

#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苹

#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3 年第 11 期

总第 468 期

出版日期: 11 月 20 日

## 学术聚焦

### · 阐释学研究 ·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

韩伟 1

## 哲 学

### ·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 ·

生命规训、身体反抗与工厂制度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哲学阐释

解丽霞 王众威 10

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饶琳 17

身心一体观的古典形态：伊壁鸠鲁学派的身体观蠡测

妥建清 24

论斯托内克语境

胡扬 32

##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其现代价值意蕴

罗佳 39

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

——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视角的案例分析

彭凯 晋琳琳 47

## 政 法 社会学

### · 技术与社会 ·

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版权法分析

——禁止盗用救济路径的提出

[澳] 迈克·彭道敦 [文] 谢琳 [译] 52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及政策选择

石杰琳 庄严 55

### ·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 ·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蔡晓梅 何洁 63

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要蓉蓉 郑石明 70

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困局与方法论的重构

肖平辉 76

---

---

## 经济学 管理学

- 推动数据流通交易:要素市场细分和基础制度建设 李军林 陆树檀 路嘉明 81
-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王美艳 90
- 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虹吸或溢出效应  
——兼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 洪炜杰 罗必良 98
- 电商下乡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  
——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评估 魏下海 曾晨语 余玲铮 李 丁 107

## 历史学

-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田 澍 115
- 反主为客:1928年京津易帜、国民党政权与北平社会 王建伟 127
- 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 林浩彬 140

## 文学 语言学

- 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物性和无物性  
——从意义发生看中西艺术范式差异 王才勇 152
- 两个桃源的对话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关系的再探讨 李光摩 162
- 景图在文学传播中的生成机制与意义  
——以刘禹锡《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及其“涵碧”意象为例 戴一菲 170

# Academic Research

## CONTENTS

No.11, 2023

---

---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Space in Ancient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ites and Yue .....	Han Wei (1)
Life Discipline, Physical Resistance and Factory System: A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i>The State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i> .....	Xie Lixia and Wang Zhongwei (10)
Disparities Between Marx's and Hegel's Views on Epicurean Philosophy .....	Rao Lin (17)
The Classical Form of the Oneness of Body and Mind: A Study on the Body View of Epicurus School .....	Tuo Jianqing (24)
On Stalnakerian Context .....	Hu Yang (3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ultural View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	Luo Jia (39)
The Evolu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by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	Peng Kai and Jin Linlin (47)
Copyright Analysis on Larg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Proposition of a Misappropriation Remedy .....	writ. by Michael D. Pendleton, trans. by Xie Lin (52)
Order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Sel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Big Data Industry .....	Shi Jieli and Zhuang Yan (55)
The Impact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n Resident Well-Being: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	Cai Xiaomei and He Jie (63)
Co-Embedded Collaboration: Model Innovation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Cross Regional Government-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Yao Rongrong and Zheng Shiming (70)
The Dilemma of Basic Theory of Health Law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	Xiao Pinghui (76)
Promoting Data Elements Flow and Transaction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Basic System Construction .....	Li Junlin, Lu Shutan and Lu Jiaming (81)
Marriage, Childbearing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for Females .....	Wang Meiyang (90)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Siphoning or Spillover Effects of Central C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in Guangdong .....	Hong Weijie and Luo Biliang (98)
E-Commerce to the Countryside and Rural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s Assessment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Program .....	Wei Xiaohai, Zeng Chenyu, Yu Lingzheng and Li Ding (107)
The Accession of the Emperor Wanli and Weakening of Imperial Power: Beginning of the Late Ming Politics .....	Tian Shu (115)
From the Protagonist to the Bystander: The Social Sketch Rule of Beiping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in 1928 .....	Wang Jianwei (127)
The Reform of Officia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and Abolishment of Chengcan .....	Lin Haobin (140)
On the Materiality and Immateriality in the Creation of Art Form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Paradig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ning Emergence .....	Wang Caiyong (152)
A Dialogue Between Two Peach-Blossoms Spring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he Travels of the Peach-Blossoms Spring</i> and <i>The Poems of the Peach-Blossoms Spring</i> .....	Li Guangmo (162)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and Significance of Scenery and Pictures in Chinese Classical Communication: Taking Liu Yuxi's <i>Answering the Dongyang Yu Ling Han Bi Tu Poetry</i> and Its "Han Bi"-Image as an Example .....	Dai Yifei (170)
English Main Abstracts .....	(177)

---

---

学术聚焦

· 阐释学研究 ·

##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sup>\*</sup>

韩伟

**[摘要]**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礼乐 公共理性 公共空间 中国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I02；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01-09

中国古代的“公共理性”实质上就是道德理性。不同于其他文化体中的哲学理性、宗教理性，道德理性更加强调道德之善对人生及社会的作用。其在个体修养层面秉承儒家体系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内核，在世界观和伦理观层面坚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等级准则。对自身良善的修持，对天地的敬畏，对身处高位者的尊重，对尧舜禹等圣人言行的模仿，是道德理性的基本构成要素。《说文》释“德”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段玉裁注曰：“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sup>①</sup>即是说有德之人，不仅要追求自身完善，还要惠及他人，实现对他人的影响。自己与他人实际上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当社会趋向信仰一体化之时，就是社会大治之时，这构成了道德理性的运行法则。

### 一、礼乐与道德理性的关系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道德理性如何推行呢？答案是礼乐。礼乐是一个合成概念，礼乐一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这可以追溯到巫术时代。巫文化的核心是对天地的敬畏，《说文》释“巫”为“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其中包含了基本的等级观念，“无形”与“神”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巫师是与它们沟通的桥梁，现实中的人则处于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在之后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神”逐渐人间化，甚至与现实世界的帝王相结合，于是天地人的等级观念变成了现实社会的礼仪规范。至于乐，亦与巫文化密不可分。巫术仪式已经包含了诗、乐、舞的一体性存在，乐为“百兽率舞”的拟兽性舞蹈提供音声支撑，在感性层面是部落成员狂欢的媒介，在理性层面达到“降神”的神秘企图。因此，从巫文化源头来看，礼与乐同根同源，无法分离。历代研究者因视野和知识结构的不同，或者关注礼学，或者聚焦乐学，但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乐论视域下中国美学范畴形成与建构研究”（20BZW031）、哈尔滨音乐学院东北亚音乐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东北肃慎族系歌诗史”（XT2022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sup>①</sup>〔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02页。

这仅是基于研究精深性和可操作性的做法，是一种人为性割裂，并不代表礼、乐本身便天然如此。

依托礼乐，道德理性得以落到实处。在道德理性的形成过程中，孔孟式的义理言说固然重要，但道德的真正实施，必须落实到操作层面，礼乐承担了这一任务。在《周礼》中，严密的职官体系为礼乐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春官亦称“礼官”，统领执掌礼事、乐事、卜筮、祝巫、星历、车旗之类的官员凡 70 职。学界虽然对该书的产生年代说法不一，但基本上都承认它能够反映出周代职官分布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春官总体上属于“礼官”性质，但“乐事”却是其职责所辖，由此进一步印证了春秋以前的礼乐一体状态。作为“礼官”之首的大宗伯，全面负责国家对天神、人鬼、地神的祭祀，其中包括“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协万民，以致百物”，<sup>①</sup>按照宋人王与之的解释，“天产”包括日、月、风、云等物象，它们具有“隐然难见”的性质，故归入“阴德”之列；“地产”包括山、林、川、泽等物象，它们“显然可见”，故归为“阳德”之属。<sup>②</sup>无论日、月、风、云，还是山、林、川、泽，都有变幻不定、过犹不及的隐患，所以需要礼乐进行规约节制，以此实现天地、鬼神、万民、百物和谐的局面。显然，这段话不仅礼乐合论，而且将礼乐与天地之德相勾连。这种天地之德恰是人间道德的母体，礼乐与天地之德相关，自然就具备了干预人间道德的哲学基础。大司乐隶属大宗伯，他作为执掌“乐事”的主官，负责具体的人间道德教化，不仅要选择“有道者、有德者”对国子进行教育，还要在教育过程中灌输“中、和、祗、庸、孝、友”等德行内容，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在日常行为层面落实道德教化。《礼记·经解》称《礼》经之教的效果为“恭俭庄敬”，《乐》经之教可以实现人性的“广博易良”，礼、乐之经虽有物理划分，但义理相通，它们共同指向道德的完善。

礼乐作为道德理性的具体展现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借助“深化礼乐之义”“复兴礼乐之器”“规范礼乐之制”等途径，将道德理性深植于社会。就深化礼乐之义而言，沿着周代将礼乐与天地之德相勾连的路径，后世礼论和乐论往往随时代思潮，进一步强化天地与人间的联系，为人间道德的合理化寻找先验依据。比如，汉代便进一步将礼乐与阴阳结合，《汉书·礼乐志》云：“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sup>③</sup>阴阳二气的地位较前代有显著提升，禀其特质而生的礼乐，必然具有通神明、正人伦的功效。这种义理经董仲舒“天人之说”的系统建构，遂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共识。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董仲舒直言“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sup>④</sup>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具有阴阳属性的礼乐成了“民修德而美好”的重要工具，故汉武帝执政期间推行了“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sup>⑤</sup>等一系列明智之策。客观而言，对礼乐之义的锻造历代都没有停歇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除了汉代，还有魏晋和宋明时期，前者将礼乐与玄学相结合，后者将礼乐与理学相勾连。尽管各时期的方式不同，但基本思路仍然遵循汉儒的路数，最终指向的仍是以德治为根基的社会治理。

就复兴礼乐之器而言，“器以藏礼”的逻辑基础是“器以藏德”。对礼乐之器的建设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以北宋为例，《宋史·乐志》载，宋代用于雅乐演奏的乐器有 20 余种，分别是编钟、铸钟、编磬、特磬、鞀鼓、建鼓、应鼓、晋鼓、雷鼓、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巢笙、匏笙、箫、竽、篪、笛、埙、柷等，其种类涵盖“八音”之全部。这是宋代君臣不断建构的结果，比如仁宗时期，翰林王珪针对雅乐演奏中无“木”音的现象，主张加入柷、敔两种乐器，称：“夫所谓柷、敔者，圣人

①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82 页。

② [宋]王与之：《周礼订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520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027 页。

④ [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17-418 页。

⑤ [汉]班固：《汉书》，第 212 页。



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祝、敌之用。”<sup>①</sup>王珪恢复木音的依据是上古《韶》乐以及《书经》所载，带有明显沿袭传统的特征，他的主张得到了仁宗肯定，自此雅乐演奏中有了木类乐器的参与，“八音克谐”审美想象得以形成。这里，乐器充当了理想社会的表象，以礼乐之器构筑社会道德的初衷显而易见。礼乐之器还可以超越族性隔阂，成为某些少数民族政权接受汉族道德的载体。宋为金所灭，《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载，靖康二年（1127）正月，女真人攻破汴梁“从正月初十日以后，节次取皇帝南郊法驾之属。是日尚书省奉军前圣旨，令取五辂副辂卤簿仪仗，皇后以下车辂卤簿仪仗，皇太后诸王以下车辂卤簿仪仗，百官车辂仪仗，礼器、法物、礼经、礼图、大学轩架、乐舞、乐器、舜文王琴、女娲笙、孔子冠、图识、竹简、古画、教坊乐器、乐书、乐章、祭器”。<sup>②</sup>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易代之际屡有发生，礼乐之器成为固有文明的象征，其中承载的道德基因，亦超越了时空和种族的域界。

礼乐之制与礼乐之器具有相似规律。道德性在礼乐制度发生之初便已渗透其中，按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说法，“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公吸收夏商丧德而失天下的教训，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改良，周礼的宗旨实际上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sup>③</sup>王国维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德与礼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德的呈现必须借助外在载体，需要形式因素将之外化，此种背景下礼制就担当了这一角色。除礼制之外，乐制也具有同样的属性。以唐代为例，自太祖武德九年（626）下诏令太常少卿祖孝孙制定雅乐，至太宗贞观二年（628），在张文收等人的协助下最终完成了“大唐雅乐”的建设。祖孝孙、张文收的贡献主要在定律层面，即用旋宫之法确定了官方的十二律和八十四调，并确定相应的雅乐乐章，名为“十二和”，取“大乐与天下同和”之义。“十二和”乐章经过虞世南、魏征等文臣的几次修订之后，于贞观十四年（640）最终确立，并在唐王朝一直沿用。此类定律、定名历朝普遍存在，比如宋代自太祖至徽宗，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乐议（太祖朝为和岷，仁宗朝为李照、阮逸、胡瑗，神宗朝为杨杰、范镇、刘几，哲宗朝为范镇、司马光，徽宗朝为魏汉津），试图对作为律准的黄钟律管进行确定。另外，亦在建国之初改后周“十二顺”乐名为“十二安”。从唐、后周、宋的“和”“顺”“安”等乐名可以看出道德性因素已经完美地灌注于国家音乐体制之中，其目的无疑是彰显道德崇高感，建构文化认同。

## 二、显性权力：礼乐营构公共空间的方式之一

道德理性在民族文化体中获得了公共性的延续，从而使古代中国社会体现出明显的自生长性和自运行性特征。哪怕帝王处于昏聩状态，甚至社会深陷动荡局面，整个民族仍会保持固有的节奏不断前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道德理性在人们观念以及民间社会中的根深蒂固。某一时期的政治体系可能崩塌，但建基于修身齐家基础上的道德信仰体系却异常坚固，这种道德理性或者说道德自觉使绝大多数成员身处其中却不自知。礼乐是信仰体系的载体，道德理性是内核，而让绝大多数成员身处其中却不自知的环境就是公共空间。总体而言，礼乐通过不断的阐释过程塑造公共空间，其方式包括三种：一是显性权利话语建构；二是隐性文化环境塑造；三是微观典籍阐释。

礼乐是一种权力，或者说礼乐本身就是权力空间的建构者。周代以后，制礼作乐的主导者往往是帝王，以他们利益为代表的权力话语成了推动礼乐运行的主要力量。《礼记·礼运》言“礼者，君之大柄也”，君主驾驭权力的重要工具是礼乐建设，通过倾向性的礼乐文化建设，或者塑造自己的形象，或者巩固自己的地位。英国学者汤普森认为阐释的过程就是权力空间建构的过程，“在古代，政治领袖及其他人通过象征性权力为自己的政治权力赢得合法性，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张江对这种观点加以肯定，进而指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乃至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

①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71页。

②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4页。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4、232、243页。

夺取和掌握阐释的权力”，<sup>①</sup> 这些观点适用于解读古代帝王进行礼乐建设的深层动机。总体而言，古代帝王通过礼乐或礼乐阐释建构权力话语，其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主动型，一种是被动型。

首先看主动型礼乐建构。唐太宗李世民在立国之初即在魏征等人的协助下制定“贞观礼”，基本精神是不拘泥古礼，兼收并蓄，“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sup>②</sup> 主张威压与人情相结合。这一指导原则亦在后来的“显庆礼”“开元礼”中得以延续，遂使现实性与民间性在唐礼中获得了良好结合，为大唐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代帝王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武则天。为了彰显身份和统治的合法性，对礼乐的重新厘定用力尤勤。《唐会要·服纪上》载武则天在高宗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提出改革子女为母亲服丧的制度，按照《仪礼·丧服》《礼记·丧服四制》所载，父亲健在，母亲亡故，子女只为其着丧服一年，这与为父亲着服三年的情况不同。对此，武则天提出“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理由是：“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也。……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sup>③</sup> 一方面将“礼缘人情”作为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此前提下认为不必拘泥成例，以“报母之慈”作为准则。这一改革到垂拱元年（685）正式写入当时的礼典《垂拱格》之中，并成为官方定例。历史上此类例子不限于作为女性的武则天，很多男性帝王由于出身不正，也往往会采取类似手段，较典型者如明代嘉靖帝，其旷日持久的“议大礼”活动，使“经画自心”“乐章屡易”时有发生，深刻地改变了明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走向。<sup>④</sup>

其次看被动型礼乐建构。“主动”和“被动”具有相对性，唐太宗、武则天、嘉靖皇帝等人进行的礼乐建设，固然是一种主动性的权力建构，但其中必然包含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式的被动抉择。而在某些少数民族掌握政权时期，帝王们吸收中原礼乐开展文化建设，看似被动，却蕴含着他们鲜明的自觉意识。北宋时期，北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就契丹而言，总体上处于“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sup>⑤</sup> 的状态。耶律阿保机立国之后，积极吸收中原汉地礼乐文化，《辽史·太祖本纪》载其于神册三年（918）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并亲自带领皇后、皇子、嫔妃等拜谒孔子庙。耶律德光（太宗）于大同元年（947）灭掉后晋，班师回朝之时，“唐、晋文物，辽则用之”，这些“文物”中包括制度性文献以及礼器、乐器，乃至大量乐工，自此辽朝的礼乐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宗之后，穆宗强调“朝会依嗣圣黄帝（太宗）故事，用汉礼”，<sup>⑥</sup> 这几乎是辽朝后来君主的共识，从而使中原礼法与本民族礼俗充分融合。与辽人的全面吸收态度不同，金朝帝王则表现出一定复杂性。一方面，在建国之初，“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sup>⑦</sup> “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sup>⑧</sup> 另一方面，到了世宗、章宗时期，政权渐趋稳定，此时帝王开始改变前期亦步亦趋的“礼乐化金”的策略，一变为“金化礼乐”，以本俗为主实现与中原礼乐的融合，比如世宗以“女真人浸忘旧风”感叹本民族歌舞的弱化，当其巡视本族发源地金上京时，面对“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的现状，更是“泣下数行”。<sup>⑨</sup> 尽管世宗呈现如此态度，但总体上仅是理性的担忧和反思，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金初便形成的礼乐政策，故金末元好问才以“典章制度几及汉唐”为本朝张目。

元、清时期，统治阶层的礼乐建设与辽、金具有相似性。元代统治者出于强化王权的考虑，仅对中

① 张江：《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张江与约翰·汤普森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11期。

② [唐]吴兢著，裴汝诚等注：《贞观政要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3页。

③ [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75-676页。

④ 韩伟：《明代礼乐变革与通俗文艺的关系脉络》，《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⑤ [元]脱脱等：《宋史》，第10863页。

⑥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907、69页。

⑦ [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89页。

⑧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58页。

⑨ [元]脱脱等：《金史》，第892页。



原礼仪中的朝觐礼和祭祀礼表现出热衷态度，所以《元史》总结称“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sup>①</sup>后来朱元璋亦感慨道“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sup>②</sup>但元人却对中原雅乐及制度青睐有加，具体表现为：在雅乐精神方面，模仿“大章”“大韶”“大武”，定雅乐乐名为“大成”，并以《乐记》《周礼》《周易》《诗经》等典籍充实其内涵；在乐律方面，仍然沿用宋徽宗时期魏汉津所制“大晟乐”体系；在乐器方面，宋朝八音之器是其主要吸纳对象，故《元史》称“元初，钟用宋、金旧器”“磬亦用宋、金旧器”。<sup>③</sup>清代统治者取得政权之后，随即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热情。总体来看，清代礼乐文化表现出两种趋势：首先，基于文化体内在冲突，一方面以“退理还礼”的方式，肃清明代心学的不良影响，退回到人伦日常的实用礼乐形态，另一方面突出礼乐经典的治理角色，呈现出“以经术为治术”的文化导向，这在乾嘉以后尤为突出；其次，基于外来文化冲突，一方面伦理之礼逐渐受到经世之礼（法）影响，礼乐文化与西方法制文化开始深度对话，另一方面礼乐之乐被音乐之乐取代，雅乐的道德属性被削弱，清中叶以后雅乐仅是一种符号性存在。即便如此，礼乐在清代权力空间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们见证了前现代权力运作模式与现代模式之间的对话和交融。

### 三、隐性环境：礼乐营构公共空间的方式之二

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乐除了以显性的方式进行制度营构和道德灌注之外，还往往采取相对隐性的方式，潜移默化之中完成对文化环境的塑造。如果将这种隐性方式进一步打开的话，我们认为对天人、中正、道艺等观念的塑造是最基本的手段。

首先，礼乐与天人意识相关。客观地讲，天人意识是人类天然具备的一种观照世界与自身的意识，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文化体所具备的天人观念会存在明显差异，不仅“天”与“人”内涵会随着历史演进而有所不同，而且两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脉络也会迥然有别。在古代中国，礼乐是促进中国特色天人意识形成的重要媒介。《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有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话，与之类似，《论语·述而》亦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但他们并不是在否定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天道的不可知性。“不可知”并不意味着“不试图去知”，礼乐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桥梁。《礼记·乐记》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秉持天地属性，是天道的载体。《礼记·丧服小记》亦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现实伦理是人道的展现，礼与人道互为表里。以此观之，天道、礼、人道之间构成了相互勾连的体系，天道难以知晓，但通过现实的礼将秉持天道属性的人道具体化。另外，“人道”除了包括狭义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之外，还指代政治统治，孔子在《礼记·哀公问》中回答鲁哀公“人道谁为大”时，直言“人道政为大”，这不仅扩大了对人道的理解，也提升了现实礼法的意义。纵观轴心时代以后礼的发展历程，无论其变体为“法”，还是提升为“天理”，总体上以“天”为根基、以“人”为指向的路数不曾改变，这一过程不断夯实着具有道德属性的天人意识。

就乐而言，乐与礼并行，促进了天人意识的完善。《尚书·尧典》载音乐演奏可以实现“神人以和”“百兽率舞”，《尚书·益稷》也有乐音致“祖考来格”“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的表述，神、人、祖考、百兽等都在音乐之中和谐共处，天与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动性感应关系。这种天人互感关系在周代以后被赋予道德性内涵，于是《乐记》在“乐以象德”的总框架下，以乐为基点建构了天地之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人性之和（“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社会之和（“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等由天而人而社会的逻辑框架。其中蕴蓄的天与人的关系具有道德性，包含了“天德”与“人德”之间的彼此呼应。这种呼应及其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获得了更充分展现。按其所载，葛天氏之乐有“达帝功”“依地德”的内容；颛顼时的《承云》乐“以祭上帝”；帝尝时期的音乐“以康帝德”；

①[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79页。

②[明]朱元璋：《御制大诰》，《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③[明]宋濂等：《元史》，第1700页。

尧帝《大章》乐“以祭上帝”；舜帝的《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这里的“帝”或“上帝”带有原始崇拜色彩，是“天”的人格化。自禹之后这种色彩逐渐转淡，乐所承载的道德变为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具体的帝王之德，“德”的内涵发生了由天到人（君主）的转变。<sup>①</sup>由此可见，天与人的一体关系，以及道德性的呼应应在礼乐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形成，与意识形态中的其他方面共同营造了社会话语体系。

其次，礼乐为中正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助力作用。中者，不偏不倚；正者，正直不杂。礼乐通过两种方式构筑社会的中正意识，一种是礼与乐之间的和谐共存，另一种是礼论和乐论对中正的强调。就第一种方式而言，按照《礼记·乐记》的说法，礼的作用在于区分等级，乐的作用在于弥合差异，两者需要相得益彰，否则“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与乐在差异基础上追求辩证统一，既多元并存，也不偏不倚，保持平衡，这种情况对人们生活逻辑乃至人格构成都产生了示范作用。就第二种方式而言，礼乐理论本身就蕴含了直接性的“中正”观念。礼最初源自神、鬼、人之间的等级秩序，以天地秩序指导人间秩序，所以在《周礼》中便存在专门侍神的“神仕”一职，其职能为“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意思是神仕根据日月星的规则确定人鬼、天神、地神在天上的位置，绘制相应图形，以做辨别。郑玄引《国语》“古者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中正……如是则神明降之”，<sup>②</sup>注释这段话指出，神、鬼、人位置的井然有序与个体的“中正”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对神、鬼按规则进行礼遇的过程就是人间社会达到中正状态的过程。就人间礼仪而言，礼的要素渗透在方方面面，制作礼仪的基本参照除了天地秩序之外，还有世俗人情，于是《礼记·冠义》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sup>③</sup>礼从行走坐卧、仪容言语的端庄中正开始，由人身而社会，这是礼得以实施的基本逻辑。以上两例，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礼与中正之间的关系。礼作为社会的显性规则，其渗透的领域不仅包括祭祀、立身、君臣等维度，也延伸到建筑、文学、艺术等很多方面，由此，其蕴含的中正精神也得以推广。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乐论中。雅正是音乐审美的重要指标，就儒家伦理体系而言，雅正就是中正，两者之间具有互通关系。扬雄《法言·吾子》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雅与郑的关系就是正与邪的关系，郑音或邪音一直被主流乐论所摒弃。到了明清时代，这种观念亦滞留在音乐审美领域，甚至在个人性极强的琴乐层面亦是如此，故徐上瀛在《溪山琴况·速况》中总结称“疏疏淡淡，其音得中正和平者，是为正音”。<sup>④</sup>除此之外，对其他各“况”而言，尽管表述方式有所差异，但中正和平都具有总括性。礼乐与人们生活水乳交融，中正观念便通过这样的途径熔铸到日常生活和日常信仰之中。

再次，礼乐帮助塑造了整个社会对“道艺”的追求。如果说天人意识及中正观念偏于抽象层面的话，那么道艺追求则偏于实践和具体化。“道艺”与“道义”相关而又不同，就相关而言，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道义是道艺的理论支撑；就相异而言，“道艺”主要是在道德框架下对技术精纯的规定，如果不符合伦理规范，那么无论如何高超的“技”也不能称为“艺”。“道艺”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周礼·地官·乡大夫》载：“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地官·州长》亦有类似文字：“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sup>⑤</sup>在这些表述中，德行与道艺往往对应出现，但并不是说两者截然分开，道艺实际上是在德行的笼罩下存在的。在礼的施用过程中，无论对礼器之华美的规定，还是对仪式之谨细的规定，都往往凌驾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上，

① 韩伟：《〈吕氏春秋〉乐论思想疏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27页。

③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12页。

④ [明]徐上瀛：《溪山琴况》，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37页。

⑤ 杨天宇：《周礼译注》，第170、171、173页。

最充分地彰显出古人对精益求精的追求。乐的运行亦是如此,各种乐仪与礼仪同时存在,水乳交融。乐悬制度、用乐场所、乐器种类、乐曲等级、乐工使用等方面在各个时代都有明文规定,且帝王、大臣都有参与。虽然其中主要体现着对等级秩序的重视,但完全可将它们视作广义之“技”或“艺”。一般情况下,学界往往将《乐记》视作论乐的集大成性成果,虽然在《礼记》中仅存十一篇,但按郑玄等人的注解,其全书至少还包括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寔公等十二篇,而且这些篇目主要以讨论技艺为主。将它们与现存篇目并而视之,正好体现了义理与技术、道德与道艺的融合。笔者认为:“道艺精神实际上就是对技艺之精、技艺之善的强调。正是由于美与善的参与以及技与艺的相得益彰,才使得古代更加推崇‘技艺’而不看重单纯之‘技术’,青睐‘道艺’而不一味强调纯粹道德性之‘道义’。”<sup>①</sup>总之,“道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道德与技艺的总体性追求。

#### 四、典籍阐释:礼乐营构公共空间的方式之三

礼乐对显性权力话语的建构,主要是在以帝王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施行,这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掌控阶层;礼乐对隐性文化环境的营构,主要基于礼乐承载的天然道德根性的自发释放。除了这些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之外,在典籍阐释过程中,礼乐经典的征用以及礼乐惯例的援引,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空间塑造方式。与前两种方式不同,典籍阐释偏于微观,本质上属于“用礼”“用乐”的过程。典籍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思想传播和学术建设的作用,对经典著述的不断阐释以及借用经典对后世文献的再解读,构成了一门独特的学问——经学。广义经学是对“解经之学”的泛称。无论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还是学者们基于时代及个人倾向,进行或“诂”或“阐”的行为,<sup>②</sup>依凭的对象往往都是轴心时代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著述。礼乐类的经典(如《周礼》《仪礼》《礼记》等)成了汉代以后学术发展的重要依据对象,它们不断巩固礼乐文化的影响力,以相对微观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公共空间的塑造。为了将这一过程解读得更为透彻,不妨以宋代学术为考察对象。

宋代学术虽以“理学”为知名,给人偏于义理阐发的印象,但“礼学”实为底蕴。由“礼”到“理”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礼仪秩序向天理秩序升华的过程,两者本质相同,只是呈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对宋代礼学有所梳理:“宋时三《礼》之学,讲习亦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有王昭禹、易祓、叶时,皆可观。《仪礼》有李如圭《集释》《释宫》,张淳《识误》,并实事求是之学。《礼记》,卫湜《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周易》。而陈祥道之《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陈振孙服其精博……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取大、小戴及他书所载系于礼者附之,仅成家、乡、邦国、王朝礼,丧、祭二礼未就而朱子残,黄幹续成之。”<sup>③</sup>按照《宋史·艺文志》所列,宋代礼仪性典籍多达一百余部,因此皮锡瑞所做的仅仅是宏观性梳理。其中提到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连同并未提到的杨复《礼仪图》、魏了翁《仪礼要义》等礼书,都属于“考订注疏”及“纂辑旧说”性质的专著;与他们不同,朱熹、卫湜、黄幹等都是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所著《礼记集说》《仪礼经传通解》虽然有“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以及“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的问题,但总体上是建立在经典基础上的再阐释,开启之功不容忽视。上述做法代表了宋代“三礼”之学的两种取向,前者属于“我注六经”模式,后者属于“六经注我”模式,但在后一种模式中,礼书的经典地位并未发生动摇。这就使得无论哪种“用经”方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留存了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甚至在后一种模式中得到了升华。

除了上述成规模的礼书创作之外,更为普遍的是一般性著述中对“三礼”内容的征引和运用。宋代礼仪建设的重要特征是文人作用的凸显,他们成为制礼作乐的主要力量,因此笔者曾以“文人礼治模式”

① 韩伟:《论中国礼乐精神及其呈现形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 张江:《“阐”“诂”辨》,《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③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4页。



对之进行界定。文人礼治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民间礼乐开始蓬勃发展，以百姓日常生活为对象的礼仪典籍不断涌现，其中主要的两类是家礼和学礼。前者的代表如范仲淹《家训百字铭》、宋祁《庭戒诸儿》、欧阳修《示子》、邵雍《戒子孙文》、二程《婚礼》《祭礼》、张载《祭祀》《丧纪》《女戒》、司马光《书仪》《家范》、黄庭坚《家戒》、叶梦得《石林家训》、陆游《放翁家训》、吕祖谦《家范》、朱熹《家礼》、真德秀《教子斋规》等；后者如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含“乾道四年规约”“乾道五年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乾道九年规约”）、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程端礼和董铎《程董二先生学则》、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等。在这些典籍中，三礼成为重要的引用对象，比如司马光《书仪》的“居家杂仪”部分，涉及父母管理子女、妻子的职责、子女的义务、下人的行为等。谈到子女义务，就化用了《礼记·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的话，称“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奉养之”。<sup>①</sup>《礼记·内则》还有“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缡，笄，总，拂髦，冠，纁缨，端，鞞，绅，搢笏”的话，对此，司马光《家范》亦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盛容饰，以适父母之所”。<sup>②</sup>此类例子在“家礼”类礼书中不胜枚举。“学礼”类著述亦是如此。比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明确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其中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源自《礼记·中庸》。同时，朱熹对古礼逐渐沦丧十分痛心，在书院中身体力行推行学礼，白鹿洞书院落成之时，他亲自以释菜礼祭祀孔子，“鼓篋之始，敢率宾佐，合师生恭修释菜之礼，以见于先圣（孔子），以先师充国公（颜子）、先师邹国公（孟子）配”，<sup>③</sup>这明显是对《礼记·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精神的延续。自此，“释菜”礼在宋代及以后的书院中成为必备的学礼，比如南宋理宗时期设立的带有纪念程颢性质的明道书院，其《学规》的第一条即为“春秋释菜，朔望谒祠，礼仪皆仿白鹿书院”，具有明显的因袭性质。

通过对礼的分析，可以看到宋代的文化建设有逐渐下移、切于人情世用的倾向。在众多先秦经典中，礼乐类经典的这种状况更为明显。欧阳修说：“六经者……《书》载上古，《春秋》纪事，《诗》以微言感刺，《易》道隐而深矣，其切于世者《礼》与《乐》也。”<sup>④</sup>《乐经》亡佚，其角色则由《乐记》充当，所以宋代典籍中《乐记》及其文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总体来看，宋代典籍对《乐记》文字的征引包括义理性征引和哲学性征引。就义理性征引而言，主要以《乐记》为媒介阐发道德、伦理、政治观念。比如司马光《中和论》论述“中和”观念，就说“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乐记》曰‘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以至于‘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盖言乐以中和为本，以钟鼓为末也”，<sup>⑤</sup>这是对《乐记》文字的直接使用。除此之外，更多时候学者们往往以化用的方式引用，比如韩琦说“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噍杀啍缓之声随之而应之，非器之然也”，<sup>⑥</sup>这段文字的背景是，仁宗朝频繁进行乐制改革，试图恢复古乐、古器。对此，韩琦用上段话进谏仁宗。《乐记·乐本》有“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sup>⑦</sup>两相比对，可以明显看出韩琦对《乐记》的化用。就哲学性征引而言，主要是指理学家对《乐记》的使用。宋人卫湜在《礼记集说·统说》中说：“河南程氏曰……《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得之。”<sup>⑧</sup>在朱熹辑录的《二

① [宋]司马光：《书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480页。

② [宋]司马光：《家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677页。

③ [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37页。

④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73页。

⑤ [宋]司马光：《传家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592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01-2802页。

⑦ 杨天宇：《礼记译注》，第467-468页。

⑧ [宋]卫湜：《礼记集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册，第6页。

程遗书》之《畅潜道录》篇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在二程、朱熹等人的作品中的确存在大量借用《乐记》的痕迹。兹举数例：《乐记·乐礼》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周敦颐《周子通书·礼乐》即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sup>①</sup>《乐记·乐象》曰“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记·乐情》曰“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情，管乎人情矣”，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开篇即言“‘礼反其所自生，乐乐其所自成’。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乐统同，乐吾分而已”。<sup>②</sup>除此之外，最为明显的要数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看法。《乐记·乐本》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这一观念在二程表现为“灭私欲则天理明”，在朱熹表述成“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将这种隐性的征引关系进一步明确为：“明道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愚按《乐记》已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至明道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sup>③</sup>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无论是“三礼”还是其中的《乐记》，都在宋人典籍中占有重要位置。宋代学者们或者在纂辑故释、章句疏解、名物训诂层面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征引礼乐典籍，或者采取注入义理的方式，以礼乐典籍为媒介阐发哲学观点，建构哲学体系。这两种方式殊途同归，都对礼乐文化的延续起到了助力作用，让礼乐始终存续在学者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诚然，宋代经学常被人诟病，认为其主观多于客观且“以理注经”，但从礼乐文化建构以及以之为媒介的公共空间营构的角度看，它们的差异仅是方式上的，而非目的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宋人在典籍注疏过程借助礼乐经典进行的文化空间营构，是历史的缩影，具有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将中国文化的本质定义为礼乐文化。其中蕴含的道德理性，不仅规约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也对学术和文艺起到指引作用。无论经学阐释、诗学阐释，还是艺术创作，都无法脱离儒家道德体系的影响。牟宗三将“礼乐型的文化系统”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并且认为可以“从这里开辟出中国文化生命的全幅精神领域”。<sup>④</sup>朱光潜谈到礼乐精神时亦曾指出：“礼乐兼备是理想……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评论一个人的修养，一派学术的成就，一种艺术的风格，以至一个文化的类型。”<sup>⑤</sup>礼乐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其不断被再阐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道德理性成了渗透于社会整体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具有互助关系，一方面公共理性依托于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公共理性又对公共空间中主导文化观念的延续起到保障作用，从而塑造公共空间，因此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不可分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礼乐除了塑造并承载社会的道德理性之外，也参与了公共空间的营构，从而完成了对权力话语和文化信仰的推广和延展。因此，从礼乐阐释的视角解读中国文化，观照理性、空间、权力的形成是可行的中国路径。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宋]周敦颐：《周元公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427页。

② [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1页。

③ [宋]黄震：《黄氏日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11页。

④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⑤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月刊》1942年第7期。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 生命规训、身体反抗与工厂制度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哲学阐释\*

解丽霞 王众威

**[摘 要]** 工厂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护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身体作为一种能动的物质实在，是工厂制度的承载物和驱动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青年恩格斯从身体视角对工厂制度进行了深度剖析。工厂制度的全部就是关于在空间中规训工人身体所呈现的种种身体“景观”。工厂制度通过技术赋权、时间掌控、空间封锁和纪律威慑，使工人身体在劳动场域和生活场域呈现出工具化和节奏化倾向，陷入了“苦难窟”，时刻处于“监视”之中。工厂制度的全方位规训，促使工人身体发生转向，塑造了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化身体。身体的革命化催生着工人的身体反抗。工人在对身体的体认与社会的“沟通”中实现了身体认同建构，在身体反抗意识觉醒中回归了身体主体性，在身体反抗行动的在场中推动着身体走向解放。

**[关键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工厂制度 身体政治 身体规训 身体反抗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10-07

工厂制度通过运用自动机器体系、制定严格规章制度、建立封闭生产单元，重塑了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和秩序，为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奠定了重要基础。工厂制度作为具象的管理方式，需要借由工人身体来完成叙事。因此，工厂制度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还内含着对工人身体的形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青年恩格斯将工人身体同工厂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之“身”与工厂制度之“体”之间的镜像，既昭示了工厂制度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意志对工人身体的支配和驯服，又凸显了工人阶级“赤裸生命”的塑造，加速了其反抗意识的觉醒。在此意义上，工厂制度促生了身体的革命，同时也塑造了革命的身体，身体与革命的共融，展现着工人运动的现实图景。

## 一、生命与政治：身体承载的双重叙事

为了保持机器的正常运转，确保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资本家逐渐确立并完善了工厂制度这一治理工具。工厂制度是在技术所推动的机器发明和使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家庭作坊时期，生产工具简便且易于操作，劳动者自己能够在家庭中完成所有工序。随着工业革命序幕的拉开，机器不断发明并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直接推动着工厂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从手工、水力到蒸汽动力，技术进步促进了纺纱机器的不断改进，工厂生产取代了家庭生产，工厂制度随之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以机器为基础和以工厂为载体的工厂制度开始与家庭作坊在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8ZDA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解丽霞，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众威，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41)。

之间展开竞争。结果，工厂制度取得了胜利。工厂制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整个生产领域，还拓展到社会领域，在造成手工业工人失业的同时，又推动着他们“再就业”；在夺走手工业工人饭碗的同时，又促使他们成为“工资奴隶”。为了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需要，资本家必须设计出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控制工人身体，使工人绝对服从机器大生产的划一运动。对此，工厂主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sup>①</sup>“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sup>②</sup>“兵营式的纪律”就是资本家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工人，把工人的活动束缚在机器生产之上，使工人成为“活的机器”。它与机器、工厂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工厂制度，为资本家提供了“治理”工人的“工具”。

身体是人确证自我存在的基本条件，资本家运用工厂制度“治理”工人，实质上就是对工人身体的“治理”。工人身体是由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构成的。自然身体，也即生理身体，是“能被撞击、敲打、碾碎，进而被摧毁”<sup>③</sup>的。它是由血肉和骨骼等构成的活生生的躯体，通过生育实现生命的生产。社会身体是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身体。依靠身体这个实体，工厂制度完成了对工人的全面“治理”。

身体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工厂制度对工人生命的摧残。福柯指出：“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sup>④</sup>工厂制度通过对工人身体的精心谋划，不断榨取工人的生命潜能。机器的流水线生产作业，要求工人身体必须各就其位，按照机器节奏同步运动；罚款、解雇和体罚等手段，要求工人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动作”，竭尽全力地工作。在高强度和超负荷的生产支配下，工人的“肉体”和“灵魂”遭受着双重迫害，不仅制造出了驯顺的肉体，使工人成为服务于生产的“有用力量”，而且还在工人身体上确立了一种持久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剥夺了工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身体的受难唤醒了工人的仇恨意识，激起了工人的身体反抗行动。正是对工厂制度下身体悲惨遭遇的真实体验，使工人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与资本家的阶级分界，强化了工人的反抗行动。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sup>⑤</sup>在工厂制度的钳制下，工人身体由温驯的身体走向反抗的身体，开始追求身体权利、重获人格尊严和塑造自由空间。

身体的血肉之殇成为对接生命与政治的中介，推动着工人从生理性身体向政治性身体转变。工厂制度对工人的肉体剥蚀，营造了身体暴力的现实图景。在身体危机的烘托下，资本家成为工人共同的敌人，工人的斗争行动获得了道义支持。在身体意义建构中，生命与政治的联姻作用就此显现：工人通过“集体意识”指认了资本家的“恶”，并将这种“恶”上升为“阶级仇恨”，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完成了从劳动身体向革命身体的转向。

## 二、规训与惩戒：工厂制度的权力展演

在生产力意义上，“肉体基本上是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sup>⑥</sup>只有实现对工人身体的征服，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工人身体力量转化为强大生产力。工厂制度通过技术赋权、时间掌控、空间封锁和纪律威慑，建立了一套全面的、持续和稳定的操控机制，从而塑造了“听话”的身体。

### （一）技术赋权：身体的工具化

规训是包括技术在内的权力系统，是“一种技术学”。<sup>⑦</sup>工厂制度建立的直接原因就是技术所推动的机器发明和普遍应用。作为技术的具象表征，机器的使用不但没有减少对工人身体的依赖，反而加重了工人身体在生产中所占分量。机器大工厂改变了生产场域，促使工人身体作为劳动要素附着机器发生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8页。

③[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④[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⑥[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7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42页。

移，机械化生产则促使工人身体成为配合机器运转的配件，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在机器的支配下，工人身体游离于生产过程，从根本上丧失了劳动主体性。

机器大工业推动了工人劳动空间的跨域迁移。在家庭手工业时期，工人凭借手工劳动在乡村过着几乎无忧无虑的生活。随着机器的发明、改进和应用，集中的、社会化的工厂生产取代了分散的、个体化的家庭生产，原料、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向最具优势的城市聚拢，“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sup>①</sup> 机器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降低了对工人技能的要求，造成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这样一来，所有工人仅需进行简单的劳动协作即可推动机器运转。最终，机器大工业把工人从手工业生产中排挤出去，增加了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家凭借着工资对工人生存需要的“补偿”，驱使工人不得不从乡村转向城市工厂劳动，从此远离美好时代，过着只能靠不断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sup>②</sup> 的日子。

工人身体在城市工厂中以“活的附属物”样态并入生产过程之中，伴随随机器单调、机械运动，严重损耗身体机能。一方面，机器生产按照分工原则，要求工人从事专门操作，导致其身体片面发展。恩格斯指出：“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sup>③</sup> 为了充分发挥机器与工人配合的最大优势，资本家把生产过程分成不同片段，将工人放置于指定的生产机位，以规范和协调生产中的“人机组合”。这样一来，工人身体在机器分工生产中碎片化了，只能得到片面发展。另一方面，机器的自动化生产带来了流水线作业，导致工人身体随机器节奏做机械式和重复性的运动，“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sup>④</sup> 而且，这种身体运动十分单调，强度大，不允许有一丝懈怠，“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投入很大的注意力，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也不能想”。<sup>⑤</sup> 机器生产不仅增加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体力支出，还加重了工人的心理压力，整个工厂中弥漫着紧张情绪。

机器的应用赋予资本家设计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权力，导致工人丧失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必须自觉服从生产节奏，工人身体唯有在机器生产中才有存在意义。

## （二）时间掌控：身体的节奏化

时间是生命的尺度。劳动、休息总是与时间相勾连的。控制时间能够引发劳动过程的改变，也能够影响日常生活形态。“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sup>⑥</sup> 工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且有价值的身体要素。在工厂制度下，时间成为描述工人身体的重要标准。工厂制度通过对工人时间的掌控，指挥工人的身体劳动和身心休息，促使工人身体在工作与休息之间来回切换，消弭了消费与休息之间的界限，从而使工人身体在严密的时间控制内做节奏化运动。

通过调配工作时间，工人身体被精密地镶嵌在生产过程之中。工人时间对于资本家而言，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的时间越多，产能也就越大。工厂制度通过三种工作时间调配方式来控制劳动过程。一是通过工作时间的“分割”，细化工人身体的活动内容。在工厂空间内，资本家把工作时间分割为不同时间段，将工人身体放置其中，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恩格斯指出，工人的一切可支配时间都被剥夺了，都被用于生产了，“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sup>⑦</sup> 在这一线性时间表中，工人身体活动都被工作时间所支配着，在紧张的工作时间中寻找自我时间。二是通过工作时间的“同步”，规约工人的集体性身体活动。按照固定的时间“节奏”，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开展共同的身体活动。在工厂制度下，工人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钟头，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同样的身体动作。时间的连续性预设了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3页。

⑥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3页。



人身体的统一性，促使工人身体在生产过程中保持同一性。三是通过工作时间的“压缩”，提高工人身体的输出效率。为了创造出更多的商品，需要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做出尽可能多的身体动作。工厂制度通过压缩工人的个别劳动时间以增加劳动时间的利用率。这样的时间管理使工人的身体活动成为一种强制性而非自愿性的生产活动，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sup>①</sup>而且，这种强制劳动对工人时间的剥夺，使工人“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sup>②</sup>这就从肉体和精神上使工人身体完全沦为生产的工具。由此，通过对工作时间的调度和安排，工人的身体按照既定的时间节律进行动作展演，满足了资本家对秩序化生产的追求。

通过创造消费景观，工厂制度以消费时间取代休息时间，推动放松的身体转向消费的身体。休息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方式，是人对自由的体验和享受。事实上，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时间的阈限已经溢出工厂空间，延展到工人的生活空间。这是由于工人在工作期间承受着工厂制度带来的巨大肉体和精神折磨，需要寻找自由消遣方式，释放身心压力。工厂通过生产消费品，营造消费景观迎合了工人的宣泄诉求，以引诱工人身体消费的方式实现了对工人“休息时间”的再安排，成为工厂制度利用时间控制工人身体的又一“发明”。恩格斯指出：“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sup>③</sup>特别是“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他迫切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sup>④</sup>酗酒在工人群体中已经成为必然现象。但是，“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毁灭性的影响”。<sup>⑤</sup>所谓的休息时间本来意味着工人的身体已经摆脱工厂制度的规制，但实际上工人并未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体时间，他们被迫进入了工厂制度创设的消费空间，继续接受来自工厂制度的时间强化控制。显然，工人的这种消费时间不是自然时间节律的转逝，而是基于一定目的而无奈接受的外来时间安排。这就是工厂制度提供给工人的可供消费的虚假循环时间，在白天和夜晚、工作和休息中不断循环往复。

工厂制度通过对时间的缜密安排，驱使着工人身体在悄无声息中被嵌入时间控制网中，在线性时间流程中不断进行身体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工人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持续地、有节奏地转动。

### （三）空间封锁：身体的“苦难窟”

身体具有空间性。梅洛·庞蒂以“身体图式”概念强调身体是进入空间、获取空间认知的方式，“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sup>⑥</sup>空间的生存意蕴，决定了空间是一种隐蔽且致命的身体规训载体。工厂制度凭借空间封闭、空间分割的方式，推动了空间与工人身体之间的对立，工人身体由此陷入了罪恶的“苦难窟”之中。

一方面，工厂制度打造封闭的工作空间，使工人身体处于监禁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于资本家而言，要发挥工人身体的最大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工人身体固定于某个场所之中。工厂是资本家组织工人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的完美空间。在物质结构方面，工厂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是“旧的兵营式”<sup>⑦</sup>的建筑，工人身体在其中遭受集体“禁闭”。在工厂内部，充斥着冰冷的自动机器、杂乱的生产物料，地面污浊不堪，车间通风不畅、空气恶劣、臭气熏天，令人窒息。这样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人“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sup>⑧</sup>同时，这种“旧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6页。

⑥[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页。

兵营式”的厂房，围墙之高，暗无天日，无形中在工人心理上施加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工人在进入工厂之后，就成为囚禁的“奴隶”。他们每天在车间内必须忍受着非人的工作环境，围绕着机器不停地从事着机械劳动，丝毫不敢怠慢。通过对工厂的灵活运用，工厂制度不仅实现了对工人身体的统一管理，也打断了工人身体与外界的必要联系，造成了工人身体在封闭工厂中饱受煎熬。

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分割居住空间，造成工人身份的等级化，损耗着工人的健康肌体。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工人聚集区。恩格斯以曼彻斯特城市居住空间为例指出：“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却尔顿和阿德威克的郊外房屋或别墅里”。<sup>①</sup>资本家通过费尽心机和有系统的居住安排，人为地进行了三六九等的身份划分。而且，工人的非人性的居住空间，使一切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的清洁环境都被剥夺殆尽了。恩格斯指出，工人在逼仄的住宅内，“在夜间呼吸的那种空气完全可以使人窒息。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sup>②</sup>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大部分工人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无力抵抗疾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工厂制度就这样通过分割居住空间，使工人蜗居在城市中最肮脏、最破败的区域，导致工人身体时刻遭受着社会的“谋杀”。

空间对于人而言，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生存空间。任何有生命的个体都离不开空间而存活。正是如此，工厂制度通过打造工人的谋生空间、分割工人的生活空间，使工人身体陷入了两难境遇，遭受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 （四）纪律威慑：身体的无形“监视”

纪律是工厂制度的重要元素。纪律是一种无形的微观控制技术，实质上是一种规训手段。福柯将纪律视为“政治解剖学”和“权力力学”，认为它“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sup>③</sup>纪律作为一种规训手段，通过制定严格的行为规范、具体的操作程序等，明确了工人身体在生产过程中“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塑造权威的方式实现了对工人身体的无形“监视”。制定和实行严苛的规章条文是工厂主监视工人身体的重要手段。工厂主为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必须制定工人所要遵守的规则、法规和条文。恩格斯指出：“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sup>④</sup>纪律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力意志，是一种规范性和持久性的非暴力的身体规训策略，迫使工人身体自觉服从。

工厂主通常采用罚款、解雇甚至残酷的体罚等措施，迫使工人“主动”就范，工人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饱受摧残。恩格斯以曼彻斯特特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为例，指出工人严格执行上下班制度，“迟到三分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sup>⑤</sup>在工厂内部，工人必须站着工作，无权坐下，“谁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罚”。<sup>⑥</sup>为了减少开支，扩大利润，工厂主以解雇来威胁工人无酬加班，“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sup>⑦</sup>在工人不服从纪律、进行反抗时，工厂主“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sup>⑧</sup>这样近乎苛刻的纪律，使工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已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1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28页。



失去了生命灵性，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约束。

工厂制度通过纪律对工人身体的“监视”，形成了一种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高雅”管理艺术。这种纪律不仅要实现对身体的有效征服，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主动服从关系，使工人主动接受、认同工厂纪律，自觉成为驯顺的肉体。

### 三、认同与反抗：身体意义的重新返场

在工厂制度下，工人肉体和精神备受摧残，身体成为物化的身体。但是，工人始终是自己身体的主宰者。阶级生活条件使工人身体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在身体的自发、自在、自觉中走向身体解放。工人对身体的直接感知中实现了自我与身体的合体，阶级生活条件为工人身体意识觉醒和身体主体性的回归提供了条件，身体的重塑终归还是要通过工人的身体反抗行动来实现。

#### （一）身体认同的建构：身体认知与社会“沟通”

身体不单单是物质性的，而且也是具有意识性的。通过对身体的体认和与社会的“沟通”，工人对身体具有了清晰的认识，实现了对身体认同的建构。

工人对身体的认同首先来源于对身体变化的认知。吉登斯指出：“身体以实践方式参与到日常生活互动之中便是维持一个连贯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构成部分。”<sup>①</sup>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身体不仅是单纯的物理实体，还是具有理性的精神存在。工人在工厂主的权力规训下持续地进行身体演绎，身体成为工厂主操控的工具，自我与身体产生了分离。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sup>②</sup>外显特征的变化和身体功能的异化，使工人的身体体验发生了变化，工人愈发意识到工厂主通过工厂制度把自己陷入了“非人”的境地。社会身份的转变给工人带来了认同转向。工人逐渐感知到自己身体遭受奴役的残酷现实，开始以一种明确的态度重建自我与身体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sup>③</sup>自我认同作为一种情感和心理过程，其本质就是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角色的理解和接受。

工厂制度对工人的身体“破坏”，使工人逐渐走向集体，在阶级中找到身体归属感。身体认同的实现有赖于个体与群体的身体契合。恩格斯指出：“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sup>④</sup>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是所有工人的身体渴望与诉求，他们不愿再像奴隶一样跟着资产阶级走。恩格斯指出：“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sup>⑤</sup>在工人群体中，“受损的身体”是全体工人不可改变的共同特征。也正是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工人之间形成了彼此的信任，产生了相同的见解和态度，组成了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在参与这种身份的建构中，个体找到了身体归属感，完成了自我的身体认同，逐渐同群体一起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产生影响和作用。

#### （二）身体主体性回归：身体反抗意识觉醒

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身体被禁锢、被侵蚀。饥饿之躯、疾病之躯和欲望之躯的巨大刺激，促使工人阶级认识到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由此，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在工人意识中逐渐恢复。

共同的苦难促使工人身体开始觉醒。在工厂制度下，工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其他一无所有，普遍过着贫困生活。恩格斯引用西蒙斯的话论证贫穷对工人的影响：“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

---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5页。

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sup>①</sup> 贫穷对工人的身体打击是巨大的，它逐渐使工人身体在奴役、剥削的环境中习惯这样的压抑与束缚。但是，贫穷在毁灭工人肉体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工人的斗争精神。恩格斯指出：“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穷到处境悲惨和食不果腹的时候，那就会更加促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秩序。”<sup>②</sup> 欲望的产生、追求与满足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它可以塑造或影响身体，是身体走向现实世界的动力。欲望，特别是生存欲望，是强烈的和革命的，这是身体主体性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身体主动性的根本前提。它意图获得生存资料，以此确认身体的存在意义。正是生存欲望的刺激，使以往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工人身体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进行身体展演。

共同利益的潜在作用，使工人逐渐意识到了作为阶级团结起来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工人群众感到他们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sup>③</sup> 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在社会寻求归属感，以集体的力量实现阶级利益最大化。工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后，才明白自己与资产者之间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就促使了工人与资产者的决裂。为了获得自身利益，工人“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分享社会设施的利益”。工人阶级从此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社会和政治上发挥影响和作用，“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sup>④</sup>

### （三）身体走向解放：身体反抗行动在场

从最初的为改善生活进行的无组织的犯罪，到成立工会，实行罢工，以合法途径和暴力手段获取更多的身体权利，再到以革命手段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实现了身体反抗行动的自发、自觉和自为。工人阶级通过反抗与“发声”“诉情”“展演”，展示了身体的“在场”。

回归身体的自由状态，必须摆脱外界力量对生命的奴役和压制，重建个人的身体意义。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若要摆脱阶级压迫下的非人境况，“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sup>⑤</sup> 工人阶级的身体反抗行动是一种力对另一种力的推翻和破坏，目的是通过不断的反抗增强自我的生命力。从最初使用犯罪的方式来反抗资产者，到通过罢工砸碎机器和捣毁工厂，再到后来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最后发展到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由低级到高级、从经济到政治的身体抗争，都是为摆脱“非人”境地，追求自由身体的过程。

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展示了身体的“在场”。一是工人阶级以身体行动“发声”，表达了对人的尊严、生存等权利的诉求。需要是身体的本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工人阶级而言，需要是多样性的和多层次的，而生存需要则是根本前提。所以，工人阶级改变非人的生存状况的第一种形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sup>⑥</sup> 二是工人阶级以身体行动“诉情”，表达了他们之为人的深沉情感。工人阶级的身体并非纯粹的物理肉体，也是具有情感的灵魂。工人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在行动中倾注了热情与坚毅，势必要为自己争取合乎“人”的身份。这是工人阶级在反抗中显现出的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sup>⑦</sup> 三是工人阶级以身体行动“展演”，展现了强大的身体能量。在犯罪、罢工和宪章运动等活动中，工人阶级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斗争形式逐渐从独立的无组织发展到联合的有组织，斗争范围不断扩大，斗争结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展示了工人阶级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sup>⑧</sup>

责任编辑：罗 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2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4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页。

# 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饶琳

**[摘要]** 马克思与黑格尔都认为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代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在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观点上,二者却走向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立场。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哲学只停留在感觉认识的层面,是肤浅和琐屑的,他的自我意识观点表现出哲学对现实的逃避;而马克思却认为伊壁鸠鲁哲学达到了概念的高度,其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代表了对总体哲学必然规定性的斗争,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这种差别源自二者在哲学史的阐述中采用了不同的哲学底本,黑格尔的观点源自他的精神现象学,而马克思采用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证方式。正是哲学上不同的角度形成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关键词]** 马克思 黑格尔 伊壁鸠鲁哲学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 B0-0;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11-0017-07

可以认为,从黑格尔至马克思的时代是哲学史的时代,人们普遍开始回顾历史并在历史中探索时代的精神特征。这种对哲学史的重视有着其特殊意义,而黑格尔的哲学史思想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马克思也称黑格尔的哲学史计划是庞大的,他的研究是伟大的。<sup>①</sup>但马克思也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史受他的思辨的东西影响,妨碍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发现。这也是后来的哲学史研究者对黑格尔的一个批评。同样的批评似乎很少出现在对马克思《博士论文》<sup>②</sup>的研究中,人们反而热衷于发现其中所隐藏的马克思后来的思想线索。这种态度的差别大概源自我们渴望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发现哲学真正的历史,却只希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找到马克思思想的萌芽,然而实际上,在马克思本人看来,他的《博士论文》是一项严肃的哲学史研究。因而,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于他们对伊壁鸠鲁哲学观点的比较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一、哲学史观中的立场分歧

马克思在准备及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期间,他的哲学史观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青年黑格尔派,另一方面也直接来自马克思对黑格尔著作的大量阅读。<sup>③</sup>其结果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对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的理解中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承认古希腊之后的罗马哲学精神是古希腊哲学精神的延续,但是对于这种哲学精神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与现实的关系二者却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

**作者简介** 饶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暨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② 即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文中简称《博士论文》。

③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发展和哲学精神的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相关性。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他说：“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Idee）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sup>①</sup>同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logischen Begriffe）了。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以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Fortgang der geschichtlichen Erscheinungen）。”<sup>②</sup>黑格尔表明了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本身，因此他认为：“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Persönlichkeit）和个人的性格（individuelle Charakter）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sup>③</sup>相同的观点在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也可以看到：“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Persönlichkeit），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sup>④</sup>

马克思的观点与黑格尔很接近，同样认为哲学史并不在于哲学人物思想的记述，不是历史人物个性的表达，而应当表现出哲学的体系及其精神。另外，马克思将哲学史的研究等同于哲学的研究。如果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在说明哲学研究的内容，那么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则是对哲学史的一种哲学规定，同时这也认可了基于哲学史进行哲学表达的合法性。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Wesen）来展开。”<sup>⑤</sup>进一步可以认为，马克思在哲学史方面的认识，至少关于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的认识和黑格尔是相同的。这种相同的哲学史观，反应在二者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认识上，则表现为他们都认为伊壁鸠鲁哲学及其同时代的斯多亚和怀疑主义代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哲学精神的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观点，马克思与黑格尔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斯多亚、伊壁鸠鲁和怀疑派的哲学作为自我意识哲学的阶段。这种观点既是哲学的，也是哲学史的。黑格尔认为，在哲学层面，伊壁鸠鲁哲学、斯多亚和怀疑派代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形态。在哲学问题上，它们将古希腊哲学当中存在的普遍与个别、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具体化。其中具体化的普遍就是精神，这种哲学发展成为总体就是斯多亚哲学；而具体化的个别就是自然，它把自然存在和感性发挥为总体就是伊壁鸠鲁哲学，两种冲突的哲学原则在怀疑派那里达成了统一。<sup>⑥</sup>就伊壁鸠鲁哲学而言，它更多代表了斯多亚哲学的反面，但二者都在主体层面将哲学的原则普遍化，因而表现出哲学的自我意识。而在现实层面，黑格尔认为：“在罗马世界的悲苦中，精神个性的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质都被冷酷、粗暴的手扫荡净尽了。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做实存的主体（existierendes Subjekt）——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

---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1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49.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5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S.49.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9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S.20.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MEGA<sup>2</sup>, vierte Abteilung, Band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137.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70页。MEGA<sup>2</sup>,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37.

⑥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1页。

(inneren Freiheit)中去。”<sup>①</sup>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的自由、不动心、漠不关心、宁静不摇、平静不扰等等,在哲学层面,其屈从于一种独断意识,是对意识的主奴关系的妥协,在现实中则表现出精神对现实世界的逃避。黑格尔认为,正是这种意识的主体形态造就了哲学的自我意识。<sup>②</sup>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虽然同样认识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sup>③</sup>但马克思却认为这些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是被遗忘的对象。<sup>④</sup>

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形态,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中,哲学通过发展成为总体哲学,它的发展和完善是通过对哲学和与哲学相对应的世界的规定完成的。总体哲学最终导向哲学反对世界,这种反对的形式就是总体哲学通过哲学规定导向必然性。马克思在《笔记》中这样论述:“以前作为成长过程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已成了规定性;而曾经是存在于自身中的否定性的东西变成了否定。”<sup>⑤</sup>马克思认为,在总体哲学的规定当中,实际上是内部分离的,不仅仅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是如此,在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哲学同样是如此。在总体哲学之后的自我意识所代表的个别主体性正是这种分离的表现。因此在与总体哲学的关系中,自我意识表现出反对总体哲学的斗争。这种自我意识并非避世的和消极的,而是哲学积极的斗争形态。

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力量朝向总体性进发,人类的意识存在克服内在矛盾达成统一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属于意识本身。<sup>⑥</sup>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本能是趋向于统一(自我意识就是一种自身统一)。<sup>⑦</sup>而在这种哲学统一的另一面,表现为哲学内在的矛盾,主观与客观、本质与形式、个别与普遍等,它们显示为意识的内容以及意识的运动,并构成哲学意识发展的各个环节。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注意到了哲学在走向总体之后的分裂,哲学的各个环节以及哲学的自我意识表现为总体哲学转向主体的个别自我意识,因而并不是哲学逃回到精神的自由世界才有了自我意识,而是哲学通过自我意识表现出它的自由精神。

## 二、感觉认识论与原子观念的考察

上述差异也反应在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认识上。对于伊壁鸠鲁的哲学,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只是停留在感觉思维的层面,因而在概念思维的层面是缺乏的。黑格尔将伊壁鸠鲁的感觉看作是以感觉为基础的认识论,并认为:“感觉(Empfindung)是非理性的(alogisch),没有理由的。”<sup>⑧</sup>在黑格尔看来,虽然伊壁鸠鲁对感觉做出了概念式的判断,但是判断的依据并不是概念的普遍性原则,而是基于感觉表象。对此他说:“在伊壁鸠鲁这里,对象的表象的自身同一性,也是作为一种意识中的回忆,不过这个回忆是从感性事物出发的;图像、表象乃是同意一个感觉的东西(Empfindung)。”<sup>⑨</sup>黑格尔将伊壁鸠鲁的哲学判断作为一种意见(Meinung),而且认为意见的标准在于感觉,要看感觉重复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19,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255.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1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MEGA<sup>2</sup>, erste Abteilung, Band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23.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8页。

⑥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Ⅲ·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6页。

⑦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9, S.139.

⑧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54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2.

⑨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56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4.



出现时是否始终如一。<sup>①</sup>黑格尔称这种以感觉为标准的判断“是一个很琐屑肤浅 (trivialer) 的过程。因为它只停留在感性意识的最初阶段上,停留在对一个对象的直观 (Anschauung)、直接的直观的阶段上”。<sup>②</sup>这种否定意味的观点代表了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尤其是感觉认识的基本评价,黑格尔并没有否定伊壁鸠鲁认识论的正确性,但是黑格尔却认为这种正确是肤浅的、琐屑的,是对于那些最初的知觉所进行的表象作用的机械说明。基于这种认识,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在原子认识上采取了同样过于简单的认识原则。黑格尔评论说:“关于不被看见的东西,伊壁鸠鲁所采取的真理标准,是一个极轻率 (leichteste) 而现在也是很习见的标准,即:与所见、所闻的东西不矛盾。因为这样一些思想中的东西,如原子、表面的分解物,诸如此类,事实上我们并不能看到。诚然我们可以看到和听到某种别的东西;但是那被看见的东西,——和那被表象 (Vorgestellte)、被想象 (Eingebildete) 的东西,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既然把两者分开,那就不会有矛盾了;因为矛盾要在关系中才发生。”<sup>③</sup>这里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评判,其语气类似于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所做的评论,称他将原子论矛盾的双方分别置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不同的地方,以此来规避矛盾。如果按照黑格尔的分析,伊壁鸠鲁并没有通过别的什么方法来规避原子论的物质与形式的矛盾。但是,马克思却将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认识归给了德谟克利特,那么在马克思的认识中,伊壁鸠鲁的哲学认识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呢?

对此,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探讨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哲学史上为什么伊壁鸠鲁会重新思考原子论哲学。<sup>④</sup>在《笔记》中,马克思就说:“相当有意义的现象是,构成纯粹希腊哲学的那一套三个希腊哲学体系,即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都从过去已知的东西中吸取各自的基本要素。”<sup>⑤</sup>到《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具体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正在向总体发展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进一步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sup>⑥</sup>正是借以这一问题的探索,马克思认识到:“在伊壁鸠鲁那里,概念 (Begriffs) 的最一般的形态是原子,因为这是它的最一般的存在形态,可是这一存在本身是具体的并且是一个类概念 (Gattung),但是同时它对其哲学概念的更高的特征和具体化来说,又是种概念 (Art)。”<sup>⑦</sup>基于此,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一来,原子是一种例如个人、哲人、神的抽象的自在的存在 (Ansichsein)。这是同一概念的更高的、更进一步的质的规定。”<sup>⑧</sup>

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的论述并没有和黑格尔以及其他研究者一样,按照伊壁鸠鲁哲学本身的划分来展开,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有专门提到。在考察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之后,马克思认识到:“原子作为概念的直接形式只体现在概念的直接不存在之中,也适用于哲学意识 (philosophischen Bewußtsein),这个原则就是这种意识的实质。”<sup>⑨</sup>由此,马克思说:“同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56-57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4.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57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5.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60页。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S.308.

④ 对于该问题,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也曾提到这种现象,他认为:“像这样的复兴只能被认作借那有限的先行的形态以深入认识自身的过渡,或者被认作通过必要的文化进展的阶段把那业已过去的东西重新经历一遍罢了”。他评价这种现象是把木乃伊带到活人里面去,因此黑格尔并不认为这种哲学能够真正达到哲学的观念及其精神。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8页。MEGA<sup>2</sup>,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36.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8页。MEGA<sup>2</sup>,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36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3页。MEGA<sup>2</sup>,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47.

时这也证实：我认为确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伊壁鸠鲁所采用的分类是恰当的。”<sup>①</sup> 马克思的动机表明，他认识到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作为原子概念的表现方式直接表现为原子规定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中的原子概念以及原子概念的规定并非原子作为感观对象获得的，而是原子作为思维的对象已经被意识所捕捉。

以上表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认识是从他的原子观念开始的，他认识到，在伊壁鸠鲁那里感觉并不真正表现为认识的原则，真正的原则是基于原子观念的规定，这种规定在感觉认识之外。在马克思的《笔记》中，他说：“观念性转入原子本身。原子中最小的东西对于表象并不是最小的，而是某种与表象相类似的东西，——此时不能想象出任何规定性的东西。原子所固有的必然性（Nothwendigkeit）和观念性（Idealität）本身仅仅是某种想象的偶然的東西，对原子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原则仅仅表现为：观念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只存在于这种对于它们本身来说是外在的想象的形式，即原子形式中。伊壁鸠鲁的彻底性就达到这样的程度。”<sup>②</sup>

因此，我们可以解释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对于伊壁鸠鲁哲学总体态度上的差别。对于黑格尔而言，他在伊壁鸠鲁的认识中把握到的是将感觉作为意识与原子的中介，因此感觉作为真实的标准取消了概念的必要性。可以说，伊壁鸠鲁的哲学观点仅仅被看成是一种不具有思辨性的、流俗的常识观点。<sup>③</sup> 对于黑格尔而言，伊壁鸠鲁哲学所处的哲学发展阶段决定了他对伊壁鸠鲁哲学以及自我意识的解读，所以黑格尔的探讨所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哲学史线索。在这样的解释当中，伊壁鸠鲁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是古希腊哲学原则在主体关系中的延续。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直接表现为总体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

与此对应的，在黑格尔看来是意见的和琐屑的内容，在马克思这里却表现为一种认识论上积极的以及属于意识本身的规定。在黑格尔看来，“伊壁鸠鲁漂泊在一些什么也不能说明的不定的说法中。”<sup>④</sup> 他的概念、抽象和实在之间是杂乱无章的、混乱的关系，但在马克思那里，伊壁鸠鲁对原子的规定中所表现为矛盾的地方反而是一种理论内的，以及属于哲学自我意识表达上的有意为之。所以可以认为，与黑格尔相比，在相同的问题上，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做了更加积极的和同情式的理解。这也是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之后放弃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而选择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这样的哲学史线索的一个原因。它表明，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所对应的哲学观念的相关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出现了分歧。

### 三、哲学史的不同哲学底本

对比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并不高，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的准则学，其真理标准是简单、琐屑、肤浅和机械的。<sup>⑤</sup> 在关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认识上，黑格尔执着于弄清楚伊壁鸠鲁哲学中本质、原子和感性现象之间的关系，但他最终陷于对伊壁鸠鲁哲学的不耐烦和不屑中。黑格尔的态度部分源自他在《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对意识的发展所形成的固有认识。与《哲学史讲演录》相比，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讲述到自我意识阶段时，所举的例子只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而没有直接提到伊壁鸠鲁主义。在这部以“意识的自身经验”为主题的书中，黑格尔进行考察的线索主要围绕意识的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等展开，其考察的内容影射在哲学史中便是诸种“精神现象”或“精神形态”。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的这种自由作为一个自觉的现象出现在精神史中，是在斯多亚主义那里，其下一个环节是怀疑主义。<sup>⑥</sup> 之所以说黑格尔在他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论述中采用了精神现象学的底本，表现在黑格尔仅仅只是将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斯多亚哲学的对立面来看待，因此在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及其内容上也表现出与斯多亚哲学相反的态度。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8页。MEGA<sup>2</sup>, vierte Abteilung, Band1, S.19.

③[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49页。

④[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62页。

⑤[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58页。

⑥[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33页。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163.

于伊壁鸠鲁哲学，黑格尔有所肯定的地方是他的道德学，因为在这里，伊壁鸠鲁表现出了与斯多亚派同样的原则和结果。<sup>①</sup>也正是因为黑格尔在论述伊壁鸠鲁哲学时所采用的哲学底本是他的精神现象学，使得黑格尔更加着重于考察伊壁鸠鲁的感觉认识论，并试图从中寻找到与他在意识的经验考察中相匹配的结果。

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哲学底本更多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1839年底，马克思在其《笔记》的基础上，集中开始对黑格尔逻辑学进行研究。<sup>②</sup>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正式确定了他《博士论文》的题目和框架，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到黑格尔逻辑学对马克思观点的影响。<sup>③</sup>在马克思针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中，核心内容是对原子论的考察，主要围绕二者对原子的规定，即原子的物质与形式、存在与概念（本质）的二律背反为线索展开。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哲学中对原子的认识达到了概念的高度，而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把握是黑格尔式的，即将概念理解为高于存在与本质的由存在与本质环节发展而来的统一，<sup>④</sup>只是马克思将原子概念的两个环节表述为“纯粹物质性的存在”（Existenz eine rein materielle）和“纯粹形式规定”（reine Formbestimmung）。<sup>⑤</sup>同时，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将原子概念的两个环节及其矛盾客观化了。<sup>⑥</sup>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概念最终通过个别性（Einzelheit）进入现实性（Wirklichkeit），<sup>⑦</sup>而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天体就是原子概念的现实性（Wirklichkeit）。<sup>⑧</sup>在具体观点的细节方面，马克思以原子的三种不同运动方式：直线运动、偏斜运动和排斥运动，分别代表了原子的物质性规定、形式规定和原子概念。<sup>⑨</sup>原子通过运动关系将否定包含在自身之内，因而关于原子的规定具有了辩证性。与此相对应，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论及原子论的部分，也提到在哲学史上对原子运动的关注带来的对原子的思辨的规定。他说：“运动作为原子和虚空的另一个关联，完全不同于这两个规定相互之间的单纯并列和漠不相关。”<sup>⑩</sup>而在论及排斥运动时，黑格尔认为：“这个排斥（Repulsion）的意思是通过单一体（Eins）自身而设定诸多单一体，而这意味着，单一体亲自来到自身之外，而且这些如今位于单一体之外的东西本身仅仅是单一体。这是就概念（Begriffe）而言的排斥，一个自在（an sich）存在着的排斥。”<sup>⑪</sup>而马克思在论及伊壁鸠鲁原子论的排斥运动时，将排斥理解为一种原子的自身关系很明显来自黑格尔。<sup>⑫</sup>另外，在关于原子的质的讨论部分，马克思说：“由于有了质（Qualitäten），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这个矛盾正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sup>⑬</sup>这里的质被认为是设定的原子的规定性，并且具有内在矛盾和否定的特性。这种对质的论述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认为的质（Qualität）作为一个直接的（unmittelbarer）或存在着（seiender）的规定性，<sup>⑭</sup>以及将这种规定性作为“一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75、83页。

② [民主德国]埃·朗格、英·陶贝尔特：《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年第2辑。

③ 这一点在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le Heinrich，1957—）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著作 *Karl Marx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 中也有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范畴对伊壁鸠鲁原子理论进行了重建。同时参见凌菲霞：《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新解——基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传记视角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

④ [德]黑格尔：《逻辑学Ⅱ》，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1、2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页。MEGA<sup>2</sup>, erste Abteilung, Band1, S.35.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页。

⑦ [德]黑格尔：《逻辑学Ⅱ》，第243页。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299.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MEGA<sup>2</sup>, erste Abteilung, Band1, S.55.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页。

⑩ [德]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

⑪ [德]黑格尔：《逻辑学Ⅰ》，第151页。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187.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页。MEGA<sup>2</sup>, erste Abteilung, Band1, S.40.

⑭ [德]黑格尔：《逻辑学Ⅰ》，第92页。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S.118.



种以肯定的方式设定下来的否定”<sup>①</sup>的观点是相同的。

无论是总体线索还是细节上的论述，都表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分析所采用的辩证法大部分来自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考察。可以认为，这种以逻辑的辩证关系和原子的规定为线索形成的新的叙述方式，就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不同于伊壁鸠鲁本人以及黑格尔的重新分类的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观点上分歧的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分析中采用了他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底本，而马克思则采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底本。这个因素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差别变成了黑格尔哲学内的他的精神现象学和他的逻辑学的关系。这种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回过头来认识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精神的不同理解。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自我意识表现出它消极的一面。所谓消极可做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作为意识发展的环节，在它的辩证运动中，推动意识发展的、作为意识能动条件的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本性，或作为自我意识存在环节的欲望（Begierde）、承认（Anerkennens）和哀怨意识（unglückliche Bewußtsein），因而自我意识本身仅仅作作为意识经验的结果被呈现出来。<sup>②</sup>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完全成为自由的自我意识之前，它始终受到外力的束缚和驱动，因而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其消极的一面。另外一方面，这种自我意识在哲学史上反映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作为凝固的东西抽象地守着自身，只在个人内心中追求快乐和幸福，并对外界表现出被动。<sup>③</sup>

而对马克思而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底本不仅仅只适用于马克思对原子论的分析，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天象”进行考察时，马克思分析了伊壁鸠鲁的意识经验，这里的意识直接是自我意识，并沿用了在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考察中得出的原则，即纯粹概念对一切必然规定性的否定。马克思说：“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Abstract-Einzeles）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sup>④</sup>从原子论到自我意识，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将原子论的逻辑原则运用到了自我意识的考察中。因而在自我意识的经验中，它“感觉”（felt）到的，不再是受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驱使，而是精神的自由。把这个原则推广开来，马克思得到的结论是在伊壁鸠鲁那里，“他所理解的自然的本质就是他的现实的自我意识的本质。”<sup>⑤</sup>因而“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只是对象化了的（vergegenständlichte）、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sup>⑥</sup>

因为原子的逻辑原则优先地被考察了，因而它同时作为自我意识的原则就使得自我意识不再是作为一种本能的冲动而发挥作用，它的经验也不是以零碎的、变动不定的、混乱的方式进入思维之内。因而，自我意识的积极性首先是意识的能动性。它使得伊壁鸠鲁能够在面对古希腊以降的神学世界观和哲学观念时，保持独立的思辨能力，不盲目跌入意识形态与哲学的空洞假设之中。<sup>⑦</sup>至此，马克思也表达出了他对抽象个别自我意识自由的追求和对神学意识批判的双重主旨。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I》，第94页。

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11-144页。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139, 146, 163.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1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MEGA<sup>2</sup>, erste Abteilung, Band1, S.39.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页。MEGA<sup>2</sup>, erste Abteilung, Band1, S.51.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页。

# 身心一体观的古典形态： 伊壁鸠鲁学派的身体观蠡测<sup>\*</sup>

妥建清

[摘要] 身心关系问题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基源问题之一。柏拉图不仅颠覆荷马的身心同一论，而且批判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思想，基于其创世论系统建构身心二元论的范式。此种身心二元论范式影响了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的身心思想。伊壁鸠鲁学派则基于原子论的研究进路，强调身体和灵魂乃至神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并且论证身心的原初合一性以及灵魂必死性，从而突破了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把哲学由灵魂规劝之术转变为身心合一的伦理学，重新诠释着晚期古希腊社会何为美好生活。

[关键词] 柏拉图 身心二元论 伊壁鸠鲁学派 原子论 身心合一

[中图分类号] B50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11-0024-08

身(身体)心(灵魂)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古希腊思想文化研究的基源问题之一。自荷马开始，他的身心同一论揭橥人与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差异，“似神一样的生活”对于彼时庶众而言闻所未闻。嗣后随着城邦文明的勃兴，柏拉图赓续毕泰戈拉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的思想，并且在批判高尔吉亚修辞术思想的基础上，依托其创世论建构身心二元论范式，彻底颠覆荷马的身心同一论，影响所及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人的身心思想。伊壁鸠鲁则以“拯救感性”为己任，借由原子论的研究进路突破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把哲学由灵魂规劝之术转变为身心合一的伦理学，由此开启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人学转向。

## 一、灵魂实存：柏拉图身心二元论范式的建构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作为常态化科学发展中的范例是科学革命的主要变量，科学革命的发生系于范式的转移。库恩的范式论不仅阐明科学革命的结构，强调范式所具有的中立价值，而且指认范式论作为实践抽象的历史理论——既适用于科学史，也适用于文学史、哲学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古希腊的身心观而言，柏拉图通过扬弃毕泰戈拉、智者学派等的身心思想，并且基于神创论系统建构了古希腊身心二元论范式。

(一) 柏拉图身心二元论受到毕泰戈拉灵魂观的影响。古希腊关于身体和灵魂的论述肇始于轴心时代的荷马，荷马主要是从身心同一性的角度论述身体和灵魂的问题。在荷马史诗中，荷马分别使用“psychē”和“sōma”指称“无生命的灵魂”和身体，使用“thumos”(心气)一词来形容“有生命的灵魂”，“thumos”既指身体方面的情感、力量，也指精神能力，它是“心一身”整体的。<sup>①</sup>“thumos”一词表明，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传播史的书写问题研究”(18AZD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妥建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陕西 西安，710049)。

① [美] 安东尼·朗：《心灵与自我的希腊模式》，何博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荷马不仅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是可朽的，而且鉴于“thumos”包含着“心一身”两方面，承认人的身心是同一的。现当代学者荣格与铃木大拙<sup>①</sup>以及迈克尔·克拉克<sup>②</sup>都强调荷马所言的人是身心一体之人。

有别于荷马身心合一且可朽的思想，毕泰戈拉揭开了灵魂轮回和灵魂净化的思想。毕泰戈拉认为灵魂源自神的世界，灵魂的神圣起源既表明灵魂的不朽性，死亡只是身体的腐朽，灵魂可以从此一身体转移至其他生命物的身体之中，亦要求着灵魂的净化，灵魂借由音乐、哲学等灵魂净化的方式不断地脱离身体，最终复返于神的世界，获得永久的至福。<sup>③</sup>毕泰戈拉强调灵魂以其不朽性优位于可朽的身体，从而为此世道德行为与彼世奖惩果报建立联系。<sup>④</sup>毕泰戈拉的此种思想影响了柏拉图。柏拉图与毕泰戈拉学派后期的传人有所交往，诸如柏拉图曾去南意大利访问过毕泰戈拉学派的活动中心塔壬同，与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尔基塔塔过从甚密，乃至格思里认为阿尔基塔在塔壬同推行的政治制度实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中心论旨。<sup>⑤</sup>第欧根尼·拉尔修载述柏拉图曾见过毕泰戈拉学派的菲洛拉俄斯和欧律托斯，<sup>⑥</sup>并花费一百米那购买菲洛拉俄斯公开发表的三部著作。<sup>⑦</sup>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主要人物蒂迈欧也疑为毕泰戈拉学派中人。<sup>⑧</sup>尤有进者，柏拉图在《美诺篇》《蒂迈欧篇》等篇什中论及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的思想明显受到毕泰戈拉灵魂观的影响。<sup>⑨</sup>要之，柏拉图发展毕泰戈拉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的思想，进而系统提出身心二元论。

（二）柏拉图身心二元论的建构是批判高尔吉亚修辞术思想的结果。作为语言使用技艺的修辞术（rhetorike）是古希腊人性教化的七艺之一。古希腊社会在由王宫体制转向城邦文明之后，城邦生活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给予公民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公民诉诸语言而非暴力等前政治的非自由方式参与城邦生活，语言的完美运用就成为人性教化的主要内容。尽管智者以修辞术为业而闻名雅典，但是鉴于其秉持表象即实在的哲学观点，对于作为技艺的修辞术缺乏真正的知识。在《高尔吉亚篇》中，高尔吉亚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围绕着何谓修辞术进行了精彩的论辩。柏拉图拒斥高尔吉亚关于修辞术的三种定义，尤其是高尔吉亚所言的修辞术乃一种说服的技艺的观点，《海伦颂》实则是高尔吉亚此种观点的明证。<sup>⑩</sup>在《海伦颂》中，海伦作为“致命女人”成为特洛伊战争的诱因，遭到斯巴达人的诋毁，但是高尔吉亚却为之辩护。高尔吉亚指出，海伦去特洛伊的原因有四种，其中海伦被言语感动和被爱情支配皆是由灵魂的弱点所致。根据强力的原则，前者是由于语言的强大，后者则是因美的身体的强大。高尔吉亚认为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说服人的灵魂，“语言能感动灵魂使它将别人生活中遭到的幸运和不幸在自己身上产生同样的感情”。<sup>⑪</sup>高尔吉亚亦认为灵魂是通过视觉接受印象的，海伦看到迷人的对象，灵魂自然为之骚动，故而跟随帕里斯去了特洛伊。这是本性使然，并非海伦之罪。尽管高尔吉亚在此强调修辞术是一种说服灵魂的技艺，但是他已经暗示人是由身体和灵魂所构成，并且身体是主要的，灵魂反而受制于身体。

而柏拉图对于高尔吉亚修辞术的批判则是基于其身心二元论。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技艺专家有三个标

① D. F. Suzuki, *Selected Works of D. F. Suzuki, Volume I: Z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and, California, 2014, p.230.

② Michael. J. Clarke, *Flesh and Spirit in the Songs of Hom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9, p.115.

③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7-402页。

④ Kathleen Freeman,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Oxford: Blackwe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76-77.

⑤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33.

⑥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138页。

⑦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398页。

⑧ [英]大卫·赛德利：《古代创世论及其批评者》，许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144页。

⑨ Gail Fi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48-52.

⑩ [美]安东尼·朗：《心灵与自我的希腊模式》，第67页。

⑪ [古希腊]高尔吉亚：《海伦颂》，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志：需要一个参照的理想模型、理解对象的本质以及解释其成因、以最好为目的。<sup>①</sup> 第一，以智者对于修辞术的定义而言，智者认为修辞术是源于经验的技艺，经验根据技艺而不是依靠偶然的机遇指导人生，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不同的技艺。但是柏拉图从先天知识的立场出发认为智者所言的修辞术只是后天感知经验的知识，它重“技”而不重视“道”，此种感知经验的知识因无从依傍的理想范型而陷溺于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缺乏确定的真理标准。第二，柏拉图认为真正的修辞术拥有正义的知识，但智者的修辞术则是与道德无涉的说服人的技艺，其主要以奉承或谄媚大众、满足大众的欲望为己任，它所产生的只是没有知识的似是而非的信念。第三，真正的修辞术是以善而非快乐为目的。柏拉图以人的知识为例指出，人是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关于身体的学科有体育和医学，关于灵魂的学科则是治邦术，身体的学科和灵魂的学科是相互对应的。他从善的目的出发认为真正的技艺是有助于身体和灵魂之健康的，而正义和修辞术都是攸关灵魂的事情，但智者的修辞术只是奉承身体宰制下的灵魂，并不是真正为灵魂之好。如果真正为灵魂好，人就要在生前始终不渝地追求正义和善，因为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分隔，而灵魂是不灭的，如此才不会受到神的惩罚，获得永恒的幸福。要之，正是在批判高尔吉亚修辞术的基础上，柏拉图建构了身心二元论的范式。

（三）柏拉图基于神创论系统建构身心二元论。柏拉图揭橥宇宙是一生成之物而非存在之物，作为生成之物表明宇宙有其开端。而宇宙作为“神的恩赐”则是由于造物主拥有最高的善，可以公正地对待一切事物，他希望万物如其所是成为至善至美的生命体。但是其创造万物并非像基督教的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有，而是为事先存在的处于混沌状态的质料赋予秩序。造物主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理性不可能在缺乏灵魂的事物之中出现，灵魂由此就成为其最早的造物。造物主把存在、同、异三种要素结合作为灵魂的原始材料，<sup>②</sup> 并按照一定的数的比例关系对灵魂予以划分，使灵魂的全部构造和谐。造物主首先创造了充满宇宙的宇宙灵魂，宇宙灵魂是根据永恒设计而创造出的最好的东西，它成为天体运行秩序的基础。继而创造各种被造物主称之为不朽的被造物神的天体。然后造物主把宇宙灵魂搅和进剩余材料之中，虽然每次搅和的方式基本一样，但是搅和后的纯度不断递减，造物主对此搅和之物的划分产生了个别灵魂。从搅和物的纯度而言，诸神的灵魂是优位于人之灵魂的，然而人的灵魂也是由造物主所创造的，因此人的灵魂也是不朽的。造物主最后又要求诸神为人以及其他生命体创造身体。诸神从水、土、火、气中取得一些原始材料揉成团，使用一些小的看不见的栓，把它们合成能够拴住灵魂进出的身体。诸神先创造人的头部，接着创造身体的其他部分，而人的头部模仿宇宙灵魂遍布并围绕球形天体旋转的方式，因此成为理性灵魂的寓所，统治着身体的其他部分。灵魂进入身体之后，由于身体是由四种要素组合而成，它进行着剧烈的非理性的运动，导致灵魂失去理性和秩序。只有随着身体的此种成长消退之后，灵魂的旋转开始安静下来，逐步恢复其自然状态，理性才能重新出现。如果人能够以真心修养和教育来积极回应理性，使身体服从理性，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完善之人，其死后灵魂方能回到最初最好的生活。反之，如果人对于理性不予回应，那么其死后灵魂则会被诸神回收，诸神按照灵魂中理性的纯度使其轮回转世在相应的新造的身体之中。要之，从柏拉图的神创论而言，相较于由诸种物质元素所组成的可朽的身体，灵魂是永恒的存在之物，灵魂优位于身体并宰制着身体。

综上，柏拉图通过批判智者学派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思想，并且基于神创论系统建构了古希腊身心二元论范式。从古希腊哲学史而言，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身心思想尚是遵循着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但是伊壁鸠鲁学派则以基于原子论的身心一体观突破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为希腊化时期个体的幸福生活提供实践指南。

## 二、“拯救现象”的原子论：伊壁鸠鲁学派身心一体观的基础

伊壁鸠鲁的身心合一观以原子论为基础。

<sup>①</sup> [英] 大卫·赛德利：《古代创世论及其批评者》，第166页。

<sup>②</sup> [古希腊] 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第21页。

(一)从质料因而言,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否定灵魂和神是“非物质”的说法。伊壁鸠鲁认为存在的总体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原子的存在是感觉可以证明的,虚空的存在则使物体可以运动,但虚空并不是非物体。在物体当中,有的是组合物,有的是组成组合物的原子。尽管从根本上说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但原子组合物依然是真实的,具有存在的合法性。相对于由原子所构成的各种物体,原子和虚空并不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sup>①</sup>由此保证现象世界的真实性。

伊壁鸠鲁亦认为灵魂是由原子构成的。在早期古希腊哲学中,灵魂具有生命和认知功能的双重含义。灵魂(psyche)从希腊词源而言,主要指呼吸、生命之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乃是生命的本原。<sup>②</sup>泰勒斯认为纵使无生命之物亦具有“灵魂”,他所说的“灵魂”实是生命,但是由于希腊人尊重生命而又无法解释此种“物活”现象,<sup>③</sup>从而出现泛灵论乃至泛神论思想。嗣后阿那克萨戈拉提出“努斯”说,业已视“努斯”为有别于物质的心灵、理智。直至柏拉图提出相对于城邦的三个阶层的灵魂三分说,即灵魂包含着欲望、意气、理性,但理性是灵魂的最主要的部分。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强调灵魂亦是物质,不是独立于身体的不朽之物,灵魂既具有运动能力,使得人的生命得以产生,又与身体相结合,使得人的感知能力成为可能。灵魂与身体的原子构成为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寻找到统一的基础,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在本质上不是不朽之物与可朽之物的相互混合,而是原子基础上的原初统一性。

尤有进者,伊壁鸠鲁强调神亦是极为精细的原子构成。实在论的观点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的神是有生命的,其居于诸宇宙之间的空间。<sup>④</sup>如果说构成灵魂的原子较之于构成身体的原子更为精细和活跃,那么构成幸福和不朽之神原子则是最为精细的。<sup>⑤</sup>在西塞罗的《论神性》中,伊壁鸠鲁学派的代言人威莱乌斯认为神是具有人形的最卓越、不朽的存在,拥有最高的理性,但是神不具有血液、身体等。<sup>⑥</sup>要之,伊壁鸠鲁从始基的角度揭橥灵魂和神都是物质,否定柏拉图的理性灵魂和神的说法。

(二)伊壁鸠鲁学派批判性反思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无限”思想,力证世界是原子自行分配的结果。德谟克利特认为无限的宇宙是由无限数量的原子所构成,原子的偶性——形状、次序、位置等外形差异是原子运动以及现象世界多样性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指出:“他们说,这种差异共有三种——形状、次序和位置。”<sup>⑦</sup>辛普里丘记录的亚里士多德的《论德谟克利特》指出:“他(德谟克利特)将原子的凝聚力归结为某种程度上的物体相互纠缠和拥抱的方式”。<sup>⑧</sup>《欧塞比乌注释的狄奥尼修》同样提出:“他们说,这些原子在虚空中随机地产生,通过不规则的漂移偶然地相互碰撞,并纠缠在一起。”<sup>⑨</sup>就单个世界而言,原子在虚空中的漩涡运动生成宇宙万物。虽然原子的运动是盲目的,但是由诸多原子相互撞击而形成的漩涡运动本身具有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由盲目的原子所形成的世界是一个机械而必然的世界。不仅如此,由于无限的虚空存在着无限的原子,世界不只是一而是多,乃至无限,而无限的世界保证任何一种原子排列都可能在世界中重复出现,推而论之,相似的世界是可能的。西塞罗指出:“按你们所说,德谟克利特认为存在无数个世界,其中有些不仅彼此相似,且互相完美契合,根本没有区别,而人类也是如此。”<sup>⑩</sup>但是如果原子的外形是无限的、偶然的,那么一个由原子所构成的特定的排列是未

①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李永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2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91页。

④ [英]大卫·赛德利:《古希腊哲人论神》,刘未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06-214页。

⑤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448页。

⑥ [古罗马]西塞罗:《论神性》,石敏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24页。

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⑧ *Simplicius: On Aristotle on the Heavens 1.10-12*, R. J. Hankinson, tran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p.6.

⑨ Eusebius of Caesarea, *Praeparatio Evangelica* (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 Tr. E. H. Gifford (1903), Book 14, p.768 d.

⑩ [古罗马]西塞罗等:《怀疑的理性——西塞罗与学园柏拉图主义》,魏奕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页。



必可能重现的，即相似的世界未必可能出现，纵使出现也是偶然的。由此，从原子的无限可以推出相似世界的出现，但是从原子外形的差异推出相似世界未必可能出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于此出现矛盾。而此种原子论的矛盾为神创论打开了方便之门。柏拉图的神创论即是认为宇宙的创生源于造物主的仁慈，造物主鉴于物质—质料的混乱赋予其秩序，从而以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型把宇宙创造为一个有理性和灵魂的生命体。

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拒斥此种“无限”思想。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并不是最小的单位，每个原子包含着一定数目的最小单位，并且由于这些最小单位是不可分的，因此给定的一组单位可能存在着有限的排列，故而原子的种类是有限的。若原子的种类是有限的，那么原子与原子之间能保持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如此由原子所构成的世界类型亦是有限的。正因为存在着有限的世界类型，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如此的现实世界。于此而言，现实世界的出现不是源自神的创造，而是原子自身进行分配的结果。<sup>①</sup>

(三) 从动力因而言，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认为原子运动是由于其本质属性。德谟克利特认为盲目的原子通过在虚空中的漩涡运动必然生成宇宙万物。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原子是充实无间的实体，其自身是不能运动的，只能以外形的结合或者分离的方式在虚空中进行永恒的运动，最初促使此种外形差异的原子进行运动的动力，原子论者并未阐明。而若承认原子是被动的，那么必然需要追溯第一推动力。<sup>②</sup>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谟克利特对于原子运动的内在原因未予揭示。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形状、大小、重量等外形不是原子的偶性，而是原子的本质属性。<sup>③</sup> 如果原子的外形是其本质属性，那么原子运动就可以从原子的内面予以解释。伊奥尼亚自然哲学认为万物的运动取决于其自身，不是假于外力而进行的。在此意义上，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属性由外在偶性向内在本质属性的解释不仅坚持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大传统，而且深化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伊壁鸠鲁亦通过原子偏离垂直运动来解释原子的连续运动。原子按照本性除了垂直运动之外，原子连续运动如果成为可能，那么必然需要有的原子出现偏离现象。由于原子具有重量、大小等本质属性，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运动会发生偏离，原子偏离使得原子之间相互碰撞，原子运动才能持续进行。由此，伊壁鸠鲁以此原子本质属性所造成的偏离垂直运动回应亚里士多德第一推动力之说。万物运动的初始因既不是第一推动力，万物也不是趋向最终的理性神的完善的要求。要之，伊壁鸠鲁以原子运动的偶然性动因拒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神。

综上，伊壁鸠鲁强调灵魂、身体乃至神都是由原子所构成的，通过批判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无限”的思想以及主张原子运动的偶然性动因拒斥神创论，以此身心合一的原子论否定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

### 三、立体的灵魂：伊壁鸠鲁学派的灵魂结构论

伊壁鸠鲁学派揭橥灵魂与身体的原初同一性，但由于构成灵魂与身体的原子精细程度不同，灵魂较之于身体的功能更为重要，其作为宰制人的生命的最重要的部分，自身具有四种成分，且显现出立体的结构。

(一) 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灵魂是居于身体之内的宰制生命的重要部分。第一，灵魂与身体作为原子共同构成人的完整的身体。灵魂与身体都是完整的身体必要的组成部分，身体是灵魂的存身之处，灵魂作为精细的原子居于身体之中，使得身体成为有灵魂的身体；灵魂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不是独立于身体的非物体，而是人的生命力的表征，如果身体缺乏灵魂，身体不但不是完整的，而且身体由于失去灵魂成为

<sup>①</sup> [英] 大卫·赛德利：《古代创世论及其批评者》，第 234-248 页。

<sup>②</sup>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论天》，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2 卷，徐开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56-357 页。

<sup>③</sup> [古希腊] 伊壁鸠鲁：《伊壁鸠鲁文存》，[古希腊] 伊壁鸠鲁、[古罗马] 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4 页。



无生命的存在。第二，灵魂与身体在原子构成的基础上是同一的，但是构成灵魂的原子较之于构成身体的原子更为精细，因而灵魂就具有生命和认知功能。失去身体的一部分并不能使人丧失生命，但是灵魂一旦离开人的身体，人就会死亡。较之身体，灵魂才是指导和控制生命的重要部分。<sup>①</sup>第三，灵魂既不是“非物质”的和谐，也不与身体构成异质层面的决定关系。“和谐”（harmonia）一词的原义是指把不同的事物结合或调和在一起。由于“和谐”最早成为毕泰戈拉学派的重要范畴，因此一般认为此种灵魂和谐的说法是由毕泰戈拉学派提出的。<sup>②</sup>但是柏拉图对于灵魂和谐的说法予以否定。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认为如果灵魂是和谐，它就是由身体中的多种元素组合而成的。然而凡是组合而成的事物必然是在各种构成组合物的元素之后的，并且和谐之为和谐需要依赖组合物的各种元素。因此，灵魂的和谐会导致灵魂受到物质机械作用的影响，失去自身的自由。更何况灵魂是绝对的善，并非如毕泰戈拉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善的灵魂与恶的灵魂的和谐。由此，柏拉图强调和谐与灵魂不同，和谐是可朽的身体的对立面的调和，灵魂则是单一的神圣的不朽之物。

伊壁鸠鲁学派则基于身体和灵魂的原子构成强调，一方面，和谐不是“非物质”的和谐，因为灵魂就位于体内，并且也不是“和谐”在使身体进行感觉，而是灵魂的本性支撑着生命。另一方面，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并非如柏拉图所言，是异质层面的不朽与可朽、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同质层面的主次关系，对于人的生命而言，灵魂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身体则起着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作用。要言之，构成灵魂与身体的原子的特质不同，导致灵魂在人的生命中具有主导作用，灵魂不是“非物质”的和谐，而是与身体构成同质层面的决定关系。

（二）伊壁鸠鲁学派探讨灵魂中心灵和理性的位置，揭示灵魂的立体结构。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灵魂并不是“非物质”，而是具有大小、位置等本质属性的原子。亚里士多德、<sup>③</sup>第欧根尼·拉尔修<sup>④</sup>都指出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由原子构成的。在德谟克利特看来，灵魂作为圆形的原子充溢于身体之中，赋予人生命功能，但是对于灵魂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心灵和理性的位置等，他并未详细考察。有别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学派把灵魂分为处于核心的心灵和理性，以及其他的两部分。他认为灵魂中的关键部分——心灵和理性位于人的心脏部位，心灵和理性的位置取决于它们的特殊的感受功能。灵魂的其他部分是介于灵魂的核心部位和身体之间的中位。相比位于中央部位的心灵和理性，灵魂的其他部分遍布于全身，遵从心灵的命令，接受智力的意愿和动作而展开行动。灵魂只有受到心灵力量的驱动，才能高速运动冲向身体，进而引起身体的变化。在此灵魂推动身体的运动过程中，灵魂只有与身体接触才能引起身体的活动。于此而言，灵魂并不是“非物体”的，它与身体都是物体性的。<sup>⑤</sup>反之，灵魂和身体是共感的，身体受到伤害，灵魂亦然。要言之，伊壁鸠鲁学派揭示了灵魂作为物质所具有的位置等本质属性，强调了灵魂中心灵和理性的核心作用。

（三）伊壁鸠鲁学派考察灵魂的具体组成。灵魂从本质上而言是由原子所构成，德谟克利特在探讨灵魂的偶性时涉及灵魂的组成问题。<sup>⑥</sup>在德谟克利特看来，灵魂具有火和“努斯”的形状，此实已指出灵魂是精细的微粒。不同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学派详细地探讨了灵魂的具体组成。第一，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灵魂是极为精细的，由非常微小的原子所组成。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认为灵魂最基本的特征是运动。精细、光滑、圆巧的物体相比于更重、更粗糙的物体是更易于运动的。从运动的特性就可以推知心灵是由极其细微、光滑的物质构成的。另一方面，灵魂离开身体时几无踪迹，身体并未减少丝毫的重量，足见灵魂本身是十分精细与轻盈的。第二，伊壁鸠鲁学派分析组成灵魂的四种成分。

①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32 页。

②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I*, p.307.

③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3 卷，第 15 页。

④ [古罗马]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 454 页。

⑤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36 页。

⑥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3 卷，第 11 页。

他们认为灵魂是一种混合体，它是由四种成分构成的：某种似火的、某种似空气的、某种似风的，以及无以名状的精细元素。无以名状的精细元素最先开始运动，继而似火的也开始运动，然后是似风的开始运动，最后是似空气的运动。灵魂运动之后，血液开始沸腾，肌肉、骨骼相继感受到力量。在伊壁鸠鲁学派看来，灵魂是由四种性质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并按照性质重要性的差异由高到低开启运动的。第三，灵魂是一种统一体，四种性质不同的成分构成灵魂原子的本质属性。四种性质差异的成分只有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运动，它们是无法被分割独自进行运动的。<sup>①</sup>要言之，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灵魂是由非常精细的原子，即性质差异的四种成分组成的统一体。

综上，伊壁鸠鲁学派强调身体和灵魂皆是由原子所构成的，但是灵魂原子的特质决定其是宰制生命的重要部分，由此，灵魂与身体不是异质层面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同质层面上的主次关系，伊壁鸠鲁学派遂以此身心合一观突破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

#### 四、灵魂必死：伊壁鸠鲁学派的身体同一性

伊壁鸠鲁学派强调灵魂与身体是物质性的原初同一性，灵魂既不是先于身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也不是后于身体而死亡的不朽之物，而是与身体共同出生、成长，乃至共同死亡之物。由此，伊壁鸠鲁学派身心同生共死的身體同一性<sup>②</sup>拒斥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的思想。

（一）伊壁鸠鲁学派认为身体和灵魂具有原初的整体性。第一，灵魂与身体具有原初的同一性，合之则为完整之人，分开则表明人的死亡。尽管灵魂在身体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灵魂功能的实现需要依托身体所提供的基础。身体如果离开灵魂，则独自无法出生、成长，纵使死后尸骨也荡然无存；灵魂如果离开身体，既不会优入圣域，也不会轮回转世，终于无处安身而至死亡。因此，灵魂和身体是相互依存、相互结合的原初合一体。<sup>③</sup>

第二，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灵魂与身体是共同感受的。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身心二元论者在灵魂与身体二元的基础上强调，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不朽之物，其先于身体而认识事物，身体所感知的客观事物只是“见闻之知”，它并非真正的知识。伊壁鸠鲁学派从“拯救感性”出发认为，灵魂和身体的原初合一性决定着灵魂和身体是共感的，身体独自是无法感知的，灵魂亦然，身体的感知能力实是身体和灵魂共感的结果。<sup>④</sup>

第三，在身体和灵魂的共感之中，身体的感受先于灵魂的感受，但是灵魂的感受更为深刻。伊壁鸠鲁承认感觉（直觉）的客观有效性，认为感觉之所以具有客观有效性，主要是源于原子是事物的本质，感觉是人的感官所接触到的事物的原子所散发的光束，此种源于原子的光束只要与健康的感官相接触就会有此种感觉，由此感觉具有客观普遍性。感觉器官之于客观事物的感知，尽管是身体和灵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时间的先后逻辑而言，物放射出的影像首先是由身体感觉器官感受到的，而感觉只是接受印象，具体判断事物的印象则是灵魂的理性之事。<sup>⑤</sup>相比于身体，灵魂原子居于身体的中央控制着生命，灵魂的感知能力是更重要的。要之，灵魂和身体是原初的同一性，并不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相互嵌入式地编织着。

（二）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灵魂与身体作为物质性的原初同一性表明灵魂是可朽的。伊壁鸠鲁学派通过多个论证，证明灵魂是必死的。<sup>⑥</sup>由此，灵魂并非独立于身体的不朽之物，而是与身体具有物质同一性的必死之物，以此拒斥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宣扬灵魂不朽的理性神学，强调人应该快乐地生活。

（三）灵魂与身体的物质同一性表明死亡是必然之事，但死亡实是与人无关的。伊壁鸠鲁强调死亡与

①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44 页。

② [英] 克里斯托弗·希尔兹：《古代哲学导论》，马明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05 页。

③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50 页。

④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50 页。

⑤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352 页。

⑥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58-294 页。

人是不能并存在的，人作为终有一死者不应该整日戚戚于死亡的恐惧，而应该快乐地活着。卢克莱修从灵魂的必死性出发亦强调，如果死亡代表着灵魂与身体的分离，那么死亡并不意味着灵魂从身体的开释，进而获得彻底的解脱，灵魂与身体的原初合一性使得灵魂无法独自活着。死亡的出现中断人的感知活动，导致人既无法追忆曾经的感知之事，又无法操心“尚未”的将来之事。纵使死亡之后如果灵魂还具有感知能力，那么则需要借助新的身体与其结合成为活的生命体，但是新的身体与灵魂的结合并不能对人有丝毫影响，因为死亡已经使得原有的身心结合所产生的感知能力中断，新的身心结合所产生的感知能力已经不再是原来之人的感知。因此，死亡的此时此刻性与人已经毫无关系。<sup>①</sup> 纵使纪念死者，从哀悼和回忆中受益的依然是纪念者，而不是被纪念者，因为被纪念者已然去世，纪念者通过纪念活动控制自己的情感，从而产生快乐。尤有进者，自然的巨镜亦折射出死亡与人无涉。<sup>②</sup> 既然死亡与人是毫无关系的，那么人就不应该恐惧地狱等死后世界，而真正的地狱就在人间。正是种种人造的恐惧压迫着世人，使人难以获得快乐。只有人真正地明白死亡与人无关之时，人才能无所畏惧地享受着快乐的生活。

综上，伊壁鸠鲁学派以灵魂必死的论证否定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所揭橥的灵魂不朽的思想，不仅解除了理性神学对于人的压抑，而且论证了快乐主义的合理性，从而开启了希腊化哲学的伦理转向。

## 五、结语

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不仅影响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的身心思想，而且成为古希腊哲学身心二元论的范式。斯多亚学派将柏拉图的造物主内在于物质之中，造物主被视为“宇宙灵魂”（*pnuma*），身体则被视为质料，宇宙灵魂通过“主导原则”（*hegemonikon*）管理着身体。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熔铸综合，提出影响甚大的“太一”→理智→灵魂→身体的“流溢”说，其强调灵魂作为本体高于作为质料的身体。然而伊壁鸠鲁学派从原子论出发揭橥身体与灵魂的原初合一观，拒斥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强调哲学是一种死亡训练，借由灵魂的规劝个体终能获得灵魂的净化，达至幸福的境界，那么伊壁鸠鲁学派基于原子论的身心合一观则是一种关注身体的伦理学，其认为身心的身体性使得灵魂不朽成为虚妄，幸福则由灵魂在来世永生的信仰转向此世身心的快乐，由此其成为“减法治疗”的代表，影响到古罗马的拉尔修、卢克莱修，近现代的蒙田、卢梭、马克思，以及晚近的安东尼·朗、赛德利、努斯鲍姆等人。于此而言，柏拉图和伊壁鸠鲁学派身心思想的转变不止表征着古希腊哲学的转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在“颓废”（*de-cadence*，失去节奏即失序）的古希腊社会晚期，伊壁鸠鲁学派以其身心一体论重新诠释着何为美好生活。

责任编辑：罗 苹

---

①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296 页。

② [古罗马] 卢克莱修：《物性论》（拉中对照译注本），第 304-306 页。



# 论斯托内克语境<sup>\*</sup>

胡 扬

〔摘 要〕斯托内克语境理论将语境定义为交际者的共有场，即交际方在某一时刻所共同预设的信息。我们可以从“概念特征”和“基础问题”两个方面对斯托内克语境进行深入的考察。斯托内克的语境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语境的表征理论。

〔关键词〕斯托内克 语境 共有场 可能世界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32-07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斯托内克(Robert Stalnaker)将语境界定为“共有场”(common ground)，即交际方在某一时刻所共同预设(commonly presumed)的信息。共有场理论解释力强，在话语解释、预设以及说谎者悖论等领域具有持久的理论影响力。我们试图在这里搭建一个条理清晰完整的解释框架，以把握共有场语境理论的诸多特性，勾勒其理论纵深和思想基础。首先，我们将分析共有场的三个特征，即共有场是命题态度概念，具有迭代结构，通过适配(accommodation)得以更新。进一步，我们会说明共有场何以被界定为一个可能世界集。其次，我们指出，共有场的上述特征和界定背后是斯托内克对两个基础问题的创见，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何谓“交际”，以及“预设”从何而来。最后，我们将说明斯托内克论述共有场的方式实际上暗示了一种关于语境的表征理论。

## 一、共有场的特征及其界定

交际发生在情境(situation)里，这是共有场语境理论的直觉基础：语境即是一种情境，为理解交际者的所言(what is said)及欲意(what is intended to mean)提供解释资源。语境提供的解释资源涉及众类信息，如“言者意向(intentions)，言者及听众的知识、信念、期待和旨趣。在同一语境下已完成的其他言语行为，说话的时间，话语效果，已表达的命题真值”。<sup>①</sup>显然，每位交际者各自有独特的背景知识、会话目的、旨趣、交际期待和个人信念等。共有场语境试图捕捉的不是这些独立分殊的认知状态，而是那些被交际者所共同预设的信息，它们保障了会话交际的成功。斯托内克将这些被共同预设的信息叫作共有场。

### (一) 共有场是一个命题态度概念

共有场是命题态度概念，反映的是参与者对彼此共有预设的“共同接受”。这里，参与者“共同接受”的可以是他们对预设信息内容的共同信念、假装、怀疑、希望等。因此，为了特定的交际目的，交际双方可以共同接受假的预设信息，于是，假的预设信息就可以落入共有场。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语境主义解悖方法论研究”(20CZX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扬，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631)。

①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and Content: Essays on Intentionality in Speech and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5.



例如，这周二（6月18日）中午，陈红的父亲问母亲：“晚上还是给陈红做上周的红烧茄子吗？”母亲答：“当然不啊，没听到她说不喜欢吃吗？”随后，陈红打电话说忘给他们讲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这段对话表明，父母共同接受对以下预设信息的信念：陈红6月18日会在父母家吃晚饭。这条信息虽为假（陈红的电话表明实际上她这一天不回父母家吃晚饭），但它构成了父母对话的一条共有场信息，促成了父母间的这场对话。

共有场包含假信息也会发生在“佯装”的情况下。例如，看到王浩，陈红抓住身边黄斌的手，说：“亲爱的，今晚我们还去看电影。”黄斌机敏地理解陈红是要让他配合演她男朋友，断了王浩的念想。于是黄斌配合说：“好呀宝贝，去昨天那家影院吗？”陈红与黄斌在王浩面前共同接受这条被佯装的预设信息，即黄斌是陈红的男朋友。显然，这条信息是陈黄二人的一条共有场信息，这条预设信息虽为假，但没有这条信息，交际目的就会流产。

## （二）共有场具有迭代结构

对于成功的会话，每位交际者各自认为某条信息是所有交际参与者的共同预设，这还不够，只有交际者对该预设信息共同接受的态度彼此通达（mutually accessible），共有场才能形成。这就牵涉到共有场的结构问题。

斯托内克认为，共有场具有如下迭代结构：

“一个命题是你和我之间的共有场如果我们（为了某个特定的交际目的）都接受它，我们都接受它，我们都接受我们都接受我们都接受它，等等。”<sup>①</sup>这种迭代结构的形成，关键在于

每个交际者对该预设信息的接受态度彼此通达。给定一个对话和一条预设信息，这一通达关系（Accessibility Relation）可表述为：每个对话参与者通达<sub>n</sub>每个对话参与者通达<sub>n-1</sub>……每个对话参与者通达<sub>1</sub>每个对话参与者对这条预设信息的通达<sub>0</sub>。我们假定某对话参与者为A和B，共有

场为命题 $\phi$ ，其相应的通达关系为接受关系： $r_n, r_{n-1}, \dots, r_2, r_1$ ，图1则示例了共有场的迭代结构： $A_0$ 与 $B_0$ 分别代表对话者A和B对命题 $\phi$ 的接受状态<sub>0</sub>。以A为例（同理于B），从 $A_1$ 到 $A_n$ 代表会话参与者A迭代的接受状态<sub>(1, 2, \dots, n-1, n)</sub>。给定通达关系 $r_1$ ， $A_1$ 表示A接受<sub>1</sub>B接受<sub>0</sub>命题 $\phi$ ；给定通达关系 $r_2$ ， $A_2$ 表示A接受<sub>2</sub>B接受<sub>1</sub>A接受<sub>0</sub>命题 $\phi$ ；……给定通达关系 $r_n$ ， $A_n$ 表示A接受<sub>n</sub>B接受<sub>n-1</sub>……A接受<sub>1</sub>B接受<sub>0</sub>命题 $\phi$ 。

从 $r_1$ 到 $r_n$ 的迭代是理论上形成共有场的结构条件，否则，如果A在 $A_i$ 中接受<sub>i</sub> $\phi$ 为共同预设，而B在 $B_i$ 处不接受<sub>i</sub> $\phi$ 为共同预设，通达关系在 $r_i$ 迭代遭到阻断，共有场则难以形成。

## （三）共有场通过适配而改变

共有场会随对话改变，这一变化过程就是“适配”，即交际方对共有场的信念达成一致的过程。一场对话的参与者很可能对哪些预设信息是共有场有不同的认识。我相信 $\phi$ ，所以我相信 $\phi$ 是共有场；然而很可能你也相信 $\phi$ ，却不相信 $\phi$ 是共有场。于是我们对共有场的信念没有达成一致。斯托内克认为，成功的交际活动依赖于对共有场的一致信念：“交际包含的一个规范就是交际参与者的预设——他们当作共有场的信息——应该一致。”<sup>②</sup>

这一会话规范促成了适配过程。然而，适配的前提是交际双方必须首先互相认定他们对共有场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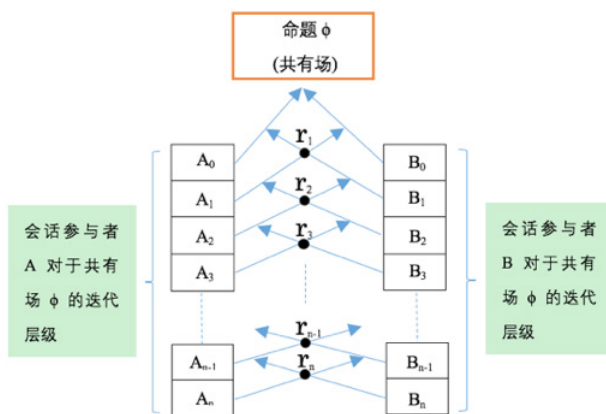


图1 共有场迭代结构图

①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5.

②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p.46.

念存在分歧，并且分歧必须明示交际者。斯托内克认为，“明示事件”（manifest event）可以做到这一点，即“发生在交际环境下，对交际者都很显明（obviously evident）的事件。”<sup>①</sup>显然，话语本身就是这种明示事件：“当话语产生，它被产生这一事实会变成共有场；当交际语言的语义是共有场时，一句带有语义的话语被产生出来这一点将会得到明示。”<sup>②</sup>

分歧被明示，意味着适配的开始，三种不同的明示方式对应着三种适配过程，我们可以将其分别命名为“扩充共有场”“更迭共有场”以及“伪装共有场”。

第一，扩充共有场。你说出一句话，该句预设命题 $\phi$ ，你相信命题 $\phi$ ，并相信 $\phi$ 是我们的共有场。这将成为我相信命题 $\phi$ 并也将其视作共有场的理由。基于该理由，我的信念集由于囊括进命题 $\phi$ 得以扩充，同时我接受 $\phi$ 是我们的共有场，于是，你一开始当作共有场的命题最终成为我们之间的共有场。你对我说：“我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句话预设你有孩子，也表明你相信你有孩子这一信息是你我之间的共有场（或者相信它将会是我们的共有场）。虽然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不知道这条信息，你也不知道我是否知道这条信息，但是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你在撒谎。另外，要是你没有孩子或者你不知道你有孩子，你也不会预设该信息。于是，我有了一条新信念，即你有一个孩子，通过你说的话，我相信你相信……我相信你有孩子，它成为我们的共有场。因此，一开始只是你当作共有场的信息最后成为我们的共有场。

第二，更迭共有场。我“明确否定你所预设的命题而改变你的预设，这样，你将不再错误地把该命题作为共有场。”<sup>③</sup>你问我：“你又换工作了？”表明你预设我至少换了两次工作，并认为这一信念是我们的共有场。我回答：“我换了，但是只换过一次。”显然，我否认了你的预设，你不再认为“我至少换过两次工作”是对话的共有场。该回答重新建立起来一条共有场，即这是我第一次换工作。依此，共有场获得了更迭。对于顺利的会话交际，我本应该直接通过说“换了”还是“没换”来回答你，但这里我不得不首先纠正你的错误预设，更迭对话的共有场。

第三，伪装共有场。在某些情况下，我并不相信你通过明示事件所做的预设，我有理由相信该预设是假，但是由于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交际目的，我们会接受该假预设作为共有场。之前的语例中，陈红和黄斌通过明示事件共同预设“黄斌是陈红的男朋友”，这一预设虽为假，但是有助于实现“拒绝王浩”的交际目的，因此，他们把该预设伪装成会话的共有场。

#### （四）共有场的“可能世界集”定义

我们提到，共有场是一个命题态度概念，它表示的是交际者共同接受的信念。如果这些信念由一组命题来表达，共有场则可以界定为一组命题。然而，就斯托内克看来，通过一个可能世界集来界定共有场是更基本的方式。

可能世界集确立在特定的交际过程中，它提供了交际者在某时刻“可言说的选项”。斯托内克认为话语交际的核心目的是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然而世界有很多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可能世界。言说在话语交际中的功能之一就是众多可能性中挑选出一种可能性，排除其他可能性。“挑选”，即确认一个言说选项，将之传达出来。你对我说“广州是广东的首府”，这句话选出并传达了一个可能世界（这一可能世界也就是现实世界），即广州是广东的首府。然而我们可以想象，世界还有其他可能，交际者因此有不同的言说选项，比如“中山是广东的首府”以及“佛山是广东的首府”等等。一方面，共有场限定可能世界集，它是所有给定可能世界的共有部分，只有能够使共有场为真的可能世界才能成为这个可能世界集的元素。可以想见，你我之间的共有场是“广东有首府”，它在我们上述列举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而给定这个共有场，可能世界集就不能包含“广东没有首府”的可能世界。另一方面，可能世界集限定共有场：一条信息要成为共有场，当且仅当它在所有给定可能世界中为真。在这个意义

①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p.47.

②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p.47.

③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p.48.

上,可能世界集给共有场划了范围。鉴于可能世界集与作为语境的共有场之间的对应关系,斯托内克将该可能世界集称作“语境集”(context set)。

假设一场对话,甲说:“那本书封面是什么颜色的?”乙答:“那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p<sub>1</sub>)。显然,甲乙之间此刻的共有场之一是“那本书有封面”(c<sub>1</sub>),给定上述共有场与语境集之间的关系,这场对话在此刻的语境集不能包含使该共有场为假的可能世界,这样,语境集中可能世界的范围得到了限定。在该范围内,我们可以设语境集中包含n个可能世界,分别是“那本书是红色封面”(w<sub>1</sub>),“那本书是蓝色封面”(w<sub>2</sub>),“那本书是白色封面”(w<sub>3</sub>)……“那本书是M色封面”(w<sub>n</sub>)。进一步来说,乙的断言p<sub>1</sub>(“那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让语境集和共有场都发生了变化:w<sub>1</sub>被p<sub>1</sub>断定,于是,从w<sub>2</sub>到w<sub>n</sub>的所有可能世界从语境集中删除,同时,p<sub>1</sub>提供的认知信息(即“那本书是红色封面”)扩充了共有场的内容。在甲乙的交际继续进行之前,这场对话的语境集至少要保证p<sub>1</sub>和c<sub>1</sub>都为真。

既然共有场可以由语境集来界定,那么共有场对言说的作用就可以分析为语境集对言说的作用。借助这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隐去“共有场”,仅仅通过说明言说与语境集之间的关系来刻画动态的交际:言说[如一个断言(an assertion)]改变语境集的元素,反过来,语境集限制言说的范围,交际就是言说与语境集互相限制和改变的过程。

至此,我们分析了斯托内克共有场概念的三个特征和它的“可能世界集”界定。然而,共有场语境因交际而创,这是它的语用本质:交际使语境得以生发、识别和派用。与此密切相关的有两个问题:首先,共有场要借助交际,那么如何刻画“交际”?其次,如果共有场的对象实质上是交际参与者共同接受的预设,那么如何理解“预设”?这两个方面构成共有场语境理论的重要基础。

## 二、共有场语境的基础问题

### (一)何谓“交际”:语用的背景故事(background pragmatic story)

什么是一场“交际”?斯托内克把该问题的答案叫作“语用的背景故事”。语言哲学家需要说明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斯托内克的版本是:“我知道,并且你需要知道,某件事是否是A,或者是B,或者是C,等等;所以,我说出一个语句,用这个处于上下文的语句来说出A或者B或者C等等;因此,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得到你需要知道的内容。”<sup>①</sup>实际上,这一“语用的背景故事”是对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版本的修正,刘易斯的版本是:“我知道,并且你需要知道,某件事是否是A,或者是B,或者是C,等等;所以,我说出一个在上下文中我视为真的中文语句(原文为“英文语句”——引者注),而这一语句的真取决于A或者B或者C,等等;因此,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得到你需要知道的内容。”<sup>②</sup>斯托内克和刘易斯都把言语交际视作提供信息的行为,这一信息是言者知道且听众需要知道的内容,但是两者对交际的信息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斯托内克认为交际内容是交际参与者所表达的命题;刘易斯认为交际内容是某一具体语言下所言语句的真值。言语交际过程一般表明言者希望传递给对方一定的内容,这一内容首先是语义内容。斯托内克和刘易斯都将语句作为语义机制的输入,两者的分歧在于语义机制的输出是什么:斯托内克认为是命题,刘易斯认为是语句真值。

我们认为,斯托内克讲述的语用背景故事可以从两方面得以论证。一方面,斯托内克强调,决定某一语句真值的信息有两层作用:一层作用是确定交际的所言内容,另一层作用是确定所言真值。如我断定语句“你是个笨蛋”为真,李荣有两种方式断定其为假:第一种方式下,李荣与我共认“你”的指称是王明。李荣和我都在给同一个命题“王明是个笨蛋”赋予真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命题“王明是个笨蛋”有真正的分歧。第二种方式下,李荣与我没有共认“你”的指称。比如,我用“你”指王明,李荣认为我用“你”在指李荣,而我并不知道李荣错认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断定了不同的所言内容,

<sup>①</sup> Robert C. Stalnaker, *Context*, p.21.

<sup>②</sup> David Lewis, “Index, Context, and Content”, S. Kanger, S. Öhman, eds., *Philosophy and Grammar*,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93.



也就是断定了不同的命题：我断定“王明是笨蛋”，李荣否定“李荣是笨蛋”。我们在这里只有误解，没有分歧。只有在语义过程中获得合适的命题（也就是语义内容），交际双方才有可能避免误解，以正确的方式（如上述第一种方式）赋真值。因此，语义过程的输出必须是一个命题，才能够区分信息的上述两层作用（“获得所言命题”和“确定所言真值”）。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对交流语句的真假没有必然要求。满足特定的交际目的很可能意味着我们要说一些假话（即使我们假装其为真）。交际方能够通过这些假语句交流得起来，靠的是交际双方的共有场，即他们（彼此通达地）共同接受相关预设信息。显然，获得这个共有场，依赖的不是所言语句的真值，而是对所言及其预设“共同接受”的命题态度。要有命题态度，必须先有命题，这意味着交际的语义材料并不是语句的真值，而是命题。因此，斯托内克的语用背景故事弱化所言真值，凸显所言命题，实际上就是在给作为命题态度概念的共有场铺路。

## （二）言者预设（Speaker Presuppositions）

共有场的内容是交际方共同接受的预设信息。这里的“预设”尤指言者做出的预设，而不是词句自带的预设。区别于以往普遍将“预设”理解为“词句预设”（sentence presuppositions），“言者预设”构成了共有场概念的另一根本。从词句预设到言者预设，义理上的起承转折表明“言者预设”并非空造，其理论指向十分明确。

词句预设取决于词句的字面义和语法规则，是纯粹的语言学考量。词句预设实际上被视作语义学概念：预设归根到底是词与语句（触发预设的词与被预设句）、语句与语句（触发预设的句与被预设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将预设看作词句预设，无法说明交际中的三类预设现象。

（1）所言预设不被接受致使所言违和。西蒙斯指出，一方面，“交际中的预设只是交际参与方的背景信息，不是交流的内容和要点。”<sup>①</sup>然而，当背景信息难以令人接受时，话便显得唐突、不恰切或不舒服（即“违和”）。如我说：“李志戒烟了。”你应：“李志根本不吸烟。”我的话引起违和的原因，不是所言本身，而是所言预设：“戒烟”预设“曾经抽烟”，而有人指出李志从不抽烟。

（2）所言预设作为交流的新信息被接受，所言不显违和。不可否认，交际中的预设有时恰恰是重要的交流内容，我们将其作为新信息接受下来。如你说：“新同事很帅！”小王应：“我敢肯定他妻子也这么想。”显然，短语“他妻子”预设新同事有妻子，这是在利用预设传递信息，提醒你新同事有妻子，这时候小王的话在交际中并无违和之处。

以上预设都是由词句语义或语法所引发的，但它们有时不被接受，有时却是重要的交际内容，词句预设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3）佯装预设信息。词句预设的经典界定是语句S预设命题 $\phi$ 当且仅当只有 $\phi$ 真，S才有真值。不过，在具体的交流活动中，我们会遇到S有真值同时 $\phi$ 为假的情况。如在陈红和黄斌演的那场戏里，陈红通过说“亲爱的，今晚我们还去看电影”这句话预设黄斌和她是情侣，这一预设为假，而这句话确有真值（即为假）。因此，词句预设难以说明佯装预设的情况。

问题好像出在词句预设遗落了预设发生的语境。劳里·卡图南（Lauri Karttunen）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语用的词句预设”（pragmatic sentence presuppositions）理论：S语用地预设 $\phi$ ，意味着只有在可以衍推 $\phi$ 的语境<sup>②</sup>中我们使用S才是恰当的（felicitous）。语用的词句预设不再孤立地显示语言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它现在对应的是可以衍推出自己的语境。开发词句预设的语用面相可以说明上述困难“（1）”和“（3）”：对于“（1）”，所言违和源于所言语境不能衍推所言预设；对于“（3）”，陈红的“亲爱的，今晚我们还去看电影”是假话（即该句有真值），然而陈红与黄斌的对话目的（即让王浩死心）营造了一个语境，从中可以推出该句的预设（即黄斌是她的情侣）。“（2）”好像不能被“语用的词句预设”所解释：

<sup>①</sup> Mandy Simon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Presupposition”, *Philosophy Compass*, vol.1, no.4, 2006, p.359.

<sup>②</sup> 卡图南指出，“‘语境’是一组背景假设（assumptions），它包括‘任何言者选择的，并视为他与其听众分享’的内容。”Lauri Karttunen, “Presupposition and Linguistic Context”,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vol.1, no.1-3, 1974, p.181.

语句“我敢肯定他妻子也这么想”在之前所例举的对话场景中并无违和之处，然而我们很难在对话者之间建立一个能够推衍其预设（即新同事有妻子）的语境。因此，我们不能说找不到能够推衍所言预设的语境，所言就会违和。

刘易斯试图通过“预设容纳原则”来化解“(2)”：“如果在时刻t说某句话需要接受预设P，并且如果在t之前P并没有被预设，那么P在t时刻被预设。”<sup>①</sup>根据该原则，语境在所言时刻t得到更新：所言预设会在t时刻自然纳入语境当中，保证所言预设能够从更新的语境中推出。对于“(2)”，语句“我敢肯定他妻子也这么想”在t时刻说出，语境在t时刻得到更新，这意味着所言预设“新同事有妻子”被纳入语境中。所言预设既然是新语境的一部分，自然能够从该语境中推出。借助“预设容纳原则”，语用的词句预设看起来能够很好地化解“(2)”：语句“我敢肯定他妻子也这么想”在t时刻于对话并无不恰当之处，因为其预设可以从更新的语境中推出。问题是，“预设容纳原则”是一项有关某门语言的约定原则，语境的更新是这一语言约定原则的结果，它与言者的交际意向等因素不相干。如此刻画语境更新过程不符合我们的直觉。直觉上言者意向等全面参与到对预设信息（也就是对语境）的构建当中。斯托内克认为，如果我们要公正对待言者意向对预设的作用，在思路上就必须放弃“词句预设”，转向“言者预设”。

如果说词句预设主要来源于特定词句的触发，相对照来说，言者预设强调言者在交际中如何根据自己的交际意向去做出预设。这意味着预设的产生不再依赖词句语义，而是依赖言者的信念状态。“这一观点希冀将语言学现象还原成言者的信念状态：对预设的要求仅仅通过言者的内在状态来满足，只要言者具有必要的信念，预设的要求就能满足。”<sup>②</sup>

“言者预设”理论试图彻底扭转“语义触发预设”的思路。一方面，预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又来胡说八道了”不再仅仅预设命题“他之前至少有一次来胡说八道”，而是表明言者心中确切记得有一次（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涉及的人物等）他曾来胡说八道。言者预设意味着言者意向等非语言学要素全面介入对预设的分析之中，预设的内容不再完全受制于字面义，而是反映言者的信念状态。另一方面，“言者预设”可以让我们正确理解共有场语境适配。如果说刘易斯的预设容纳原则是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的规范，那么，斯托内克的共有场适配规范就是交际过程中关于言者意向的规范。换句话说，在“词句预设”的线索上，交际的达成有赖于某种特定的语言（语言中的语词及其预设），“交际”就是言语交际；在“言者预设”的线索上，交际的达成有赖于交际当事人的交际意向和信念状态，“交际”就是意向交际。

借助“言者预设”，共有场的更迭、扩充和伪装能够回应上述“(1)”“(2)”“(3)”所提出的问题，也能避免刘易斯方案中对言者意向的搁置。需要强调的是，借助“言者预设”，共有场的更迭、扩充和伪装直接体现交际方意向上的变化，交际方在交流过程中所思所想的变化不再受到任何特定语言的影响。“以这种脱离语言的方式来刻画言者预设，相当于言者可以不通过任何实际的言说来进行预设”。<sup>③</sup>这里的问题也是显然的：作为“明示事件”的言语行为促成并标识共有场适配，换句话说，言者预设发生在言语的同一时刻，即言者做出言语行为，言者预设得以改变，共有场适配得以进行，这意味着斯托内克对共有场适配的刻画仍然离不开特定语言中的言语。

---

① 这里的“容纳”和前文斯托内克的“适配”只是译文之别，都对应英文“accommodation”。刘易斯将语境的更新看作语言实践的一项规范，斯托内克则认为语境的更新并不依赖于特定语言，而取决于交流者的意向（speaker's intention）。David Lewis, “Scorekeeping in a Language Gam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vol.8, no.1, 1979, p.340.

② Mandy Simons, “Presupposition and Accommodation: Understanding the Stalnakerian Pictu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12, no.3, 2003, p.257.

③ Mandy Simons, “Presupposition and Accommodation: Understanding the Stalnakerian Pictu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12, no.3, 2003, p.267.

### 三、作为表征理论的斯托内克语境理论

我们在介绍共有场语境理论的一开始，就提到了斯托内克建立该理论的基本直觉，即“语境是话语发生的情境”。从这个角度看，斯托内克对语境的说明也就是对“情境”（situation）的说明。沿着这一思路，斯托内克的理论关切其实是“表征”情境式语境（context-as-situation），这种对语境的研究进路我们可以将之看作语境的表征理论（the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context）。

首先，所谓“表征”，一般意味着具有语义性质的对象（object）。这里的“语义性质”包括“内容”“指称”“真值条件”“真值”等等。斯托内克试图建立情境式语境的表征理论这一点十分明显。我们在“共有场的‘可能世界集’定义”那一节看到，斯托内克将语境定义为由交际者所共同预设的命题，而命题一般来说是真值可判定的对象，于是，语境就是某种具有语义性质（如“真值可判定”）的对象。斯托内克的共有场语境理论所关切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说明“语境”这个表征对象（包括它的本质、结构）以及它对话语解释的作用等。

其次，在斯托内克看来，语境代表的是“外在”于待解释话语的解释资源。斯托内克的语境理论的另一基本直觉是话语内容依赖并更新语境。这实际上预设了一种话语内容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待解释的话语内容在“一边”，具有解释功能的语境占据相对的“另一边”，两者互相作用。之前谈到，斯托内克的语境理论将语境当作某种对象（即命题），这些对象应该外在于待解释对象（即话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时间  $T_1$  处将命题  $P$  当作语境集的一部分，那么  $P$  应该被理解为属于“语境”的范畴，它作为对某一话语  $U$  的解释项而存在，然而我们不会在  $T_1$  处将话语  $U$  归于“语境”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语境  $P$  和话语  $U$  是相互外在的。当然， $U$  的内容通过适配过程在  $T_1$  之后会包含在语境集当中。 $P$  还有可能在时间  $T_2$  处被某个语句表达出来，并需要语境集里的其他命题来解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P$  在  $T_2$  处就不属于作为解释项的语境范畴，而是属于待解释的话语，它外在于语境集里作为解释项的其他命题。总之，斯托内克将语境表征为具有解释作用的“对象”，它外在于待解释对象。

最后，斯托内克的语境是描述性的理论建构（descriptive approach）。我们提到，斯托内克语境建立在交际对话的基础上，它是语用学语境。语用学语境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语境如何作用于语义，而是语境如何作用于交际。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斯托内克刻画了语境的本质、结构和功能。就像他强调的，他的语境概念“可以让语境与交际内容之间动态交互的过程获得清晰的表征”。因此，斯托内克处理语境的方法是描述一个对于解释某个交际行为所必要的情境，而不是提供一套“情境应该如何解释交际行动”的规范条款。在这个意义上，斯托内克的语境，即“共有场”，是描述性概念。

### 四、结论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建立斯托内克语境（即共有场）的理解框架：共有场的特征（及其界定）与共有场的基础。斯托内克用可能世界集来界定共有场语境。共有场的基础有两个方面：它包含一套特别的语用背景故事，其中涵盖了对“交际”的基本理解；共有场的内容本身开辟了一条关于“言者预设”的研究路线，预设的生发不再取决于字面意思，而是取决于言者意向。最后，我们论证了斯托内克的共有场语境理论是一个描述的、外在的表征理论。

责任编辑：罗 苹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其现代价值意蕴

罗佳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观念，事实上就是他们对于人们的生存境遇、人类未来的发展境况以及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文明判断。这样的文化观是基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现实考察，从而呈现出“决定性”与“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文化观 资本主义批判 新的文化生命体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B03;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11-0039-08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观就是对于文化的一种核心观念。对于文化观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sup>①</sup>于我们而言，树立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根植于“两个结合”，而“两个结合”的内在机制就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探讨和研究，既要把握其生成的理论脉络，又要把握其思想特性，还要解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理论难题，找寻其所依凭的科学思维。

## 一、隐微与变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生成的理论脉络

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深深地意识到，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活的灵魂”。<sup>②</sup>这意味着只有在观念上审视文化和文明，方能真正理解现实的人的具体处境，而这样的具体处境，内涵于社会生活深处。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直指了文化观念的重要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的非均衡发展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sup>③</sup>可见，马克

**作者简介** 罗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530）。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思并非一些西方学者所指责的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者，他敏锐地发现了思想、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提出了哲学批判为政治变革开辟道路的思想。“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sup>①</sup>为此，马克思提出了理论对社会发展的先导功能并致力于推进哲学革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②</sup>同时，“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sup>③</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阐述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他强调：“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sup>④</sup>他以希腊神话为例，一方面肯定希腊神话的艺术成就，“认为其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sup>⑤</sup>另一方面指出希腊神话是与人类借用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早期生产阶段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强调说：“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sup>⑥</sup>这既承认了一定的艺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又强调了它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形成了一种理论互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形成了“实践”概念，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人与环境的关系等一系列新观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点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社会现实的突出功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⑦</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中，尤其是在有关“精神”“思想”“意识形态”等的阐释中，凸显了其文化维度。“精神”“思想”“意识形态”等发源于社会生活，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⑧</sup>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一定历史条件下思想体系的阶级属性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指出那些所谓的独立化的思想，反映的只不过是遮蔽了这些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幻想。他们指出，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⑨</sup>进而揭示了精神在历史上扮作最高统治者的三个阶段的戏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断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文化”只不过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sup>⑩</sup>的把戏，借以掩盖和遮蔽阶级关系，消弭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结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从直接生活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1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3页。

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sup>①</sup>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从何而来，文化如何受到一个民族特定的地理、历史境遇的影响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具体呈现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逻辑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对私有制进行深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解放愿景。“粗陋的共产主义者……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sup>②</sup>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客观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的基础上指明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③</sup>这一历史必然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社会物质生活决定文化、社会结构变迁推动文化发展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一原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特性做了深刻的阐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的宰制。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文化只不过是资本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庸，资本逻辑的扩张最终造成人们精神的空虚和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sup>④</sup>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sup>⑤</sup>

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现实的需要和理论检视，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文化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念的伟大变革，但是却遭遇到“经济决定论”式的误读。针对那种把唯物史观万能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马克思本人十分反感：“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⑥</sup>恩格斯在晚年的一些通信中对此做了省思和回应：“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sup>⑦</sup>同时，他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更为详尽、更为审慎的思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发展性。

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定义为一种哲学上的原理和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公式或者万能的套语。“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⑧</sup>“必须重新研究全部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页。



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sup>①</sup> 恩格斯在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sup>②</sup> 而“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sup>③</sup> 他一方面强调经济对于文化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sup>④</sup> 另一方面又承认这种决定性作用是间接的、有条件的和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他以哲学为例，指出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sup>⑤</sup> 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对唯物史观做出庸俗、简单、教条化理解，根源在于对辩证法的无知：“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sup>⑥</sup>

## 二、决定与能动：唯物史观中文化的定位与功能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解读中，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就是如何准确理解文化在唯物史观中的定位和功能。西方很多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论简单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决定论”背后根本没有文化独立生存的空间。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记中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对马克思来说，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过——经济基础（主导的生产方式）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sup>⑦</sup>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⑧</sup> 这一经典论断，以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呢？正如当代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斯所指出的那样，需要用“构成论的因果论”来代替“还原论的因果论”。我们必须区分自然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必须区分以客观性作为立足点的外部决定论和以历史客观性作为出发点的内在决定论。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决定性，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是通过一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起作用的，这种决定性的理论前提是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而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而不能将经典作家的文化论做简单和庸俗的理解。

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视野来思考文化的定位和价值，需要把握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物质生活对文化发展的“决定性”，是一种长期趋势的限定性，是通过人的主体实践活动展现出来的，而不是一种简单直线关系，更不是社会结构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实际上，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哲学发展状况和社会革命发展状况关系的时候，就指出了思想与现实的相互促进关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sup>⑨</sup>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8-5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0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01页。

⑦[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页。

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sup>①</sup>对于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②</sup>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东西，既包括现实的物质条件，也包括文化传统和精神特质。因而，经济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决定作用应当理解为社会物质关系对文化的产生、变迁和发展在总体上具有塑造、推动、促进和限制的作用，但并不据此否定文化形成之后所具有的发展连贯性，以及其发生发展所具有的内部独特的规律性。同时，在人类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和作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始终如一的。

第二，文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典作家在社会发展观念上不是简单的机械论者，而是实践论者。实践作为主体力量作用于客体的一种方式，是连接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重要力量，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从而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源头。人作为实践主体，是有思想、有文化、有观念的存在物，因此，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是通过主体的人来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实践中的人总是要继承原有一切历史成就和文化遗产，同时又具有在实践基础上推进文化创新的可能。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经典的描述：“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sup>③</sup>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是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自然化化和人化自然的统一。如果把唯物史观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那么只需要坐等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来推动文化的更新就可以了，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人就会变成被动地被社会结构决定的存在物，实践的力量完全被消解，文化传承与创新也无从实现了。

第三，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合力观”，并且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生存境遇、发展状态和能动创造紧密相关。对此，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sup>④</sup>这段解释为深入理解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总的来说，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社会实践的“合力观”，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的地位和本质的理解，体现了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与文化的能动作用之间的辩证智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学说，其文化观自始至终未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并作为人类社会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而呈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理想最终体现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上。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文化现象的考察不应当脱离整个社会有机体，文化的变迁从来都离不开现实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文明更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成果。

### 三、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本质的深刻揭示

文化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生生不息的宝贵财富，又要受到特定生产方式的制约与影响。在承认资本主义文化相对于封建文化的进步性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在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深刻的文化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9页。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深入阐述了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基本原理，为考察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他们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sup>①</sup>“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sup>②</sup>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不过是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经济政治地位而创造的意识形态，是资本逻辑在文化上的展现。而资本逻辑，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③</sup>“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sup>④</sup>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扩张性，要求把资本逻辑的触角扩张到世界各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宰制。这种资本逻辑裹挟下的文化扩张的过程，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预见了资本主义文化随着世界市场的产生所进行的全球扩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⑤</sup>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⑥</sup>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性化、流变性、扩张性等特征也做出了精准的揭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sup>⑦</sup>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sup>⑧</sup>“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sup>⑨</sup>这些描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封建社会关系的摧毁，同时也是对旧信仰的“祛魅”以及对封建文化的摧毁。资本主义文化随着资本的扩张性，在全球化进程中进化为一种新的文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⑩</sup>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既看到了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也担忧资本主义文化可能对其他不同类型的文化造成侵蚀，导致“文化帝国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精准地预见，资本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⑪</sup>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5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3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自我标榜为“永恒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不屑的。他们批判了那种所谓“永恒真理”的神话，指出思想、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阶级本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的观念：“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sup>①</sup>“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揭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当代西方文化的扩张本质及其内部矛盾的钥匙。

资本逻辑裹挟的文化扩张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性，只有超越资本逻辑才能彻底解决危机。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文化做了原则性的界定。共产主义建立在消除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也就消灭了阶级本身，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人类解放的文化。因此，无产阶级文化的最终归宿和最高原则体现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③</sup>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最为本质的价值原则以及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 四、守正与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既是中国式的，又是现代化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统一体。近代中国曾经经历了一场全方位的殖民主义入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过根本性的怀疑和否定，出现过激进的反传统与全盘西化主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通过“两个结合”，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sup>④</sup>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文化自信来之不易。自信源于自我体认，首先在于对主体性的建立和坚持，这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sup>⑤</sup>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文化主体性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起点上完成新的文化使命，就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科学方法。守正才能立得住，创新才能行得远。守正，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守正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种实践路径的选择。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正走向新的十字路口，其中交织和激荡着文化冲突、价值重构、文明重塑等深层次问题。显然，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疲软”难以解决世界性问题，甚至对世界发展造成了威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在当今社会一再被验证。我们必须坚持问题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问诊人类的时代境遇，探索人类文明新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sup>①</sup> 深刻把握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困境，努力探索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破解的时代课题。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文明中心论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恰恰是人类社会对新的文明形态的呼唤。中国呼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超越了资本逻辑，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和“天下观”，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提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sup>②</sup> 面对这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中国共产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创造和文明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改写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图式，具备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具有的科学内涵和价值优势。人类文明新形态终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新的希望和力量，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责任编辑：罗 苹

---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6 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 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

## ——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视角的案例分析\*

彭凯 晋琳琳

**[摘要]** 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当前其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视角下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首先,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中的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协同驱引了相关企业的组织学习活动,进而实现了民族非遗技艺产品的多样创新及二元价值创造;其次,新兴经济体企业对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探索是在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驱动下的进阶过程,各阶段对应的组织学习和产品创新也随之演进。研究结论拓展了对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及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相关讨论。

**[关键词]** 新兴经济体企业 民族非遗技艺 传承创新 战略性社会责任 纵向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47-0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非遗技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民族智慧的宝贵结晶。通过企业的市场化商业运作来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不仅是非遗技艺保护发展的重要路径,其也为新兴经济体企业提供了差异化竞争和突破价值链锁定的难得机遇。然而,现有研究并未阐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是如何逐步克服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中的不同困难,也未深入揭示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对于新兴经济企业成长的特殊意义。本文拟借助纵向案例来探讨新兴经济体中的先行企业是如何将非遗技艺传承创新作为自身的战略性社会责任,进而推动组织学习和产品创新,直至最终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发展。

### 一、文献回顾

#### (一) 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研究

通过企业的市场化商业运作来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是发展保护民族非遗的重要途径之一。2012年原国家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对民族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之一。<sup>①</sup>该模式具有诸多优势:第一,利用企业在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资源能增强非遗技艺的知名度;第二,以企业主体的方式引导非遗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推动非遗技艺的创新;<sup>②</sup>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责任创业悖论张力的形成机理和调和机制:一项多层次纵向研究”(72072043)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设计服务业面向产业链的价值重构与攀升机理”(GD20XYS04)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彭凯,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晋琳琳,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刘容:《“场”“类”“度”视域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

② 饶勇、杨岳轩等:《剪纸艺术类非遗生产性保护实践效果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第三,通过企业行为来挖掘非遗技艺的经济价值还有利于提升非遗传承人及技艺工匠的经济收入。然而伴随实践的发展,学者们也逐步关注到企业在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少数企业经营者忽视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未有对非遗技艺展开深入学习,而是一味追求哗众效果,以致削弱了非遗技艺的本真性。<sup>①</sup>另外,企业化的生产组织模式需要传统非遗工艺流程更加显性和标准化,<sup>②</sup>从依赖个人直觉经验转向重视科学观测。此外,新一代年轻人却普遍不愿从事高劳动强度的非遗手工技艺工作,非遗技工短缺的问题由此突显。<sup>③</sup>

## (二) 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特征与践行研究

战略性社会责任是企业主动将社会责任作为自身战略的核心部分,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导向行为。<sup>④</sup>相比被动责任响应,战略性社会责任具有突出的主动嵌入性、系统融合性和竞争优势等特征。一方面,相关企业需要在思维定势突破与创新方案探索、核心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的定位等方面展开主动探索。<sup>⑤</sup>另一方面,其需要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使命,并深层次嵌入到组织的技术获取、产品创新等重要价值创造环节中。此外,借助战略性社会责任,企业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评价,提升产品创新合法性,实现错位竞争。<sup>⑥</sup>实践中企业如何逐步推进战略性社会责任?部分学者已对上述微观过程展开了探索性分析,如将社会责任践行划分为“感知—计划—行动—审核—制度化”等主要步骤。<sup>⑦</sup>此外,部分学者还引入组织学习理论,以进一步扩展分析框架的系统性。如 Osagie 等指出,领导层对社会责任的关注与感悟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基础,管理层带动了外部社会责任议题的内化并使之系统嵌入到组织学习中。<sup>⑧</sup>

## 二、纵向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适合回答研究中的“如何”问题,而纵向案例尤其便于对时间序列中的关键事件及其因果逻辑展开观察。<sup>⑨</sup>本文选取的案例对象是广州汇美集团旗下的著名服饰品牌“生活在左”。该品牌自创立之日起就将非遗技艺的传承发展这一战略性社会责任嵌入品牌基因,始终以“不可复制的手工”作为品牌理念。研究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收集数据,主要一手数据包括与品牌创始人和设计总监的访谈记录(160分钟),与品牌资深手工艺人、研究工坊负责人、市场部经理等重要员工的访谈记录(12人次共395分钟)等;二手数据包括国内媒体报道和行业研究报告99篇,品牌官方微博及官方商城发布的技艺介绍等。

### (一) 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探索阶段(2014—2016)

本阶段的构念关系结构见图1。首先,聚焦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感知的特征(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2014年初,服饰品牌“生活在左”正式创立,孩提时的成长经历与之后的专业学习让创始人林某

① 杨信:《非遗生产性保护中文化认同的缺失与重塑——以土家织锦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汤夺先、伍梦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内涵意蕴、问题呈现与学理反思——以宣纸为例的探讨》,《文化遗产》2017年第6期。

③ 刘晓春、冷剑波:《“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 Michael E. Porter and Mark R. Kramer, “Strategy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84, no.12, 2006.

⑤ Giacomo Boesso, Francesco Favotto and Michelon Givoanna, “Stakeholder Prioritization,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Further Evide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22, no.6, 2015.

⑥ Carman Stoian and Mark Gilma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Pays’: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CSR for SM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vol.55, no.1, 2017.

⑦ François Maon, Adam Lindgreen and Valérie Swae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Ground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87, 2009.

⑧ Eghe Osagie, Renate Wesselink, Vincent Blok, et 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ation: Unravell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nd Oper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vol.35, no.1, 2022.

⑨ Kathleen M. Eisenhardt,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4, no.4, 1989.

对传统手工艺一直有着深厚的情感。看到精美的传统手工技艺后继无人、逐渐消亡，林某总会思索“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濒临消亡的传统手工艺”。而多年的互联网服装品牌运营经验也让她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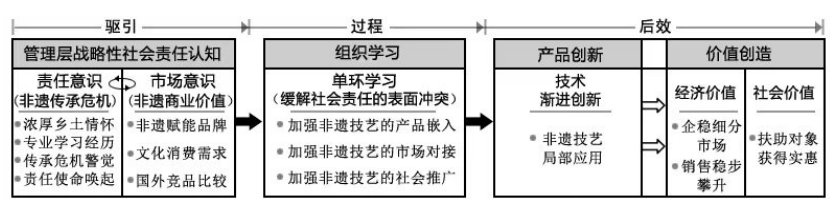


图1 探索阶段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内在机制

锐意识到：传统手工及其文化内涵不仅能为服装品牌提高产品客单价、复购率及摆脱低端价格竞争提供新的机会；也能进一步提高民族服饰品牌的性价比，增强与国外时尚品牌的竞争力；且部分经济收入更高的消费者对手工技艺具有极大的认同度。

其次，分析本阶段的组织学习特征。基于对传统非遗手工技艺的责任意识和市场意识，林某和其他高管为初创的“生活在左”确定了本阶段组织学习的核心方向：着力将非遗技艺融入服饰产品，以增加非遗技艺的认知度和手工艺人的经济收入。为此，不仅通过多项措施推进非遗技艺的产品设计嵌入，如采取产品总监和运营总监“双驱动模式”来保持设计的独立性、引进品牌首席手工艺师等；更先后与广东潮州的手工钩花艺人、贵州丹寨的蜡染艺人等全国十余个地方的特色手工艺人建立了合作，将相关技艺融入到品牌服饰或作为服饰配件。此外，品牌还积极提升非遗技艺的社会关注度。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是一种渐进性与巩固性的学习形式，<sup>①</sup>其并不涉及认识的本质改变，而是表面绩效的优化，提倡通过积极完善外在缺失来尽快适应环境。由于本阶段的组织学习聚焦于探索非遗技艺与现代服饰融合的产品开发路径并借此提升非遗技艺的知名度和手工艺人的经济收入，暂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体系思考，因此属于单环学习层次。

最后，探讨本阶段的产品创新和相应价值创造特征。通过组织学习，“生活在左”增进了与非遗艺人的交流，推出了一批融合中华传统手工技艺的产品，实现了技术上的渐进式创新。如在服饰局部嵌入手绣、手折和手钩等技艺，添加了手工贴布绣和粗线条的手工编织毛线等饰样。通过将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作为战略性社会责任积极融入到产品中，品牌成功企稳了细分市场，销量也稳步攀升。社会价值方面，不仅为手工艺人增加了实际收入，也为他们极大拓展了信息获取和交流的渠道。

## （二）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深化阶段（2017—2018）

本阶段的构念关系结构见图2。首先，聚焦本阶段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感知的特征（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在此阶段，林某等高管逐步察觉到影响民族非遗技艺传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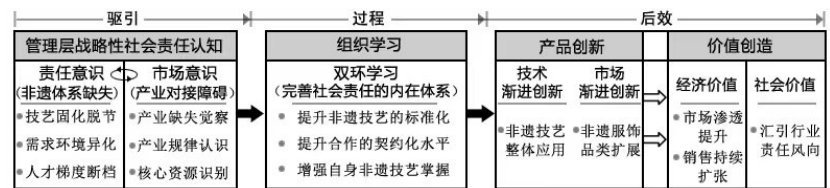


图2 深化阶段案例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内在机制

手工艺人多分布在山区等偏远地区，不熟悉现代的产品设计理念和产品设计流程”“非遗技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人才的布局和培养梯度，这样才能持续”。很明显，这些问题已经从单纯的产品设计层次上升到非遗传承的内在体系思考。与此同时，“生活在左”管理团队对于非遗技艺与现代服饰产业的市场对接障碍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互联网服饰品牌倾向采用预售模式，并且是加单制，这要求供应商有很强的敏捷性”“传统手工艺不太适应规模式开发。卖的好的时候量上不来，而有些款式则成本很高以致不符合价格体系”等。

其次，分析本阶段的组织学习特征。由于对非遗技艺的责任意识和市场意识形成了新的理解，“生活在左”管理团队为本阶段的组织学习确定了新的方向：着力完善非遗技艺传承的内在体系。第一，重

<sup>①</sup> 陈逢文、付龙望等：《创业者个体学习、组织学习如何交互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整合视角的纵向单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

点提升非遗技艺的标准化水平。如责成技术部协助手工艺人将加工制作过程的关键步骤及主要经验转换成标准化术语（规范）。第二，加强了与非遗艺人合作的契约化水平。通过影响因素提示并推荐辅助工具等柔性手段来帮助手工艺人克服困难，以实现产品按约交付。第三，为了“对传统工艺的逐个环节都做到心中有数”，不仅品牌创始人和设计总监亲自带队参加非遗大师开设的学习班，还在内部建立起“天然植物染色”“传统刺绣编织”“传统纹样”“蓝印花工艺”等多个研究工坊和相应的知识分享与考核机制。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是一种变革性的学习方式，<sup>①</sup>其强调对问题根本原因的明确与修正，着眼于组织知识基础的本质变化。本阶段企业组织学习定位于深层次的非遗技艺传承内在体系的完善，聚焦非遗传承的本质问题，因此具有双环学习的特征。

最后，探讨本阶段的产品创新与相应价值创造特征。技术创新方面，本阶段品牌实现了非遗手工技艺的更整体化嵌入。如在2018年初的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冬发布会上，品牌推出了融合手工刺绣、仿汉服交领造型等多种传统技艺的蓝印花系列产品。市场创新方面，“生活在左”还推出了萌趣玩偶等非遗技艺衍生品，以扩展商品品类。上述创新有力带动了品牌的价值创造。经济价值上，“生活在左”市场渗透力持续加强，销售收入显著增长。社会价值上，“生活在左”显著提升了非遗服饰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特别是2018年9月品牌惊艳亮相伦敦春夏时装周，获得当地知名媒体的重点报道。

### （三）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跃升阶段（2019—2022）

本阶段的构念关系结构见图3。

首先，聚焦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感知的特征（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此阶段，“生活在左”的管理层更强烈地感到，传统手工技艺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既需要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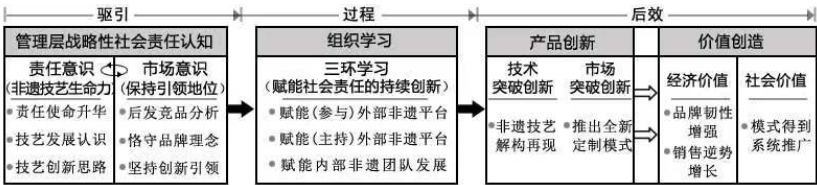


图3 跃升阶段案例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内在机制

也需要创造性的转化。品牌创始人林某就表示：“作为设计师，我们有义务让非遗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需要从最初的传统工艺经典重现，跃升到探索对它进行解构创新”。同时，随着“生活在左”品牌影响力的逐步增强，市场中也开始有部分厂商模仿甚至抄袭“生活在左”的新品。对此，林某认为：“仿冒产品的面料及做工与我们的产品差距很大”，“很多消费者宁愿付出更高的价格而选择左家的产品，是因为他们对品牌有了接纳和信赖”，“（在此情况下）需要持续推出突破性的创新产品，始终引领行业发展的方向”。

其次，分析本阶段的组织学习特征。伴随管理层对非遗技艺的责任意识和市场意识进一步深化，品牌的组织学习又具有了新的方向：赋能社会责任的持续创新。为此，一方面，品牌积极参与和搭建外部非遗合作平台。如2019年参与了唯品会旗下唯爱工坊的活动，为贵州蜡染和彝绣非遗产品提供设计辅导。同年，品牌还与贵州省黔南州妇联、州妇女民族手工业协会签署了《东西部协作协议》，共同推进传统非遗技艺的设计创新和技能培训。2022年，与浙江省东阳市三单乡政府、横店影视职业学院签订《蓝印花布教学生产基地建设协议》等文件。另一方面，“生活在左”还大力推进内部非遗技艺应用团队的发展。如选聘设计师兼任加工工坊的负责人并赋予运营自主权，为非设计岗位员工提供新品开发参与机会，支持员工申请相关技能资格等。三环学习（triple-loop learning）是一种共创型（co-invent）学习，<sup>②</sup>强调在反思旧有学习方式基础上探索新的学习方式。本阶段“生活在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赋能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对“潜在学习方式的探索（learn how to learn）”，呈现出鲜明的三环学习属性。

① 陈逢文、付龙望等：《创业者个体学习、组织学习如何交互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整合视角的纵向单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

② P. Arunprasad, “Guiding Metaphors for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 Strategic HRM Practices and Knowledge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vol.24, no.4, 2016.



最后，探讨本阶段的产品创新与相应价值创造特征。此阶段“生活在左”产品创新具有了更多的突破。技术创新上，主动应用解构、重组、拼接等多种现代手法展开创新设计，如将传统蓝染扩展出青绿、碧色、绿色、粉色等更多色系，以及在传统马面裙基础上解构推出微马面裙、大马面裙、半身马面裙、凤尾马面裙等多种时尚款式。市场创新上，“成衣定染”获得高端客户的普遍欢迎。产品的持续创新为品牌价值创造提供了重要支撑。经济价值上，“生活在左”在疫情期间体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2021年逆市实现销售额近4亿元。社会价值上，“生活在左”的非遗传承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系统推广。

### 三、结论与启示

从截面过程看，“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组织学习—产品创新及价值创造”之间的紧密作用关系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对民族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首先，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为后续组织学习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责任意识来源于管理层对民族非遗技艺的情感体验和专业认知，前者能增强行动驱动力，后者则增强了分析的准确性。另一方面，管理层的市场意识同样重要，为市场机会的敏锐觉察提供了基础。其次，组织学习是企业践行民族非遗技艺传承这一战略性社会责任的重要环节，企业需要通过多种组织学习形式来深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和逻辑体系。相应的组织学习形式包括缓解表面冲突的单环学习、完善内在体系的双环学习、赋能持续创新的三环学习等。此外，周密组织学习推动了企业面向民族非遗技艺传承的产品创新，进而实现了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协同创造。相关企业的组织学习必须与不同性质的非遗技艺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不同程度的非遗技艺创新（渐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紧密衔接起来。

从发展历程看，企业对民族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依循由表及里的进阶路径。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不断驱引组织学习持续深化，并带动产品创新及二元价值创造的层次提升。如传承探索阶段，案例企业的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主要着眼于非遗技艺本身的困境与机会，这使随后的组织学习更多聚焦产品层面的问题。上述旨在缓解表面冲突的单环学习推动了产品在非遗技术应用方面的渐进性创新，企业产品因而在竞争激烈的高端服饰市场中初步站稳脚跟，合作的手工艺人也获得了收入增加、信息拓展等诸多切实收益。在传承深化阶段，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主要着眼于非遗技艺的体系缺失。这也指引组织学习的目标从对问题本身的单环思考跃升到对问题内核的体系思考。上述双环学习不仅推动企业实现了多维度的技术渐进创新，同时也取得了以品类延伸为表征的市场渐进创新。而这些创新不仅让品牌市场渗透不断增强、销售持续扩张，同时也带动了非遗传承的社会关注。进入传承跃升阶段，案例企业的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则更多关注非遗技艺持续创新的“新动能”。这也驱引组织更加开放地推进内部非遗技艺团队和外部非遗平台的成长发展。上述旨在赋能责任创新的三环学习为产品的技术突破创新（如马面裙的元素重构）和市场突破创新（如成衣定染模式）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品的突破创新最终增强了品牌的市场韧性。

本文所归纳的“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组织学习—产品创新及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揭示了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的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该案例提示相关企业经营者，不仅应将民族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这一社会责任当做规范要求，更应主动视其为战略手段，通过社会责任认知的不断深入来持续驱动自身组织学习与二元价值创造的跃升。

责任编辑：王冰 许磊

# 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版权法分析

## ——禁止盗用救济路径的提出

[澳] 迈克·彭道敦 [文] 谢琳 [译]

**[摘要]** 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生成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或侵犯他人版权，不应受制于版权法的“独创性”“实质性相似”等相关概念分析。采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防止版权过度保护，但会使版权法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应直接从版权保护的本质“禁止盗用”分析，并通过扩大侵权抗辩来限制版权保护，即被告只要对原告作品中添加了足够多的内容，便不再构成侵权，并享有自己的保护。关键难点在于如何判定额外投入已足够，其中转换性使用可作为其衡量标准。基于该禁止盗用救济路径，非由人类创作的独创性争议不应成为人工智能作品获得版权保护的障碍，转换性使用可作为人工智能训练的侵权抗辩依据。

**[关键词]** 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 禁止盗用 可版权性 合理使用

[中图分类号] D9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11-0052-03

人工智能可能是当前讨论最多、最受关注且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而这些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中 ChatGPT（现为第 4 版本）在目前同类产品中最为著名。人工智能程序进行大量文本与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 TDM）训练以执行任何给定任务。这当然会引发可能侵犯所挖掘资源的版权，以及其终端生成物是否会构成侵权或甚至产生原创性版权作品的问题。笔者将基于英联邦法律并结合比较法视角对此进行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对此类人工智能局限性的讨论将影响最终结论。若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对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其所挖掘的解释，则将得出与下文分析截然不同的结论。Noam Chomsky 在《ChatGPT 的虚假承诺》一文中指出：“人脑不像 ChatGPT 及其同类产品那样，一个笨拙的模式匹配统计引擎，吞噬数百 TB 的数据并推断出最可能的对话响应或最可能的科学问题答案。相反，人脑是一个非常高效甚至优雅的系统，它只处理少量信息；它不寻求推断数据点之间的粗鲁关联，而是寻求解释。”<sup>①</sup> 到目前为止，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做出解释，只有人类才能做到。人工智能仅能通过分析文献来解释为什么苹果会掉到地上，但人工智能无法基于爱因斯坦所拥有的少量数据而得出苹果坠地是因时空弯曲引力的解释。

### 一、版权法相关概念的不确定性

对于人工智能是否生成版权作品及侵犯他人版权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受制于版权法的相关概念分析。版权法中“独创性”作品构成要件和“实质性相似”侵权判定要件实际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

---

**作者简介** [澳] 迈克·彭道敦 (Michael D. Pendleton)，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 (Murdoch University) 终身荣誉教授；谢琳，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广东 广州，510275)。

<sup>①</sup> Noam Chomsky, “The False Promise of ChatGPT”, *The New York Times*, 8 March, 2023.

法提供清晰的指引。

版权保护的本质在于保护对劳动 (labour)、技术 (skill)、努力 (effort)、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在早期的版权法中,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英联邦司法管辖区采用的是“额头流汗”学说。该学说坚持认为,在信息整理方面只要投入足够的劳动、技能和努力就足以赋予其独创性,从而获得版权保护。基于防止过度保护的司法政策考量,后期判例法提高了独创性的判定标准,认为仅仅依靠“额头流汗”不足以赋予其独创性,并引入思想表达二分法,<sup>①</sup>若思想与表达混同则不能获得版权保护。<sup>②</sup>在版权侵权判定方面,为合理界定保护范围,版权法采用了与独创性相对应的“实质性相似”判定要件。

然而采用这些概念反而会使版权法变得更为复杂且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独创性”“实质性相似”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的主观衡量,为定性而非定量分析。司法实践中不乏模糊保护甚至对“思想”突破保护的判例。<sup>③</sup>在经常被援引的 *Kelly v Morris* 判例中,原本属于事实的地图里程测量获得保护。<sup>④</sup>在标志性案件 *Ladbroke (Football) v William Hill* 中,虽然被告主张足球博彩券中的多个表格仅各自构成版权作品,但法院则认为对多个表格的总体汇编也构成作品。<sup>⑤</sup>在 *Elanco v Mandops* 案中,被告尽管完全改写了原告说明书的表述,但仍然构成侵权。<sup>⑥</sup>该案经常作为支持版权保护超越表达的先例而被援引。至于后期要求最低程度创造性的独创性标准也面临着同样的模糊性问题。满足独创性要求是小数据、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获得保护的关键。然而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程序所涉及的数据汇编独创性判定却最成问题。标准的模糊性将无法清晰指引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于判定结论的得出,法院的同情心起重要作用,而同情心则是非常具有主观性的。除非情形显著,否则判例法很少能阐明为何做出这样的判定。而在能够阐明之处,法院实际上采用的是“禁止盗用 (misappropriation)”分析逻辑。因此,直接从禁止盗用对劳动、技术、努力、时间和金钱的投入的角度进行分析,回归问题的本质,可避免因采用版权概念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 二、禁止盗用的一般性救济路径的提出

在多数案件中,判决构成实质性相似进而构成侵权是因为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有违其公平竞争理念,而判决不构成侵权则是因为法院认为存在允许竞争的必要性,但这些背后的原因在判决中鲜有提及。<sup>⑦</sup>

笔者的主张是,虽然认识到限制版权保护的必要性是可取的,但存在比背离额头流汗规则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即扩大侵权抗辩也可得到同样的结果。换言之,只要投入劳动、技术、努力、时间和金钱,即可获得保护,但同时也应建立一种新的抗辩,被告只要对原告所做的添加了足够多的劳动、技术、努力、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就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可受保护的新权利,不再对原告的作品构成侵权。<sup>⑧</sup>其中核心关键问题是,需要投入多少额外的劳动、技术和努力,才足以脱离他人的保护范围并可能享有自己的保护?必须进行多大的跳跃 (jump)?

## 三、人工智能作品的可版权性

人工智能作品因其并非由人类所创作,可能无法满足版权作品的独创性要件。然而若依据上文所提

---

<sup>①</sup> *Ice TV Ltd. v Nine Network Australia Ltd.*, [2009] HCA 14.

<sup>②</sup>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499 U.S. 340 (1991).

<sup>③</sup> 对此我可以举出大量的模糊性判例, Michael D. Pendleton, “An Abject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yan Abbott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pp.113-132.

<sup>④</sup> (1866) 1 Eq 697.

<sup>⑤</sup> [1964] 1 All ER 465.

<sup>⑥</sup> [1980] RPC 213.

<sup>⑦</sup> 例如 *LB (Plastics) Ltd. v Swish Products Ltd.*, [1979] RPC 551.

<sup>⑧</sup>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笔者一直主张构建禁止盗用的一般性救济路径,并就此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如 Michael D. Pendleton, “Balancing Competing Interests in Information Products: A Conceptual Rethink”,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 vol.14, no.3, 2005.



出的禁止盗用救济路径，直接从禁止盗用的角度予以衡量，独创性则不应成为阻碍其获得版权保护的门槛障碍。虽然美国版权局近期拒绝对人工智能作品进行登记，<sup>①</sup>但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登记并不是授予美国版权，只是加强了保护。版权局拒绝登记人工智能作品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版权，人工智能作品仍然可能获得版权保护。若美国国会没有进行立法，未来很可能会有有关人工智能作品可版权性的案件一路进行到最高法院，来回应科技的新发展。

美国版权局的当前路径沿袭了美国宪法上注重作者和艺术家保护的版权传统，欧洲的法律也倾向于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版权法（安娜法和出版商公司的历史）则与艺术家或创作无关，而是关乎企业或出版商发行作品的风险保护。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法律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英国法上“计算机生成作品”便早已认可对人工智能作品进行版权保护。

#### 四、人工智能版权豁免的构建

对于人工智能输出和输入行为的侵权判定，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辖区都在计划制定新的立法，与此同时，相关回应也陆续提出。在输出方面，终端生成物有可能侵犯版权，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要求在线平台为本地内容付费。<sup>②</sup>在输入方面，人工智能需要复制大量的文本进行训练，也有可能侵犯版权。对此均应考虑其是否构成版权豁免。欧洲和美国等都已经通过或提出各种 TDM 豁免方案。当然，此类豁免必须符合《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检验法。在功能上，其与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中互联网平台的安全港条款非常相似。

正如 Pierre Sirinelli 教授所指出的，三步检验法并没有详细说明应允许的例外情形，其优势在于概括出基本的判定规则，使各国能够以此审查或修改其立法，以适应数字环境的新发展。<sup>③</sup>《伯尔尼公约》当然允许通过美国式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方式来界定合理使用豁免。法院对通过三步检验法的判定可视为其符合《伯尔尼公约》。据此，美国最高法院在谷歌诉甲骨文案<sup>④</sup>中所阐述的转换性使用在我看来特别契合人工智能：其灵活、技术中立且动态。在该案中，作品价值的实质性增加不仅仅依赖于 Java 编程语言的版权所有人，同时也依赖于使用 and 开发它的各种程序员。谷歌的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新平台。谷歌意图创建一个接口来进一步开发计算机程序，而这本身就是在促进版权的基本宪法目的的实现。转换性使用概念为界定何为足够的额外劳动、技术和努力以构成版权抗辩提供了充分依据。

责任编辑：王 冰

---

① U.S. Copyright Office, Library of Congress, “Copyright Registration Guidance: Works Containing Material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8 FR 16190, 16 March, 2023.

②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aching behind Newspaper Paywalls”, *The Economist*, 2 March, 2023.

③ Pierre Sirinelli, “Exceptions and Limits to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the Workshop on Implementation Issues of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nd the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Geneva December 6th and 7th, 1999, p.6.

④ Google LLC v. Oracle America, Inc., 593 U.S.\_ ( 5 April, 2021 ).

#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及政策选择<sup>\*</sup>

石杰琳 庄 严

**[摘 要]**作为知识密集型业态,大数据产业技术和应用正处于创新突破期,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天然需求,加之“大数据+在线环境”下知识产权更易受到侵犯,认定更加困难,以致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成为值得关切的论题。该秩序意指在明晰的法律制度、规则运行和知识产权文化基础上达致的有序竞争、动态和谐的情势。大数据产业刚刚兴起,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行业自律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陶染为秩序的自我演化提供了条件,但国际竞争紧锣密鼓和中国创新发展的紧迫性,以及无秩序下的杂乱无章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或市场失灵弊端,势必促使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自我演化与理性建构“二元”结合的路径成为现实必然。再加上目前大数据产业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基础薄弱以及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难度和困境,政府的政策选择尤为重要。

**[关键词]**大数据产业 知识产权保护秩序 数据产权 秩序构建

**[中图分类号]** C93;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11-0055-08

##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

大数据产业,是指“以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包括数据资源建设、大数据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活动,以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sup>①</sup>大数据产业的意义并不在于掌握海量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实现数据的赋值、增值和价值显现,由此成为“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产业”。<sup>②</sup>由于大数据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电子设备生成、存储和传输而成,加之大数据呈现相关性及信息检索、归集、整理、传播有自动化、智能化特征,致使数据信息传播中侵权行为更易发生。<sup>③</sup>比如数据挖掘算法可能被迅速仿制,供大数据分析的海量数据或许会遭遇反向侵权,数据采集网络爬虫引发著作权争议等。可以说,“大数据+在线环境”下知识产权数据更易获取和受到侵犯,侵权主体泛化且认定更加困难。近年来,由数据权属和不正当竞争引发的纠纷增多,无论是既有知识产权遭到侵犯,还是企业竞争中数据信息的窃取和不正当使用;也无论侵权行为是来自大数据产业内部对数据采集、使用、开发、应用和提供服务的主体,还是来自产业外部主体实施信息挖掘、归集、整理和传播的过程,抑或是大数据产业主体在业务活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21&ZD168)及“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2ZDA0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石杰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河南 郑州,450001);庄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430072)。

①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电子报》2017年1月20日第5版。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105/content\\_10137.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105/content_10137.htm), 2015年9月5日。

③ 熊培松:《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自建数据库的知识产权问题及保护研究》,《河南图书馆学刊》2017年第3期。

动中对产业外知识产权的侵犯,都印证了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有序竞争的知识产权保护秩序。

关于数据权属与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问题。数据权属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认定相关,而客体是保护对象问题。有学者指出,数据信息归属是当事人能否作为适格主体寻求法律救济的前提。<sup>①</sup>对于数据权属的性质,“新型人格权说”提出创设个人信息资料控制权,将个人数据作为个人信息资料权的客体。“知识产权说”主张针对数据库和数据集在选择和编排上是否具有独创性,分别用著作权和邻接权保护。“数据财产说”认为数据是一种新型财产,应增设为独立的权利,与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并列。关于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问题。有学者指出,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客体法定”的立法模式,大数据能否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利人依法享有权利,相对义务主体履行不侵犯权利的义务。<sup>②</sup>目前我国尚未对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有观点主张条件成熟时可独立立法;而相反观点认为,现有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数据信息提供保护。<sup>③</sup>关于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问题。有研究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探讨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职能,指出政府应履行好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纠纷解决职能;另有研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转变,认为尽管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中能够弥补市场的一些缺陷,但从事产业竞争的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不能以全能型过度介入。<sup>④</sup>关于中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新秩序构建问题。有学者指出,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正处在变革与重构的关键期,我国应当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中充当积极协调者的角色,为此应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问题的研究。<sup>⑤</sup>另有学者重视区域合作,认为中国应加紧建设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范式,并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效衔接,<sup>⑥</sup>比如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治理新秩序。<sup>⑦</sup>

## 二、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法理基础

### (一) 数据权利的法理基础及其知识产权属性

作为自然权利的知识产权,其正当性依据主要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说和黑格尔的人格说。洛克论证了个人的劳动成果应该成为个人财产,黑格尔则强调人的意志的外在关联物是人的财产。<sup>⑧</sup>先哲关于“知识的创造主体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拥有权利”的洞识为数据权利建构提供了注脚,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蕴含着对自然权利的法理关怀。知识产权属性是分析数据产权的一个关键维度。数据之所以能够得到知识产权保护,是因为它具有知识产权属性。第一,无形财产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的对象,而数据的价值体现形式符合知识产权的该项特征,<sup>⑨</sup>当数据确权即为无形财产权,表现为客体的非物质性,不发生有形的占有、损耗以及有形交付的法律处分;第二,数据与知识产权在本质上都是信息,“数据是信息的表达,信息是数据的内涵”,<sup>⑩</sup>“知识产权客体的本质就是信息”;<sup>⑪</sup>第三,数据信息包含人身、财产

① 黎淑兰、范静波等:《大数据产业发展背景下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人民司法》2020年第13期。

② 翟晓舟、周梦溪:《大数据知识产权法律规制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③ 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课题调研组:《大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调研报告——以大数据产权、模式和伦理为视角》,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8054825\\_99928127](https://www.sohu.com/a/158054825_99928127),2017年7月18日。

④ 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

⑤ 徐元:《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角色定位与立场选择》,《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

⑥ 王黎莹、张迪等:《区域自贸协定新规则“升级”还是“规锁”?——浅析知识产权国际规制》,《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年第8期。

⑦ 廖文龙、董新凯等:《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治理新秩序构建研究》,《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11期。

⑧ 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

⑨ 黎淑兰、范静波等:《大数据产业发展背景下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人民司法》2020年第13期。

⑩ 王广震:《大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以知识产权法为研究进路》,《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⑪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权益的保护要求,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涵盖了对这两种权益的保护。<sup>①</sup>

## (二) 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依据和经验认知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数据信息都值得知识产权保护,它们大多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提及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规定。多年来,我国对数据信息的法律保护较多关注个人信息安全、隐私及人格尊严层面,但这已不能满足大数据权益保护的需求。经过分析、处理最终表现为基于数据的智力洞察和决策判断,其中所蕴含的智力活动印证了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新形态客体的正当性,<sup>②</sup>换言之,那种经过结构性组合成为创造性智力成果的数据信息,应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

目前法律意义上的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尚未形成,在此背景下,基于数据信息与知识产权既有客体的共通性,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可参照的规范依据愈益受到眷注。TRIPS 协议第 10 条第 2 款规定,“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由此,将具有独创性的数据信息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是履行 TRIPS 协议的应有之义。对于特定情形下的数据信息,若不具备著作权所要求的“独创性”和商业秘密所要求的“秘密性”,但事实上造成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的,可以考虑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sup>③</sup>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据此,利用大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而经过大数据控制者的劳动凝结,成为智力创造的结果,就具有专利权的信息垄断性的内在特征。<sup>④</sup>

尽管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认定,但司法实践中已尝试将表现形式基本符合既有知识产权客体条件的数据信息纳入相关法律的保护范围。根据海淀法院的调研报告,现有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数据信息提供保护。大数据处理流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比如,数据采集与预处理阶段,涉及数据的取得、汇总及初步筛选,以文字、图片和视频形态呈现的内容可通过著作权予以保护;数据存储与管理阶段,如果数据库、云数据在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上体现了独创性,可作为汇编作品通过著作权予以保护,若不具独创性但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劳动而产生的数据,可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除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可通过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外,专业化处理数据所使用的挖掘、整理、计算方法可申请专利权保护;数据成果呈现与应用阶段,那些依托于大量数据收集和成果软件有理由通过著作权加以保护。<sup>⑤</sup>司法实践中的经验认知为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构提供了启示。这里称其为“经验认知”,是因为司法实践中指涉的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尚未经法律制度明确厘定。

## 三、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的学理探究

### (一) 秩序型构范式

人们关于秩序的定义虽不完全重合,但对秩序的本质特性不乏共识,即人或事物、组织处于有序的、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结构中。秩序何以型构?有两种范式争论已久。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为代表的唯理主义论者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知识完备,认为秩序是人自觉创设的,规则和制度是为特定目的而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刻意建构一种合意的秩序,即“秩序建构论”;而以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休谟(David Hume)为代表的进化论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有序的结构,它们是许多人行动的产物而非由人设计建构的,即“秩序自发论”。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二元秩序论”是对上述两大型构范式的一个理论推进,他将人为设计的秩序称作“外部秩序”,在社会

① 黎淑兰、范静波等:《大数据产业发展背景下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人民司法》2020 年第 13 期。

② 何敏:《知识产权客体新论》,《中国法学》2014 年第 6 期。

③ 芮文彪、李国泉等:《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探析》,《电子知识产权》2015 年第 4 期。

④ 俞风雷、张阁:《大数据知识产权法保护路径研究——以商业秘密为视角》,《广西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⑤ 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课题调研组:《大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调研报告——以大数据产权、模式和伦理为视角》,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158054825\\_99928127](https://www.sohu.com/a/158054825_99928127), 2017 年 7 月 18 日。

领域也可称之为“组织”，而将无数构成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称作“内部秩序”，即由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公正的行为规则中根据自己的知识追求各自的目标，<sup>①</sup>并相互冲突、协调乃至不断试错，秩序是自发形成的结果而非刻意创造的。在哈耶克那里，自由、竞争和规则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而且自发秩序有可能比中央指导的秩序更大程度地使用所有社会成员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使因此产生的试图尽可能地运用这些强大的自发秩序的力量的结果成为可能。<sup>②</sup>基于此，他批判说，人为设计秩序极易陷入盲目自大的境地。不过，哈耶克并不漠视社会秩序理性建构的事实以及政府作为特殊“组织”对于自生自发秩序演进所必需的规则体系强制实施所发挥的功能。

理性建构主义范式是由某主体“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sup>③</sup>基于个人具有理性并能考虑到建构秩序所必需的所有知识的假设，它强调秩序构建中政府的推进作用和形式的合法性，轻视抽象规则及其所承载的文明传承的价值。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凭借自上而下的法律准则和强制力量确实能在短期内彰显变革的效果，但是，人为建构秩序范式受到社会基础条件的制约。恩格斯在谈及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而又幻想破灭的论述能给人启悟。<sup>④</sup>当然，力陈理性建构的局限性和制约条件，并非为拒绝任何制度设计和改革创新提供借口。事实上，自生自发秩序也不必然要求适用的规则一定是自发生成的。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亦往往需要政府推动、促进甚至决定。“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sup>⑤</sup>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持续地补救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无论在哪一种制度变迁模式中，政府始终是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者。<sup>⑥</sup>

## （二）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状态评判和构建要素

1. 秩序状态评判。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应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明确的法规和制度安排之下、在全社会形成知识产权文化和心理预期基础上达致的井然有序但不失活力的、动态和谐的运行状态，一个良性竞争的数据产业生态圈。比如产业内采集数据时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商业秘密，也不违反网络爬虫类“君子协定”；获取他人数据信息的手段合法、正当；企业间对于加密或开放的数据及统计结论合理避让，避免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和导致恶性竞争等。<sup>⑦</sup>秩序首先是一种客观状态，这是评判秩序实现的不可忽视的要素。“秩序”概念原本就包含对稳定的客观状况的描述，犹如人们常用“秩序井然”来表述一个可感知的稳定状态，若不将有序的客观状态作为构成要素，对秩序的认知就是不完整的。当然，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理想状态，是在逐步健全的知识产权法规、制度运行和愈益强化的创新意识、知识产权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公平竞争、激发创新活力的动态和谐，而不是静态的各就各位，更不是命令与服从的等级结构。

2.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的关键要素。大数据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安排和文化积淀，是秩序构建最为关键的两大要素。法律、制度、规则或借助强制手段，或依凭自然约束，均可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是消除或预防、制止社会无序状态的首要、经常起作用的手段；<sup>⑧</sup>而制度的关键功能便是增

① [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② 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162.

③ [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7页。

⑤ [美] 罗纳德·H. 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7页。

⑥ 李雨峰、陈伟：《优化营商环境下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职能》，《知识产权》2020年第7期。

⑦ 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课题组：《大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调研报告——以大数据产权、模式和伦理为视角》，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8054825\\_99928127](https://www.sohu.com/a/158054825_99928127)，2017年7月18日。

⑧ 蒋传光：《公民的规则意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进秩序，它规制人们的行动，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规则是秩序的核心和必要条件，对于一种整体秩序来说，从某些方面看，所有的个人都必须遵循某些明确的规则或者他们的行动都必须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sup>①</sup>当然，“只有当个人所遵循的是那些会产生一种整体秩序的规则的时候，个人对特定情势作的应对才会产生一种整体秩序”。<sup>②</sup>应该说，大多数道德规则、伦理和习俗是自生自发的产物，经过长期的演化，人们逐渐学会了适应或改进它们，这对于秩序演进来说必不可少，但是“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sup>③</sup>诺思（Douglass C. North）关于非正式约束与正式规则的关系论证，诠释了二者在社会秩序演进中的规制作用及其承载的制度变迁。对于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来说，行业自律、习惯、伦理等非正式约束十分重要，因为它是秩序构建的内在根柢，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规则同样重要，因为它是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强制力量。现阶段，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有自我演化的条件，但当非正式约束无法在特定时间内发挥有效作用的情势下，法律制度、规则以及保障运行的机制安排对秩序的类型构建就显得重要；换言之，在秩序自我演化遭遇困境而自身又难以克服之时，明晰的法律、制度、规则及其机制安排能够更有效率地发挥指导预期的功效。

文化对人们感知和遵循知识产权制度、规则起着内化的作用，因此，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对于秩序构建不可或缺。诺思认为，文化限定了个人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方式，惯例是文化的，规范也是。<sup>④</sup>在历史进程中，习俗、惯例、伦理规范是秩序形成的基础，它们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演进。这些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非正式约束，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sup>⑤</sup>就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而言，有助于秩序自我演化的惯例、伦理规范既是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又是进化为正式立法和制度的基础。这即是说，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生成中，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素养能够直接影响习俗、惯例、伦理规范的演化方向，而这些惯例、伦理规范也有可能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创新文化、知识产权文化决定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的成败，因为创新文化是激发大数据产业智力成果层出不穷的源泉，知识产权文化激励创新成果的产出，也促进诚信守法理念和规则意识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实践证明，知识产权意识不强、规则观念淡薄是导致侵权行为频发的根本原因。

#### 四、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的现实路径

##### （一）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来自关键要素的制约。现阶段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意识薄弱，是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的主要制约因素。目前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客体、权利行使以及保护路径和机制等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制度框架，纵然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数据产业创新成果提供相关保护，但尚未在法律层面予以确认，其原因在于大数据是新业态，行业规矩、商业道德等行为规范还处于摸索、演化之中，无法在短期内上升到立法层面，即使对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进行变革，也难以一蹴而就。当前对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问题认识上存在争议。比如，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是另立新法、专门赋权，还是对现有知识产权法规加以拓展？原始数据是否是知识产权法律规则保护的对象，抄袭行为应追究技术还是追究数据本身？涉及计算机程序的智力成果能否获得专利授权？收集和统计用户信息的商业方法、金融机构交易数据分析方法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还是属于可授权的专利？还有些问题属于司法实务中的难点或未理清

---

①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3.

② [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第65页。

③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46.

④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42.

⑤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的盲点,比如,网络用户自行制作和提供的内容,平台商对该部分数据持何种权利?著作权保护的是数据选择或编排方法而非数据内容(而内容才真正具有经济价值),一旦他人改变编排方法但实质内容一致,该如何保护数据本身?诸如此类的问题尚难有定论,所有这些都必然制约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则的界定和制度安排,而没有明晰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便无从谈起。创新文化、知识产权文化的缺乏使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演化中习俗惯例、伦理规范等约束手段的功效不足,而这些约束手段正是秩序得以自我演化的必要条件。如今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推进,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迫切需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但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文化积淀,国民的创新文化、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偏低,这不仅迟滞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自发生成,也使理性建构秩序中文化建设的任务繁重。

其次是大数据的特殊性带来的困境制约。数据产权主体难以明晰,归属权不易确定,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困境。第一,传统上著作权涵盖的每个种类被赋予一定的排他性权利,但数字化作品使过去作为不同种类的作品更容易地组合。第二,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复制多借助于互联网的分发和获得,此过程中存在电信接入服务、内容服务、平台服务等多个环节,围绕不同时期和环节形成的多维数据往往确权困难。第三,虽然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尽可能地明确创新权属、协调利益分配,但大数据特别是海量跨国流动数据的产权界定极具挑战。“大数据+互联网”的运行环境使知识产权保护遭遇新的困难。数字化和网络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智力成果的传统规矩,这种新形式的作品可以轻松地复制、传输以及存储,若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永久性电子存储就构成侵权。但侵权行为的认定并不简单,即使能确定某人进行了传播或侵权复制,一旦权利管理信息删除就使著作所有权的证明不甚容易,加上网络管辖权问题,也往往使知识产权侵犯的检测更为复杂。<sup>①</sup>此外,某些网络服务商利用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规避自身责任,导致司法实践中维护产权人利益的难度增大。<sup>②</sup>

## (二)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构建路径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具有自发生成的条件。第一,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形成会直接受到市场秩序及规律的影响。在自生自发秩序范式中,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追求利益,同时又都在努力维持一种秩序,依靠的是自由、竞争和规则,如同市场经济体系里无数个体和组织在竞争与价格机制作用下的互动促使着文明秩序的自发演进一样,作为经济范畴的大数据产业,其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演化与市场经济模式存在必然联系。第二,大数据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而生成、存储和传输的,产业运营以互联网为载体,而互联网天生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每一个体都可成为整个知识传播网络中独立的节点,彼此间通过某种介质而联结。<sup>③</sup>互联网的相对自治性和大数据产业的技术应用性为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自生自发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第三,行业自律和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陶染也对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自发演进起催化作用。比如,数据交易中防止敏感数据包括商业秘密或涉及法律权益的数据流通;企业间对于加密或开放的数据及统计结论合理避让,避免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和导致恶性竞争等,都得益于行业自律和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潜移默化。通常习俗、惯例反映了人们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常规性,在寻求秩序的过程中,人们遵从规则的自然倾向也可促使习惯、惯例进化成为法律。

然而,客观而论,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无论是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习俗和伦理规范,还是获得认同的规范上升到法律层面,都需要一个演化过程。但问题

---

<sup>①</sup> 郭德忠:《知识产权管理教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远程教育中文平台:<http://wipo-academy.ciptc.org.cn>,2017年9月1日。

<sup>②</sup> 于志强:《大数据背景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网络化与解决思路——以著作权间接侵权为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sup>③</sup> 孟宏涛:《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观与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完善》,《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的另一面是,大数据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需求愈益迫切,这不仅仅因为“大数据+在线环境”下知识产权更易受到侵犯,加之秩序自我演化的延迟性和无序下的杂乱无章可能带来的不公正直接影响到大数据产业知识创新的进展,因而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需求刻不容缓;也不仅仅因为大数据战略竞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紧锣密鼓地展开,创新驱动发展业已成为中国转型的着力点,作为知识创新密集型产业,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也是应对国际竞争、适应国内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需要,而且还在于,大数据时代的新问题亟需对原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以完善和拓展,而对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客体、权责等通过正式法律和制度予以界定,正是“外部秩序”构建的任务,其中,政府的制度供给职能至关重要。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共政策之维,正是政府介入的法理指向。<sup>①</sup>

综上,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自发生成的缓慢性、渐进性与现实需求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不能不使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相结合的“二元”路径成为现实必然,这即是说,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形成依赖于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的“二元”合力。事实上,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路径并非绝对对立和水火不容,即使在哈耶克的秩序观里也蕴含着两种秩序的辩证关系,如他所说“当政府实施其服务功能的时候,它只是许多组织中的一个,而且就像其他组织一样,它只是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中的一部分,而当它实施其强制功能的时候,则是在为继续这个整体秩序提供一项基本的条件”。<sup>②</sup>换言之,自生自发秩序中包含着组织(政府是其特殊形态),反过来,政府的强制功能是自生自发秩序正常运行的保障。两种秩序的相辅相成关系,还反映在哈耶克关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与立法意义上法律的界分与关联上。有趣的是,同样的论辩理路在具有建构主义理念的诺思那里也有所体现,诺思指出,“制度由正式的成文规则以及那些作为正式规则之基础和补充的典型的非成文行为规则组成”,<sup>③</sup>“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它们的实施方式一起,型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sup>④</sup>尽管历史演进中确实存在秩序的自我演化倾向和经验例证,但自我演化与人为建构也总是如影随形的。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自我演化的迟滞性、难以避免的无序性带来的社会不公及市场失灵等困境,为作为特殊组织的政府介入秩序演化进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但政府的作用并不在于直接安排秩序。政府以制定知识产权行政规范性文件、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方式履行制度供给职能,同时提供公共服务,实施市场监管和解决利益纠纷。

### (三)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选择

第一,明晰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政策工具属性。当代社会立法部门与政府职能分开,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条款的制定是立法部门的职责,但政府在适时推动知识产权法修订、完善的同时,也通过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推进知识产权法律实施和出台政策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不足,为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规则基础。<sup>⑤</sup>如今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迫切需要立法部门和政府“明晰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这是理性建构助力内部秩序演进的重要途径。知识产权保护秩序应该是有序竞争下的动态和谐,因而须有协商机制、赔偿机制、救济机制、权利人维权机制和权利滥用监管机制,特别是建立产权纠纷仲裁调解机制,以推动纠纷投诉受理处理、诉调对接、调仲对接、行政执法与仲裁调解对接、多部门会商协作等环节。<sup>⑥</sup>2019年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再度体现了这一层面。

① 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

②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第70页。

③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4.

④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83.

⑤ 李雨峰、陈伟:《优化营商环境下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职能》,《知识产权》2020年第7期。

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函协字〔2017〕122号),2017年3月13日。

第二，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产权保护是整个知识产权战略的前提，现实中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惩处执行难现象，扼杀了创新创业热情，也助长了侵权行为的多发、频发。为此，强化政府的执法、监管职能，“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是必然的政策选择。2017年出台的《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把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工作重点，提出形成行政、司法和社会力量共同发力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审判“三合一”改革，把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落到实处。

第三，产权私益与知识传播公益的平衡。从公共政策层面上，知识产权制度承载着知识产权私益与知识传播公益的平衡。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一旦产权垄断造成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介入干预。有学者运用冲突分析模型对数据共享性和知识产权专有性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认为二者有利益均衡点，只要在共享系统中引入中立协调人（政府或其他组织）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力（如协调、惩罚等），就可能产生产权专有性与数据共享性冲突的稳定解。<sup>①</sup>事实上，正是为了“创新者私权”与“公共利益”达到平衡，在保护产权人利益的同时，知识产权法律也设计出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权利用尽、法定许可等制度来限制知识产权的滥用。对于大数据产业来说，在保障数据产权的同时也须规制数据垄断。比如，在特定的环境下政府可实施强制许可，以保障大数据技术成果的广泛和及时应用；政府还可利用开放源代码许可，对自由开放源代码软件实施监管或推广，利用开放源代码许可控制开放标准，有利于调整知识产权保护与大数据产业创新成果应用的紧张关系，在 Mark Perry 和 Brian Fitzgerald 看来，自由/开源软件是民主的工具，让公民更好地参与社会和民主进程。<sup>②</sup>

第四，政策激励创新，但避免政府过度干预。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出台鼓励高新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2016年发布《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提出对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目前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先进技术服务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大数据产业的创新主体是法人或自然人，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不可替代的“活”的因素，必须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作用。政府避免过度介入知识产权市场，因其“不可能以参与者的角色跟上知识产权市场变动的步调”。<sup>③</sup>鉴于数据挖掘、分析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愈益重要，应加大政府对大数据服务、知识产权产品的采购；制定鼓励性政策引导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支持大数据企业在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上探索创新，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政策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创新研发，并经过竞争获得政府资助基金。

责任编辑：许磊 王冰

---

① 邓灵斌、余玲：《大数据时代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6期。

② Rami M. Ol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Springer, 2013, p.278, 345.

③ [美]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下篇，李明轩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 ·

#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sup>\*</sup>

蔡晓梅 何 洁

**[摘 要]**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基层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乡村振兴 地方依恋 居民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11-0063-07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①</sup>共同富裕意味着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乡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为此,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sup>②</sup>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载体,是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基本性、便利性与均等性以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人口大量流出,乡村“空

<sup>\*</sup>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返乡精英移民的流动性实践与乡村地方性重构研究”(42071191)及“流动基础设施作用下劳工移民地方嵌入的过程、机制与效应:粤港澳大湾区案例”(423712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蔡晓梅,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1);何洁,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心化”严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导致乡村文化供需矛盾突出，<sup>①</sup>进而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无法形成合力、凝聚“民心”，也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乡村的高质量振兴。因此，因地制宜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一方面要吸引村民、乡贤以及外来人员“实心化”乡村；另一方面要留住乡愁，让远在他乡的村民有情感寄托的场所，有为家乡贡献财富与智慧的空间与土壤。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乡村治理作为基本保障。所以，基于基层治理视角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不仅是缓解乡村文化供需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更是各级政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改善生活品质，让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工作重点。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经历了自发生成、政府主导和共建共享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其基层治理功能也相应的清晰化，进一步明确了其作为实施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的作用。<sup>②</sup>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乡村，文化治理成为乡村基层治理的核心与关键。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效应以及机制等问题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维系乡村秩序的纽带，发挥着基层治理的作用。<sup>③</sup>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是以传统空间为载体、注入现代文化内涵的行动，旨在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精神文化需要、重建乡村精神家园，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居民幸福感不仅包括个体生活质量与生活状态的满足，还强调个体潜能实现的心理满足，<sup>④</sup>这是美好生活的核心要义。近年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实践使传统文化空间功能得以活化拓展，有效优化了乡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解决了乡村文化供需矛盾，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sup>⑤</sup>融入现代文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可以丰富居民日常文化生活，为提升居民幸福感带来了极大可能。<sup>⑥</sup>

关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现有研究的主流观点，多是基于文化场景理论探讨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组成与功能，<sup>⑦</sup>祠堂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途径等。这一观点视公共文化空间为文化容器，关注其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积极影响，<sup>⑧</sup>但忽略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内在的治理属性，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核心维度以及作用效能缺乏全面的认识，阻碍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何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研究，无法破译共同富裕征途上乡村居民的幸福密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基于基层治理视角，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旨在回答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边界效应以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 二、文献综述

### （一）乡村基层治理与居民幸福感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以乡村为基本单元，乡村基层治理通过解决人的精神思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关键问题建立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sup>⑨</sup>乡村基层治理主要围绕治理主体、机制与效能展开探讨：乡村基层治理主体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管理的核心力量，<sup>⑩</sup>在此基础上政府与乡村联动并逐渐建立共治体系，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和政府

① 陈波、李婷婷：《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理论与模式构建》，《艺术百家》2015年第6期。

② 耿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5期。

③ 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人民论坛》2018年第21期。

④ 彭怡、陈红：《基于整合视角的幸福感内涵研析与重构》，《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7期。

⑤ 贺一松、王小雄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与重构——基于江西莲花县村落祠堂的调研》，《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年第6期。

⑥ 蔡晓梅、朱竑：《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专栏解读》，《地理研究》2019年第7期。

⑦ 傅才武、侯雪言：《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艺术百家》2016年第6期。

⑧ Sanna Ala-Mantila, Jukka Heinonen, Seppo Junnila, et al., “Spatial Nature of Urban Well-being”, *Regional Studies*, vol.52, 2018.

⑨ 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⑩ 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为核心,以村民参与为基础,<sup>①</sup>以乡贤和精英为纽带,<sup>②</sup>以外来移民与游客为补充的多元主体治理框架。乡村基层治理机制可以概括为法治、自治与德治的结合。“法治”治理机制强调正式制度的约束,“自治”和“德治”治理机制,是依靠“熟人社会”、宗族、民间信仰提供的规范和价值观,通过社会网络的关系互动而对个体和群体产生约束。<sup>③</sup>治理机制的相互嵌入有利于形成持续的乡村善治。乡村基层治理效果体现为树立良好的公民意识;促进合作、化解矛盾、促进乡村和谐稳定;提供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显示,乡村多元主体治理能有效化解基层纠纷、降低冲突风险,<sup>④</sup>提升村民满意度,帮助乡村脱贫和增加居民收入。<sup>⑤</sup>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也是基层治理的目的。因此乡村基层治理效能更深层次的目标在于提升人民幸福感。

幸福感包含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层内涵。生活幸福感是基于享乐主义(hedonic)而提出的,强调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与评价;<sup>⑥</sup>心理幸福感是基于幸福论(eudaimonia)而提出的,强调个体潜能的开发,表现为个体愉悦的心理状态,包括对自主、目标实现、个体成长、积极的关系等的感知。<sup>⑦</sup>随着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逐渐从分离走向融合,居民幸福感包括生活需求和心理需要的双重满足而体验到的愉悦。<sup>⑧</sup>幸福感是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体验,个体生活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sup>⑨</sup>随着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从关注经济环境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幸福感与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基层治理越来越重要。研究表明,乡村基层治理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但是缺乏对具体的基层治理实践的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是实施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不仅可以实现公共空间的物理功能发挥,还有利于凝聚情感,是基层情感治理的集中体现。<sup>⑩</sup>乡村既传统又现代、既开放又封闭,有不同于城市社区的治理逻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作为乡村基层治理实践,有利于打通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回答“如何让居民更幸福”的问题。

## (二)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地方依恋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活动、交流的场所,包括传统的公共空间和村民自主形成的公共空间,如祠堂、村庙、村民集体开会的公房、公用的客堂等。<sup>⑪</sup>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已成为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需要注入新的文化内涵、重构乡村居民的精神家园,进而建立文化自信。经典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由社会力量构成,是权力产生的基础,同

① 赵晓峰、马锐:《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2期。

② 张兴宇、季中扬:《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实践方式——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③ 任骏:《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文杂志》2020年第7期。

④ 侯麟科、刘明兴等:《双重约束视角下的基层治理结构与效能:经验与反思》,《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⑤ 贾俊雪、秦聪:《农村基层治理、专业协会与农户增收》,《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

⑥ Ed Diener, Ernkook M. Suh, Richard E. Lucas,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25, no.2, 1999.

⑦ Thomas A. Wright and Russell Cropanzano,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Job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33, no.4, 2004.

⑧ P. Alex Linley, John Maltby, Alex M. Wood, et al. “Measuring Happiness: The Higher Order Factor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47, no.8, 2009.

⑨ 廉威、苏竣:《公共支出的公众幸福感影响——基于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的实证比较研究》,《经济问题》2020年第5期。

⑩ 曾莉、周慧慧等:《情感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天平社区的实地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期。

⑪ 牛文斌:《从“一姓一祠”到“六姓共祠”:小白井村公共空间变迁的社会文化阐释》,《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



时兼具情感意义。空间的生产与重构体现了物质、权力与情感的交织与变迁。<sup>①</sup>空间与地方依恋紧密相关。当空间被赋予情感时,则会成为地方,并建立人和地的情感和心理联系。地方依恋集中体现为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指个体基于情感、认知、行动的纽带形成的对某一特殊意义地方的依恋,包括情感认同与功能依赖。<sup>②</sup>情感认同强调个体与地方的一致性,是个体对地方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的一致和认可而形成的个体对地方的心理归属感;地方依赖强调的是个体对地方功能上的依靠。<sup>③</sup>地方依恋通常基于地方象征、空间与集体记忆产生,<sup>④</sup>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常是地方的典型象征,也是村民进行文化活动、沟通、交流的特定场所,承载了乡村的集体记忆,形成了个体的地方归属与情感依赖。<sup>⑤</sup>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实际上是凸显乡村传统的文化象征、维系文化空间并强化集体记忆,因此对居民的地方依恋有积极影响。过往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居民的地方依恋紧密相关,但对于这一作用关系还缺乏深入分析。因此需要在全面认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维度的基础上,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

### (三) 地方依恋与居民幸福感

提高居民幸福感是乡村基层治理的目标。<sup>⑥</sup>地方依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机制。地方依恋体现了个体对空间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可以满足个体生活需要和心理需要而提升幸福感。一方面,地方依恋通过促进个体对生活环境的依赖从而增进幸福感。<sup>⑦</sup>地方依恋越高,则人们的心理舒适感与安全感越强,并愿意留在所依恋的地方,因此可以增加幸福感与地方忠诚。<sup>⑧</sup>另一方面,地方依恋通过满足个体的心理需要而提升幸福感,地方依恋可以使个体从地方寻找意义和安全感,因此有利于提高幸福感。<sup>⑨</sup>现有研究围绕地方依恋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展开了诸多讨论,这些分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 三、探索性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基于治理视角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核心维度,探讨这些维度影响居民幸福感效应的边界以及如何经由地方依恋而影响乡村居民幸福感,从而建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模型。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理论模型建构主要基于文献梳理和实地走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课题组于2020年12月3日对佛山市“祠堂+文化”30个示范点中的4个示范村展开预调研,走访政府工作成员、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初步了解“祠堂+文化”示范点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现状。选择“祠堂+文化”示范点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案例地,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民间祠堂作为农村祭祀祭奠、议论村务、兴学公益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历来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极

① 冯健、赵楠:《空心村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特征与重构策略——以邓州市桑庄镇为例》,《人文地理》2016年第6期。

② 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③ Paul Morgan,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30, no.1, 2010.

④ 黄向、吴亚云:《地方记忆:空间感知基点影响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人文地理》2013年第12期。

⑤ Marieke vander Star and Cody Hochstenbach, "Continuity among Stayers: Levels, Predictors and Meanings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ural Shrinking Region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96, 2022.

⑥ 贺雪峰:《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⑦ Corina Bogdan, Liliane Rioux and Valeria Negovan, "Place Attachment, Proactive Coping and Well-being in University Environment",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33, no.1, 2012.

⑧ Wang Yaochin, Liu Chyong Ru, Huang Wenshinng, et al., "Destination Fascination and Destination Loyalty: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estination Attachment as Mediator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vol.59, no.3, 2019.

⑨ 王舒媛、白凯:《西安回坊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依恋与幸福感》,《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

其重要的空间代表；第二，以祠堂为代表的乡村公共空间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活化的变迁过程，是当代乡村重建中重要的部分，其变迁与建构对于乡村振兴、乡村基层治理具有典型意义；第三，佛山市三水区“祠堂+文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党建引领基层文化治理”的试验典范，已经形成品牌，盛名远播；第四，佛山市位于经济活跃的珠三角地区，临近广州、深圳，人口流动频繁，其乡村兼有封闭性和开放性，形成了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融合的特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确定案例地后，课题组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间，随机走访了共63名受访者（包括中10名政府工作人员、44名村民、9名外来人员），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约为30—90分钟。通过内容整理分析发现，最后1名政府工作人员受访者访谈记录与前9名内容重复，最后4名村民受访者访谈记录与前40名内容重复，最后2名外来人员受访者访谈记录与前7名内容重复，已无法形成新的理论范畴，访谈内容达到饱和，访谈结束。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流动人口特别是在外地工作的本地村民和游客的访谈不够全面，课题组在2021年1月1—3日再次深入案例地，共补充访谈了10名在外工作的本地村民和18名游客，并将访谈文本一并纳入案例编码。

（二）案例编码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Nvivo11软件对全部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主要包括3个层次的编码。开放性编码：在进行各级编码前，先将资料按照不同类型的受访人员进行编码，提炼出649条原始语句，并最终形成了建筑独特、祠堂修复、设施增设、周边资源和环境等41个初始范畴，用ai标注。主轴式编码：基于开放性编码继续发现资料中不同部分的内在联系，并由此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关联。共形成本文10个副范畴（Ai）和4个主范畴（AAi）（编码过程示例见表1）。其中，副范畴为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意义性空间、情感认同、地方依赖、物理性空间的开放、权力性空间的开放、意义性空间的开放、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主范畴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地方依恋、空间开放程度和幸福感（表1）。选择式编码：经过开放性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的汇总分析，形成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地方依恋、空间开放程度和幸福感这4个主范畴以及每个主范畴所涵盖的主要测量维度。基于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背景和意义，研究建立了4个核心范畴与乡村基层治理的类属关系。其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空间开放程度是乡村基层治理的水平呈现，地方依恋是乡村基层治理的作用机制，幸福感是乡村基层治理的效能体现。此外，研究还重点确立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基于地方依恋和空间开放程度对村民幸福感影响效应关系的主逻辑（图1）。

研究结果显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包括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意义性空间3个主要维度；地方依恋包括情感认同、地方依赖2个维度；空间开放程度包括物质性空间的开放、权力性空间的开放和意义性空间的开放；幸福感包括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影响村民幸福感的空间载体，而地方依恋是影响村民幸福感的情感桥梁，是传导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到幸福感之间的中间力量，空间开放程度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表1 编码过程示例

原始语句（节选）	开放性编码	主轴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ai）	副范畴（Ai）	主范畴（AAi）	乡村治理的类属
T12-029 祠堂的顶部为圆形，建筑造型非常独特。	a1 建筑独特 .....	A1 物理性空间 （a1 ~ a4）	AA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A1 ~ A3） .....	乡村治理的空间实践 .....
T06-159 村里的其他公共设施、道路现在也很好和整洁。	a4 周边环境和资源			
G03-341 祠堂内设有党建功能区，已供党员同志学习和日常党建。	a5 党建平台 .....	A2 权力性空间 （a5 ~ a10）		
T32-244 祠堂是政府给的资金支持进行修复和改善的。	A10 政府支持			
T33-610 祠堂功能的修善提升了我们村的凝聚力，议事更有效。	a11 提升凝聚力 .....	A3 意义性空间 （a11 ~ a16）		
T17-109 日常休闲活动可以在祠堂这边进行，活动形式也多样了。	a16 丰富日常生活			

因此，从乡村基层治理视角打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黑箱，既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维度与开放程度紧密联系，也与主体对地方的情感要素紧密相关。

### （三）信度检验

为保证编码结果有效可靠，文本资料由课题组 4 名研究者分别编码，再将 4 套编码进行比对、讨论与修正。根据 Boyatzis（1998）编码信度计算公式，得到 4 名研究者的相互同意度为 0.791，信度为 0.842，达到了大于 0.70 的要求，说明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 四、结论与启示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是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承载了乡村基层治理的职能。秉承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是一个文化的简单容器，而是社会性的、有价值判断的空间。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原有公共空间的理论意涵。<sup>①</sup> 基层治理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包括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三个核心维度的重构，它们的变化展演了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的治理成果。物理性空间重构强调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以及建筑、设备和设施修复与更新，旨在保护独特精美的建筑，修复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碎片，融合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满足乡村居民的心理归属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诉求，因此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权力性空间重构强调空间行为的约束与规范的建立，在政府引导和支持的保障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强化了乡村社会关系与网络，促进了信任和合作，能够为乡村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sup>②</sup> 意义性空间重构关注不同主体的功能诉求的实现，包括村民、宗亲的敬老省亲、婚庆嫁娶等日常需求，以及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公益讲座、流动图书馆、公益电影播放等文化活动诉求，有利于提升乡村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日常生活的互动与情感交流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sup>③</sup>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治理效能受到空间治理水平的影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放程度越高，则意味着物理空间不再局限于敬祖、祭祀的宗族场合，而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平等共享；吸纳政府、村民、乡贤和外地移民等社会力量，有利于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对地方的认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可以满足居民教育、健身、休闲、人际沟通等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而居民日常活动场所的使用<sup>④</sup> 以及公共休闲空间公平感知<sup>⑤</sup> 可以增强居民归属感和幸福感。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放程度越高，则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生活幸福感以及心理幸福感的作用效果将更强。“我们镇是‘祠堂+文化’公共文化空间最成熟的地方，主要是我们每天都开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所有人特别是外地人都可以享有这些空间提供的文化服务，可以自豪的说，老白泥人和新白泥人都很满意！”（受访者 G2）相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放程度低，则意味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少数人共享，村民共建共享的主动性降低，并且空间所提供的功能比较单一，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继而削弱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效果。“我们祠堂有好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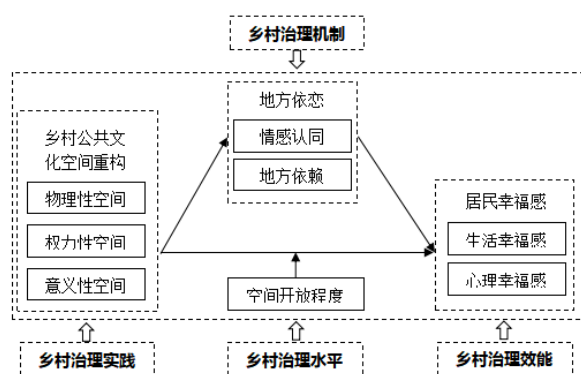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① William Holy-Hasted and Brendan Burchell, “Does Public Space Have to Be Green to Improve Well-being? An Analysis of Public Space Across Greater London and Its Association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Cities*, vol.125, 2022.

② 李树、陈刚：《“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8期。

③ 邢占军、张千群：《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④ 苏玲玲、周素红等：《社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间维度的作用》，《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9期。

⑤ 张海霞、唐金辉：《居民公共休闲空间公平感和幸福感知的影响因素——以杭州市为例》，《城市问题》2019年第5期。



开，才会过去，平时都不会过去啊。……外地人一般不会去，尽管我们村有三分之二的外地人，但是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村史馆是政府投资建的，参与的村民也不多，外地人就更加不了解了……未来希望大家一起弄吧，参与才快乐。”（受访者 T29）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融合了功能与情感的双重治理机制。随着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治理机制也从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下沉，转向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相融合。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逻辑，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从刚性到柔性、从乡情涣散到情感回归的“情感转向”。<sup>①</sup>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可以满足居民敬祖祭祀、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的多种功能需求以提升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通过满足居民的心理需要和情感需要以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与民众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能有效破解乡村治理能力协商不足、提升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使公共文化空间更加符合村民的生活和心理期待。此外，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与网络，通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活化使用，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认同，满足居民对和谐关系的需要，从而能够为乡村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我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对这个村有浓厚的感情。但很长一段时间，村里脏乱差，路上都是泥巴。自从这个空间开始重建，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从过去的冷漠变得热情，很多过去不回来的村民也开始计划为村里做点事情，也有介绍朋友来村里投资的。中社公祠是村里建设和发展的引爆点，也是我放弃外面的世界，回村里做村长，建果园的原因。回到村里，我感觉比在外面打拼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幸福。”（受访者 T28）

本文丰富了基层治理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理论。新时代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集合乡村文化资源与文化活动的场所，更是具有多种功能、多元权力和糅杂意义的场域，对于乡村基层治理发挥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三个核心维度的重构，展演了多元治理主体、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效能，揭示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主体建构过程。本文探索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治理效能的边界，强调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放水平的约束作用，拓展了乡村治理的权变观；深化了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实践的治理机制。本文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抓手，探讨了地方依恋的文化治理机制，拓展了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幸福感的影响，为乡村基层治理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由此带来三方面的实践启示。第一，建设异质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由于乡村的类型、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均存在差异，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物理特征、空间权力生产、意义展演是“千村千面”而不是“千村一面”。因此需要建设异质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第二，异质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响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号召，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需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此外，乡村需要因地制宜提高居民在物理性空间的可进入程度、权力性空间的参与程度以及意义性空间的功能满足程度，提升治理水平，从而强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效能。第三，强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在政府法治的指导作用下，需充分发挥村民为主体、乡贤为纽带、外来人口为补充的德治和自治机制。三治结合是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一方面有助于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实现乡村基层更多内容和更大空间尺度范围“物”的治理；另一方面也使更多在他处的人化解了乡愁、在此处的人提升了幸福感，实现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更深入的“心”的治愈。

（感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刘美新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王惠对本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 冰

---

<sup>①</sup> 陈桂生、吴合庆：《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求实》2022年第4期。

# 互嵌式协同： 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sup>\*</sup>

要蓉蓉 郑石明

**[摘要]**“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关键词]**互嵌式协同 政企协同 治理模式创新 嵌套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1；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70-06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综述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水资源分配不均和水污染等水危机，对中国当前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高效的水环境治理至关重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水环境治理“十六字”工作思路，即“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强调应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多采用命令控制手段来实施，致使环境治理过程中对政府过度依赖，而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甚至导致“政企合谋”现象的出现。<sup>①</sup>因此，如何使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有效协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跨行政区域流域管理方面，由于涉及多层次主体，利益冲突时有发生，使各主体自愿产生协同行为并非易事。政府与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能否有效协同决定着水治理的成败。那么，跨行政区域的政府与企业应如何协同？怎样的协同治理模式可以使政府与企业产生协同行为、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产生创新协同治理模式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

协同治理有利于更好地整合知识系统和利用分布式资源，以及实施理解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学习过程。当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朝着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和共享创新的方向努力时，双赢的方式更有可能带来成功的合作。但是如何能使各主体实现真正的协同，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热点。嵌套治理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双碳’目标下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协同治理效应与机制创新研究”（22AGL029）及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2022A15150101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要蓉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41）；郑石明，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2）。

<sup>①</sup> 聂辉华：《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是一种提升社会效益的机制,通过分散的和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得以实现,并可同时跨越空间和管辖范围找出社会和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后果。<sup>①</sup>为有效提升协同治理效能,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嵌入式协同”(nested collaboration)的概念,即在协同计划中加入其他协同计划,创建计划之间协调的知识和资源交流平台,从而增加学习的潜力并加速创新过程。<sup>②</sup>因此,可将嵌入式协同理解为在多个层面上设计协同安排,以促进知识与资源共享,推动协同主体的发展。

现有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部门内部、政府与社会或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嵌入式协同研究,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的条块结构,研究在数字政府<sup>③</sup>和社区治理<sup>④</sup>等领域,政府各部门间的嵌入与协同,分析其中的内在机制。国外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嵌入式协同对环境治理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并可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sup>⑤</sup>二是在双向嵌入式协同治理模式方面的研究,这部分研究集中在“双向嵌入”或“互嵌”模式在政社关系中的应用,<sup>⑥</sup>发现政社互嵌能有效促进政策与治理机制创新。<sup>⑦</sup>三是嵌入式协同在水治理方面的应用,结合多层次理论,有学者提出“科层制嵌套结构”,<sup>⑧</sup>还有学者研究了在多个制度嵌套层次结构中进行协同规划时面对的挑战。<sup>⑨</sup>此外,政企协同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政企协同育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和企业管理等方面,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政企协同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sup>⑩</sup>

综上所述,将协同治理与嵌套理论相结合,进行政企关系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间,对双向嵌入协同、互嵌式协同的研究更为匮乏;嵌入式协同较少涉及政企间嵌入式协同研究,政企间互嵌式协同研究也暂未发现;政企协同在环境治理领域未引起足够关注。企业作为环境污染主体,对环境治理成效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其在环境治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对提高环境治理效能有重要意义。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拟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分析其在协同治理模式中的创新及作用机理。采用个案研究法,案例材料来自2021年8月至2022年3月笔者的调研材料,共对8名来自不同部门的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的焦点各不相同,主要针对永定河流域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另外还有笔者收集的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文件以及网络资料。

## 二、分析框架:互嵌式协同治理模式

“嵌套”(nested/embedded)一词最早出现于Michael Barkun在1968年出版的《没有制裁的法律》(*Law without Sanctions*)一书中,随后Polanyi和Granovetter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研究最为广大学者所认可。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公益性事业,具有典型的“公共池塘”特性,而

---

① Carina Wyborn and Patrick Bixler, “Collaboration and Nes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ale Dependency, Scale Framing, and Cross-Scale Interactions in Collaborative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123, 2013.

② Amber Geurts, Tara Geerdink and Marit Sprenkeling, “Accelerated Innovation in Crises: The Role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Ventilato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68, 2022.

③ 邓理、王中原:《嵌入式协同:“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的跨部门协同及其困境》,《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4期。

④ 涂晓芳、刘显彤:《嵌入式协同: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联动——以S社区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⑤ Bradley Karkkainen,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Governance: Scale, Complexity, and Dynamism”, *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21, no.2, 2002.

⑥ 田毅鹏、张帆:《社会矛盾调处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嵌性”运作——以J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为例》,《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⑦ 顾昕:《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⑧ 奉海春、李放:《科层制嵌套结构:农田小水利制度层次关系解析——基于广西的案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⑨ Jayanath Ananda and Wendy Proctor,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Water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86, 2013.

⑩ 娄成武、韩坤:《嵌入与重构:中央环保督察对中国环境治理体系的溢出性影响——基于央地关系与政社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嵌套治理被视为从多个理论前沿解决大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逻辑解决方案。<sup>①</sup>嵌入和协同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关联性，相辅相成：嵌入可增加协同的成功性，提高跨行政区域协同治理效能；而协同则是嵌入的前提，只有当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协同的目标或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相互嵌套发挥合力作用。

#### （一）结构嵌套协同

Granovetter 将嵌套划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类，前者主要关注主体间的双向关系，后者主要关注网络及网络中的主体的功能。<sup>②</sup>本文着重关注在网络中的主体的双向关系及功能嵌套所产生的协同治理效能，研究结构嵌套协同在政企协同中的作用。嵌套结构是通过在某种结构中内嵌其次级结构，形成多层嵌套结构的现象。<sup>③</sup>协同关系代表协同元素之间的协同和交流关系。协同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纵向协同，即条条结构上的协同，意味着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另一种是横向协同，即块块结构上的协同，通过协作要素的平等协商与合作来实现。由于跨行政区域治理的复杂性，政府层级和参与个体的增加与相互嵌套加大了协同的难度。块块结构具有保证政府部门积极性和政策目标实现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责任模糊，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策执行出现扭曲。嵌套结构主要根据非正式规则操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用来调整正式规则。<sup>④</sup>嵌套结构一般具有多个层次，合作总成本高，也会给嵌套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带来额外的挑战。通常，不同的政府或机构之间难以实现权力和资金共享，如果政府与 / 或机构之间无法合作，就会导致跨行政区域水环境治理失败。跨行政区域水环境治理涉及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与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行动者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意味着可能存在各种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影响着权力的行使、决策的制定以及公众的参与方式。<sup>⑤</sup>所有这些都对结构嵌套协同提出了新需求。只有当纵向有效赋权、横向高度协同时，才能最终提升跨行政区域协同治理的效能。

#### （二）制度嵌套协同

关于嵌套性的研究最成熟的是“嵌套政权 / 制度”（nested regimes/institutions），侧重于考察国际体制和制度在某种“等级”秩序中如何协调一致和相互影响。制度是通过立法、行政政策、组织政策、行为改变等几个不同的过程创建和调整形成的，或者只是作为创造行为模式和提出期望各方如何互动的集体行动。<sup>⑥</sup>研究发现，当制度安排鼓励合作，并通过在行动者之间建立更多的信任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时，有利于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sup>⑦</sup>Kiser 和 Ostrom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中提出“行动的世界”，从行动的角度详细说明了三个相关但不同的制度分析层次：运营层次，用以解释个体的行动；集体选择层次，用以解释如何进行“权威决策”；宪法层次，用以解释“集体选择机制的设计”。各层次之间相互嵌套，制度安排“将每一级决策与下一级决策联系起来。宪法决策确立了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及其如何实施。集体决策反过来又为个体行动建立制度安排及其如何实施”。<sup>⑧</sup>Sabatier 通过定义三个嵌套的政策行动层面，扩展了 Ostrom 的制度分析：运营层（如流域管理局决策）、集体选择层（如流域管理局法规）

① Graham Marshall, “Nesting, Subsidiarity, and Community-Bas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yond the Local Lev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vol.2, no.1, 2008.

②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7 页。

③ 王思斌：《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中国社会行动模式研究》，《学海》2009 年第 1 期。

④ Song Qijiao, Qin Ming, Wang Ruichen, et al., “How does the Nested Structure Affect Policy Innov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Low Carbon Pilot Cities”, *Energy Policy*, vol.144, 2020.

⑤ Patrick Bixler, “From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to Polycentric Governance: Assessing Evidence from the Bottom Up”,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vol.27, no.2, 2014.

⑥ Elinor Ostrom, “A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Franz K. Kaufmann, Giandomenico Majone, and Vincent Ostrom (eds.), *Guidance, Control, and Evalu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Berlin: Gruyter, 1986, pp.501-523.

⑦ Cameron Holley, “Removing the Thorn from New Governance’s Side: Examining the Emergence of Collaboration in Practice and the Roles for Law, Nested Institutions, and Trust”,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News & Analysis*, vol.40, 2010.

⑧ Kiser L. L. and Elinor Ostrom, “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 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linor Ostrom and Beverly Hills (eds.),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p.179-222.

和宪法层（如立法机构宪法）。<sup>①</sup>例如，国家体制机制决定区域和地方一级的体制设计；集体选择规则确立指导或约束水务部门产生决策的管理政策和方案；各利益相关方可以为决策施加压力、提供信息，提出创新政策选择供决策参考。

综上，本文提出“互嵌式协同”分析框架（图1），以下将结合案例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对“互嵌式协同”进一步展开分析。

### 三、案例分析：永定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中的政企协同

#### （一）案例简介

永定河发源于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和山西高原的北部，流经蒙、晋、冀、京、津五个省区市，是京津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廊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水资源过度开发及上游来水不断减少，永定河下游平原曾一度河道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制约着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恶化，永定河多段断流，加之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了永定河流域生态退化。然而，永定河流域各行政区一直分区治理，由于各地环保压力不同，发展水平不平衡，造成环保标准不统一，如何使各地统一标准、有效协同、共同应对水环境治理成为永定河流域治理的主要问题。

为扭转永定河流域的恶劣生态环境状况，2018年6月，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交集团”）共同出资成立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域公司”），负责整个流域的生态修复，这是国内首个以流域为整体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流域治理项目，构建了一个典型的“政企协同互嵌体”。在流域公司和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永定河终于在2021年12月首次实现全线通水，标志着永定河治理模式的阶段性成功。

#### （二）案例分析

1. 政府与企业结构互嵌：协同治理的组织准备。在流域公司成立之前，永定河流域的水环境治理采取以“块”为主的环境治理体制。在本地利益最大化驱使下，部分上游地方政府在对待取水和排污问题上，缺乏对下游地区利益的考虑，流域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官厅水库是永定河上的重要节点，对京津冀地区的用水贡献巨大。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城市群和经济发展使得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量大幅增加，加之上游地区水库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层层拦蓄与连续干旱引致官厅水库水位明显下降。除此之外，严重的环境污染是永定河流域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严峻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部分地区环保政策执行不到位，对排污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约束，致使永定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失控，也直接导致官厅水库在1997年退出北京市饮用水水源系统。

面对复杂的跨行政区域、跨部门流域水污染治理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未寻到使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协调、形成合力的有效机制。在调研过程中，一位环保部门官员说：“以前的流域治理都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界实施治理，跨部门协同都难，更别说跨区域、跨行业了。”（访谈记录：HBA20210905）<sup>②</sup>通常情况下，水环境治理多是政府层面的活动，常常出现投入与收益不对等的情况，属地治污模式易引发“搭便车”行为。研究表明，市场机制有利于在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促进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为克服上述困难，永定河流域各地方政府大胆创新，用市场化手段开展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在纵向和横向上展开多层次嵌套协同。在纵向上，2017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部省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部省协调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重大决策问题，长期监督项目实施。2018年，水利部与四省市水利部门及流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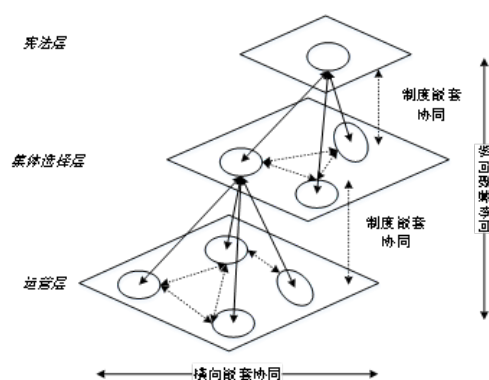


图1 互嵌式协同分析框架

<sup>①</sup> Paul A. Sabatier, “Toward Better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24, no.2, 1991.

<sup>②</sup> 编号规则：访谈单位、人员首字母与访谈日期，下同。

司签订用水保障协议，在水利部统一调度下，四省市实施跨区联动，与中交集团共同组建、运营和管理流域公司，协同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在横向上，流域内多地为方便协调解决治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相继组建协调领导小组并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如：北京市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领导小组等。流域公司内部采用“1+N”体系，“1”是流域公司，负责永定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和投融资运作，统筹管理国家及各流域省市的财政扶持资金，经营流域内有关工程和资产。“N”是若干分（子）公司，通过整合政府、社会和企业多方力量组建，实施具体的所在地项目运营及资源开发。通过流域公司，政府与企业实现纵向横向双向结构互嵌，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便利的沟通途径，可有效提高协同治理效能。

2. 多层次制度互嵌：协同治理的战略导向。永定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可以用嵌套制度层次（宪法、集体选择和运营层面）和政治体制结构、活动领域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来描述。永定河流域治理简化为三层制度层级，这三层制度层级叠加在中国的三层政治治理体系上。在每一层制度层级上做出的决策都受到上级制度规则集的约束。在宪法层面，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林业部等国家部委负责议程制定和政策启动，并通过部省协调领导小组为永定河治理政策的总体方向提供指导。为有效推进永定河治理工作，多个重点省市相继成立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领导小组，与上级领导小组保持密切沟通，并指导流域本地治理工作。在发改委和多个中央部委联动下，我国制定了多项重要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力的政策，如“水十条”，确保河流和地下水系统的健康达到环境可持续水平。

在集体选择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三大经济发展战略之一，三地同时作为永定河流域的重点城市，其协同发展对流域治理有重要影响。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具体要求，其中对水环境协同保护提出“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推进包括永定河在内的“六河五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与四省市正式印发《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从国家层面推动、跨行政区域、以市场化手段进行河道综合治理文件，指出要将永定河流域的治理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同时提出要创新流域协同治理机制，引入市场手段，组建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各省市为配合中央政策，积极制定本地政策。2017年5月，北京市率先出台《北京市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方案》。2018年1月，河北省也出台了相关方案。一位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告诉笔者：“通过这一系列实施方案创建的永定河流域治理结构，迫使所有相关部门都想看看这些政策及机构可以在怎样的机会下帮助他们实现所有目标。”（访谈记录：HBD20210915）

在运营层面，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中交集团按出资比例分别在流域公司占股35%、5%、15%、15%和30%，政府以股权为纽带嵌入企业，实施协同治理。因此流域公司既是永定河流域的治理主体，同时也是永定河流域的资产运营主体。由于流域治理存在大量的公益特性，因此流域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采取“一地一策”模式制定资金平衡方案，深度开展政企、银企合作。流域公司在成立后即对各地的资源进行了梳理，因地制宜地发挥各地资源优势，通过沿线产业和资源开发反哺流域治理。流域公司是永续经营公司，这与传统的PPP模式有显著差别。《方案》对流域公司的运营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保障，如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保证流域安全的情况下，流域公司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同等条件下，流域公司享有优先经营流域内营利性项目的资格等。协同可以同时存在于几个不同的制度层面，在每个层面都有可以创建用于信息共享和共同决策的结构和程序。流域公司是运营层面制度变革的一个典型案例，嵌套协同结构的创建为满足不同层级协同需求提供了有效途径。

#### 四、政企互嵌式协同治理模式作用机理分析

##### （一）“结构—制度”二维互嵌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依据集体行动理论，人们通常不会自愿展开合作，更不用说通过合作取得成功，因为通常情况下（假设）个体是自利的，主体间为取得更多的利益采取竞争而不是合作的方式行事显得更加理性。这种理性，利己主义在至少三个常见的“合作困境”结构中起到关键的解释性作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



和 Olson 的集体行动问题。Olson 指出, 当一个群体足够小的时候, 集体行为达成一致的成本以及监督和执行该协议的成本可能足够低, 以至于该群体能够克服这些成本并组织起来。将四省市、国家部委和企业的力量通过“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嵌入流域公司这个小集体中, 化解了大团体难以协同的困境。四省市通过股权形式嵌入流域公司, 使得流域公司成为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类型的企业。它承担着流域治理的公益性任务, 同时又与各级政府一起致力于流域治理和区域发展, 保障流域沿线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以政企结构互嵌的模式提升协同治理效能。流域公司将政府和企业深度互嵌, 使其能够在多个层面同时利用政府和市场的资源, 有利于减少整个区域合作的总成本和时间。地方政府也可从这种嵌套结构中受益, 嵌套结构为各地方政府提供更加有效的互动的途径, 通过与流域公司及其他地方政府的互动, 可以解决单个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

## (二) “结构—制度”二维互嵌破解资源匮乏困境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 组织行动依赖于“关键”和重要资源, 因而根据组织对特定资源的依赖情况可以有效解释组织的决策和行动。如果一个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制定者的资源依赖强度过大, 就会削弱其组织能力。在政府与企业的协作过程中, 企业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对政府有较强的资源依赖, 政府与企业的资源互嵌协同能有效保障企业的政策执行能力。实施大江大河流域治理往往需要大量人财物等资源, 且由于治理周期较长, 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效益, 因此融资平衡难度极大。流域公司通过“结构—制度”二维嵌入将政府与企业资源深度互嵌, 负责整个流域的水环境治理, 按市场化机制履行政府公共职责, 作为一个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 与政府协同发挥政府和企业资源上的优势, 有效提高政企协同治理效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拓宽资金渠道, 既保证了水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又保障了企业的生存, 创新了投融资机制。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困境是实现协同治理的两大障碍, “结构—制度”二维互嵌式协同一方面在结构上, 使得需要协作的问题更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 并能迅速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在制度上, 将多个层级相互嵌入, 保证企业能从政府获得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撑, 政府也能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反馈, 从而有利于提升整体协同治理效能。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水生态环境的案例构建分析框架, 从“结构—制度”二维分析政企互嵌式协同治理模式创新, 旨在探寻政企协同在永定河流域治理过程中的特点及作用机理, 以期协同治理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借鉴。在结构维度上, 政府与企业形成多层级结构互嵌, 为政企互嵌协同奠定组织基础。嵌套治理有助于提高具有大规模公共资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健性, 将一些较小且具有排他性的单位通过嵌套安排成为更具包容性的体系的一部分, 增加上级政府获得地方信息的能力, 还可以加强其与基层的沟通, 更易制定出符合地方特色的制度, 降低执法成本。在制度维度上, 形成“宪法—集体决策—运营”三个层次的制度安排, 多级制度间相互联系、相互嵌入, 通过在更大范围内调度资源使用, 提升组织利用不同管辖区域资源的能力。成立永定河流域公司是一种治理模式创新, 该模式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展开互嵌式协同。在国家层面, 各相关部委通过部省协调领导小组与省市政府展开合作, 制定政策准则, 设定目标及问责机制, 以指导较低层级的协作行动。在省市和各地层面, 各流域主要地区成立领导小组, 指导该地区的政府支出, 并监督相关的政策执行问题。将低级别的协同与高级别的协同相互嵌套, 实现区域协同治理。在运营层面, 流域公司通过各分公司, 实行“一地一策”模式, 因地制宜, 充分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相互融合, 降低协同成本, 提升协同治理效能。“结构—制度”二维互嵌协同可有效缓解由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带来的治理困境, 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嵌套式结构设计为低层级的区域协作提供了更多使用政府和企业的集合资源的机会, 增强了协作机制的可持续性, 也降低了较高区域级别协作的难度, 将大问题聚焦化、缩小化, 分块治理, 最终产生较大的协同治理效能。

责任编辑: 许磊

# 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困局与方法论的重构<sup>\*</sup>

肖平辉

**[摘要]** 新冠疫情爆发,中国卫生领域内第一部“牵头管总”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引发了学术界对卫生法新的一波关注。学术界提出卫生法学集法学、医学、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其特殊性需要突破传统法学理论构建。文章探讨了以传统部门法为生成逻辑的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在卫生法基本理论上的困局,提出领域法学作为卫生法学方法论上的理论重构的价值。

**[关键词]** 卫生法 健康中国 社科法学 领域法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76-05

##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当年6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牵头管总”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上述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引起了学术界对卫生法的关注。近些年,国内也出现一批卫生法学者,并已经出现一批卫生法立项课题,显示卫生法愈发成为学术界热点研究问题。而学术界对于卫生法的法学理论建构的探讨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卫生法出现基本理论的困局,需要突破传统法学理论构建,应吸收理论界新近提出的领域法学视角进行方法论的重构。<sup>①</sup> 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 二、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困局

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中国法学分阶段演进为政法法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三派。<sup>②</sup> 虽然纯粹的政法法学已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作为传统法学、部门法学的方法论,在学术界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二者逐渐形成中国法学基本理论构建的基座。法教义学强调实然法的语义分析、对法条的解析和诠释以及稳定性、可预期性,而社科法学强调法条之外的学科探讨,具有应然法的批判张力。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为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方法论上的取向不同而已。相比而言,以社科法学来研究构建卫生法已胜于法教义学,具有进步意义。因为法教义学建基于传统部门法的话语体系,更接近法学科内的话语体系内循环。而且如前所述,法教义学是部门法体系构建下的法解释学,若教学研究过程中,仅仅从法教义学展开卫生法,或许会步入“机械卫生法条主义”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卖平台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研究”(19BFX1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平辉,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006)。

<sup>①</sup> 解志勇:《卫生法基本原则论要》,《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

<sup>②</sup> 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第16版。

窠臼而不能自拔。<sup>①</sup>而且目的上“法教义学是关于现行有效法律或者实在法的学问，它并不致力于探讨理想之法或应然之法”，法教义学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以解释法条核心工作为司法提供裁判基准，较少思考“法应该如何”这样一个应然法维度的问题。而社科法学不同，它强调开放性，主动进行对非法律语言即其他社会科学的吸纳，达到法律学科大社科的外循环。“法教义学可能更多地关注法律后果，而社科法学更注重对事实后果的分析与考量。”<sup>②</sup>在法律实践运作方面，“社科法学更注意现代治理术的灵活运用，因此视角更多扩展到新兴法律部门，以及法律与其他公共政策交织的运作技术。”通过社会科学的介入，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能够更好回应社会中的新问题。<sup>③</sup>

以卫生法中的医疗纠纷为例。大量医疗纠纷都由医疗损害衍生而出。如果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医疗纠纷来自于医疗损害，而医疗损害应该直接定位到民法教义学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也就是过去的侵权责任法到现在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条款，将法律事实与相关民法规范涵摄，进而完成司法裁判。从法律及语义逻辑来看比较完备，但实际上上述民法教义学在现实中遭遇了困境。大量的医疗纠纷无法仅仅通过医疗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得到解决，即至少民法教义学在卫生法面对某些问题时失去了解决问题的张力。医疗损害是医患问题的燃点，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纬度，“医患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具有契约性质、消费倾向、经济伦理和法律内容的特殊的不对称的专业关系，具有综合性的特点”。<sup>④</sup>我国长期存在医疗资源地区性不平衡、过度医疗、医生收红包等不当行为。<sup>⑤</sup>而这些问题的叠加带来的医疗纠纷问题，通过民法以教义学的教条的方式难以解决。对医患关系应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法律多维层面进行思考，“其改善的途径应是全方位”。<sup>⑥</sup>这些更深刻的社会纬度问题，使得医疗纠纷不能仅仅只看“法律后果”，更应关注其扩大性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后果”问题。正因为如此，对于医疗纠纷，国务院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强调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同时司法、公安、财政、民政、保险监督管理等部门通力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sup>⑦</sup>本条例实际上是对我国既有医疗损害民法教义学的有力扩张。先前的医疗损害民法教义学以解释法律为工具，仅仅对实然法进行诠释，缺乏应然法的社会性张力，对解决卫生法中医疗纠纷这样一个较具社会开放性的问题已经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才有《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在后的以一种全方位多社会视角介入医疗纠纷进行补位。这也契合了有学者对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进路差异高度总结：前者是“作为自治体系的法律”，后者是“社会语境中的法律”。<sup>⑧</sup>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对现行卫生法中医疗纠纷问题的解决思路不是仅仅限于法教义法，而是某种程度上契合社科法学，在超越法条教义语义维度上展开。此时社科法学视野的展开，也即大社科的外循环分析，即前面提到的“现代治理术的灵活运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科法学在卫生法方法论上的优势。

本质上，社科法学以法律交叉为研究进路，形成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认知科学研究等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sup>⑨</sup>相较于法教义学，社科法学虽然强调不拘泥于教义，法外学科展开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新的学科，有其进步意义，但对于卫生法中的医疗纠纷问题，可能需要解决前置发生的地区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相关问题，这些通过经济财政手段也就是社会科学维度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因此，对于卫生法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社科法学似乎提供了某种解决路径，但社科法学在卫生法的展开

① 赵敏、胡亚林等：《“5+3”一体化模式下卓越中医师的卫生法治素养培养研究》，《医学与法学》2020年第6期。

② 孙海波：《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方法论反省——以法学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为重点》，《东方法学》2015年第4期。

③ 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义学为对照》，《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④ 李正关、冷明祥：《医患关系研究进展综述》，《中国医院管理》2009年第3期。

⑤ 张文娟、郝艳华等：《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医学与社会》2014年第4期。

⑥ 宋华、宋兰堂等：《对医患关系现状的多维思考》，《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年第9期。

⑦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年第26期。

⑧ 宋旭光：《面对社科法学挑战的法教义学——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

⑨ 侯猛：《社科法学的研究格局：从分立走向整合》，《法学》2017年第2期。



仍有缺陷。

卫生法大量涉及医学、公共卫生等自然科学。这些问题通常又以法的形式展开技术内容,比如形式意义的立法条款中却含有大量的技术内容。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该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规定实际可以分两段进行分析:一是“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等先发行为,这是公共卫生医学问题;二是这些先发行为可能引发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等后生行为,而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先发行为与后生行为实际上是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一个卫生法问题,也就是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先发行为都是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涉及医学公共卫生等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先发行为因为是针对个人展开,直接从上述先发技术行为中伴生隐私问题,所以上述法条实际上同时涉及医学、法学高度交叉的现象,显然缺了任何一条腿都无法解决由此带来的卫生法责任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进路去理解卫生法中以法的形式展开的技术内容?社科法学的交叉研究只强调社科领域,社科法学只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依然有学科跨度不够的问题。有学者在反思社科法学研究进路时,提出了法律与自然科学交叉怎么办之问。<sup>①</sup>法律与自然科学交叉之间虽然只是以此质疑“社科法学”这一称谓的逻辑合理性,却无心插柳抛出了当今法学研究一个正在显现的命题:法学不但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叉,其实也在大量地与自然科学交叉集结。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文理交叉强调问题实践导向的领域,如前论述卫生法中有关医疗损害、传染病防治等具体问题,除了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维度知识遁入法学,大量涉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通过立法进入法学界域,此时社科法学研究进路在应对类似卫生法等新兴交叉法学科时开始力不从心。

上述分析显示了以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为中国法学基本理论构建的基座,在卫生法的法学知识的逻辑生成中,呈现方法论的不足。而卫生法遭遇的理论困局,亟待新的方法论的理论重构。

### 三、卫生法方法论的重构

#### (一) 传统法学的破局与领域法学兴起

近20年以来,一些新兴领域如卫生法、环境法、网络法等出现高度整合性、交叉性、动态性的特点。从传统法学角度,难以按当前传统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标准划归任何一个既有部门法,这也呼唤以学科交叉和法学内部交叉进行研究的路径来解决这些领域的法律问题。有学者将上述有别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兴领域的法学现象统称为“领域法”。该学者进一步认为,卫生法是典型的领域法,其调整对象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包括调整人体生命健康权益保护关系,跨公法、私法。涉及个体及群体健康安全,调整与人体生命健康相关的各种传统和新型特殊关系、调整卫生安全保障关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关系等,在实践中无法划归任何法律部门。<sup>②</sup>

领域法的出现克服了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在新兴问题领域的方法论上的研究缺陷,又在吸纳传统方法论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独有的研究进路。有学者指出,有着浓重法教义学的传统部门法发展到现在受到三大挑战:一是部门法交叉,如刑法和行政法交叉形成行政刑法;二是传统法律因新的价值体系的遁入而带来全新塑造,如生命法原来归入民法或刑法,后来随着后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等现代生命科技的诞生,生命法开始对生命伦理纳入研究范畴;三是科技发展伴生出来的新兴领域天然的有别于任何传

<sup>①</sup> 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sup>②</sup> 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

统部门法,如网络法、环境法等。第一种只需要加强传统部门法的教义交流便可以周延解决;后两种都是传统部门法建构“不敷用于新兴社会领域”的情形下,领域法可发挥的空间和价值的体现。<sup>①</sup>前面提到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具有相通之处,则可视作传统部门法逻辑框架下的方法论。但以上述两方法论适用卫生法学教学研究都具有一定局限性。法教义学不免落入教条主义,“是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公式化联系,至于法律背后的公义,通常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社科法学偏重社会科学交叉下的理论建构,将关注法律规则的整体性价值,并不重视规则本身的形式圆满。<sup>②</sup>虽然社科法学强调跨学科思维,需要遁入其他社会科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支点,但是卫生法是一门医学专业背景下的交叉法学。它无法回答医学等理工科学在卫生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进一步说,社科法学无法解决法律人如何对医学等自然科学完成知识谱系的法学化建构问题。

### (二) 领域法学视角下的卫生法研究进路特点

领域法学一定程度上对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合理元素兼收并蓄,并在前述理论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进路。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领域法法学学科属性、定位愈加清晰。传统部门法更关注抽象、形式的正义;而领域法则对复杂的问题做具体和实质性的审思。当然领域法作为新型法学,并非完全颠覆既有的传统方法论,而是借鉴融合。领域法融合了部门法思维下的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工具和手段等要素,但方法论上强调问题意识,强调法学研究的经世致用。领域法与传统部门法同构互补,但前者相对后者又有法社会张力的异质性,领域法突破传统部门法的形式主义,在认识和方法上对传统法律部门加以拓展和超越,弥补其应对新兴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进路的不足。按通说,领域法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法律相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具有包容和开放的特征,融合部门法、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实现法学内部乃至其他学科之间整合互动,具备新型法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sup>③</sup>

长期以来,我国“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甚至学科内部也沟壑纵横”,形成学者以传统部门法教义学为壁垒的“饭碗法学”思维。<sup>④</sup>领域法作为法学研究方法论,实际上是对打破“饭碗法学”论的积极回应。领域法往往涉及新兴行业或技术等领域,作为新问题,其所体现的规则和法律范式往往无法被传统部门法框架所涵括,此外新兴行业或技术往往还有法律之外的知识体系架构。这些或都导致研究者需要重新学习、系统探究法学之外相关学科逻辑。而这也揭示了以部门法为基础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其方法论在特定场域里的局限和领域法的发展空间。<sup>⑤</sup>简言之,并非具备部门法学科知识,就可以将某一领域法研究好;领域法具有高度跨学科性,要想深入某一领域法,还必须对领域法所涉及的行业及技术背景也即法学之外的学科知识有系统了解。卫生法就是典型跨学科的法律,长期在法学、医学等学科中徘徊,一方面是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研究的,另一方面也存在同时被两个学科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如公共卫生法就尚未成为主流法学学科体系,并“长期在医学和法学领域内处于双重边缘化境地”。<sup>⑥</sup>这其实是对领域法的挑战,也是其魅力所在。“健康中国”的实施,新冠疫情的肆虐为卫生法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卫生法学者也有了更多的研究空间,而中国卫生法学术圈也尚在成长中。

### (三) 卫生法的领域法学实践与展望

从领域法学视角研究卫生法,学术界已有响应。法学院的卫生法学研究者开始进入领域法学,在卫生法方法论上作出了积极回应;医学院卫生法学者对领域法学在卫生法研究进路方面也进行了省思,如有医学背景的学者著书立说提出如何从领域法视角解构卫生法。领域法应该作为卫生法基本的理论范式,是因为领域法有效地避免了传统部门法划分研究导致的割裂性。领域法以问题为导向提取研究“公

① 耿颖:《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② 熊伟:《问题导向、规范集成与领域法学之精神》,《政法论丛》2016年第6期。

③ 刘剑文、胡翔:《“领域法”范式适用:方法提炼与思维模式》,《法学论坛》2018年第4期。

④ 王利明:《“饭碗法学”当休矣》,《法制资讯》2011年第6期。

⑤ 耿颖:《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⑥ 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法学》2020年第5期。

因式”。<sup>①</sup>

目前卫生法初步形成体系化教学,进入国内部分法学院、医学院。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卫生法学是一门集法学、医学、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交叉学科。<sup>②</sup>不过一部分学者也对卫生法实际现状和地位产生忧思,卫生法的这种交叉跨学科,也使得它在医学和法学教育方面异化边缘化。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发生相互轻看冲突的“斯诺命题”现象;而破解这个问题,应该在医学院的卫生法学教学中用“以问题和案例为导向”的方法来提升医学生的医师职业精神,使医学生形成法律思维模式,进而形成学科良性交叉互动。<sup>③</sup>

#### 四、余论

本文探究了卫生法基本理论上的困局,即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法学理论在卫生法上的局限性。<sup>④</sup>提出对于卫生法这样一个跨法学和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高跨度的学科,领域法更具有学术张力,因此卫生法研究者应打破传统部门法研究格局,主动进行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方法论重构,回应时代需求。中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疫情监测预警、领导决策、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等核心机制运转的重要经验,疫情也对中国卫生法进行了一次全面检视。<sup>⑤</sup>但是,国内卫生法学还在建构起学科独有的知识体系的路上。<sup>⑥</sup>借鉴美国主流学说中的卫生法学体系,卫生法分为以下模块:公共卫生相关法律(疾病预防、传染病防治法等);医疗相关法律(医疗卫生服务的许可、管理等);食品和药品相关法律(食品安全法、健康相关产品生产和营销、药品安全和记录保存等);生物伦理等。<sup>⑦</sup>上述卫生法模块化内容充分体现了卫生法学与传统部门法的异质性和自身的高度交叉性。法学作为传统文科,法学研究者如何进行法科之外的学科如医学自然科学的构建?如何跨法学外部学科构建卫生法所需的知识体系?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许磊 王冰

① 乐虹、赵敏:《中国卫生法发展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5-79页。

② 王晨光:《时代发展、学科交叉和法学领域拓展——以卫生法学为例》,《应用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③ 王岳:《医学专业卫生法学教育的“异化”现象探析》,《医学与哲学(A)》2017年第6期。

④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并非因此否认传统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法学理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工具价值,事实上,法学界如部门法研究依然自觉不自觉运用法教义学作为理论证成工具和路径。秦天宝:《〈民法典〉背景下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法教义学展开——基于人格权禁令制度的考察》,《政法论丛》2022年第1期;王海军:《自杀行为规范属性及刑事归责的法教义学诠释》,《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4期。

⑤ 鲁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多主体合作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学术研究》2020年第4期。

⑥ 张怡:《欧洲卫生法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路径》,《中国卫生法制》2021年第4期。

⑦ 上述模块中,是否将食品法纳入卫生法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和政策创新中心(Center for Health Law and Policy Innovation)和食品法律及政策诊所(Food Law and Policy Clinic)联合主任艾米丽·莱布(Emily Broad Leib)教授认为食品法一方面具有维护人类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其具有卫生法属性。但另一方面由于食品来自于农业生产,其具有卫生法研究不能涵盖的特性,她本人于是更倾向于将食品法独立于卫生法。参见Emily B. Leib and Baylen J. Linnekin, “Food Law & Policy: An Essential Part of Today’s Legal Academy”, *Journal of Food Law and Policy*, vol.13, no.2, 2017. 关于美国卫生法概况,参见Wang Zhengzhi, Tran Djung, Xu Fenglei, et al., “Health Law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Law Schools: Results of a Pre-SARS Survey”, *Templ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18, no.1, 2004.



## 推动数据流通交易： 要素市场细分和基础制度建设<sup>\*</sup>

李军林 陆树檀 路嘉明

**[摘要]**数据流通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数据价值释放的重要途径，但数据交易面临的隐私泄露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阻碍了数据流通。随着技术进步，隐私计算有效解决了数据交易中的隐私问题，使得数据要素交易实现“可用不可见”，数据所有权交易转变为使用权交易。基于数据要素的两权分离，从减少数据交易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角度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细分能够改善交易的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形成区域与行业间网格化的数据交易市场结构，并通过促进数据市场有效分工、减少交易成本、循序渐进形成市场化定价等方式来实现交易双方的帕累托改进，促进数据交易。目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拓展数据流通途径，促进数据要素使用权交换和市场化流通，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助力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据流通 隐私计算 市场细分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6; 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81-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其中，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正在激发新动能，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与配置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四个方面初步搭建了我国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同样提出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由于数据要素具备规模报酬递增和非消耗性的特征，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在流通中不仅不会有所损耗，而且会持续增值。可以说，需要流通是数据的天然属性。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循环正是关键所在。

然而，数据要素目前并未实现高效流通。根据估算，2018年我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达到了7.6ZB，美国为6.9ZB，但2019年我国数据市场服务交易规模为330—66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5。<sup>①</sup>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数据交易额目标从曾经的“日交易额100亿元”下调至“全年力争突破亿元”后仍然难以完成的实例也说明了数据流通存在一定的障碍。<sup>②</sup>造成数据流通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交易面临着隐私泄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评估与学术话语权建设研究”(22&ZD1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军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树檀、路嘉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① 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罗曼、田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这六年》，《证券时报》2021年7月12日。

露与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隐私计算的发展,数据交易中的隐私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则需要在制度建设中进一步解决。本文在隐私计算实现数据交易“可用不可见”、数据要素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细分数据市场来解决数据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细分能够实现数据市场分工,降低谈判和匹配的交易成本,由低维度到高维度循序渐进形成标准化数据价格,解决数据属性匹配问题,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对健全数据要素交易机制、促进数据流通、实现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有着较为明确的现实意义。

### 一、隐私计算实现数据所有权交易转变为数据使用权交易

隐私问题是制约个人数据交易的首要因素,<sup>①</sup>造成隐私问题的原因是个人信息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的不统一,这一矛盾严重阻碍了个人数据交易。

用户通过数据共享获得忠诚折扣和正网络外部性,但用户在分享个人数据的同时,也会暴露其关联人的部分隐私。<sup>②</sup>比如在信贷审核中,个人的社交网络影响其偿还能力,个人征信的构建会影响到亲友的征信分数。信息关联使得用户长期保持个人隐私变得困难,不管用户是否选择保护自身的信息,企业对用户的信息推断都会发生。一旦披露隐私带来的收益有所提高,对隐私保护需求较低的用户就会泄露与之关联用户的信息,并且泄露隐私无需承担风险,造成了隐私偏好与保护隐私行为的不匹配。<sup>③</sup>当其他用户的数据披露损害到了个人隐私时,用户也将缺乏动力来维持自身隐私。随着用户维护隐私的成本不断增大以及企业对用户画像分析能力的不断增强,信息披露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逐渐扩大,推动了个人信息的共享。<sup>④</sup>虽然用户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隐私,通过禁用 cookies、关闭 GPS 定位、限制 APP 权限等影响信息披露的程度,但拒绝隐私政策有可能给自身带来不便。可以说个人数据共享呈现了公共利益的特征,个人数据有着内生的共享属性。

企业通过易货交换的方式从用户手中获得数据,并将其加工成标准化数据,为处理数据投入了大量资源,往往是数据要素的实际控制者和推动数据要素流通的主要力量。程啸(2018)提出应对企业持有数据权利进行保护,激励企业更好利用数据要素。<sup>⑤</sup>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企业拥有数据产权也是更为合理的选择。<sup>⑥</sup>由于个人数据始于用户接入网络,对用户赋权应该成为数据权利配置的起点。<sup>⑦</sup>Acquisti et al.(2016)指出隐私不是共享的反面,而是对共享的控制,应该赋予数据主体对其共享内容的控制权。<sup>⑧</sup>在个人的知情同意下,个人数据流向企业没有涉及隐私侵权问题,但企业间的用户数据交易会面临个人隐私侵权的风险,这是制约数据交易的首要问题。

隐私计算(包含可信执行环境、多方安全计算和联邦学习)为数据交易中的隐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金融、医疗、能源、制造业等多个领域。<sup>⑨</sup>隐私计算覆盖了存量优化应用场景

① 本文主要考虑基于个人授权的可交易流通数据。

② Daron Acemoglu, et al., “Too Much Data: Prices and Inefficiencies in Data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vol.14, no.4, 2022, pp.218-256.

③ Athey Susan, Christian Catalini, Catherine Tucker, “The Figital Privacy Paradox: Small Money, Small Costs, Small Tal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23488, 2017.

④ Rod Garratt, Maarten Van Oordt, “Privacy as a Public Good: A Case for Electronic Ca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9, no.7, 2021, pp.2157-2180.

⑤ 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⑥ 陈永伟:《数据产权应划归平台企业还是消费者》,《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⑦ 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⑧ Alessandro Acquisti, Curtis Taylor, Liad Wagman, “The Economics of Priva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54, no.2, 2016, pp.442-492.

⑨ 《隐私计算白皮书(2022)》指出:可信执行环境通过软硬件方法在中央处理器中构建一个安全的区域,保证其内部加载的程序和数据在机密性和完整性上得到保护。多方安全计算指的是在无可信第三方的情况下,多个参与方共同计算一个目标函数,并且保证每一方仅获取自己的计算结果,无法通过计算过程中的交互数据推测出其他任意一方的输入数据(除非函数本身可以由自己的输入和获得的输出推测出其他参与方的输入)。联邦学习是指一种多个参与方在保证各自原始私有数据不出数据方定义的私有边界的前提下,以保护隐私数据的方式交换中间计算结果,从而协作完成某项机器学习任务的模式。

和增量创新应用场景，对已有安全技术进行了提升并拓展了数据安全流通场景，形成了“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交易模式，将进一步实现数据要素“可控可计量”、流通过程“可信可追溯”。“可用不可见”数据交易模式将数据转换成符号，在存储上进行分离处理，降低了数据泄露和数据滥用风险，保证数据安全，实现了数据所有权交易向数据使用权交易的转变。<sup>①</sup> 数据要素的两权分离能够有效解决交易中的隐私泄露问题，将极大地推动数据流通。

## 二、数据要素市场细分：解决数据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安排

相较于其他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备可复制性和多维属性的特征。可复制性使得同一数据可能会承载多个不同主体的数据权利，多维属性会导致不同数据之间的相互匹配能够产生不同的价值，这两个特征使得数据要素交易在实现两权分离后，仍然会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见图 1）。一是竞争因素。对数据要素的控制内化于企业竞争优势。企业通过处理其收集、储存的大量个人数据，将其转变为自身的独占性数据，当数据规模足够大的时候，数据独占可以形成行业进入壁垒，成为企业竞争优势。<sup>②</sup> 对头部企业来说，共享数据不仅会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还会增加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因此无效率地囤积数据来保持企业竞争力是更优的选择。<sup>③</sup> 二是激励问题。企业数据没有明确的排他性，导致了数据交易各方的权益分配较为模糊，而且事前契约无法有效约束数据出售后进行再加加工的转售行为，这些因素都降低了企业交易数据的意愿。三是市场结构。目前数据垄断现象十分严重，少数的数据收集者垄断了绝大部分数据权限，对 APP 的分类调研表明，前 10% 的数据收集者收集了不少于 97% 的权限数据。<sup>④</sup> 数据垄断使得头部企业巩固并扩大了市场势力，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限制了创新要素的流动。四是匹配问题。一般来说，企业更愿意获取与其主营业务最相关的数据，<sup>⑤</sup> 但目前更细分的行业数据市场尚未形成，难以实现企业间数据交易的精准匹配。在数据要素的交易情境中，符合市场化供求关系的交易场景相对较少，大多数交易情境中，交易双方的数量需要花费一定的搜寻成本才能够进行匹配。数据交易低频的匹配方式会减缓市场化价格的形成，而非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会导致数据交易行业性和地域性的分割，增加交易双方搜寻、匹配和谈判成本。除了数据交易所面临的以上问题之外，隐私计算的应用也面临着双方数据量相差悬殊、数据定价不准确、训练模型成本高致使交易无法达成等现实问题。强制要求企业共享数据将会产生额外的社会成本，企业可能通过各种行为来阻碍数据共享，如为数据增加噪音、提供不完整数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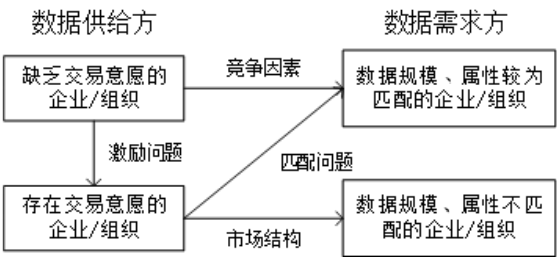


图 1 两权分离后数据交易所面临的问题

解决数据交易难题可以从明晰数据使用权和促进数据属性匹配两方面入手，明晰数据使用权可以提升对交易主体的激励，促进数据属性匹配则能够增加数据结合所产生的价值。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细分数据交易参与者的使用权，并基于数据属性适配对数据交易市场进行精细化分割。细分数据要素使用权和分割数据市场，可以推动数据交易参与者产生分工和促进数据交易匹配，循序渐进建立稳定的数据价格体系，持续推动数据交易发展。

### （一）市场细分有助于实现有效分工

对数据要素使用权的细分赋予了数据流通链条各主体权利排他性，增强事前契约的效力，激励数据

① 龚强、班铭媛、刘冲：《数据交易之悖论与突破：不完全契约视角》，《经济研究》2022 年第 7 期。

② Gaessler Fabian, Stefan Wagner, “Patents, Data Exclusiv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104, no.3, 2022, pp.571-586.

③ Charles I. Jones, Christopher Tonetti, “Nonrivalry and the Economics of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0, no.9, 2020, pp.2819-2858.

④ 孟小峰：《破解数据垄断的几种治理模式研究》，《人民论坛》2020 年第 27 期。

⑤ Elsaify Morad, Sharique Hasan, “Data Exchanges among Firms”, *Digital Business*, vol.1, no.2, 2021.



权利主体进行交易并消除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将数据交易从一个冲突与利益相混合的博弈转变成为一个共同利益博弈，形成市场主体的稳定预期、数据产业的分工以及多样化委托代理市场，为企业数据交易提供激励并解决数据交易后续的转售问题。哈特指出，由于世界状态的不确定性和人们行为的不可预期性，法律条文无法完全阐明有关产权的各种条件和事项，这导致产权存在着有一部分剩余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改变，产权的潜在属性会被发现，剩余空间会被进一步挖掘。<sup>①</sup>对数据要素使用权的细分实际上是在不断缩小公共领域，<sup>②</sup>形成数据要素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提升数据要素权利主体对数据要素的利用能力，减少租值耗散的过程。数据使用权的细分，会逐步推动生产环节从生产链中独立出来，形成中间产品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分工的专业化将激励数据权利主体参与数据交易，增加参与数据交易的主体数量，保障数据交易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由于数据要素需要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发挥效能，对数据要素使用权的进一步细分还会促使不同类型的主体加入到数据要素交易当中，拓展数据市场的生产流通链条，扩大市场规模，形成包含数据要素采集、储存、处理、销售、应用等环节的供应链网络，呼应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趋势。

分工精细化能够刺激多主体进入数据市场，但也增加了数据交易成本，需要通过改进交易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予以解决。常见的数据交易形式包括交易所交易、点对点交易和数据中介商交易，随着数据市场分工模式精细化，会催生大量细分领域的数据交易平台和数据商来减少交易成本，如数据信托、数据银行等。其中交易平台可以通过说服或补贴的方式诱导卖方披露更多的保留价格信息，进行合理的资产登记。数据商能够提供数据评估、数据清洗和数据加工等数据服务，帮助交易双方厘清数据价值，更好评估自身数据资产，减少数据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数据流通。

## （二）市场细分为交易双方提供激励并减少福利损失

同一数据集包含了不同维度和不同属性的数据，不同属性数据要素相结合能产生不同的价值。当数据要素维度和属性较为接近时，强关联性会有效提升数据结合后的可解释性和预测能力，数据结合后的整体价值也将超过单个数据价值的简单相加，数据交易主体对这样的数据会产生更强烈的交易意愿。

对于市场细分的激励机制，可以参考 Yang（2022）给出的例子。<sup>③</sup>假设销售商向三类消费者出售一批商品，其中销售商的边际成本  $c$  是私人信息，有一半的概率为  $1/4$ ，一半的概率为  $3/4$ 。如图 2 所示，三类消费者各占总人数的  $1/3$ ，商品对消费者 1 的价值为 3，对消费者 2 的价值为 2，对消费者 3 的价值为 1。不同消费者的支付手段不尽相同，消费者 1 只使用移动支付，消费者 2 只使用现金支付，消费者 3 有  $1/2$  的概率使用移动支付，有  $1/2$  的概率使用现金支付。销售商与数据供应商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数据供应商拥有所有的消费者数据，包含了消费者类型信息和支付信息，并将这些数据选择性地出售给销售商。对销售商来说，越能够详细精确了解消费者信息，越有可能实现价格歧视。假设数据的价格为  $p$ ，销售商购买数据后的利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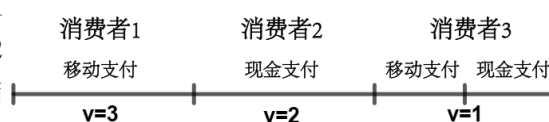


图 2 消费者类型和支付类型信息

$$\pi_p = \frac{1}{3}(1-c) + \frac{1}{3}(2-c) + \frac{1}{3}(3-c) - p$$

若销售商不购买数据，其利润为：

$$\pi = \max\{(1-c), \frac{2}{3}(1-c), \frac{1}{3}(3-c)\}$$

① Hart Oliver,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1990, pp.1119-1158.

② [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③ Kai Hao Yang, “Selling Consumer Data for Profit: Optimal Market-Segmentation Design and Its Consequ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2, no.4, 2022, pp.1364-1393.

当  $\pi_p > \pi$  时, 销售商购买数据的利润要大于不购买数据的利润, 此时价格  $p = 5/12$ 。但根据销售商不同的边际成本  $c$ , 存在着利润两个约束。当销售商边际成本  $c$  较小时, 数据价格  $p = 7/12$ , 当销售商成本  $c$  较大时, 数据价格  $p = 5/12$ 。若将销售商不同概率的边际成本看作不同销售商的成本, 那么信息的增多会使得低成本数据商获得更大的利润, 从而存在着较大的议价空间。数据商如果对销售商进行统一定价, 将无法实现对较低成本销售商的价格歧视。在这种情况下, 数据供应商存在着策略  $S$ , 通过对数据市场的细分来获得更高的利润。

$$S = \left\{ \left( \text{支付类型数据}, p = \frac{1}{3} \right), \left( \text{消费者类型数据}, p = \frac{7}{12} \right) \right\}$$

在策略  $S$  下, 成本更高的销售商会选择购买支付类型数据, 成本更低的则会选择购买消费者类型数据。对成本更高的销售商来说, 更多数据所提供的额外信息意义不大。而边际成本更低的销售商, 则能够通过更多信息获得更高利润。如果将不同成本看作不同销售商拥有的不同类型数据, 那么销售商与数据供应商的不同数据结合将产生不同价值。此时数据供应商通过市场细分促进属性更为匹配的数据相结合而实现了价格歧视, 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销售商也通过市场细分获得了与自身更为匹配的数据而实现了帕累托改进。Haghpanah & Siegel (2022) 指出, 卖家为部分消费者提供低效率的服务是要降低其他消费者的信息租金, 缺乏效率的市场都存在帕累托细分, 会弱增加所有消费者的剩余, 严格增加部分消费者和卖方的剩余。<sup>①</sup> 在总剩余没有最大化时, 市场细分能够使得供需双方都获益。如图 3 所示, 细分市场减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细分的程度越高, 在搜寻和谈判成本中损失的福利就越小。但对数据的需求者来说, 在细分规则没有标准化时, 需求方只能根据数据供给方所提供的数据细分市场规则进行选择, 在搜寻交易和后续的价格谈判中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很难达成对自身更有利的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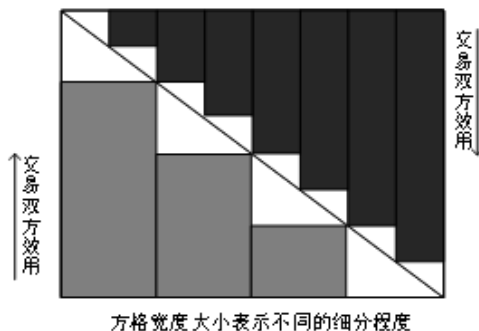


图 3 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细分的福利损失

### (三) 市场细分有助于推动形成数据定价

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 具备着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经济特征。市场主体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数据产权分配和价值达成共识, 需要不断磨合和动态调整。这种动态调整需要大量的数据交易作为基础, 以形成标准化交易模式。数据交易的前提在于对数据交易参与方进行激励, 激励的前提则是参与各方对数据有着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 这种预期将逐渐转变成数据要素的价格。价格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中有着四个作用: 一是价格能够激励数据产品加工使用者、数据产品经营者以成本最低的方式生产市场最稀缺的数据产品, 促进数据产品的高效生产, 增加数据市场的供给; 二是激励数据持有者提供其数据资源以实现报酬最大化, 价格是引导数据持有者进行数据流转的重要因素; 三是为数据市场配给稳定的数据产品供应, 价格稳定保证了数据供应链上各参与主体在各环节的较小成本波动, 从而能够实现稳定的数据要素供给; 四是减少数据市场的交易成本, 价格的确定使得数据交易双方无需花费额外的谈判成本、调查成本等去估计对方的保留价格, 提升了数据交易效率。但目前对多维数据集的定价并不明确, 交易双方的估值分歧仍然较大。为此, 市场细分可以通过匹配细分领域内的数据交易, 促进细分领域内单一维度数据价格的形成, 并逐渐推广形成包含更多维度的数据价格, 解决多维数据集定价问题。

数据的维度越低, 越容易对其进行定价。市场细分通过实现规模和属性相近的数据交易、减少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定价。根据匹配机制, 数据交易可以分为一对一许可、一对多许可、多对

<sup>①</sup> Nima Haghpanah, Ron Siegel, "Pareto Improving Segmentation of Multi-Product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31, no.6, 2023, pp.1546-1575.

一许可和多对多许可。其中，一对一许可是通过合同进行协商交换；一对多许可通过 API 开放数据，提供数据服务、数据报告等；多对一许可包括了谷歌搜索等用户通过数据交换服务的模式；多对多许可包含了多边交易市场，如第三方交易平台等。数据定价应该遵循真实性、公平性、收益最大化、无套利、隐私保护和计算效率等准则。<sup>①</sup> 在交易市场上买方较多时，即在一对多、多对多交易模式中，数据产品定价类似于数字产品定价，可以采取设置固定价格（刚性定价和设置定价层级）、与其他商品捆绑销售、订阅和随机拍卖等方式形成市场化定价。在买方较少时，需要企业或个人自主定价。多对一的交易模式往往与一对一的交易模式处在同一数据交易链条上。数据收集企业通过多对一的模式收集客户数据，再通过一对一的模式进行出售。一般来说，企业间的数据流动方式主要包括企业间共享、自留使用和数据交易。<sup>②</sup> Elsaify & Hasan（2020）对美国 1285 家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17% 的公司进行了数据交易，超过 50% 的交易方式是数据共享协议，其余为购买或者单项共享协议。<sup>③</sup> 但企业间自行匹配导致了一对一的交易模式通常是不透明的，是一种相对低效的方式，需要双方形成一致的利益才能达成数据交易。市场细分能够促进行业内的企业进行数据交易，并通过持续交易来确定价格的合理区间，实现更为透明的交易，形成更高维度的市场化价格。

（四）市场细分的整体作用

数据使用权细分与属性匹配相结合，可以形成网格化的交易空间和市场化价格，减少企业交易中数据规模不匹配的问题，加速行业间、区域间的企业交易数据，催生大量的数据交易所与数据商。目前，我国数据交易呈现分散化态势，数据孤岛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在这种非市场化的结构下，数据交易所、第三方数据商和专业机构是促进交易匹配的重要推手。数据交易所能够定制数据产品、进行数据资产登记以及聚合信息，通过延迟接受算法等匹配机制寻求最优的交易对象，实现一对多或者一对一的稳定匹配，在持续的数据交易中形成标准化的数据定价，减少租值耗散。在非马尔可夫的“预付费均衡”均衡中，买家越多，数据流通的速度就越快，实现交易双方的聚合对数据流通有着重要作用。<sup>④</sup> 数据分析是认识数据价值的重要途径，分析能力的差异越大，供需双方保留价格的波动就越大。专业的数据商能够为交易双方提供较为完整的数据信息，更好地修正双方保留价格。

市场细分通过促进相近规模的数据交易，还能抑制大企业的数据垄断和中小企业可能的搭便车行为，实现数据公平交易。《意见》指出：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促进劳动者贡献和劳动报酬相匹配。明确数据要素收入分配有助于打消数据交易链条上参与主体的顾虑，实现对数据的充分挖掘利用，并通过分红、提成等多种收益共享的创新方式有效激励数据价值创造。如图 4 所示，细分数据市场通过推动数据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近似、属性匹配的数据交易，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形成市场化价格，创新各环节收益分配方式，促进数据的流通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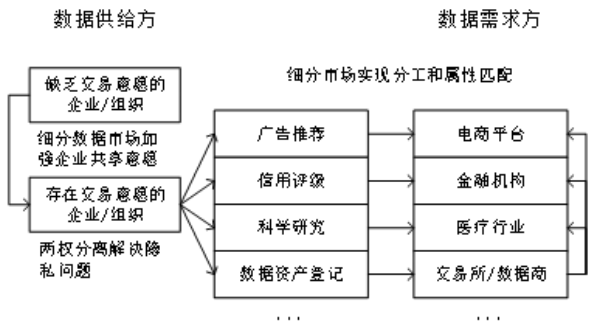


图 4 根据价值属性细分市场对数据流通的影响

三、数据要素市场细分的实践原则

数据要素市场细分的过程包括数据要素使用权细分、根据数据属性的分级分类以及完善数据资产登

① Jian Pei, “A Survey on Data Pricing: From Economics to Data Sci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vol.34, no.10, 2022, pp.4586-4608.  
② 熊巧琴、汤珂：《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2 期。  
③ Morad Elsaify, Sharique Hasan, “Some Data on the Market for Dat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no.1, 2020.  
④ S. Nageeb Ali, Ayal Chen-Zion, Erik Lillethun, “Reselling Information”, *ArXiv*, 2020.



记体系。其中，数据要素使用权细分旨在明晰不同主体的使用权，有助于更多主体参与到数据交易中。数据的分级分类是基于数据多维属性，选择较为通用的属性对数据市场进行分类，以便交易主体更好地了解数据价值，促进交易匹配。完善数据资产登记是在已有的确权体系下，估算数据要素的价格区间，实现数据要素的确权和价值确定。

#### （一）对数据要素使用权进行细分

《意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产权运行机制，对不同主体数据权利进行细分。不同于数据所有权，持有权在数据交易中指的是物理支配数据，包含了数据要素的储存和溯源。数据加工使用权包含了数据处理权和访问权，其中处理权是许可他人处理数据的权利，对交易后的转售行为进行了限制；访问权是数据需求方使用或获取数据的权利，Varian（2018）指出，数据很少像其他物品那样被出售，而是被用于特定用途，需求方的数据权利称访问权更为合适，如在自动驾驶中，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允许多方同时访问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包括引擎、驾驶系统、用户行程等。<sup>①</sup>数据产品经营权可被看作是多项权利的混合，是对经过加工、分析或处理后形成的数据产品或数据衍生产品的经营和使用权利，赋予了持有者对这些产品的经营、使用、销售、授权等权利。数据要素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还需要根据数据流通形式，随着数据积累、技术手段进步和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实现更优的配置。

#### （二）根据数据安全或价值等不同属性进行分类分级

针对数据要素标准化分级分类，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中央、地方、行业的数据安全等级和某些特定场景分级分类的数据市场细分体系。中央层面上的数据分级分类文件，是一个围绕数据安全，逐渐拓展分级分类适用范围的渐进过程，采用了适当的管控方法，与市场变化、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出台了多种公共数据开放分级分类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多也依据数据安全对不同数据逐层划分。在行业层面，通信、金融、医疗等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也有着分级分类方法，如《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基础电信企业数据分级分类方法》《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等都考虑了特定行业的数据安全需求和特点。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数据安全级别和数据权利也会随之改变，除了设定统一标准外，还需要根据场景变化而对数据的分级分类进行动态调整，在符合知情同意原则和效率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级确定数据权利。<sup>②</sup>例如，2021年4月，北京市出台的《政务数据分级与安全保护规范》对不考虑应用场景下的个人信息数据、运营商数据和某智慧停车应用场景下的数据项、数据项集合进行了分级，这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指导。

除了将数据安全作为分级分类依据，还应该根据数据要素不同维度的属性结合寻求更多的分级分类方法，在保护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拓展更多场景的数据授权机制。可以根据数据要素价值维度的五个方面进行分类。<sup>③</sup>一是数据对产品增值的影响。不同数据对产品增值的影响程度不同，对自动驾驶来说，收集大量的数据能够显著提高其安全性，而对汽车制造来说，客户反馈的使用数据则影响有限。二是数据可供学习的边际效用。当企业有着大量客户基础时，如果数据对学习的边际效用仍然很高，企业就往往具备竞争优势。比如，医疗行业往往会借助大量数据解决病毒进化、突变等问题。三是数据的相关性。如果新的数据与之前积累的数据相关性不大，在位企业就很难建立优势。例如，在游戏市场中，用户的偏好转变很快，上一个游戏的用户数据可能就不再适用于下一个。四是基于数据的改进是否容易被复制。产品改进与用户粘性相互促进，使企业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企业还可以通过实时数据进行产品改进，

<sup>①</sup> Ajay K. Agrawal, Joshua Gans, Avi Goldfarb,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405.

<sup>②</sup> 刘涛雄、李若菲、戎珂：《基于生成场景的数据确权理论与分级授权》，《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

<sup>③</sup> Hagiui Andrei, Julian Wright, “When Data Creat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98, no.1, 2020, pp.94-101.

类似于百度地图根据交通状况做出路线推荐等。五是数据的网络外部性。某些用户数据对其他用户的影响，这在各种社交网站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根据数据的增值影响、学习边际效用、相关性、改进复制难度和网络外部性等价值维度，对数据安全分级分类进行补充，能够适应更多的情形，促进数据更为合理的流通和授权。

（三）完善数据资产登记体系

市场细分对数据交易的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有赖于建立更高标准的数据交易所体系。权威的数字资产登记是建立交易体系的关键环节，在数据要素“三权分置”下，完善数据资产登记需要确定数据价格的合理区间。量化数据的货币价值需要数据交易双方能够认识到数据的真正价值，包括卖方的保留价格和买方的购买意愿。其中，卖方的保留价格由收集处理、储存和管理的成本以及对数据附加值的估计所决定。收集数据成本主要来自于用户对隐私的估值，Tang（2019）指出在 p2p 贷款平台上，个人社交网络 ID 与雇主电话价值约为 230 元。<sup>①</sup>Prince & Wallsten（2022）对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德国、墨西哥和美国进行抽样发现，人们对银行账户、指纹、短信和提现信息的平均估值最高，对联系人、浏览记录、声纹的估值次之，对网络信息、位置信息和发送广告权利的估值最低（见图 5）。<sup>②</sup>储存成本涉及硬件成本和功耗、折旧费用，但随着物联网和云服务普及，这部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正在不断降低。管理成本主要由人力成本、间接成本和服务外包成本构成。数据要素的附加值由数据要素的生成级别、来源领域、应用端用途和数据类型所决定，受到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层次性、协调性、异质性和具体交易场景的影响。<sup>③</sup>买方的购买意愿取决于数据对其的价值，其自身拥有的数据与交易数据相结合后，会产生新的价值。不同于卖方的保留价格，买方对数据的估价基于数据交易后能够产生的新价值，价值越高，购买意愿就越强。除了场景下的数据交易，无场景下的数据交易包含了企业数据分享、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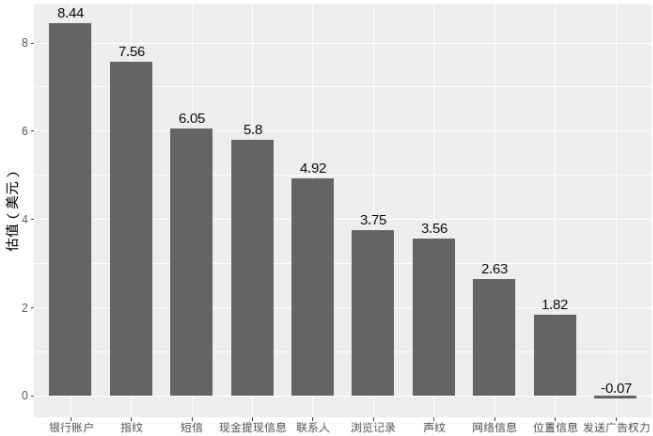


图 5 个人数据估值

业并购和数据侵权诉讼等，数据资产的估值方法包含了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当企业行为可以被观察时，可以像计算阿尔法收益一样利用企业选择与企业收益的协方差度量数据价值。在并购的场景下，可以参考实物期权法，评估并购目标企业对数据灵活管理所产生的价值。在诉讼侵权的场景中，可以根据对企业数据资源的经营生态与商业利益等形成的实质性损害进行评估定价。

在充分了解数据交易双方的需求和成本之后，更容易对数据要素进行资产登记。2022 年 7 月，北京国际大数据所成立了数据资产登记中心，通过制定数据资产登记规范和相关制度，发布数据资产凭证和数字交易合约实现数据确权，促进数据资产等级平台和数据交易平台的互联互通。2022 年 12 月的《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提出推动形成数据资产目录，建立数据资产登记和评估机制，培育数据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了数据资产登记制度，为数据交易提供可靠的基础。

四、结语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

① Huan Tang, “The Value of Privacy: Evidence from Online Borrowers”,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SSRN, 2019.  
② Jeffrey T. Prince, Scott Wallsten, “How Much is Privacy Worth Around the World and Across Platforms?”,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vol.31, no.4, 2022, pp.841-861.  
③ 欧阳日辉、杜青青：《数据要素定价机制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2 期。

能够赋能数字经济，实现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目前隐私计算在应用层面上仍然面临着较多的技术制约，难以兼顾可控性与性能损失，在复杂场景中的应用存在局限。只有头部国有企业能够承担起建立隐私技术生态的成本，并投入大量资源突破隐私计算技术瓶颈，建设数据交易基础设施为隐私计算提供底层支持，降低产业成本，对部分技术开源，促进隐私计算技术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因此，推动数据流通还需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另外，国有企业还能够在数据交易市场中起到锚定的作用。基于目前的市场结构，国有企业可以作为数据供应者为数据市场提供更多数据来倒逼其他企业进入数据供应市场，解决数据市场供应不足的问题。

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也是促进数据流通的重要途径。公共数据可以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行业新进入者的市场份额。数据开放提升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频率，政府能够更及时、准确地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缩短企业办事流程，减少企业交易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企业能够利用开放信息搜寻匹配数据交易伙伴，查找政府惠企政策，利用开放数据提升竞争力等。各级政府已高度重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比如，浙江以“四个一”为指导，统筹建设省市县三级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了一体化职能公共数据平台；山东省以“应开放尽开放”为原则，搭建省市一体化数据开放平台，推动了数据高质量开放。

数据流通是实现数据价值释放的关键途径。数据价值并非是固定的，不同的数据相互结合会产生不同的价值，数据在不断的相互结合中还会产生新的价值。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是一个需要多主体不断磨合、动态调整的过程。在当前不平衡的数据市场结构下，市场细分能够通过减少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促进数据交易，逐步实现数据要素在更多维度和更广领域的流动和融合，更好地开发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张 超



#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sup>\*</sup>

王美艳

**[摘要]**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关键词]** 劳动参与 性别差距 婚姻 生育

〔中图分类号〕F0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90-08

## 一、引言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老龄化水平提高,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供给状况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劳动参与和失业状况共同决定劳动年龄人口的利用程度(或者说劳动供给规模)。由于失业率的变化幅度相对有限,劳动供给规模主要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劳动参与两个因素。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初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处于持续下降态势。近年来,中国为提高生育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政策调整。<sup>①</sup>但即便这些政策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对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效应呈现也还需要等待。由此,要增加劳动供给,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劳动参与。

女性,尤其是进入婚姻和生育后的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而恰恰相反,进入婚姻后的男性往往会减少家务劳动时间。<sup>②</sup>一些女性在生育后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更多从事兼职和非全日制工作,或者选择自由度和灵活度更大的工作,或者工作时间更短等。诸多实证研究显示,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up>③</sup>依此推理,中国致力于既提高生育水平又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努力,将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不仅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性驱动力的影响,也受到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特殊驱动力的影

<sup>\*</sup>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经济影响及政策研究”(721413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sup>①</sup> 具体来说,生育政策调整包括2011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21年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孩子政策。

<sup>②</sup> Suzanne Bianchi, Melissa Milkie, Liana Sayer, John Robinson,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Social Forces*, vol.79, no.1, 2000, pp.191-228.

<sup>③</sup> Sarah Avellar, Pamela Smock, “Has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Declined Over Time? A Cross-Cohort Comparison of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65, no.3, 2003, pp.597-607.

响。因此,中国极低的生育率水平很可能包含着生育意愿受到抑制的历史影响。<sup>①</sup>基于生育率特殊的下降过程,中国有潜力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促进劳动参与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的同时,使得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实现生育率的反弹。利用严谨的实证模型分析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厘清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不同影响,将有助于作出更好的策略选择以促进劳动参与。

已有关于中国劳动参与状况的研究,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分析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近年来劳动参与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更大,劳动参与率存在明显性别差距(都阳和贾朋,2018;许敏波和李实,2019)。<sup>②③</sup>二是探讨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李琴等(2014)发现,健康对城市中老年人劳动供给有明显影响。<sup>④</sup>彭青青、李宏彬等(2017)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力,劳动参与率也越高。<sup>⑤</sup>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劳动参与,如婚姻和生育状况、家庭结构和最低工资标准等。吴愈晓(2010)发现,1995年婚姻对女性的就业决策没有任何影响,而2002年婚姻对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up>⑥</sup>张川川(2011)研究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sup>⑦</sup>沈可等(2012)发现,多代同堂家庭结构便于老年父母协助女性料理家务,从而有效提高其劳动参与程度。<sup>⑧</sup>马双等(2017)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sup>⑨</sup>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及贡献在于:首先,已有大部分研究利用的数据存在的共同特点是,样本对外来劳动力的代表性不足,得出的结果无法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全貌。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达到13256万人,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涵盖了城市劳动力全部群体,既包括城市本地人口,又包括外来人口,其中外来人口又被精准识别为城城迁移人口和乡城迁移人口。使用这项数据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状况。其次,已有研究关于劳动参与的定义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将劳动力有工作(沈可等,2012)或处于就业状态(张川川,2011)定义为参与劳动力市场,否则为不参与。这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参与的定义不符。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严格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询问了劳动力的状态,利用该数据能够精准识别一个劳动力是处于就业、失业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进而计算准确的劳动参与率。最后,已有研究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差异讨论较为欠缺,尤其是对婚姻和生育状况影响的探讨不够细致和深入。个别研究讨论了婚姻和孩子状况对女性就业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但讨论的是就业状况而不是劳动参与状况,而且仅讨论了对女性的影响,使用的数据时间距现在也较远。本研究拟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描述近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及其性别差距,分析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并考察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率影响的差异。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对如何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尤其是在不妨碍生育率反弹的前提下促进女性劳动参与,提出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 二、中国城市劳动参与率状况

###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覆盖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

① 蔡昉:《打破“生育率悖论”》,《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期。

② 都阳、贾朋:《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许敏波、李实:《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结构和趋势——基于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 李琴、雷晓燕、赵耀辉:《健康对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

⑤ 彭青青、李宏彬、施新政、吴斌珍:《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金融研究》2017年第6期。

⑥ 吴愈晓:《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社会》2010年第6期。

⑦ 张川川:《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5期。

⑧ 沈可、章元、鄢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⑨ 马双、李雪莲、蔡栋梁:《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安和广州 6 个城市，调查中包含的信息丰富而细致，其中关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婚姻和生育状况、与工作相关特征和家庭特征等方面的信息，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sup>①</sup> 我们使用的是 25—45 岁样本。将年龄下限设置为 25 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已经完成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潜在劳动力。将年龄上限设置为 45 岁，是为了使女性与男性劳动参与率有更强的可比性，因为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岁，但女性退休年龄仅为 50 岁（女干部为 55 岁），50 岁之后大部分女性将退出劳动力市场，部分女性甚至未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计算均使用样本权重。

（二）城市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及其性别差距

表 1 显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男性，比男性低 18.34 个百分点。将城市人口划分为城市本地人口、城城迁移人口和乡城迁移人口，三个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不存在太大差距，均在 85% 上下。对每个群体而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均显著低于男性。但三个群体间的劳动参与率性别差距相差较大，城市本地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远低于城城迁移人口和乡城迁移人口。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均逐步提高。对于每一种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言，女性劳动参与率均显著低于男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性别劳动参与率差距逐步缩小。健康状况越好，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均越高。对于健康状况差的劳动力而言，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健康状况一般和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而言，女性劳动参与率均显著低于男性。

表 1 不同群体的劳动参与率

	合计	女性（1）	男性（2）	性别差距 （1）—（2）
总体	86.22	77.34	95.68	-18.34***
按劳动力群体分组：				
城市本地人口	86.57	79.88	94.17	-14.29***
城城迁移人口	85.62	73.39	98.25	-24.86***
乡城迁移人口	85.65	72.18	97.78	-25.60***
按受教育水平分组：				
初中及以下	78.40	65.87	93.48	-27.61***
高中 / 中职	83.15	73.25	94.16	-20.91***
大专及以上	90.90	84.61	97.13	-12.52***
按健康状况分组：				
健康状况差	51.27	52.23	49.87	2.36
健康状况一般	82.50	75.17	93.49	-18.32***
健康状况好	87.64	78.45	96.78	-18.33***

注：根据 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 显示，有配偶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无配偶人群。<sup>②</sup> 对女性而言，有配偶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无配偶人群；对男性而言，有配偶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则显著高于无配偶人群。在无配偶人群中，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差异；在有配偶人群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男性。此外，育有 0—6 岁孩子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无 0—6 岁孩子人群。对女性而言，育有 0—6 岁孩子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无 0—6 岁孩子人群；对男性而言，育有 0—6 岁孩子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则显著高于无 0—6 岁孩子人群。在无 0—6 岁孩子的人群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男性；在育有 0—6 岁孩子人群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显著低于男性。

表 2 婚姻和生育状况与劳动参与率的关联

	合计	女性（1）	男性（2）	性别差距 （1）—（2）
按婚姻状况分组：				
无配偶（b）	90.53	91.49	89.64	1.85
有配偶（a）	85.13	74.04	97.36	-23.32***
有无配偶差距（a）—（b）	-5.40***	-17.45***	7.72***	---
按生育状况分组：				
无 0—6 岁孩子（d）	87.88	81.33	95.08	-13.75***
育有 0—6 岁孩子（c）	82.28	67.39	97.03	-29.64***
有无 0—6 岁孩子差距（c）—（d）	-5.60***	-13.94***	1.95***	---

三、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① 关于该调查数据的详细介绍，参见王美艳：《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劳动经济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② 我们将“未婚”“丧偶”和“离婚”三种婚姻状态均视为“无配偶”。



### (一) 劳动参与模型设定

对于一个劳动力而言,其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对参与和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效用进行比较决定的。如果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其收入将由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可以为零)两部分组成。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U_p(Y + N, \bar{T}; X) \quad (1)$$

其中,  $Y$  表示劳动收入,  $N$  表示非劳动收入,  $T$  表示劳动时间,  $X$  表示影响效用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变量的向量。

相应地,当选择不参与劳动力市场时,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均为零,收入仅由非劳动收入构成。此时,效用可以表示为:

$$U_q(N, 0; X) \quad (2)$$

对参与还是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选择,将由以下函数决定:

$$P^* = U_p(Y + N, \bar{T}; X) - U_q(N, 0; X) \quad (3)$$

当  $P^* > 0$  时,劳动力将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  $P = 1$ ; 当  $P^* \leq 0$  时,劳动力将选择不参与劳动力市场,  $P = 0$ 。以往关于劳动参与率的研究,很多都是利用 Probit 模型来估计劳动力参与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我们也将沿用这一模型。上述公式可改写为:

$$P^* = U_p(Y + N, \bar{T}; X) - U_q(N, 0; X) = X'\beta + \varepsilon \quad (4)$$

其中,  $X$  为一组变量的向量,  $\beta$  为参数向量,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模型的具体估计式如下:

$$\begin{aligned} \text{partici} = & \beta_0 + \beta_1 \text{female} + \beta_2 \text{migrant} + \beta_3 \text{age} + \beta_4 \text{age}^2 + \beta_5 \text{edu} + \beta_6 \text{health} + \\ & \beta_7 \ln \text{nonlaborinc} + \beta_8 \text{married} + \beta_9 \text{child} + \beta_{10} \text{city}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5)$$

其中,模型因变量 *partici* 为劳动力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虚拟变量(参与劳动力市场=1,参照组为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在自变量中, *female* 为性别虚拟变量(女性=1,参照组为男性), *migrant* 为一组劳动力所属群体虚拟变量(包括城城迁移人口、乡城迁移人口,参照组为城市本地人口), *age* 为年龄变量(连续变量), *age*<sup>2</sup> 为年龄平方, *edu* 为一组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包括高中/中职、大专及以上,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 *health* 为一组健康状况虚拟变量(包括健康状况一般、健康状况好,参照组为健康状况差), *lnnonlaborinc* 为家庭非劳动收入对数变量(连续变量),<sup>①</sup> *married* 为婚姻状况虚拟变量(有配偶为1,参照组为无配偶), *child* 为生育状况虚拟变量(育有0—6岁孩子为1,参照组为无0—6岁孩子), *city* 为一组城市变量,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sup>②</sup>

### (二) 劳动参与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公式(5)的设定方式,我们利用 Probit 模型估计了5个回归结果。表3为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中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模型(1)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不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比男性低20.6%。模型(2)加入劳动力所属群体变量,未缩小劳动参与的性别差距。模型(3)加入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后,性别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有较大幅度下降(从0.206下降至0.198),表明人力资本缩小了劳动参与的性别差距。两个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系数远大于高中/中职,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高。两个反映健康状况的虚拟变量同样均显著为正,而且健康状况越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高。模型(4)加入家庭非劳动收入对数后,性别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又有略微下降。家庭非劳动收入对数这一变量显著为负,表明家庭非劳动收入越多,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小。模型(5)加入婚姻和生育状况变量

① 家庭非劳动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收入、红利、储蓄性保险净收益、出租房屋净收入、出租其他资产净收入等,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政策性生活补贴、报销医疗费、赡养收入、其他转移性收入等。

② 限于篇幅,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3 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Probit 模型估计）

自变量	(1)	(2)	(3)	(4)	(5)
女性	-0.206*** (0.008)	-0.206*** (0.008)	-0.198*** (0.008)	-0.197*** (0.008)	-0.193*** (0.008)
城城迁移人口		0.009 (0.010)	0.014 (0.010)	0.010 (0.010)	0.012 (0.010)
乡城迁移人口		-0.015 (0.010)	0.025*** (0.010)	0.019* (0.010)	0.020** (0.010)
年龄			0.007 (0.008)	0.006 (0.008)	0.020** (0.009)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高中 / 中职			0.027*** (0.010)	0.028*** (0.010)	0.028*** (0.009)
大专及以上			0.106*** (0.011)	0.108*** (0.011)	0.105*** (0.011)
健康状况一般			0.107*** (0.013)	0.104*** (0.013)	0.105*** (0.012)
健康状况好			0.245*** (0.049)	0.234*** (0.048)	0.248*** (0.050)
家庭非劳动收入对数				-0.003*** (0.001)	-0.003*** (0.001)
有配偶					-0.028** (0.011)
育有 0—6 岁孩子					-0.063*** (0.011)
城市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sup>2</sup>	0.120	0.121	0.156	0.158	0.171
观察值个数	6017	6017	6017	6017	601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后，性别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至 0.193）。这表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比男性低 19.3%。婚姻和生育状况两个变量均显著，且系数均为负数。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无配偶的劳动力相比，有配偶的劳动力更不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与无 0—6 岁孩子的劳动力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劳动力更不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

### （三）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

我们进一步考察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在模型中加入性别变量与婚姻生育状况变量交叉项进行估计。首先，考察婚姻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差异，模型设定如下：

$$\text{partici} = \beta_0 + \beta_1 \text{female} + \beta_2 \text{migrant} + \beta_3 \text{age} + \beta_4 \text{age}^2 + \beta_5 \text{edu} + \beta_6 \text{health} + \beta_7 \ln \text{nonlaborinc} + \beta_8 \text{married} + \beta_9 \text{female} * \text{married} + \beta_{10} \text{city} + \varepsilon \quad (6)$$

其中， $\text{female} * \text{married}$  为性别变量与婚姻状况变量交叉项，其他变量设置同式（5）。

其次，考察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差异，模型设定如下：

$$\text{partici} = \beta_0 + \beta_1 \text{female} + \beta_2 \text{migrant} + \beta_3 \text{age} + \beta_4 \text{age}^2 + \beta_5 \text{edu} + \beta_6 \text{health} + \beta_7 \ln \text{nonlaborinc} + \beta_8 \text{child} + \beta_9 \text{female} * \text{child} + \beta_{10} \text{city} + \varepsilon \quad (7)$$

其中， $\text{female} * \text{child}$  为性别变量与生育状况变量交叉项，其他变量设置同式（5）。

根据公式（6）和（7）的设定，我们仍然利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表 4 为回归结果（边际效应），模型（1）加入式（6）中的变量，以此考察婚姻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性别与婚姻状况的交叉项显著。对女性而言，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6.0%；对男性而言，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12.3%。

模型（2）加入式（7）中的变量，以此考察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估计结果显示，性别与生育状况交叉项显著。对女性而言，与无 0—6 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4.9%；对男性而言，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3.5%。

以上结果表明，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相反。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

表 4 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bit 模型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Logit 模型
女性	0.003(0.017)	-0.150*** (0.010)	0.003(0.016)	-0.143*** (0.011)
城城迁移人口	0.005(0.010)	0.011(0.010)	0.003(0.008)	0.008(0.009)
乡城迁移人口	0.018* (0.010)	0.018* (0.010)	0.014* (0.008)	0.014* (0.009)
年龄	0.014* (0.008)	0.014* (0.008)	0.012* (0.007)	0.012* (0.007)
年龄平方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高中 / 中职	0.026*** (0.009)	0.029*** (0.009)	0.021*** (0.007)	0.025*** (0.008)
大专及以上	0.094*** (0.011)	0.107*** (0.011)	0.080*** (0.010)	0.095*** (0.010)
健康状况一般	0.096*** (0.012)	0.103*** (0.012)	0.080*** (0.011)	0.086*** (0.011)
健康状况好	0.221*** (0.046)	0.241*** (0.047)	0.194*** (0.049)	0.216*** (0.051)
家庭非劳动收入对数	-0.003***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有配偶	0.123*** (0.024)		0.146*** (0.029)	
女性 * 有配偶	-0.283*** (0.027)		-0.293*** (0.032)	
育有 0—6 岁孩子		0.035** (0.017)		0.041** (0.018)
女性 * 育有 0—6 岁孩子		-0.184*** (0.035)		-0.191*** (0.045)
城市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sup>2</sup>	0.190	0.179	0.188	0.178
观察值个数	6017	6017	6017	6017

的概率低于无配偶的女性，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于无配偶的男性；育有 0—6 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于无 0—6 岁孩子的女性，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

模型（1）和（2）使用的是 Probit 模型。我们也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了估计，模型（3）和（4）同样报告的是边际效应。可发现，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非常类似，这反映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 （四）稳健性检验

1. 扩展样本。我们将回归使用的样本年龄从 25—45 岁扩展至 20—50 岁，模型中的变量设置不变，再次估计模型，这相当于从样本扩展的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5（边际效应）。<sup>①</sup>在模型（1）和（2）中，交叉项均显著。对女性而言，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5.2%；对男性而言，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12.7%。对女性而言，与无 0—6 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9.2%；对男性而言，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6.0%。模型（3）和（4）的结果与模型（1）和（2）大致相同，且均与样本扩展前类似，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2. 替换变量。前面分析将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种状态，其中“无配偶”包括“未婚”“丧

表 5 劳动参与的模型估计（扩展样本）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bit 模型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Logit 模型
女性	-0.020(0.014)	-0.154*** (0.009)	-0.019(0.012)	-0.142*** (0.009)
有配偶	0.127*** (0.020)		0.144*** (0.022)	
女性 * 有配偶	-0.279*** (0.022)		-0.285*** (0.023)	
育有 0—6 岁孩子		0.060*** (0.017)		0.076*** (0.017)
女性 * 育有 0—6 岁孩子		-0.252*** (0.037)		-0.306*** (0.051)
Pseudo R <sup>2</sup>	0.176	0.166	0.174	0.164
观察值个数	7980	7980	7980	7980

<sup>①</sup> 限于篇幅，表中其他变量的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偶”和“离婚”。尽管“丧偶”和“离婚”也被视为“无配偶”，但其与“未婚”相比存在差异。此处，我们把“丧偶”和“离婚”排除在外，仅将“未婚”视为“无配偶”状态，再次估计模型，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关于生育状况，前面分析将其分为“育有 0—6 岁孩子”和“无 0—6 岁孩子”两种状态。然而，不论年龄大小，孩子都可能会长期影响一个人的劳动参与，而不仅仅是只有 0—6 岁孩子才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此处，我们将生育状况设置为“有孩子”和“无孩子”两种状态，观察其对劳动参与的影响，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 6（边际效应）。<sup>①</sup>在模型（1）和（2）中，交叉项均显著。对女性而言，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6.8%；对男性而言，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13.0%。对女性而言，与无孩子的女性相比，有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2.0%；对男性而言，与无孩子的男性相比，有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8.6%。模型（3）（4）的结果与模型（1）（2）大致相同，且均与替换变量前类似，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6 劳动参与的模型估计（替换变量）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bit 模型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Logit 模型
女性	0.019(0.020)	-0.069*** (0.014)	0.018(0.018)	-0.063*** (0.013)
有配偶	0.130*** (0.026)		0.154*** (0.031)	
女性 * 有配偶	-0.298*** (0.029)		-0.311*** (0.035)	
有孩子		0.086*** (0.020)		0.100*** (0.023)
女性 * 有孩子		-0.206*** (0.025)		-0.212*** (0.029)
Pseudo R <sup>2</sup>	0.192	0.179	0.191	0.178
观察值个数	5818	6017	5818	6017

#### 四、异质性分析

##### （一）不同劳动力群体劳动参与的模型估计

我们对城市本地人口、城城迁移人口和乡城迁移人口劳动参与的决定，分别估计了 Probit 模型，见表 7（边际效应）。<sup>②</sup>关于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三个群体的回归结果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对三个群体而言，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于无配偶的女性，育有 0—6 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于无 0—6 岁孩子的女性。不同点在于，对于城市本地人口和乡城迁移人口而言，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于无配偶的男性；对于城城迁移人口而言，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与无配偶的男性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城市本地人口而言，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对于城城迁移人口和乡城迁移人口而言，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没有显著差异。

##### （二）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劳动参与的模型估计

根据对三种受教育水平群体劳动参与的决定，我们分别估计了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8（边际效应）。<sup>③</sup>关于婚姻和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三个群体的回归结果同样既有相同点，又有

表 7 不同劳动力群体劳动参与的模型估计

自变量	城市本地人口		城城迁移人口		乡城迁移人口	
	(1)	(2)	(3)	(4)	(5)	(6)
女性	0.02(0.02)	-0.12*** (0.01)	-0.07* (0.04)	-0.18*** (0.02)	0.04(0.04)	-0.21*** (0.02)
有配偶	0.13*** (0.03)		0.03(0.05)		0.13** (0.05)	
女性 * 有配偶	-0.26*** (0.03)		-0.18*** (0.07)		-0.40*** (0.07)	
育有 0—6 岁孩子		0.06** (0.02)		0.01(0.04)		-0.01(0.04)
女性 * 育有 0—6 岁孩子		-0.21*** (0.05)		-0.12* (0.07)		-0.14** (0.06)
Pseudo R <sup>2</sup>	0.17	0.16	0.23	0.22	0.24	0.22
观察值个数	3098	3098	1291	1291	1628	1628

① 限于篇幅，表中其他变量的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表中其他变量的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 限于篇幅，表中其他变量的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不同点。相同点在于，对三个群体而言，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于无配偶的女性，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于无配偶的男性；育有 0—6 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于无 0—6 岁孩子的女性。不同点在于，对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言，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而对于高中 / 中职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而言，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没有显著差异。

表 8 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劳动参与的模型估计

自变量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中职		大专及以上	
	(1)	(2)	(3)	(4)	(5)	(6)
女性	-0.06(0.05)	-0.24*** (0.02)	0.06(0.05)	-0.20*** (0.02)	0.002(0.02)	-0.09*** (0.01)
有配偶	0.22*** (0.06)		0.17*** (0.06)		0.06** (0.02)	
女性 * 有配偶	-0.29*** (0.06)		-0.38*** (0.06)		-0.22*** (0.04)	
育有 0—6 岁孩子		0.08** (0.04)		0.02(0.04)		0.02(0.02)
女性 * 育有 0—6 岁孩子		-0.30*** (0.09)		-0.15** (0.07)		-0.16*** (0.04)
Pseudo R <sup>2</sup>	0.19	0.19	0.19	0.16	0.16	0.15
观察值个数	1621	1621	1344	1344	3052	3052

###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丰富翔实的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描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及其性别差距，分析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并考察了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对女性而言，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6.0%；对男性而言，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12.3%。对女性而言，与无 0—6 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 14.9%；对男性而言，与无 0—6 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 0—6 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 3.5%。

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家庭（婚姻和生育状况）是劳动参与性别差距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这与美国、欧洲等的状况类似。女性的家庭责任更多表现在照料子女，而男性则更多体现在争取收入以养家糊口。相当数量的女性为了照顾家庭，尤其是照料和养育子女，在结婚和生育后不得不暂时甚至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国的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婴幼儿照料给女性带来了较大的负担。2021 年以来，“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女性面临更大的育儿和照料压力。如果托幼服务体系得不到明显改观，女性劳动参与率可能进一步下降，与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持续扩大。

实际上，提高生育水平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并行不悖，以下做法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做好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并不断健全婴幼儿照护体系，将有望在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的同时实现生育率反弹。二是要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让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育儿和照料家庭等责任，实现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公平。新近的一项国际研究表明，对于低生育率国家而言，如果在实现很高的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还能够满足性别平等这个条件，生育率可望实现适度反弹。<sup>①</sup>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本身就是性别平等的重要体现之一。

责任编辑：张 超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9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9.

# 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虹吸或溢出效应

——兼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sup>\*</sup>

洪炜杰 罗必良

**[摘要]** 振兴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关于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利用 2000—2020 年中国县域和主要大城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表现为虹吸效应。（3）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4）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产生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转变为溢出效应，对边远县域则产生虹吸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因此，大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关系，关键取决于大城市及城市体系是否合理布局。

**[关键词]** 县域经济 中心城市 虹吸效应 溢出效应 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F061.5；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098-09

## 一、引言

城镇化快速推进是中国过去 40 余年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其间，中国农村人口从 1980 年的 80.61% 下降到 2021 年的 35.28%。与之相关联，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型，第二、三产业 GDP 占比从 1980 年的 69.83% 上升到 2021 年的 92.7%。因巨大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城市经济在提高交易密度、节省交易费用、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sup>①</sup> 尽管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sup>②</sup> 但对于中国应该走怎样的城镇化道路则仍存争议。<sup>③</sup>

1980 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

<sup>\*</sup>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非农转移、代际转换与农地撂荒发生机理研究”（7220306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农地撂荒的发生机理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考察”（GD22YGL2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2022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农民共同富裕的生态逻辑及其实现路径”（GD22TWCXGC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特别委托重点项目“清远高质量发展研究”（GD23WT02-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洪炜杰，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罗必良（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① 王俊：《经济集聚、技能匹配与大城市工资溢价》，《管理世界》2021 年第 4 期。

② Xiaokai Yang,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hanges and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34, no.1, 1990, pp.199-222; Luisito Bertinelli, Duncan Black,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56, no.1, 2004, pp.80-96.

③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罗必良、耿鹏鹏：《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并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总方针。但在实践中，中国却走出了一条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尚未出现市区人口达到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3个，到2020年，前者达到10个，后者更是达到15个。如果考虑整个城市的总人口，则2020年人口达到5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为85个，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数已经超过全国总人口数的50%。

随着人口不断集聚和城市规模扩张，中国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引起关注。大量研究指出，大城市的发展会不断吸收周边城市的资本和劳动力，对其他区域产生虹吸效应。<sup>①</sup>这意味着，中心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区域与城乡差距，并“剥夺”其他地方尤其是小县城的发展机会。例如，珠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极高，是国内最大的几个城市群之一，但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较为突出。<sup>②</sup>一个好的城镇化模式选择，应当是在关注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即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农民福利。<sup>③</sup>基于此，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强化“大国小城”建设，推进以振兴县域经济为重点的城镇化，应该是现阶段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距、有效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2020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指出，县城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则强调：一方面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另一方面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由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等中心城市，县域经济有其自身的优势。县城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纽带，有利于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农民可以在打工的同时，兼顾农业生产，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并能够化解“留守儿童”“空槽老人”等农村社会问题。由于县城在空间上和农村更近，发展县域经济还可以通过外溢效应，达到壮大农村经济的目的，<sup>④</sup>缩小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差距。但从目前看，县域经济欠发达、公共基础差、吸收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依旧突出，如何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无论是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还是以县域为导向的路径选择，都存在各自优缺点。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两种城镇化路径选择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中心城市的发展如何影响县域经济？或者说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何种情况下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难以简单地概括为虹吸效应或者溢出效应，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识别其在怎样的情境下表现为虹吸效应，在何种情况下表现为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国2000—2020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分析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之谜。

## 二、文献与分析线索

实现经济发展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

---

① 丁任重、许渤胤、张航：《城市群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吗？——基于7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21年第5期。

② 李尚蒲、罗必良：《地方政府竞争：财政赤字扩张及其攀比效应——来自县域的证据》，《学术研究》2015年第9期。

③ 罗必良、洪炜杰：《城镇化路径选择：福利维度的考察》，《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9期。

④ 罗必良、耿鹏鹏：《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斯丽娟、曹昊煜：《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经济增长的源泉。新古典学派则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基于边际报酬递减假设,生产要素会在市场力量的诱导下,自发流向报酬更高的地方,激发落后地方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实现经济的追赶,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不过, Lucas 对美国和印度进行分析发现,印度资本的边际报酬是美国的 58 倍,但这并没有吸引全球的资本流向印度,相反,更多的资本都是流向边际报酬率更低的美国,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悖论”。<sup>①</sup>“卢卡斯悖论”说明,简单地依靠看不见的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此,经典理论忽视了空间因素的影响。增长极理论考虑了空间因素,<sup>②</sup>并强调政策干预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优先将资源集中发展培育若干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各地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增长极的理论逻辑,通过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或者中心城市,发展本省的经济。国家发改委提出的《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强调了优化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重点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江苏、山东、江西、广西、海南、黑龙江等省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都提出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的战略部署。<sup>③</sup>

关于发达地区如何影响相对落后地方经济发展,经典理论仍然存在争议。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根据生产活动所处的阶段不同,将区域分成不同的梯度地区,并认为随着生产周期的变化,生产活动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因此加快发达地区的发展,推动产业和要素向落后地区转移,能够最终实现落后地区经济的增长。“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则认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会产生两种效应,即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sup>④</sup>前者指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周边地区流动,实现周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后者意味着,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会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集中,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Williamson 综合上述两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相对强弱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地区间的差距不断变大,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散效应占主导力量,地区间经济的发展将会收敛。<sup>⑤</sup>

国内研究则强调区域发展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但实证方面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发展对于周围城市具有溢出效应。例如,丁任重等基于城市群的研究发现,核心城市的经济水平越高,竞争力越强,则城市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就会越明显。<sup>⑥</sup>包群等利用 1994—2006 年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建设开发区对相邻城市的影响发现,开发区密度越高,相邻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外资水平和就业率都会越高。<sup>⑦</sup>但也有研究指出,中心城市扩张对周边区域存在虹吸效应。柳卸林等利用 2004—2018 年全国 31 个中心城市和 248 个非中心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对同一个省份的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sup>⑧</sup>周密则指出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因虹吸效应过度强烈而形成极化区。<sup>⑨</sup>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研究发现,随着中心城市的类型及发展阶段不同,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影响

---

① Richard E. Lucas,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2, 1990, pp.92-96.

② François Perroux,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4, no.1, 1950, pp.89-104.

③ 吴传清、孟晓倩:《虹吸还是溢出?——“强省会”战略的经济增长极效应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④ 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年;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

⑤ Jeffrey G. Williams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vol.13, no.4, 1965, pp.1-84.

⑥ 丁任重、许渤胤、张航:《城市群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吗?——基于 7 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21 年第 5 期。

⑦ 包群、张杨、唐诗:《经济开发区、辐射效应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国际商务研究》2015 年第 6 期。

⑧ 柳卸林、王宁、吉晓慧等:《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中国软科学》2022 年第 4 期。

⑨ 周密:《“极化陷阱”之谜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学家》2009 年第 3 期。

是不同的。如吴传清和孟晓倩利用 2009—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资源聚集程度和首位度较低的省会城市发展对于周边城市的经济存在促进作用,但资源集聚程度和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发展反而会抑制周边城市经济增长。<sup>①</sup>周圣强的研究表明,工业城市增长极效应会不断地集聚人口和产业,形成经济的集聚中心,从而对周边城市形成虹吸效应。但当要素过度集中时,“拥挤效应”就会出现,反而对周边城市表现为溢出效益。<sup>②</sup>

关于中心城市究竟如何影响周边城市,已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而针对中心城市经济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讨论更相对缺乏。从经济相对发达程度看,中心城市与县域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根据“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中心城市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可能同时存在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在虹吸效应下,中心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要素报酬要高于农村,在报酬差异的驱动下,县域要素不断地向中心城市集中。Lewis 和 Todaro 等人在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时候就发现,城乡劳动力报酬之间的差异会诱导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部门流动,直至工资差异被抹平。<sup>③</sup>他们的模型还强调,劳动力的流动同时还会受到迁移成本的制约,迁移成本越高,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会越小。从该角度看,随着中心城市和县域之间初始经济差距增大,虹吸效应会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随着空间距离拉大,虹吸效应则会变得弱化。在溢出效应下,随着资源要素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要素拥挤所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将超过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城市发展成本不断攀升,在中心城市的交易功能依旧稀缺的情况下,要素将沿着交易中心向周边蔓延,寻求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更可能表现在临近的中小城市区域,其他远离交易中心的地方因生产成本下降难以弥补交易收益的损失而被排除在选择之外,即中心城市发展的虹吸效应会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而不断减弱。

综上,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两者的空间距离及经济差距,随着空间距离变大,中心城市发展对县域经济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都在减弱,而随着经济差距加大,虹吸效应会表现得更加强烈,溢出效应则减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溢出效应更多表现为资本的溢出,而资本具有依附于交易的特点,溢出效益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变远而迅速衰竭。因此,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大,中心城市发展对县域的虹吸效应更可能占主导地位。

###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有两个主要来源。县域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主要城市 GDP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局(不含港澳台地区)。本文还查询各县域和城市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来计算县域和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共收集 2000—2020 年 2545 个县域的面板数据。<sup>④</sup>由于存在部分核心变量缺失的情形,各计量模型的样本量会略有不同。

#### (二) 实证策略

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县(区、市)各年的生产总值,核心解释变量是临近中心城市的生产总值(GDP)。为衡量临近中心城市的 GDP,本文选出各年度各省份 GDP 位居前四的大城市,并分别计算这四大城市到该县域的空间距离,然后选择空间距离最近的城市作为该县域的临近中心城市(后文简

① 吴传清、孟晓倩:《虹吸还是溢出?——“强省会”战略的经济增长极效应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② 周圣强、朱卫平:《产业集聚一定能带来经济效率吗: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产业经济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③ W. 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22, no.2, 1954, pp.139-191; Michael P. 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9, no.1, 1969, pp.138-148.

④ 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域包括县、县级市以及由县或者县级市转化过来的区。



称“临近城市”)。显然,分析临近城市 GDP 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遗漏重要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各中心城市和县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仅与其自身的初始禀赋特征相关,而且也可能受到国家层面和省份层面的政策影响。为此,本文通过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来缓解上述问题。本文使用的模型如下:

$$gdp\_county_{it} = \alpha + \beta_1 GDP\_city_{i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gdp\_county_{it}$  是第  $i$  个县(区,市)在  $t$  年的 GDP;  $GDP\_city_{it}$  是该县域临近中心城市在  $t$  年的 GDP;  $u_i$  是县域的个体固定效应,用于衡量各个县域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包括初始禀赋、文化、地形等;  $\lambda_t$  是时间固定效应,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时间趋势,也衡量各个县域的共同外在冲击;  $\varepsilon_{it}$  是误差项。如果  $\beta_1$  的估计量在统计上显著大于零,这就说明临近中心城市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否则说明不存在显著影响或者存在负面影响。

为了分析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县域经济影响的动态效应,本文进一步构建以下模型:

$$gdp\_county_{it} = \alpha + \sum_{t=2001}^{2020} \beta_{1t} GDP\_city_{it} \times I(Year = t) + \theta GDP\_city_{i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Year = t)$  是示性函数,当括号内的条件成立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sum_{t=2001}^{2020} GDP\_city_{it} \times I(Year = t)$  代表一系列不同年份临近中心城市 GDP 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beta_{1t}$  代表第  $t$  年临近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如果  $\beta_{1t}$  的估计量显著为正,这就说明第  $t$  年临近中心城市经济总体上对县域经济表现为溢出效应。如果  $\beta_{1t}$  的估计量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第  $t$  年临近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总体上对县域经济表现为虹吸效应(以 2000 年的影响效应为基准组)。此外,为衡量临近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不同距离县域经济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gdp\_county_{it} = \alpha + \delta GDP\_city_{it} \times dist_{it} + \beta_1 GDP\_city_{it} + \beta_2 dist_{i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dist_{it}$  是该县域距离临近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空间距离通过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dist_{it} = \sqrt{(\text{long\_county}_{it} - \text{long\_city}_{it})^2 + (\text{Lat\_county}_{it} - \text{Lat\_city}_{it})^2}$$

其中,  $\text{long\_county}_{it}$  是该县的经度,  $\text{long\_city}_{it}$  是该县对应的临近中心城市的经度,  $\text{Lat\_county}_{it}$  是该县的纬度,  $\text{Lat\_city}_{it}$  则是对应中心城市的纬度。显然,如果  $\delta$  和  $\beta_1$  的估计量同时为正,这就说明临近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随着距离变远而强化;如果  $\delta$  的估计量为负,而  $\beta_1$  的估计量显著为正,这就说明临近中心城市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随着距离的延长,溢出效应逐渐减弱,甚至表现为虹吸效应,以此类推。

为分析临近中心城市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县域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gdp\_county_{it} = \alpha + \varphi GDP\_city_{it} \times gap_i + \beta_1 GDP\_city_{i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gap_i$  是 2000 年  $i$  县域 GDP 和临近城市 GDP 的比值。该比例越大,说明初始的经济差距越小。如果  $\varphi$  的估计量显著为正,这就说明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该县域的辐射作用越大。由于  $gap_i$  是非时变变量,其一次项的影响效应会被县域固定效应所吸收。

#### 四、实证结果及其讨论

##### (一) 临近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表 1 分析了全国的省内临近中心城市 GDP 如何影响县域 GDP,其中,模型 1—1 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临近城市 GDP,模型 1—2 控制县域固定效应,模型 1—3 进一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考虑模型依旧可能存在时变变量导致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模型 1—4 进一步控制县域的行政区域面积、年末人口总数、规模以上企业数、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变量。结果显示,4 个模型中临近中心城市 GDP 的系数都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总体上临近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临近中心城市 GDP 每增加 1 元,则县域 GDP 会增加 0.015—0.031 元。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于县域经济可能存在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从估计结果看,现阶段中心城市对于县域经济在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进一步利用模型（2）分析中心城市经济对县域经济的动态影响效应。如图 1 所示，相对于 2000 年，2001 年和 2002 年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县域经济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随着时间推移，溢出效应逐渐显著且不断提高，即中心城市经济的增长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有意思的是，中心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会随时间呈现边际递减的特征。总体来说，直到 2020 年，中心城市对于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依旧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相反，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

（二）临近中心城市、空间距离与县域经济发展

进一步讨论临近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如何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如表 2 所示，模型 2—1 加入空间距离变量，模型 2—2 进一步加入临近中心城市 GDP 和空间距离的交互项，模型 2—3 和模型 2—4 分别在模型 2—1 和模型 2—2 的基础上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加入空间距离之后，临近中心城市 GDP 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空间距离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距离城市越远，县域的 GDP 越低，经济表现越差。从模型 2—4 看，交互项的系数为 -0.015，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会不断降低。按照本文数据，平均而言，当空间距离超过 2.73 个经纬度时，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对县域经济产生虹吸效应。另外，模型 2—4 的空间距离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临近中心城市的 GDP 很低时，距离该城市越远的县域的 GDP 越高。上述结果表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对周边和边远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更可能表现为溢出效应，而对边远县域表现为虹

（三）临近中心城市、经济差距与县域经济发展

表 3 讨论的是临近中心城市 GDP 如何影响具有不同经济差距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型

表 1 临近中心城市 GDP 对县域 GDP 的影响

变量	县域 GDP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临近城市 GDP	0.031*** (0.001)	0.034*** (0.001)	0.022*** (0.001)	0.015*** (0.001)
行政区域面积				-0.000 (0.000)
年末总人口				2.769*** (0.218)
规模以上企业数				0.564*** (0.027)
农业机械总动力				0.206*** (0.052)
县域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5681	45661	45661	35056
R <sup>2</sup>	0.217	0.752	0.768	0.859

注：\*\*\* p < 0.01，\*\* p < 0.05，\* p < 0.1，括号内是考虑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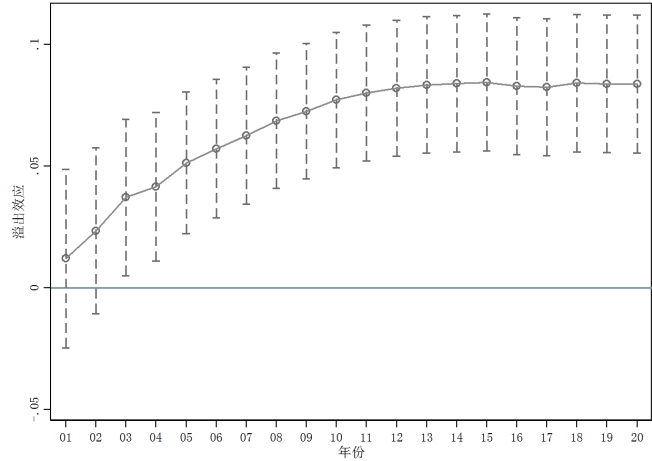


图 1 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动态过程

吸效应。另外，模型 2—4 的空间距离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临近中心城市的 GDP 很低时，距离该城市越远的县域的 GDP 越高。上述结果表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对周边和边远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更可能表现为溢出效应，而对边远县域表现为虹

表 2 临近城市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变量	县域 GDP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临近城市 GDP	0.030*** (0.001)	0.050*** (0.001)	0.023*** (0.001)	0.041*** (0.001)
空间距离	-24.35*** (0.544)	1.174* (0.700)	-15.50*** (1.285)	2.373** (1.090)
临近城市 GDP × 空间距离		-0.016*** (0.001)		-0.015*** (0.000)
县域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5681	45681	45661	45661
R <sup>2</sup>	0.240	0.312	0.769	0.795

3—1 加入临近城市 GDP 和经济差距的交互项，<sup>①</sup>交互项的系数为 0.548，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县域和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缩小，溢出效应变大。模型 3—2 进一步加入空间距离交互项，结果显示，“临近城市 GDP×经济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临近城市 GDP×经济差距×空间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心城市对经济差距小的县域的溢出效应

表 3 中心城市发展、经济差距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变量	县域 GDP	
	模型 3—1	模型 3—2
临近城市 GDP	0.004*** (0.001)	0.007*** (0.002)
临近城市 GDP×经济差距	0.548*** (0.034)	0.779*** (0.049)
空间距离	-28.84*** (2.008)	-5.806** (2.333)
临近城市 GDP×空间距离		-0.002** (0.001)
经济差距×空间距离		49.75* (25.69)
临近城市 GDP×经济差距×空间距离		-0.253*** (0.017)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9372	39372
R <sup>2</sup>	0.850	0.881

更加明显，但随着空间距离加大，溢出效应会不断减弱。因此，对于边缘县域，即使一开始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不大，也难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溢出效应。

### 五、进一步讨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之谜

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多数省份采用的发展策略，但却可能埋下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隐患。广东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广东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粤东西北地区在全省经济总量份额的比重，已经从 1978 年的 47.5% 下降到 2021 年的 19.12%，珠三角城市的经济份额却不断攀升。《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1 年，广东由 57 个县（市）组成的县域经济，以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71.74%、户籍人口的 46.71% 以及常住人口的 28.15%，仅产出全省 GDP 总量的 12.49%。<sup>②</sup>珠三角城市对周边地方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导致广东县域尤其是沿边县域的经济发展不足。

#### （一）一个特别观察：沿边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一般来说，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往往来源于人们进行横向对比所构成的心理认知。同样，相邻省份沿边县域的比较，也是判断发展质量及共同富裕成色的重要参照系。为此，本文专门讨论广东的沿边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广东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交界的沿边县域共有 27 个（其中，与福建相邻的县域有 5 个，与江西相邻的县域有 9 个，与湖南相邻的县域有 7 个，与广西相邻的县域有 9 个）。<sup>③</sup>沿边县域发展滞后，或许是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最大痛点。从表 4 的人均 GDP 对比可以发现，广东沿边县域在 1990 年的人均 GDP 均要明显高于周边省份相邻的县域。但到了 2021 年，福建、江西与广东相邻的县域人均 GDP 已经明显高于广东对应县域，广东相对于湖南的优势也正在弱化，而相对于广西的优势却没有明显拉大。这意味着，广东的沿边县域经济增长在总体上要滞后于其他相邻省份。进一步的数据表明，2021 年广东沿边县域仅占全省 GDP 总量的 4.69%。这意味着沿边县域在广东经济发展格局中有不断被边缘化的态势。

表 4 广东与周边省份相邻县域人均 GDP 比较

年份	粤闽沿边县域 GDP（元）			粤赣沿边县域 GDP（元）		
	广东（5 县）	福建（5 县）	广东 / 福建	广东（9 县）	江西（7 县）	广东 / 江西
1990	1131	853	1.33	958	918	1.04
2021	41125	83637	0.49	35187	48609	0.72
年份	粤湘沿边县域 GDP（元）			粤桂沿边县域 GDP（元）		
	广东（7 县）	湖南（5 县）	广东 / 湖南	广东（9 县）	广西（7 县）	广东 / 广西
1990	1168	754	1.55	1145	858	1.33
2021	45422	39281	1.16	43224	30928	1.40

① 经济差距以 2000 年县域经济与临近中心城市经济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越大说明两者经济差距越小。

② 不同的是，浙江与江苏的同一指标在 2020 年分别高达 42.09% 和 42.59%。这表明，广东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

③ 其中，平远、仁化和连山均与 2 个省接壤。另外，梅县于 2013 年撤县设区，但为了保证 1990 年和 2020 年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文依旧保留梅县。



(二) 中心城市、空间距离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

前文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和县域的经济差距大、空间距离远等因素,均会抑制中心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从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从表5的模型4—1可发现,广东临近中心城市GDP的系数为-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全国普遍的情形不同,广东中心城市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负向影响,即全国层面的溢出效应大于虹吸效应,而广东的虹吸效应要大于溢出效应。

从模型4—2可发现,临近中心城市GDP的系数为0.00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临近中心城市GDP和空间距离的交互项系数为-0.007,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个估计结果和前文的模型2—4类似,即中心城市经济对周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大,却逐渐转变为负向作用,从溢出效应转化为虹吸效应。不同的是,溢出效应转为虹吸效应的空间距离更小,当空间距离超过1个经纬度时,广东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就会对县域经济表现为虹吸效应。模型4—3、模型4—4的估计结果分别和前文的模型3—1和模型3—2类似。这表明,广东中心城市经济对于经济差距相对较小的县域同样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且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大,溢出效应逐渐变小,转为虹吸效应。

(三) 对广东县域及沿边县域的比较分析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不足尤其是沿边县域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虹吸效应。其中的逻辑是,广东县域和中心城市的经济初始差距更大,或者县域距离其临近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更远。

表5 广东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变量	县域 GDP			
	模型 4—1	模型 4—2	模型 4—3	模型 4—4
临近城市 GDP	-0.009*** (0.002)	0.007*** (0.002)	-0.010*** (0.001)	-0.013*** (0.002)
临近城市 GDP × 经济差距			0.482*** (0.043)	0.717*** (0.041)
空间距离		-47.57 (58.79)	-428.9*** (70.99)	203.9*** (76.39)
临近城市 GDP × 空间距离		-0.007*** (0.001)		0.004*** (0.001)
经济差距 × 空间距离				-4863*** (921.1)
临近城市 GDP × 经济差距 × 空间距离				-0.200*** (0.018)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509	1509	1493	1493
R <sup>2</sup>	0.827	0.836	0.915	0.945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表6中的模型5—1利用2000年全国县域的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广东省县域(在广东省的县域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和空间距离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20,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省份,随着空间距离加大,广东县域经济占临近中心城市经济的比重下降更快。模型5—2利用广东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省内其他县域,沿边县域和临近中心城市经济差距更大。模型5—

表6 广东县域的经济差距和空间距离

3用2000年全国县域的数据分析发现,广东县域和临近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要显著远于其他省份。模型5—4用广东和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的县域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广东县域到最近中心城

变量	经济差距		空间距离	
	模型 5—1	模型 5—2	模型 5—3	模型 5—4
空间距离	-0.008*** (0.001)			
广东省县域	0.021 (0.023)		0.239** (0.106)	0.510*** (0.109)
广东省县域 × 空间距离	-0.020* (0.011)			
沿边县域		-0.029* (0.015)		
观测值	1912	75	2545	434
R <sup>2</sup>	0.026	0.040	0.001	0.064

市的距离要显著高于其他省份约 0.510 个经纬度。

总体来说，表 6 的估计结果说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可能原因在于，县域在初始阶段就和中心城市经济差距更大、空间距离更远。相对于其他省份主要城市地理位置的相对分散，广东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基本都集中在珠三角，这无疑会加大县域与发达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中心城市发展的溢出效应难以覆盖。在要素报酬率落差的作用下，县域的生产要素不断向珠三角集中，进一步抑制了县域经济发展，导致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广东沿边县域在空间上距离珠三角最远，初始经济发展也最滞后。因此，如果本文前述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沿边县域将可能出现极化现象，与其他地方经济发展差距将不断被拉大。如图 2 所示，从 2006 年开始，广东沿边县域和其他县域的经济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总而言之，初始经济差距过大使得广东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主要表现为虹吸作用，且在空间距离的作用下，虹吸效应不断得到强化，这导致广东边远县域和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随着珠三角地区城市集聚程度加强，广东中心城市与县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沿边县域出现发展不足及边缘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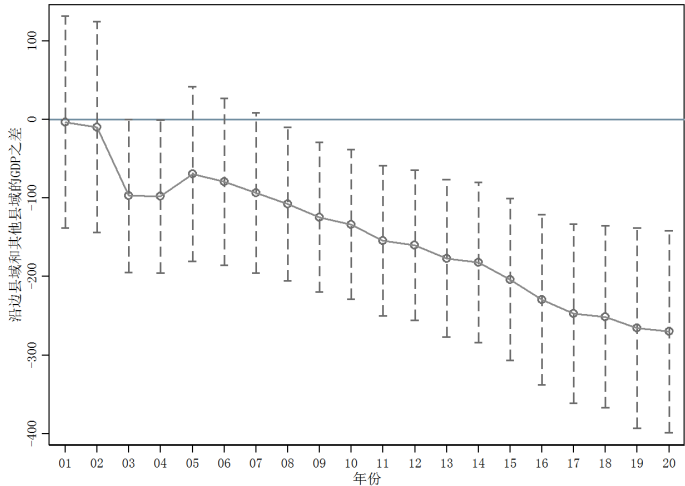


图 2 广东沿边县域和其他县域的 GDP 差距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在支撑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关注于县域经济发展，强调县域经济在实现农民就近就业、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挖掘区域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重要性。然而，鲜有研究讨论中心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心城市经济在何种情况下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话题。基于此，本文利用全国 2000—2020 年县域和主要中心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经济的增长能够显著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转变为虹吸效应。（3）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表现为溢出效应，转而对边远县域表现为虹吸效应。（4）中心城市发展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甚至转变为虹吸效应。（5）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县域和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初始经济差距过大、空间距离过远。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发展中心城市经济和发展县域经济之间并不冲突，相反，中心城市的发展总体上对于县域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关键问题不在于中心城市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城市群区位的分布状态是否合理。城市群分布的过度集中，使得中心城市对边远县域的虹吸效应过强而溢出效应不足，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第二，在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作用下，边缘县域以及过于落后的县域可能会陷入极化陷阱而难以发展。应加强对此类县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一方面，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培养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产业和工业产业；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发达地区国家级与省级经济开发区（及各类产业园区）对沿边县域经济园区进行对口帮扶共建，提高县域的工业化水平，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责任编辑：张 超

# 电商下乡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

## ——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评估<sup>\*</sup>

魏下海 曾晨语 余玲铮 李 丁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下乡能否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自2014年起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结合中国家庭微观数据,在县级层面考察电商下乡对农村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电商下乡能显著缓解当地农户相对贫困,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电商下乡能通过增加低收入农户的综合收入、扩大农村就业和兼业数量来减缓农村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显示,享受明显电商下乡红利的农户往往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或人口稠密地区,具有健康贫困、抚养比低的特征。

**[关键词]**电商下乡 相对贫困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62.4; F323.8; 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107-08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信息流向农村汇集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等要素资源。其中,农村电子商务作为现代农业销售端的重要载体,能促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sup>①</sup>打造农村电商产品品牌,增加农民经营收入,焕发农业生产新活力,提供乡村振兴新动力。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建设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消除农产品市场壁垒,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发展全国农产品市场。为贯彻落实这一意见,财政部和商务部于2014年公布《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通知》,选取部分县区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旨在更大范围地推广农村应用电子商务,完善农村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农村流通现代化。近年来,在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中,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工作更是被频繁提及。2018—2019年,国务院在先后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政策文件中均强调,要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加强农商互联和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打通“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畅销渠道。2021—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先后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政策研究”(23AJY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魏下海,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21);曾晨语,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余玲铮,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福建 泉州,362021);李丁(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611130)。

<sup>①</sup> Lijie Fang, Chien-Chung Hua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Jingdong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 Public Policy*, vol.12, no.4, 2020, pp.386-396.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明确要深化农产品电商发展，深入实施“数商兴农”。

电商下乡和相对贫困治理的行动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均为缓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就两者关系而言，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成为促进农户增收的强大动力，存在缓解农民相对贫困、重塑农户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政策评估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 年的微观数据，在县区层面研究电商下乡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制，为农村数字革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覆盖全国多个省市、具体到县区层面的微观经验证据。

## 一、文献回顾与机制阐述

### （一）文献回顾

Fuchs（1967）首次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认为如果将贫困定义为拥有的比别人少得多，那么减少或消除贫困实际上就是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sup>①</sup>因此，一些文献常常聚焦于底层收入分配研究数字革命的经济后果，认为包括农村电商在内的数字革命在低收入地区、家庭、群体中具有更为可观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有助于推动包容性增长。<sup>②③</sup>具体而言，穷人在电商下乡的新一轮农村数字革命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一些文献基于中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发展能显著推动县级经济增长，降低县区贫困发生率，同时促进相对贫困村庄的底层收入增长，全面助力乡村振兴。<sup>④⑤⑥</sup>此外，互联网电商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应用有助于消除区域数字鸿沟，催生新型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sup>⑦</sup>

然而，也有小部分文献对农村数字革命持有相反态度。这类文献主要认为，由于农户之间存在信息利用能力差异，农村数字技术接入总体上会加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具体而言，数字革命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尚未跨过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其内部收入差距将随着数字革命的不断深入而持续扩大。<sup>⑧⑨</sup>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1）现有文献虽然对农村电商的数字革命于当地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达成统一共识，但对其导致收益公平共享还是产生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仍存有争议，且少有文献就农村电商与相对贫困的话题展开研究；（2）纵使有文献证实电商下乡产生的增收效果和就业机会，但鲜有文献分析电商兴农的机制路径；（3）现有关于农村数字技术缓解相对贫困的文献，大多基于国家、省级或城市层面，少数来自村级的微观数据大多局限于某个省市，覆盖全国的微观经验证据有待补充。有鉴于此，本文围绕电商下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供电商兴农在全国县区层面的微观经验证据。

① Victor Fuchs, “Redefining Poverty and Redistributing Income”, *The Public Interest*, vol.8, no.14, 1967, pp.88-95.

② Ewa Lechman, Magdalena Popowska, “Harnes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or Low-Income and Lower-Middle Income Countri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46, no.6, 2022, 102313.

③ Xuan Leng, “Digital Revolution and Rural Family Incom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94, 2022, pp.336-343.

④ 王奇、牛耕、赵国昌：《电子商务发展与乡村振兴：中国经验》，《世界经济》2021 年第 12 期。

⑤ 赵绍阳、周博、周作品：《电商发展能降低贫困发生率吗？——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证据》，《统计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⑥ Chao Peng, Biao Ma, Chen Zhang,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Commerce: Village Involvement and Demonstration Policie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vol.20, no.4, 2021, pp.998-1011.

⑦ Yanyan Gao, Leizhen Zang, Jun Sun, “Does Computer Penetratio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42, no.5, 2018, pp.345-360.

⑧ Lianying Yao, Xiaoxiao Ma, “Has Digital Finance Widened the Income Gap?”, *PLoS ONE*, vol.17, no.2, 2022, e0263915.

⑨ Youxue Jiang, Mei Shi, “How Digital Finance Affects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280 Cities in China”, *PLoS ONE*, vol.17, no.5, 2022, e0267486.

## (二) 机制阐述

1. 促进农户增收机制。相比收入较高的农村家庭，低收入农户更多地从事小规模的生产经营（Leng, 2022）。然而，由于农产品大都具有区域性、季节性和易腐性的特征，农村小规模经营户通常难以从多环节、高成本、强损耗、低效率的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中获利，<sup>①</sup>从而更易陷入相对贫困。对此，电商下乡搭建的数字平台恰能提供相应的破解之道。农产品电商能够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产销的直接对接（Fang and Huang, 2020），使小农户摆脱中间商的桎梏，有效改善农产品销售状况，切实促进家庭收入增长。<sup>②</sup>此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能够激发周边产业的活力，拓宽当地居民的增收渠道，尤其促进先前经济机会匮乏的低收入农户的综合收入增长（Leng, 2022）。相应地，家庭农业、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综合增长有利于化解家庭贫困危机。<sup>③</sup>这种偏向于低收入阶层的增收效应又促使低等收入群体向中位收入群体靠近，有助于降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打破中国收入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且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相对贫困率下降。<sup>④</sup>

2. 扩大农村就业机制。由于初始财富积累不足的农村地区具有多劳多得特性，电商下乡缓解相对贫困的机遇更多地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就业便成为当地居民参与经济过程以提高自身福祉和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sup>⑤</sup>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和下岗农民工等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弱势社会群体而言，农村电子商务往往是最重要的就业资源。一方面，与电商活动导致劳动力需求缩减的担忧相反，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销售被证实有助于提高企业就业率和居民就业水平。<sup>⑥</sup>另一方面，电商下乡在政策扶持下迅速扩张，继而延伸农村电商产业链，带动快递、仓储等电子商务细分领域发展，扭转劳动力雇佣策略，催生诸如仓储业短期轮班的灵活运营模式，工人则会因为这种轮班时间的灵活变化而获得从事多份工作的机会。<sup>⑦</sup>简言之，电商下乡能够创造多种就业岗位，提供包容性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居民灵活就业。<sup>⑧</sup>此外，由于扩大就业是贫富差距明显地区反贫困的有效工具，增加正规就业和提高劳动质量是降低家庭贫困风险的重要渠道，<sup>⑨</sup>电商下乡产生的就业效应能相应地增强低收入群体的脱贫主动性，赋能相对贫困人群共享社会经济成果（Peng et al., 2021），从而不仅避免农村脆弱家庭陷入相对贫困，而且有助于低收入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状态。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利用商务部自 2014 年起历年发布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以下简称“电商下乡示范县”或“示范县”），<sup>⑩</sup>构建渐进 DID 模型研究电商下乡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① 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改革》2021 年第 4 期。

② Min Liu, Shi Min, Wanglin Ma, Tianjun Liu, “The Adoption and Impact of E-Commerce in Rural China: Application of an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83, 2021, pp.106-116.

③ 周迪、黄茂湘：《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 CFPS 数据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20 年第 2 期。

④ Guanghua Wan, Xiaoshan Hu, Weiqun Liu,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Miracle and Relative Poverty: Focusing on the Roles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68, 2021, 101643.

⑤ Audil Rashid Khaki, Mohi-ud-Din Sangmi, “Does Access to Finance Alleviat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SGSY Beneficiaries in Kashmir Vall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44, no.8, 2017, pp.1032-1045.

⑥ Tetiana Zatonatska, Olha Fedirko, “Modeling of the E-Commerc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in EU”, 201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Trends in Information Theory (ATIT), 2019, pp.304-308.

⑦ 秦芳、王剑程、胥芹：《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农户增收？——来自农村电商发展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2 年第 2 期。

⑧ Guangqin Li, Jiahong Qin, “Income Effect of Rural E-Commer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obao Villages in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96, 2022, 129-140.

⑨ Nguyen Ngoc Duc, Le Tin,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Head Labor Status and Worker Characteristics on Household Poverty: Evidence in Vietnam”, *Journal of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Research*, vol.9, no.3, 2022, pp.432-446.

⑩ Yong Qin, Yingfeng Fang, “The Effects of E-Commerce on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relative\_poverty_{ict} = \alpha + \beta ecommercet + \gamma X + \mu_i + \nu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1)$$

其中,下标*i*、*c*、*t*分别代表农户、县区、年份。被解释变量 *relative\_poverty<sub>ict</sub>* 表示 *t* 年 *c* 县 *i* 农户的相对贫困状态。解释变量 *ecommerce<sub>ct</sub>* 表示截至 *t* 年 *c* 县是否曾受电商下乡政策影响,其估计系数  $\beta$  反映电商下乡对当地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净效应。*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mu_i$ 、 $\nu_c$ 、 $\lambda_t$  分别为家庭、县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ct}$  为随机扰动项。

## (二) 变量识别

1. 被解释变量:农户相对贫困状态 (*relative\_poverty*)。相对贫困通常被描述为个人或家庭因社会分配不公平产生的一种相对剥夺感。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多数文献建议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 设定为农村相对贫困线。<sup>①②</sup> 考虑到相对剥夺感往往发生在特定群组之中,相对贫困通常存在典型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本文将县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 视为该县的相对贫困标准,并根据 CHFS 的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数据,将低于该标准的农户定义为相对贫困家庭,即 *relative\_poverty* 取值为 1,否则为 0。

2. 解释变量:电商下乡政策 (*ecommerce*)。参考易法敏等 (2021),<sup>③</sup> 根据商务部自 2014 年起历年公布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本文将进入过该名单的县区界定为示范县(处理组),从未进入过该名单的县区看作是非示范县(控制组)。进一步地,根据名单公布年度,本文将公布年之后年度的示范县界定为受电商下乡政策影响,此时 *ecommerce* 取值为 1;将非示范县、公布当年及之前年度的示范县均看作不受电商下乡政策影响,此时 *ecommerce* 取值为 0。

3.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现有文献,对户主、家庭、地区层面的多个特征变量加以控制,包括户主是否为男性 (*male*)、已婚 (*married*),户主年龄 (*age*);家庭人口规模 (*size*),家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究生的人数 (*low\_edu*、*mid\_edu*、*high\_edu*),家庭调查年度是否受政府补贴 (*subsidy*),家庭总资产的对数值 (*asset*);以县区夜间灯光数据衡量的经济活跃度 (*eco\_activity*),以城市政府一般预算内财政支出对数值衡量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infrastr*)。

## (三) 数据来源

除地区层面的经济特征数据外,各微观层面的数据均来自于 CHFS 数据库。考虑到家庭经济活动实际发生于调查年的上一年度(如家庭收入实则为上一年度取得的收入),本文将样本年份界定为 2012、2014、2016、2018 年。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集和 VIIRS 夜间灯光数据集的原始数据为 Harvard Dataverse 的栅格数据,本文将中国范围内的栅格数据合并处理、连续矫正后,转化为各区县的面板数据。城市财政收支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 (四) 均值检验

表 1 均值检验

表 1 通过均值检验描述政策前后示范县和非示范县的农户相对贫困差异。<sup>④</sup> 结果显示,在电商下乡政策实施前,示范县的相对贫困农户比非示范县显著多出 2 个百分点,

变量: <i>relative_poverty</i>	非示范县		示范县		示范县—非示范县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均值差异
政策实施前	3799	0.26	3302	0.28	0.02**
政策实施后	3791	0.21	3298	0.21	-0.01

注:\*\*\*、\*\*、\* 分别表示单边检验中均值差异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ounty Program”,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30, no.3, 2022, pp.161-186.

① 李莹、于学霆、李帆:《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算》,《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1 期。

② 汪三贵、孙俊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测量与瞄准——基于 2018 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3 期。

③ 易法敏、孙煜程、蔡轶:《政府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估——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经验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④ 根据样本数据,2014 年以后才有样本进入示范县代表的处理组。在 2014 年末电商下乡政策开始实施后,示范县样本截至 2016 年对全国电商下乡政策的诠释性超过 50%,到 2018 年其代表性更是接近 90%。这足以说明,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和示范县区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可以充分解释电商下乡的政策实施效果。



表明电商下乡示范县的农户更可能具有相对贫困的特征，彰显出该类县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电商下乡政策实施后，两组的相对贫困农户规模均有一定程度减少，且示范县的减少程度更大，以至政策实施后两组的相对贫困农户规模差异不显著。可见，电商下乡政策实施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正相关，但二者的因果关系还有待实证检验。

三、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第 (1) 列仅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电商下乡可以显著降低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第 (2) 列加入户主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发现电商下乡对当地农户相对贫困的负效应进一步增大，显著水平也有所提升。第 (3) 列继续加入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发现电商下乡对当地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被进一步放大，且仍保持高度显著性。具体地，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农户相对贫困状态	(1)	(2)	(3)
$ecommerce_{ct}$	-0.0283*(0.0146)	-0.0293**(0.0144)	-0.0328**(0.0145)
控制变量	无	户主、家庭层面	户主、家庭、地区层面
年份、家庭、地区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409*** (0.0016)	0.5577*** (0.0657)	1.3359** (0.6414)
样本量	14190	14190	14190
adj. $R^2$	0.103	0.117	0.117

注：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下同。

以第 (3) 列为例，受电商下乡政策影响，当地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比非政策影响县区显著降低 0.0328。结合全样本均值 (0.238) 来看，其缓解效应高达 13.78%，相对贫困治理效果十分可观。相较现有文献，本文从纾解相对贫困的角度确认了电商扶贫的政策效果，核心结论吻合王奇等 (2021) 关于电商示范项目促进中国乡村振兴的观点，并与赵绍阳等 (2023) 关于电商下乡政策降低县区贫困发生率的研究发现相互印证。在控制变量中，高等学历成员增多、受政府补贴、资产积累丰富的农村家庭更不容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与经济学直觉或现有文献结论保持一致。<sup>①</sup>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时间趋势图适用于对期数较少的 DID 模型进行平行趋势事前检验。图 1 表明，在电商下乡政策实施前，两组县区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趋势基本平行。政策实施后，两组相对贫困率虽均呈下降趋势，但处理组县区的减贫幅度明显大于控制组，以至处理组 2018 年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低于控制组。综上，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且示范县相对于非示范县的相对贫困缓解很可能是由电商下乡政策诱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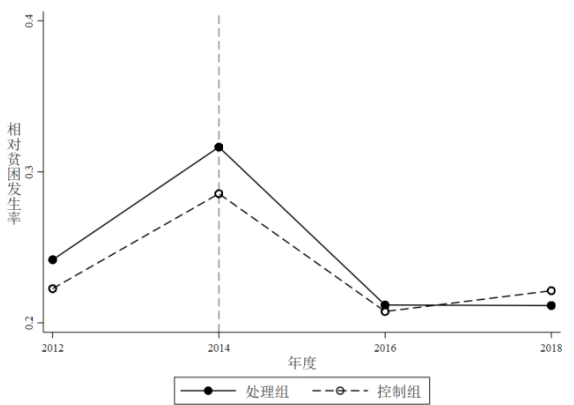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图 2 为政策分组随机打乱 1000 次后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系数基本满足正态分布，均值为 0.0002，与基准回归结果 (-0.0328) 有明显差异。这说明，随机设置电商下乡政策影响地区和时点，反而会使电商下乡成为农户相对贫困的致因，从反事实的角度验证电商下乡的相对贫困治理效果。同样地，t 估计值基本满足正态分布，其均值 0.0101 与基准回归 (-2.2621) 相差甚远，进一步证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不受随机因素的干扰，通过安慰剂检验。

3.PSM-DID。为缓解准自然实验中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

<sup>①</sup> 由于篇幅限制，已将表内控制变量结果略去，不在此过于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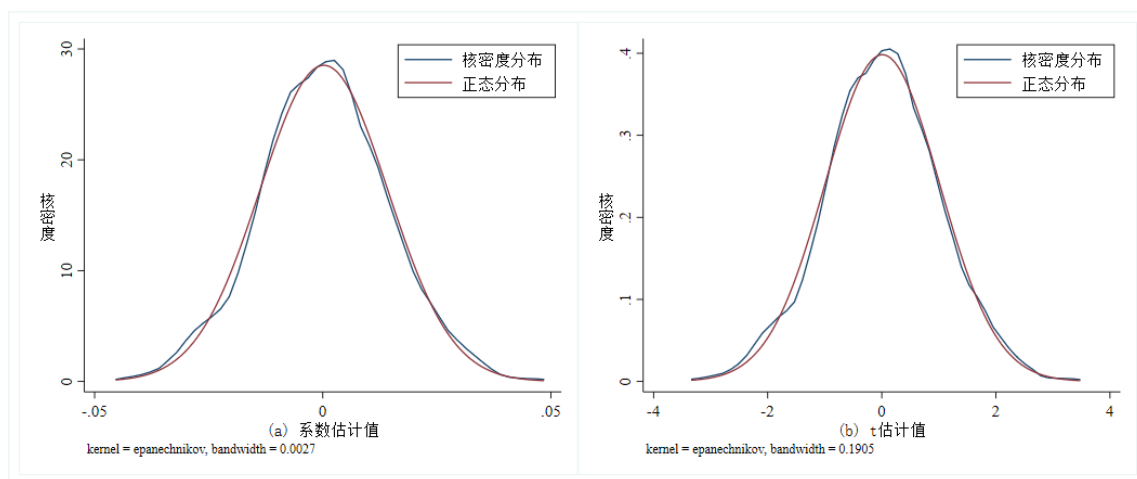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用PSM-DID方法(1:2逐年近邻匹配)对核心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后,电商下乡仍然能给农户带来显著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并且,PSM-DID方法下的系数估计值(-0.0315)与基准回归(-0.0328)几近相等,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证明本文核心结论是可靠的。

4. 控制并行政策。参考徐舒等(2020),本文将自2014年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TPA)控制在内。<sup>①</sup>表3第(2)列的结果显示,控制精准扶贫的并行政策影响后,即使电商下乡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0.0264)与基准回归相比(-0.0328)有所

表3 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	(1)	(2)
农户相对贫困状态	PSM-DID	TPA
$ecommerce_{it}$	-0.0315*(0.0189)	-0.0264*(0.0149)
TPA		-0.0267*(0.0155)
样本量	10919	14190
adj. $R^2$	0.230	0.118

注:本表中所有回归皆已控制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家庭、地区固定效应,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因篇幅限制不予列示,下同。

弱化,但其治贫效果仍然是毋庸置疑且不容忽视的。此外,精准扶贫政策也能显著降低当地

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并且其效果与电商下乡几乎不相上下。这说明,精准扶贫政策在消除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之外,也能带来缓解农户

相对贫困的意外之喜。

### (三) 机制检验

1. 促进农户增收。参考现有文献(周迪和黄茂湘,2020),本文将农户的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简称为“农工商业综合收入”)加总后取对数值,按照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0.75倍及以下、0.75—2倍、2倍以上划分低、中、高收入农户,<sup>②</sup>分样本检验电商下乡对农户综合收入的影响。表4前三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电商下乡仅对低收入农户产生显著且突出的增收效应,能使其农工商业综合收入显著增长40.05%。这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相互佐证,即农村电商发展和数字革命能赋予农村低收入家庭更为可观的收入增长效应(Leng,2022)。此外,由于农户享有的“电商红利”随着收入降级反而凸显,电商下乡产生的这种底层偏向性增收同时触及相对贫困的“贫困”内核与“相对”概念,<sup>③</sup>有助于农村内部收入分布从两极向中间收敛,从而促进农户间收入均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

2. 扩大农村就业。为验证电商下乡缓解相对贫困的就业效应,本文从就业数量和就业方式的视角,分别对电商下乡于农户就业率和多职成员数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表4后两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电商下乡不仅能够显著增加农民就业,还能促使就业者拥有超过一份的工作。具体来说,电商下乡使得当地农

<sup>①</sup> 徐舒、王韶、杨汝岱:《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sup>②</sup> 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75-176页。

<sup>③</sup> 杨立雄:《相对贫困概念辨析与治理取向》,《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户的家庭就业率显著上升 2.08%，使得从事至少两份工作、获得至少两份经济收入的家庭成员数显著增加 29.06%。<sup>①</sup> 这个结果从微观层面支持了以往文献关于电商发展积极影响就业与劳动市场的研究发现。<sup>②</sup> 此外，电商下乡通过为当地居民提供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促进多人多职就近就业，能够降低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成本，有助于重塑农村收入分配格局，减缓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sup>③</sup>

表 4 机制检验

	(1)	(2)	(3)	(4)	(5)
	因变量：Ln（家庭农工商综合收入）			因变量	
	低收入农户	中收入农户	高收入农户	家庭就业率	多职成员数
$ecommerce_{it}$	0.4005**	-0.0199	-0.1727	0.0208**	0.0390**
	(0.1993)	(0.2243)	(0.2878)	(0.0098)	(0.0160)
样本量	7339	2919	1307	14190	14190
adj. $R^2$	0.241	0.296	0.099	0.389	0.127

四、讨论：电商兴农的群体与地区异质性

（一）群体异质性

表 5 中 A1 的结果表明，电商下乡对户主健康的家庭作用不明显。但对健康状况不佳的户主而言，电商下乡可以“雪中送炭”，显著缓解其家庭相对贫困。这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较差的户主需要支付治病费用，且面临着就业挫折或失业困境，最终造成家庭收入损失，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增大。<sup>④</sup> 而农村电商能无差别地向农村居民提供丰富的经济机会，促进其社会资本与财富增长。<sup>⑤</sup> 相应地，对于原本遭受疾病歧视的农村居民而言，这种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能够有效缓解其相对贫困的窘境。

表 5 中 A2 的结果表明，零抚养比和无少儿抚养的家庭能更好地抓住农村电商发展的机遇以缓解相对贫困，而无老人抚养不会改善电商下乡的政策效果。这不难理解，相比于有养老金补贴或者至少能负担适量家务劳动的老人而言，更多的孩子意味着家庭需要养活更多的非生产性人口，少儿抚养甚至会占用一定劳动力，从而导致家庭人均收入的减少，<sup>⑥</sup> 阻碍农

表 5 电商兴农的群体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

因变量： 农户相对贫困状态	$ecommerce_{it}$ 系数	标准误	样本量	adj. $R^2$
A1 户主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不佳	-0.0723**	(-0.0337)	4103	0.059
健康状况良好	-0.0116	(-0.018)	8320	0.146
A2 家庭人口结构				
有少儿或老人抚养	-0.0287	(-0.0197)	9230	0.095
无少儿和老人抚养	-0.0610**	(-0.027)	4177	0.095
有少儿抚养	0.0073	(-0.028)	5330	0.096
无少儿抚养	-0.0404**	(-0.0188)	8140	0.118
有老人抚养	-0.0245	(-0.0262)	5333	0.077
无老人抚养	-0.0245	(-0.0192)	8221	0.124
B1 地区经济发展				
二线及以上城市	-0.0305	(0.0350)	3617	0.137
三线及以下城市	-0.0282*	(0.0165)	10573	0.111
B2 地区人口密度				
人口相对稠密县区	-0.0426**	(-0.0202)	7800	0.112
人口相对稀疏县区	-0.0256	(-0.021)	6314	0.128

注：在 A1 中，如果户主与同龄人相比，自评身体状况在一般及以上，则认为其健康状况良好，否则认为其健康状况不佳；在 A2 中，以国际上 0—14 岁的少儿抚养标准和 64 岁以上的老人抚养标准，界定家中是否有少儿或老人需要抚养；在 B2 中，若县区人口密度低于全省，则认为其是人口相对稀疏县区，否则为人口相对稠密县区。

① 在全样本中，每个家庭平均有 0.1342 个成员拥有一份以上的工作。因此，相比全样本均值，多职成员数的增长为 0.0390/0.1342=29.06%。

② Ju Li, “Open Sesame? The Paradoxical Development of C2C E-Commerce in China”,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53. no.2, 2021, pp.266-280.

③ 刘志忠、张浩然、欧阳慧：《乡村振兴下土地流转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视角》，《学术研究》2022 年第 8 期。

④ Chengchao Wang, Yuan Wang, Haiyan Fang, Bidan Gao, Zudeng Weng, Ying Tian, “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Remote Mountains of Southeast China from the Household Perspec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150, 2020, pp.793-810.

⑤ Yanliu Lin, “E-Urbanism: E-Commerce,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s in Urban China”, *Cities*, vol.91, 2019, pp.202-212.

⑥ François Libois, Vincent Somville, “Fertility, Household Size and Poverty in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vol.103, 2018, pp.311-322.



户享受电商下乡政策红利。在此情形下,如何把握电商下乡的机会,平衡少儿抚养压力和相对贫困窘境,是当地政府和农户自身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 (二) 地区异质性

本文参考 Liu and Zou (2020) 对城市分类的选择,按县区所在城市的发展水平分组后进行回归。<sup>①</sup>表 5 中 B1 的结果表明,仅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农户家庭中,电商下乡才展现出显著且相对大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这与现有文献的观点相互佐证,即作为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数字革命往往更偏向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发挥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 (Lechman and Popowska, 2022)。此外,本文对商务部历年发布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进行整理发现,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据了 92% 的示范县,二线城市所占比例仅为 5%,一线城市中更是没有示范县。这说明电商下乡政策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倾斜。

从集聚经济的视角,本文分样本检验电商下乡在紧凑型县区和分散型县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sup>②</sup>表 5 中 B2 的结果表明,电商下乡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果在人口相对密集县区显著且更大,在人口相对稀疏县区则不明显。一方面,紧凑型县区能够通过高密度发展促进集聚经济,促进资源利用,避免低效消耗土地资源。<sup>③</sup>在人口稠密县区,当地资源的充分利用能够凸显电商下乡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的效应。另一方面,类似、相关和多样化的空间集中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人口稠密地区的服务业往往更为集中,零工经济活动更为旺盛,<sup>④</sup>能对本地劳动力就业和获取经济机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降低当地相对贫困发生率。

## 五、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数字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趋势、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国情背景下,电商下乡是会促使经济机会和收益公平共享,重塑农户间收入分配格局,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还是产生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导致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现有文献尚未对此进行充分研究。本文利用 2013—2019 年的 CHFS 调查数据,在县区层面与自 2014 年起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相匹配,系统地分析电商下乡对当地农户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效应以及具体的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1) 电商下乡能显著减缓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2) 电商下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具体机制在于对低收入农户更加突出的增收效应,以及扩大就业规模、促进多岗位就业的就业效应;(3) 享受明显电商下乡红利的农村家庭的特点为户主健康状况不佳、无少儿抚养或零抚养比、处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或人口稠密县区。

根据主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中央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扶持效用,进一步巩固电商下乡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红利优势,走健康稳定的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二,政府应持续引导电商从业者与周边产业的协调发展,全方位拓宽农村居民的增收和就业渠道,确保各收入层级的农户共享经济机会和社会福利。第三,地方政府应对健康贫困、抚养比高的弱势家庭提供就业支持和财政补贴,鼓励家庭富余劳动力通过有偿劳动增强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充分利用电商下乡对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偏向性,尽量发挥紧凑型县区的集聚效应。

责任编辑:张超

<sup>①</sup> Xingchao Liu, Zhihong Zou, “Analysis on Urban Scal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latively Developed Cities”, *PLoS ONE*, vol.15, no.7, 2020, e0236593.

<sup>②</sup> 测算人口密度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WorldPop 的 1km 分辨率的栅格数据,本文将其整理为中国范围内的省、县级人口密度面板数据后使用。

<sup>③</sup> Yongling Yao, Haozhi Pan, Xiaoyu Cui, Zhen Wang, “Do Compact Cities Have Higher Efficienci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 Dynamic Panel Model with Compactness Indicators”, *Land Use Policy*, vol.115, 2022, 106005.

<sup>④</sup> Geraint Johnes, “The Gig Economy in the UK: A Reg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vol.10, no.3, 2019, pp.197-210.

历史学

#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sup>\*</sup>

田 澍

〔摘 要〕“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 73 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故。

〔关键词〕明神宗 张居正 晚明 晚明政治 皇权弱化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23) 11-0115-12

尽管“晚明”是明史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术语，但使用较为混乱。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把张居正去世的万历十年（1582）作为晚明的起点。如果此论成立，那首先得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幼主神宗的即位和张居正的病逝哪一个事件对神宗政治的影响更大？换言之，张居正去世所造成的政治震荡是万历初政的正常表现还是异常反映？如果说是正常表现，那就无关紧要；如果是异常反映，那就说明张居正根本没有尽到顾命辅臣之责，没有使已经 20 岁的神宗有能力正常行使皇权。换言之，张居正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英主”，未能完成穆宗的遗愿。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转移话题，一味地放大张居正“改革”成效和去世的负面作用，很少顾及张居正如何结束顾命时期的非正常状态。被张居正架空的神宗皇权需不需要恢复常态，这是认识万历初政的首要问题。只有以神宗即位后皇权的弱化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与晚明政治的关系和把握晚明政治的走向。

## 一、“晚明”：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

“晚明”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具有独特性，晚明史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在不同时代，学者根据自己面临的问题，各取所需，截取其中的一点或一个方面对晚明史进行不同的解读。如有的学者从亡国的角度来认识晚明，有的从政治腐败的角度来考察晚明，有的从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解析晚明，有的从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认知晚明，有的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晚明，有的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观察晚明，有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读晚明。正如高寿仙所言：晚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充

<sup>\*</sup> 本文系 2018 年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演变轨迹与经验教训”（2018-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甘肃 兰州，730070）。

满了张力和矛盾。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可以看到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既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又可以看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sup>①</sup>正是由于解读晚明的视角不同，故观点各异，认识不一。周明初就此论道：“晚明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晚明就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一般学术界把万历到明代灭亡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晚明时期。但是，晚明是不是就从万历元年开始，万历之前的某段时期，如隆庆时期和嘉靖后期算不算晚明时期？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因此，所谓晚明又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概念，它没有明确的时间断限。”<sup>②</sup>解扬亦言：“晚明是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时代，相信科学地深入其中的研究者都会感到头绪纷乱。不少概念工具用于研究现代社会尚能清晰有效，一旦用于解释晚明，研究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言不尽意，甚至文不对题的困惑。”<sup>③</sup>

晚明之“晚”，既指明朝政治腐朽、衰败之意，标志着当时皇权的弱化和政治的混乱；又指明朝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兴旺、蓬勃之意，代表着明朝的生机与活力。换言之，就是晚明政治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极不适应，互不匹配，政治上的腐败无能与具有新因素的社会转型形成了明显的错位。而晚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商业的空前繁荣、白银的大量流通与国家货币银本位的确立、工商业城镇的勃兴、消费的奢华、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以人性解放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实学思潮的兴起、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反应等全新的现象，与历史上各朝各代亡国时期的政治景观明显不同，故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并从多方面予以审视。如王天有认为：“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算起，到天启七年，仅仅四十五年。四十五年中，明王朝由振兴到衰微，进而趋于崩溃，国势急骤转变。东林党人顾允成在万历时已称‘天崩地陷’的时期已经到来。清代史家论及明朝衰亡时，也往往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可见这一时期是攸关明朝存亡的重要时刻。”<sup>④</sup>樊树志认为：“王阳明的大声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后，人才辈出……思想界流派纷呈，讲学之风盛行，互相辩驳诘难。有了这样的氛围，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播、弘扬，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世界的先进中国人。”<sup>⑤</sup>张春树、骆雪伦则认为：“晚明的社会经济变化给明代社会制度结构带来转变，同时转变的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态度。而且随着这些变化，属于明代社会的儒家基本构造的某些文化和道德操守也逐渐遭到破坏。”<sup>⑥</sup>

正是由于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晚明，故在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述这一特别而复杂的问题，而起始的时间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如沈定平用“明中叶以后”“明中叶后”“明末”“明朝末年”等概念来称呼正德以后的明代历史，将王阳明的“心学”与明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sup>⑦</sup>赵轶峰认为：“自明代中叶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知识分子普遍喜好游学、结社，至明末为最甚。但晚明党社中人，或以才学，或以道德相标榜，其所关切的实际仍是庙堂中事。”<sup>⑧</sup>周振鹤以“晚明”为大时段，“明末”为小时段，说道：“晚明社会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以至于个性解放成为文人的生活目标，因此许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头，而是走向大自然，走向气象万千的社会，将自己融合在天地人群之中，有人并且以己为宾，以自然与社会为主，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形成多种多样的、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这些游记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

① 高寿仙：《变与乱：明代社会与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3页。

②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③ 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第2页。

④ 王天有：《王天有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

⑤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页。

⑥ 张春树、骆雪伦：《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⑦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25-527页。

⑧ 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且越到明末，这类游记的数量越大。”<sup>①</sup>徐泓将“嘉靖至崇祯122年”称为“明代后期”，也称为“明末”。<sup>②</sup>巫仁恕将“晚明”与“明中叶以后”“明朝后期”“明季”混用，但通观全书，其所指的“晚明”应该是指嘉靖以来的明代历史。如言：“明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约当16世纪以后，各地的方志中都反映出平民服饰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改明初朴素守制的情形，而走向华丽奢侈，甚至逾越礼制。”<sup>③</sup>张显清在《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将明代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从洪武至天顺（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为前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时期；从成化至正德（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叶）为中期，是社会转型苗头出现时期；从嘉靖至明末（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为后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并明确指出：“在本书中，有时也将明中期称之为‘明中叶’，将明后期称之为‘晚明’。”<sup>④</sup>刘志琴明确指出：“晚明时期，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尤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sup>⑤</sup>陈宝良也说：“追溯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变动，尽管已经萌芽于明代中期，但还是以万历以后最为明显。”<sup>⑥</sup>王家范则认为“万历后期至崇祯末”是晚明时代。<sup>⑦</sup>高寿仙在梳理晚明研究后认为：“‘晚明’并非一个严格的断代概念，有人将其收得很窄，仅限于天启、崇祯两朝，也有人将其放得很宽，从成化、弘治一直延续到南明。较为通行的用法，是指万历至崇祯这一时间段。当然，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没有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晚明时代呈现的诸多现象和变动趋势，的确可以上溯到明代中叶，下延到清朝时期。”<sup>⑧</sup>但一味地上溯晚明的开始时间，并无多大意义。

在晚明史的早期研究中，主要聚焦于探究明朝亡国的原因。《明史》的作者认为：“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讎，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愆、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sup>⑨</sup>此论是否有理，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和不同解读。孟森认为：“神宗的怠政，是晚明政治败坏的根源，从万历十年起，神宗深居简出，和外廷隔绝，有几十年不上朝听政。”<sup>⑩</sup>李光壁论道：“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从万历十七年后就不上朝，在宫中吸食鸦片，纵情声色，直到万历四十三年才因为‘挺击’事召见群臣一次，以后仍旧不上朝。”他在描述“万历天启间的城市市民反抗矿税监的斗争和白莲教起义”时则使用“明末”或“晚明”，大概以万历二十年以后为开端。<sup>⑪</sup>韦庆远则明确指出张居正的去世标志着明朝政治进入混乱状态，说道：“如果说，隆万时期为期十多年的大改革运动，曾经扭转了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由治入乱的趋势，一度出现过由乱入治的兴旺前景，那么，自张居正死败，大改革运动戛然而止，各方面政策截然倒退，政局陷入混乱，又进入了由治入乱的恶性循环之中。”<sup>⑫</sup>神宗在位48年，万历前期又有所谓的“张居正改革”，故一些学者认为要说明朝“亡于神宗”，那只能说是亡于张居正之后的神宗时期，以便突出张居正功绩，否则就无法讲述“张居正改革”，

① 周振鹤：《晚明文人与旅游风气》，郑培凯：《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② 徐泓：《明代社会转型之一——以江浙为例》，郑培凯：《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第108-109页。

③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5页。

④ 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⑤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⑥ 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0页。

⑦ 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6页。

⑧ 高寿仙：《变与乱：明代社会与思想史论》，第333页。

⑨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神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4-295页。

⑩ 李文治：《晚明民变》，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页。

⑪ 李光壁：《明朝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5、148页。

⑫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59页。

更无法凸显张居正“改革家”的作用与地位。

假如“万历至崇祯”为晚明时期，那就必须搞清楚“万历”是指神宗称帝后的时代，还是改元后的时代。谢国桢将神宗即位至崇祯亡国划为明朝“已经由衰微逐步趋于崩溃”的阶段，认为“万历四十余年间，社会的情况，是由于统治者的‘好货成癖’贪婪无厌，就从暂时的小安，很迅速地转变为外患纷起，社会动荡极不稳定的局面”。<sup>①</sup>章铤认为党争是明亡的一大主因，“其祸要自居正当国始之”，“居正以前，言官所争者为公是非；居正以后，则所争者为私是非矣！”<sup>②</sup>黎东方也认为：“党争的根源，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张居正当国之时，把六部的实权归入内阁。张居正一死，六部便颇想从内阁手中，取回原有的实权。而六部之中，对内阁首当其冲的，便是吏部。”<sup>③</sup>司徒琳也认为：“这个首辅位置连对最柔顺谦和的在职者都是座烤炉，而且得随时充当皇帝过失的替罪羊。有谁试图经过那个公职向政府施加真正的影响，必受弹劾，理由不外是乘危篡取特权，或把皇帝引向堕落。的确，它就是首席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果断的行政改革由高涨到激起‘反行政机构’运动的同一理由，后者是由明末‘东林’社团所领导的。”<sup>④</sup>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认为，虽然在万历初年不存在成为东林党的团体，但是，“抵抗要把权力集中到内阁的张居正的势力逐渐形成，顾宪成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批判的是，张居正的夺情，以及张居正为了确认行政、财政改革而施行的考成法。”<sup>⑤</sup>尽管以上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将张居正与晚明政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明亡于万历”中的“万历”，既可以理解成万历时代，也可以理解为神宗时代。一般而言，人们将其理解为万历时代。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直言：“本书论述的晚明史，起自万历元年（1573年），迄止崇祯十七年（1644年）”，认为“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是加剧了自身内在矛盾，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sup>⑥</sup>何宗美也说：“晚明指从万历初年（1573）到崇祯末年（1644）这一历史时期，包括七十二年，它是明王朝在衰落中挣扎并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sup>⑦</sup>这些说法均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神宗即位的时间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而不是万历元年正月。很显然，将隆庆六年六月至十二月不计入神宗时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 二、“顾命”与“专擅”：张居正辅政的特点

以大历史观来认知某一时期的历史，在不割断历史联系的前提下，更应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但在具体研究中，可以根据某一关键事件来划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晚明而言，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晚明的历史特点，但首先必须要正视政治的因素。无论晚明呈现多么新奇的现象，必须承认的是，明朝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仍然是高度强化了了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能因为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或“市场经济萌芽”，或“早期工业化”，或“近代早期中国”，或“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等现象而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讨论晚明时代在局部或个别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是必要的，但不能以点概全，更不能无视政治因素的制约而津津乐道于晚明的“新气象”。

就社会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而言，明朝在正德时期即在建国150多年后亡国也是有可能的。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一结果，就在于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较为彻底的人事更迭，并在这一阵痛中扭转了衰亡的局面，使明朝在世宗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实现了重生。一些学者将嘉靖朝政治描绘成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对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和因此对明朝历史走向所产生的独特

① 谢国桢：《南明史略》，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6页。

② 章铤：《中华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29页。

③ 黎东方：《细说明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9页。

④ 司徒琳：《南明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引言》第10页。

⑤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涓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70-371页。

⑥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内容摘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⑦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而又积极的作用视而不见，其结果是既没有讲清楚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也没有搞明白所谓“张居正改革”的前因后果，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张居正施政的得失和晚明历史的走向。<sup>①</sup>事实上，张居正对嘉靖朝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指出严嵩因弄权而导致政治弊端丛生的同时，又在整体上肯定了嘉靖政治，并明确指出“孝莫大于尊祖”，再三表示自己要切实效法祖宗之制，“率由旧章”，明确说道：“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sup>②</sup>他曾严厉地批评非议祖制的言行，说道：“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者也。”在评价“二祖”（明太祖和明成祖）之后诸帝的作用与地位时，张居正特别突出了嘉靖皇帝的巨大影响，认为世宗“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飭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sup>③</sup>他还明确表示要效法世宗之行政，说道：“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继大统，将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sup>④</sup>谈迁就此论道：“张居正既柄政，慨然任天下之重，专尊主权，课吏实。尝言高皇帝真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深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法祖！”<sup>⑤</sup>

不可否认，张居正在万历十年的去世，绝对是影响万历政局走向的一件大事，但简单地将张居正与其生前的政治行为截然分开，并一再放大张居正去世的影响，则是值得商榷的。正是由于张居正十年的“专擅”，使亲政后的神宗力图洗刷其“顾命”政治的痕迹，并极力清除张居正的各种影响。王锡爵认为：“皇上天纵神明，近者事事惩张居正专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sup>⑥</sup>正由于此，由张居正亲自选任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也势必与张居正划清界限，力图消除顾命政治的历史痕迹，以开启神宗亲政的新局面。《明史》所谓张四维担任首辅时，“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故“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sup>⑦</sup>以及申时行“务为宽大”，“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sup>⑧</sup>凡张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sup>⑨</sup>等现象，就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申时行对此毫不掩饰，他在《张文毅公神道碑》中说道：

自江陵柄国，以刑名一切痛绳海内，其治若束湿，人心嚣然。既没，而亲信用事之人尚据要地，与权珰为表里，相与墨守其遗法，阁中议多齟齬不行。公燕居深念，间为余言：“此难以显争而可墨夺。今海内厌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宽大从事，而吾辈无深求刻责。”会皇嗣诞生，而公喜可知也，曰：“时不可失。”乃手疏，劝上宜以大庆施惠天下，省督责，缓征徭，举遗逸，恤灾眚，以养国家元气，而出诸司所拟宽条属余损益，凡数十事以进。上欣然命行之。<sup>⑩</sup>

张四维、申时行行政风格的遽变，既是其同张居正划清界限的必然选择，又是适应神宗亲政局面的必然要求。明人夏允彝所谓“继之辅政者，多避怨趋时，鲜能负荷”的批评显然不符合实情，但所谓“上既壮盛，明习庶事，不复委柄于下，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sup>⑪</sup>则有一定的道理。而《明经世文编》的编辑者认为申时行等人“尽反江陵之政者为身谋，非为国谋耳”<sup>⑫</sup>的说法，并没有考虑结束张居正顾

① 参见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7《谢召见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64页。

③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18《杂著》，第211、212页。

④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5《议外戚子弟恩荫疏》，第572页。

⑤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68，隆庆六年六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193页。

⑥ 《明神宗实录》卷267，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壬辰，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4969页。

⑦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9《张四维传》，第5770、5771页。

⑧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8《申时行传》，第5747页。

⑨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第5651页。

⑩ 申时行：《张文毅公神道碑》，张四维撰，张志江点校：《张四维集·条麓堂集》卷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872-873页。

⑪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8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第5154页。

⑫ 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54页。



命政治所必然带来的政治阵痛。

《明史》的作者极力贬损申时行等后继阁臣，试图要把他们与张居正区分开来。其言：“神宗之朝，于时为豫，于象为蛊。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墨避事。”<sup>①</sup>同时认为“四维等当轴处中，颇滋物议。其时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瞽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sup>②</sup>事实上，张四维、申时行等阁臣都是张居正一手挑选任用的，是张居正利用顾命身份组阁以维持自己“专擅”的产物。如果非要说是这些阁臣集体反水，那只能说明张居正用人失察，应对其严重失职进行反思，而不是一味地讥讽张四维等阁臣。万历十九年（1591），吏部尚书陆光祖对神宗说道：“自大学士张居正用事，阁臣进用，始有不由会推者，意在市恩蔑弃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sup>③</sup>从张居正夺得首辅之后，“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听居正底指挥。”对于张居正选用的阁臣，朱东润做了很有意义的考察，认为善于“潜伏”的张四维于万历三年（1575）入阁后，表面上对张居正恭谨谦顺，使张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但张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其实只是居正底一条尾巴。在这一点，居正和四维成立一种默契。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许可以遵守这个默契，并不感觉痛苦；才华的人如张四维，便完全两样了。他遵守这个默契，但是心里却充满怨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底恭谨，只能增加他底仇视。这便成为居正身后，四维极力报复底张本。”<sup>④</sup>为何张居正如此招人痛恨？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sup>⑤</sup>所以，在考察申时行等人的政治行为时，不能将其与张居正截然分开，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谢国桢所谓“继任张居正的首辅，像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想尽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养成自己的势力”，<sup>⑥</sup>看到的只是张居正顾命和神宗亲政两个不同时期首辅权势的不同表现状态，申时行等首辅权势的明显弱化是神宗亲政后的必然要求，他们不可能拥有张居正式的“专擅”，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张居正。

当然，神宗亲政后的行政并非一无是处，就其本意来说，他试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如神宗起用被张居正长期排斥的清官海瑞并为刘台等人平反，就是向天下昭示自己惩治腐败和纠正冤案的决心，也是在表示对张居正执政时政治腐败和专权的不满。但总体而言，神宗未能弄清清算张居正的真正目的，既没有详细的清算内容，又没有可控的清算范围。所以，在清算张居正时，势必涉及张居正效法嘉靖政治的敏感话题。如万历十六年（1588），阁臣王锡爵对神宗说道：“闻张居正擅权时，要钳人口，故将世宗晚年遗札尽行进御，名虽效忠，其实有导皇上刑辱言官自为已地之意。今皇上必欲法祖，则自有良法美意可师，而居正乃万世罪人，岂可既发其奸，而又行其志也？”<sup>⑦</sup>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阁臣方从哲、吴道南改变了这一认识，明确要求神宗向世宗学习，说道：

自昔帝王敬天，必先法祖，臣等不暇远引，即我世宗肃皇帝，非卓然中兴之主哉？彼其用贤图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8，赞曰，第5768页。

②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9，赞曰，第5782页。

③ 陆光祖：《覆请申明职掌会推阁臣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374，第4058页。

④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5、199-200页。

⑤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0页。

⑥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14页。

⑦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庚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28页。

治、虚怀纳谏之芳规，乃皇上耳闻而目击者。夷考其时，有九卿多缺、都宪全空如今日者乎？有考选不下、候补散馆不下、言路寥寥如今日者乎？有各科无印、各差无人、虚封驳之司、废巡方之任如今日者乎？使是数者而无妨于祖制，无害于国家，以世宗英明神圣，何不当先为之，而必至于皇上始有此异常之举动也？夫人主，语之以敬天，谁不悚然惧？语之以法祖，谁不欣然喜？况我皇上聪明睿知，有为尧舜之资，岂其于世主之所能为者反有让焉？是不过一深思、一奋发间，便可转因循为振作，易壅滞为疏通，纾海内郁结之心，辟贤士登庸之路，太平之盛将煌煌乎与世宗肃皇帝比隆较烈矣。<sup>①</sup>

不难看出，在清算张居正时的舍本求末和矫枉过正是亲政后神宗最大的政治失误，而放任朝臣毫无节制地攻讦张居正更是神宗政治最大的自我伤害。

明代政治体制的核心在于权力制衡，以确保皇权的绝对安全。在神宗即位后，明代政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张居正权势显赫，神宗皇权被“侵夺”，皇权与阁权的错位，导致皇帝可有可无；另一方面出于清算张居正的需要，阁权被全面打压，皇权与阁权又出现了新的错位，阁臣可有可无。其结果就是皇帝视阁臣如无有，阁臣难有作为，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从神宗即位开始，张居正生前的“专擅”和死后的反“专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万历十二年（1584），申时行对神宗说道：“今议者徒见前任阁臣之擅专，往日铨部之阿意，不论黑白，并以疑臣。不知昔年，皇上犹在冲龄，故彼得操权罔上。今皇上春秋鼎盛，总揽权纲，凡有票拟，必经御览，凡有处分，必奉宸断，臣何敢毫发擅专？臣不擅专，部臣何所忌惮而曲为阿媚？”<sup>②</sup>后来，阁臣叶向高也指出：“盖当主上冲年，江陵为政，一切政事不相关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由，上心积愤不堪，深恶臣下之操权矣。”<sup>③</sup>离开了神宗被张居正架空的基本事实和由此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就无法理解晚明政治的基本特征。

在张居正和万历初政的研究中，首先必须要正视张居正的顾命角色，也必须要把这一阶段视为非正常的政治状态。同时，只有把神宗亲政看成常态，而不是变态，才能理性地认识神宗政治的走向。也就是说，晚明的政治走向与年幼的神宗有关，与顾命时期“专擅”的张居正有关，与张居正未能顺利移交皇权有关，与张居正没有把神宗培养成明君有关。于慎行就此论道：“万历丁丑，江陵奔丧辞朝，上御文华殿西室，江陵墨绖入见，泣涕陈辞，上亦为之拭泪，一时相传以为古今宠遇，而不知贾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时尊礼，至于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廷始坐。已而称疾乞归，人主涕泣拜留，至命大臣、侍从传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赐，日十数至。此何礼也？江陵晚节礼遇，亦略相仿，至称‘太岳先生’，又过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宠荣出于迫胁，大非人臣之福，有识之士以为惧，不以为荣也。”<sup>④</sup>张居正所侍奉的皇帝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而“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就了张居正的权威”。<sup>⑤</sup>高寿仙就此认为：“张居正并不是皇帝，而且他所担任的首辅职位也不享有前代宰相那样的法定行政决策权，因此他全权处理国家事务的行为便不可避免地会视为‘专擅’。”<sup>⑥</sup>

如果以张居正的去世来分割万历时代，那将无法理解清算张居正“专擅”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无法理解神宗内阁权力弱化的来龙去脉。只有将张居正的辅政与其去世后所遭受的清算联系在一起，才能认清神宗初政对晚明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 三、神宗皇权的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学界所谓晚明时期神宗怠政、思想混乱、党争激烈、吏治腐败、矿监税使横行、土地兼并等现象，只是明朝走向衰亡的一般表象，而非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应视为进入晚明的主要标志。明朝的衰亡

①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丁未，第3328-3329页。

②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四月一日庚寅，第465-466页。

③ 叶向高：《答刘云峤》，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1，第5049页。

④ 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卷4《相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

⑤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

⑥ 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373页。

既有封建王朝亡国的一般特征，又有其特殊的内在表现。而要想弄清后者，观察的起点只能从神宗即位的那一刻来探寻。尽管明穆宗去世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与幼主即位相比，其他所有事件都处于次要地位。张居正一人顾命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这一巨变中的一个特例，人们越凸显张居正的个人作用，就越说明万历初政的异常。尽管神宗的即位没有像“大礼议”那样带来君臣更替的全新格局，但皇帝因年幼而被阁臣、太后和宦官联合架空，则反映着“大礼议”之后明朝政治的又一巨变，并对此后的明代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穆宗临终前的安排是阁臣的集体顾命，而非张居正一人之顾命。时任吏部尚书的杨博对集体顾命的安排寄予厚望，他希望“查照累朝故事，内外章奏应票拟者，不拘大小，悉令阁臣票拟；中外传帖应视草者，无论巨细，悉令阁臣视草。既有未愜圣心，不妨召至便殿，面相质问，务求至当，然后焕发。二三阁臣世受国恩，新承顾命，必不忍负先帝，必不敢负陛下。惟愿陛下推心委任，始终无二，庶几明良庆会而新政有光，上下志同而成宪无爽，固皇祖磐石之宗，慰先帝凭玉之望，天下生灵不胜幸甚，臣等不胜幸甚”。<sup>①</sup>但不久因高仪去世和高拱被逐，顾命之臣仅剩张居正一人，政局为之大变，出现了“江陵承顾托、辅幼主，身伊周之任，宠眷稠渥，前古未有”<sup>②</sup>之奇特现象。对此，张居正也毫不掩饰地对神宗说道：“仰窥皇上之心，不过以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与臣……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sup>③</sup>柄政之后，张居正“对中央则力求提高相权，使政权集于内阁，阁权集于首辅，而以大部隶诸内阁，俾收指臂相助之功”。<sup>④</sup>正由于此，被他提拔任用之人都想方设法地回馈张居正，这让张居正应接不暇。他在万历八年（1580）对四川巡抚张士佩说道：

仆生平好推毂天下贤者。及待罪政府，有进贤之责，而势又易以引人，故所推毂尤众。有拔自沉沦小吏，登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报，盖荐贤本以为国，非欲市德于人也。乃今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馈遗相报。却之，则自疑曰：“何疏我也！”及不能殚乃心、任乃事，被谴责，则又曰：“何不终庇我也！”<sup>⑤</sup>

又如万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神宗在乾清宫与宦官夜宴放纵时差点将其中两人杖毙，事发后，张居正对涉事宦官进行了处理。但是所处理者“不过冯保不悦者而汰去之，则此举适所以阿保之好恶而已”。对于这一处理结果，神宗明知其由，但“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嫌居正及保矣”。<sup>⑥</sup>

毋庸置疑，张居正的“专擅”是以架空皇权为前提的。“江陵柄国”“江陵当国”“江陵秉政”“政权由己”等表述都是架空皇权的代名词。黎东方论道：张居正“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又言：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之中，由于皇太后“管教甚严，张居正大权独揽，司礼监冯保又颇与太后及张居正合作，神宗除了读书以外，无所作为”。<sup>⑦</sup>朱东润亦言：张居正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惟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底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又说：“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sup>⑧</sup>神宗即位后出现的这一现象，与嘉靖、隆庆时期皇权的强化正好相反，是皇权弱化的表现，暗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于慎行认为：

江陵自失臣礼，自取祸机，败在身家，不足深论，而于国家大政，有一坏而不可转者，何也？

① 杨博撰，张志江点校：《杨博奏疏集·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28《会请端政本以隆新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72-1273页。

②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71，万历十年六月丙午，第4415页。

③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1《三乞守制疏》，第520页。

④ 余守德：《张江陵》，梁启超：《中国六大政治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57页。

⑤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2《答张巡抚濂滨言士称知己》，第408页。

⑥ [清]夏燮著，沈仲九标点：《明通鉴》卷67，神宗八年十一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85页。

⑦ 黎东方：《细说明朝》，第282、294页。

⑧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226、266页。



凡天下之事，持之过则甚，则一发而溃不可收，譬如张鼓急则易裂，譬如壅水决则多伤。即以内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宫之中，以醉饱过误，断一奄人之发，不为非过，而未至大失，辅弼大臣，付之不问，则犹有惮而改，即欲规正，亦当从容陈说，使之自解，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应，制之股掌之间，使之藏怒忿志，蓄极而发，从此惟所欲为，无复畏惮。数年以来，诛戮宦者如刈草菅，伤和损德，无可救药，视一奄人之发，相去何如？则持之太急故也。嗟夫！以善为之，而不知其陷于太过，则不明于《春秋》之义者矣。<sup>①</sup>

孟森就张居正的权势论道：“综万历初之政皆出于居正之手，最犯清议者乃夺情一事，不恤与言路为仇，而高不知危，满不知溢，所谓明与治国而昧于治身，此之谓也。”<sup>②</sup> 谢国桢明言：张居正“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大权独揽，用高压的手段，权威都归到内阁，言官等于木偶，来取媚于内阁。居正到了晚年，位高望尊，傲慢的态度，更觉暴露无遗……冯保与他勾结，通行贿赂，官职的升降，都由他的爱憎，他的儿子嗣修等都中了高第，居正的势力，真是炙手可热，气盖一世，但他的积怨，就潜伏其中了。言官的舆论，表面上看来，似乎已被削夺，里面更是膨胀。而一般无耻士大夫，借着机会来弹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时相……到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遂为众矢之的……言官被张居正压制了十年，至此如江河千里，一泻直下”。<sup>③</sup> 樊树志认为：“张居正掌权之时，权势显赫，举国上下仿佛风中芦苇，随风而倒。”<sup>④</sup> 这些评论深刻揭示了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期的“专擅”实情和由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张居正的“专擅”既非阁臣的权力，亦非明代之前宰相的权力，而是万历初政皇权弱化的直接反映。特别是张居正通过借助宦官冯保来强化自己的权势，明显违背了明朝政治的基本精神，故不可能成为效法的榜样。万历三十四年（1606），礼科给事中汪若霖论道：“皇上御极以来，阁臣变态亦略可睹矣。万历初年，权相勾结擅政，天下股票，盛满不戒，卒受诛灭之祸。嗣是宵人观望，于是一切变为侧媚险邪之行，以牢笼一世，门户甚坚，气脉不断。苟有正类，立见倾挤，以私灭公而不顾。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瞞心涂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为太息！”<sup>⑤</sup> 朱东润论道：“高拱、张居正当穆宗在位的时候，在最后的阶段里，已经不能并存，神宗即位以后，居正利用政治机会，撇开高拱，成为实际的独裁者，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史实。”<sup>⑥</sup> 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一死，神宗便将其身边的徐爵等人视为“楚党”，认为其与冯保等“奴辈盗我威福久，其亟诛之”。<sup>⑦</sup> 不难看出，当时神宗对张居正及其依附之人侵夺皇权的行为极度愤慨。正如申时行于万历十二年所言：“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自干宪典，然天威有赫，籍没其家，则国法已正，众愤已泄矣。”<sup>⑧</sup>

政治晚明是晚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制约经济晚明、社会晚明、文化晚明等晚明“新气象”的关键因素。不论人们如何发掘晚明的新因素，也不论如何认识晚明新因素的积极意义，当晚明政治中枢极度疲软、吏治愈加腐败、政局激烈动荡、区域发展严重失衡且自我无力变革之时，明朝只能在民怨沸腾中土崩瓦解。汪若霖认为：“臣惟天下理乱，在于朝政得失，而国家内阁之地，号曰政府，谓皇上心膂所寄，天下机务之所从出也。今天下大势，似强实弱，似安实危，百孔千疮，仅存象貌，则惟是二十年来政府之内，懦弱渐靡，以至于此，识者伤之。”<sup>⑨</sup> 当神宗无法组建自己可信可控的集体内阁及神宗内阁不能与皇帝进行有效的沟通时，神宗政治的失控是必然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入阁不久的叶向高鉴于上下隔绝、内外离心而自己难有作为，要求辞职，并言：“受事数月，莫展一筹。政本何地？辅

① 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卷2《纪述二》，第20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6页。

③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3页。

④ 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0页。

⑤ 汪若霖：《朝政因循可虑辅臣单匱难支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9，第5154页。

⑥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345页。

⑦ 申时行：《张文毅公神道碑》，张四维撰，张志江点校：《张四维集·条麓堂集》卷34，第873页。

⑧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四日己酉，第475页。

⑨ 汪若霖：《朝政因循可虑辅臣单匱难支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9，第5153页。

弼何官？而可苟且度日！铨臣问臣曰：‘庶官旷矣，职何以修？’计臣问臣曰：‘边军噪矣，饷何以处？’台臣问臣曰：‘宪署空矣，要紧各差，急何以应？’诸如此类，臣皆不能置对。举天下至危至急之事，尽责之臣等，而臣等实无以副。”<sup>①</sup>同年，利玛窦就自己的所见所闻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神父的报告中说道：“当今皇帝从不离开皇宫，很多年才在宫中上一次朝，而朝臣们也只能从很远的地方见到他：他们在一个院落中，面对着居于高台之上的皇帝。”<sup>②</sup>要理解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就不能不把观察的视角聚焦于张居正身上。在张居正看来，“只要他取得万历皇帝一人的暂时信任，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任何不同的意见，尽管罚不当罪，也要重处，这样的确可以取得暂时的效果，没有人敢反对他了，但是在积压新的社会矛盾，为日后的矛盾暴发准备了条件。”<sup>③</sup>通过清算张居正，神宗明白其他人与张居正一样，一身兼有“阴”“阳”两重性，“有‘阴’则有‘阳’，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并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sup>④</sup>可以说，神宗对阁臣的不信任，主要源于其对张居正“专擅”的不理解和不认同。朱东润认为：“居正当国，便等于神宗失位，首辅大学士和皇帝，成为不能并立的形势。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个提倡忠孝的环境之下，也不容许王莽、曹操的产生。居正以忠孝自负，而忠孝自负的主张，又和专权当国的现实，不能融洽，心理遂陷于极端的矛盾状态。”<sup>⑤</sup>

正是由于张居正未能在神宗成年后自觉地结束顾命政治，没有在前任将皇权顺利地移交给神宗，没有组建能够担当大任的内阁团队，便直接导致了万历内阁的疲软，使后张居正时代无法构筑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明人冯时可认为张居正的事功不容抹杀，“惟是好揽权而喜附己，则于贤者若掷沙遗瓠而莫之恤，于佞者若嗜醴悦臠而莫之厌。故一时举措多拂人意。又其交内竖以固位，进珍玩以希宠，甚非大臣之道。至于夺情拒谏、鼎甲其子，而名行大坠，人心大失矣。所谓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于斯验矣。”<sup>⑥</sup>张居正事实上的“专擅”和神宗应有的“独断”之间的冲突是神宗即位之后最大的政治矛盾，这一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张居正生前，而且在他死后依旧延续着，对神宗心理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王其渠认为张居正得祸的主要原因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明代特别突出，“皇帝要躬揽庶政，内阁辅相只是做顾问、代言（草拟诰敕），超过这个界限，就是专恣擅权”。而张居正“这个名相，还总揽了朝政。他自己也意识到‘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提出要‘归政’于朱翊钧，但又受阻于慈圣皇太后。以一个内阁辅臣，公然要提出归政，表明是他在‘摄政’，这在皇帝成年之后，是绝对难以容忍的。居正死后不久即遭惨祸，关键问题就在这里”。<sup>⑦</sup>但让神宗君臣始料不及的是，清算张居正不仅未能强化阁权，反而使其越来越弱。面对言路的攻击，朝臣“皆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侧目而不敢言”。首辅申时行甚至发出了“孤单寡与”<sup>⑧</sup>的感慨，并认为“今之论者，皆不惜国家之体统，不知臣子之分义，此风不息，为患非轻”。<sup>⑨</sup>阁臣许国也认为自己身处“国是摇夺，朝议混淆”<sup>⑩</sup>的乱局

① 《明神宗实录》卷 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第 8452 页。

② [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意]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利玛窦书信集·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神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321 页。

③ 陈生玺：《张居正与万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04 页。

④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 76 页。

⑤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 345 页。

⑥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 71，万历十年六月丙午，第 4415 页。

⑦ 王其渠：《明代内阁制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60 页。

⑧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四月四日庚戌，第 469、470 页。

⑨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十日乙卯，第 476 页。

⑩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丁巳，第 477 页。

之中,故连连上疏辞职,直言:“彼私党已成,气焰渐盛,稍侵其类,则群起交攻。或居中密图,或扬言鼓众。不得于此,则籍明口于他事。不得于此人,又假手于他人。盖有鳞可批、颜可犯,而言官不可少指者;命可违、法可乱、而弹章不可少议者。将来大臣拱乎(手)听命,重足屏息,人人自危,接迹求去,又不独臣一人而已。”<sup>①</sup>一年半后,许国又与王家屏联名疏言:“臣等既不能将顺皇上之美,又不能匡救皇上之过,伴食窃位,分毫无补,使天下后世追臣等而数其罪,复何颜面参于帷幄之中,立于臣僚之上乎?”<sup>②</sup>将张居正的权势与其顾命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所谓张居正改革“不仅必然是短命的,而且在此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两种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失衡后的反弹,造成各种势力的纷争不休;其二是思想被禁锢后的回拨,形成以讲学、清议为核心的士人运动。而此二者恰为晚明党争兴起的重要原因”。<sup>③</sup>阁权弱化必然导致政治功能紊乱,明朝的衰亡不可避免。万历三十九年(1611),叶向高说道:“臣见近来朝纲国政日以陵迟,世道人心日以嚣竞,而又到处灾伤,连年荒旱,考古准今,必成祸乱。”<sup>④</sup>五年多后,方从哲直言:“年来水旱相仍,盗贼时有,民生困敝,国计空虚,吏治日窳,边防渐弛,纪纲坠而不振,法守废而不存,人心之郁结未纾,朝政之壅淤日甚。”<sup>⑤</sup>《明史》的作者认为在朱赆一人在阁时,明朝已经是“朝政日弛,中外解体”<sup>⑥</sup>的状况了。

在认识晚明政治时,如果抛开首辅张居正,就无法认清其时代特点和政治走向。只有从神宗即位开始来认识晚明政治,才能较好地把握晚明政治演变的内在特点。毫无疑问,首辅张居正绝对是认识晚明政治的关键人物。万历十年,尽管张居正离开了人世,但他仍然活在人间,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万历政局。无论生前的“专擅”,还是死后所遭受的“清算”,张居正的荣辱变化集中反映着神宗皇权畸变的时代特点:神宗年幼之时,暂时需要张居正;神宗长大明理之后,则要抛弃张居正。而要树立亲政后的良好形象,神宗必然要设法消除张居正顾命政治的印记。换言之,以“专擅”名义清算张居正的目的在于使皇权和阁权向常态化转变,只是由于神宗君臣全面否定首辅张居正,未能把握好分寸,才使清算失控并走向反面。

晚明的起点应从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算起,历时73年,作为探讨明朝衰亡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是以皇权的弱化来表现的。表面上看是张居正在“尊主权”和“强君威”,实际上是在侵夺神宗的皇权,造成了神宗对阁臣的不信任。首辅张居正的独特权势是神宗年幼即位的特殊产物,既不可能延续,也不可能复制,故在万历十年以后绝不可能出现像张居正一样的强势阁臣,使神宗无心膂股肱可寄。从叶向高、方从哲等人连连上疏要求神宗增补阁臣而不敢提及张居正的情形来看,他们不敢拥有张居正式权势的想法,而是一再强调集体内阁的重要性。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方从哲所言:“窃惟国家设内阁之臣,匪徒备顾问、供代言之役而已,凡军国大事,咸得与闻,故密勿之司,号称政本。祖宗朝多至五、六员,少亦三、四员,使之谋断相资,协恭共济,从来未有以一人独任且至数年之久者。”<sup>⑦</sup>此类话语在后张居正时代不绝于耳。只有正视张居正辅佐幼主的独特性,并以皇权的弱化为中心来认识神宗政治的特点,才能认清晚明政治的特点与走向。

#### 四、结语

穆宗去世后,神宗年幼且一时难以行使皇权是客观事实,如何将神宗培养成贤君英主,才是张居正首要的政治任务。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中,才是张居正首要的政治使命,也是对张居正极大的政治考验。只有以神宗即位为起点来审视晚明的历史,才能认清因皇帝年幼而出现的皇权

①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庚申,第478-479页。

②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丁亥,第566-567页。

③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79页。

④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辛酉,第2809-2810页。

⑤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第3332页。

⑥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9《朱赆传》,第5780页。

⑦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二日丁未,第3790页。



弱化对晚明政治的特殊影响，才能洞悉张居正对神宗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才能看清晚明政治的实际走向。

不论是张居正“专擅”所导致神宗皇权的被动弱化，还是神宗亲政后因“怠政”而引起的皇权的自我弱化，都是神宗即位后皇权弱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隆庆、万历之际明代政治的重大变化。穆宗的临终托孤、幼主的即位、顾命首臣高拱被逐、张居正夺得首辅并成为顾命孤臣，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神宗皇权弱化的集中表现，故晚明政治的起点应从神宗即位的隆庆六年六月算起。只有将“万历”等同于“神宗”，赵翼所谓明朝“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sup>①</sup>才与《明史》的作者认为明朝“亡于神宗”的论断是同一个意思。

只有把幼主神宗即位以后的皇权和阁权的失衡联系起来并以此为视角来认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才能看清晚明政治的走向并把握晚明社会的特点。过分突出张居正的个人作用而无视内阁“同寅协恭”的集体功能，显然背离了明朝设置内阁的基本精神。后张居正时代既有清算张居正“专擅”而树立神宗亲政形象的主观要求，也有结束顾命局面而恢复内阁常态的客观要求。张居正的权势既不可复制，也不能再现，神宗绝不会允许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后来的阁臣也不敢成为第二个张居正。神宗时代皇权的弱化和阁权的疲软势必引发政治的衰败，而政治的迷乱又与活跃的社会经济之间找不到契合点，明朝只能在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失衡中走向灭亡。

将神宗即位作为晚明政治起点的标志，旨在强调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对明代政治的特殊影响。幼主神宗的即位标志着明朝皇权的弱化，对此后明朝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顾命辅政之时，一方面继承了嘉靖、隆庆时期革新的遗风，使神宗初政得以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又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使神宗初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神宗对皇权弱化的极度不满，才使清算张居正毫无理性可言。在神宗君臣甚嚣尘上的清算之中，张居正在顾命时期所遵循的法祖崇实、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讲求实效等政治理念也一并被抛弃，万历政治因此而迷失了方向。

责任编辑：杨向艳

---

<sup>①</sup>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矿使之害》，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7页。

# 反主为客： 1928年京津易帜、国民党政权与北平社会<sup>\*</sup>

王建伟

[摘要]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兵临北京城下，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北京地方士绅等各方努力下，新旧政权基本实现平稳过渡，国民党在北京的统治正式确立。不过，这一过程仍牵扯出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几条矛盾暗线，预示之后的局面不会太平。北京延续数百年的国都身份被剥离，对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心理等诸多层面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面对此次变局，旧都各类人群有观望，有淡然处之，更有投机奔走。国民党新政权原本致力于实现北京的“革命化”，然而不久之后却上演革命的“北京化”，彰显出这场“统一”的限度以及北京城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同化能力。

[关键词] 京津易帜 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 阎锡山 战地政务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11-0127-13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以统一中国为目标，蒋介石担任总司令。至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从珠江流域推进至长江流域，先后占领武汉、上海、南京等地，控制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北伐暂时停顿。1928年1月，蒋介石积极整合冯玉祥、阎锡山地方实力派，于4月初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集团军“直捣幽燕，长驱关外”，<sup>①</sup>向张作霖安国军发起总攻击，时称“二次北伐”。5月，李宗仁、白崇禧所率军队也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之中。<sup>②</sup>

蒋介石统率第一集团军一路北进，逼近济南。5月3日，日军借口“保护侨民”，杀害中国军民，制造“济南惨案”，国民政府原部署受阻。蒋介石顾忌日本干涉，决定绕道北进，以期在最短时间内直取京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重点转向采取政治手段，抓紧与奉方交涉。张作霖也因战事不利，考虑返回关外，以东北为基地，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再起。于是国奉之间通过谈判，确立了奉军退出关外、京津由阎锡山和平接收的基本方案。<sup>③</sup>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左翼文化研究”(23AZS016)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① 《告前方将士书》，《新闻报》1928年4月6日第3张第1版。

② 与本文相关的主要研究参见习五一：《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林志宏：《北伐期间地方社会的革命政治化》，《“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6期，2011年11月；潘建华：《“军政分离”：二次北伐时期的战地政务委员会与北方政务》，《军事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王建伟：《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安徽史学》2022年第2期。

③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396-397页。相关研究参见陈铁健、黄岭峻：《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蒋介石与二次北伐》《奉蒋谈判与

## 一、国民革命军戡定北京

1928年5月28日，蒋介石发布总攻令，国民革命军各路大军相继进抵京津外围，奉军大势已去。30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孔繁蔚、尹扶一与张学良、杨宇霆进行磋商，再次确认先前达成的北京交接方案。<sup>①</sup>31日，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京汉线奉军退至琉璃河、长辛店一线，北京市民震动。

奉系退走京津之际，张作霖对政权交割作出安排。5月31日下午他约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入府，商讨京师治安维持事宜。<sup>②</sup>6月1日，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告别会，招待各国驻华公使，声明撤离北京，“但对于北京治安，仍尽力维持，希望各国侨民安心”。<sup>③</sup>同日，张与全国商会联合会及京师总商会代表在元帅府话别，申明奉军和平撤离，绝不扰及商民，“勿得神经过敏，作无谓之惊恐”。<sup>④</sup>此时《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进入北京，“时奉军大势已去，都门人心惶惶”，当到访杨宇霆帅府春耦斋时，“府卫队已纷纷以行李载之大车拉往车站，帅府上下人等，面带惴遽之色”。胡氏还以记者的敏锐眼光观察到春耦斋“几尘座积，似已无人打扫”。<sup>⑤</sup>当日下午，王士珍联络京城内各耆老、地方绅商代表汪大燮、熊希龄、孙学仕、恽宝惠等人在中央公园会晤，决定成立“慈善联合会”，承担过渡时期治安维持之责。不过限于警力不足，慈善联合会与张作霖交涉，希望能留下“奉军一旅帮同维持治安”。<sup>⑥</sup>此时，“京中殷富纷纷迁避，东交民巷某国饭店，住客充满，拥挤不堪。北京警察也以欠饷三月为借口，酝酿罢工，市民益形惶恐”。<sup>⑦</sup>

6月2日，张作霖在居仁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内阁由外长罗文干、内长沈瑞麟主持，中央政务则交由国务院摄理，治安推王士珍主持；军事设联合办事处，由张学良、杨宇霆负责；留鲍毓麟旅在京执行勤务。当日，张作霖发表息争罢兵宣言，称“不忍穷兵黩武，整率所部，退出京师……此后政治听国民裁决”。<sup>⑧</sup>留守负责国务院事务的许宝衡则嘱诸科处“将文卷等清理归束，房屋各加封锁，但每日酌定数人到院照料，以待新政府之成立”。<sup>⑨</sup>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乘专列离京返回奉天。张作霖离京当天，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议议定：请罗文干、沈瑞麟、王荫泰等分访北京在野各名流、各慈善团体、商会及各国公使，接洽维持北京城内外治安之办法。声明鲍毓麟所部军队，完全在保护京城内外华洋人民之生命财产，系保持北京治安，绝不作军事行动。<sup>⑩</sup>此时，长辛店、卢沟桥一线仍有奉军主力驻守，尚有小规模战事发生。

张作霖离京之际，原本安排张学良、杨宇霆留下，一面办理退军事宜，一面与国民政府以及晋军谈判，商讨政权交接方案，各方在细节条款上仍互有拉锯。<sup>⑪</sup>不过，此种局面因一场意外而发生变故。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专车在沈阳城郊皇姑屯被炸，张本人受重伤，回到沈阳后于当日上午10时不治身亡，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张学良闻讯后，急令长辛店、卢沟桥、良乡等处奉军全线火速向滦河一带撤退，并于4日晚匆忙返回奉天，奉方各要人也悉数离京，国务院等各部门无形休止。此时，北京城事实上已进入无政府状态。4日下午5时，在慈善联合会基础上成立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包含京师总商会、中国红十字会、京师公益联合会、农会、银行公会等团体，王士珍任会长，汪大燮、熊希龄

---

奉系出关》，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①《北京之政局与治安》，《天津益世报》1928年6月4日第1张第3版。

②《时局解决已趋近》，《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2日第2版。

③《张作霖招待各国公使》，《申报》1928年6月2日第4版。

④《张作霖昨对商界表示》，《世界日报》1928年6月2日第2版。

⑤《北都易帜记》，《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0日第2版。

⑥《国军入京前之北京治安》，《申报》1928年6月3日第3张第9版。

⑦王光远：《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前后大事记》，《北京档案史料》1988年第1期，第72页。

⑧《张作霖撤兵通电》，《申报》1928年6月3日第4版。

⑨许宝衡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3册，1928年6月2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48页。

⑩《北京之政局与治安》，《天津益世报》1928年6月4日第1张第3版。

⑪《张作霖被炸后 京津急转直下》，《申报》1928年6月14日第3张第9版。



为副会长。由于此时原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已随张学良返回奉天，当夜 11 时半，王士珍等人送吴炳湘赴警厅接任，同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及各外交使团，其会责在维持治安，不涉军事行政。<sup>①</sup>

国民革命军逼近京津之际，在京各国公使团感到不安，于是协商研究保护侨民办法。日使芳泽提出“非常警备”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警备京津”，并由外国军队接守北京各城门，“各国以其系超过自卫以上之行动，一致表示反对”。公使团讨论认为，此番南北军之战虽规模视既往各派战争为大，但对外国人士未有侵犯，因此主张适度准备应对方案，如各国驻军组成义勇军保卫使馆界、开行京津国际列车、东交民巷加厚军事防备等措施。<sup>②</sup>6 月 4 日，北京公使团议决，由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致电各集团军司令蒋、冯、阎及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请国民革命军勿攻城，由双方和平谈判后占领，并注意保护外侨之安全。治安维持会成立之后，即派代表到日、荷、美、英、法等国驻京使团处，告知维持会之情形，各使团均表认可，并有实际支持行动，同意在关税项目下拨款 30 万作为治安费，用以发放军警薪饷，维持治安。<sup>③</sup>

6 月 4 日，南京国民政府委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处理接收事务。蒋介石电阎，请其务必使北京居民“于鬯匕不惊中，转入国府治下”。<sup>④</sup>6 日，阎锡山移驻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职。国民政府随后公布《京津卫戍总司令暂行条例》，将阎的职权范围明确限制于“京津两地区之警备，维持治安，并保护外侨及国有之各建筑物”。<sup>⑤</sup>

在这次和平交接过程中，留守北京的奉系鲍毓麟旅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 6 月初被赋予维持治安任务之际，鲍氏就展示强硬手段：“除在城内郊外分队武装巡行，遇有事故，立即交军警联合处讯办外，并通令内外城门守卫无论何军官兵，如无正式护照，及上峰命令，一概拒绝入城。”<sup>⑥</sup>3 日，鲍氏分派三营驻守北京的九座城门，并亲率大刀手枪队巡街，“闻共计捕获游兵八十余人”。<sup>⑦</sup>治安维持会成立后，鲍旅改名为京师保卫团，直隶于维持会领导之下。为防止京师周边的溃兵涌入北京城内，鲍旅封闭了各个城门，“仅留永定、朝阳、西直门三门，其余各门钥匙俱由鲍旅收去，且所留三门，亦随启随闭，并经兵警，将京汉京奉各路缺口处，设有机枪两架，不准行人通过”。<sup>⑧</sup>6 月 7 日，北京陆军监狱发生越狱事件，鲍旅及时镇压并击毙囚徒 80 余人，越狱遂以失败告终。为此内外人士对鲍旅维持治安皆持肯定态度，“一般市民咸深感佩。对于外侨之机关或住宅，均特派军警保护”。鲍旅留京，也得到驻华公使的普遍支持。<sup>⑨</sup>

在“二次北伐”过程中，阎锡山、冯玉祥原本都对京津地盘垂涎已久。受济南惨案的影响，蒋介石调整基本战略与作战计划，冯玉祥统率的第二集团军成为进攻主力。同时，在阎锡山的辅助下，蒋介石将重点放在与奉方的谈判上，形成了由阎锡山和平接收京津的方案框架，这一安排也为日后蒋、冯的系列冲突埋下隐患。相对其他几路集团军而言，冯部原本牺牲最多，损失最重，但在接近胜利之时却成为陪衬角色，阎锡山则坐收渔利。<sup>⑩</sup>冯氏对此气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能被迫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且还需对外违心做高调表态，以展示大度姿态。

①《治安维持会昨日成立》，《晨报》1928 年 6 月 5 日第 3 版。

②《使团会议自卫办法》，《申报》1928 年 5 月 28 日第 2 张第 8 版。

③《北京治安会组织法规定》，《天津益世报》1928 年 6 月 6 日第 1 张第 3 版。

④《蒋总司令南京歌二电——鬯匕不惊接收北京》（1928 年 6 月 5 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985 页。

⑤《京津卫戍总司令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第 66 期，1928 年 6 月，第 5 页。

⑥《鲍毓麟谈话》，《晨报》1928 年 6 月 2 日第 2 版。

⑦《鲍毓麟亲巡街市》，《晨报》1928 年 6 月 4 日第 3 版。

⑧《昨日市面之情况》，《顺天时报》1928 年 6 月 6 日第 7 版。

⑨《北京秩序甚安谧》，《大公报》（天津）1928 年 6 月 6 日第 2 版。

⑩《蒋总司令致冯玉祥总司令请赞成由阎锡山和平接收京津电》（1928 年 5 月 22 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年，第 201-202 页。

尽管如此，冯玉祥也并非完全被动，无所作为。当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在保定告捷，奉军撤退至琉璃河之后，原本被安排在京汉及津浦线间牵制奉军的冯部迅速在京汉线东侧由前敌总指挥韩复榘部发动追击，并激励将士早日入京过端午节。于是阎锡山、冯玉祥两军各沿京津线东西两侧昼夜兼行，竞相入驻北京。6月6日，韩复榘部率先抵达北京南苑。由于国民政府此前已经安排由阎锡山和平接收北京，韩部颇有“从天而降”之感。此时，蒋介石急电冯，令其“速将入南苑之韩部，令在原地整顿，勿再入北京城内”。<sup>①</sup>冯氏于是电韩，“不准越过南苑一步”。<sup>②</sup>京师治安维持会委派熊希龄偕江朝宗赴南苑与韩部接洽，韩表示“奉长官命令，到京畿为止，现时暂驻南苑，决不入城”。<sup>③</sup>与此同时，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孙楚部进至长辛店、卢沟桥。治安维持会代表偕同孔繁蔚赴京郊与晋军商议具体接防事宜。孔繁蔚承诺“将采相当之措置”，保护鲍旅安全退出北京。<sup>④</sup>

6月8日上午10时，第三集团军孙楚部由彰仪门进入北京城，“此为国民革命军最先开入京城者，故市民有极热烈之欢迎。上午九时起，彰仪门大街一带，民众鹄立道旁，青天白日旗高挂，治安会及总商会代表分乘汽车四辆，出城欢迎。顺委会、市党部及各学校代表等，亦早驰赴城外等候。手执革命军旗，高呼欢迎武装同志口号”。“下午继续到京者为商震、张荫梧及部随员卫队等”。<sup>⑤</sup>阎锡山派参谋长朱绶光分赴各国驻京公使馆，声明“北京治安，担负全责。外侨生命财产，妥实保护”。<sup>⑥</sup>晚上，商震发出安民布告：一是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二是优待奉直鲁军眷属；三是如有收藏败兵军械者应即呈报，并禁晋军擅赴民间搜查。<sup>⑦</sup>张荫梧也开赴参谋部，并准备组织警备司令部的一切手续。就在同一时间，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在烟酒署召开会议，表示国民革命军业已入京，治安维持有人负责，该会已无存在必要，定于次日通电取消，将警厅及宪兵移交警备司令部节制。次日，该会正式宣告“解散”。<sup>⑧</sup>

就在第三集团军入城、北京城防实现和平交接之时，发生了一点“插曲”。8日晚，根据国奉双方达成的协议，在治安维持会的居间协调下，鲍毓麟旅从朝阳门撤离北京。但当鲍旅退至通州附近时，却被冯玉祥系冯治安部所阻，被迫折回，并于当日深夜被冯系第二集团军包围。9日晨，韩复榘部将鲍旅缴械。维持会闻讯后立即派汪大燮等人前往斡旋，但仅将鲍本人带回，鲍旅其他人马则被俘至南苑。消息传至东交民巷，驻京公使团也出面调停，公使团领袖欧登科偕英、美、日三国公使赴南苑与韩复榘交涉。阎锡山也出面联络冯玉祥，并附治安维持会以及公使团往来文件，希望冯能够妥善处理。

虽然承受各方压力，但韩复榘态度既明确，又婉转。他公开表示，革命目标原本就是打倒奉系军阀，鲍军既系奉军，自己当然有权处置。韩还称对鲍氏个人甚为钦佩，“缴械一举，亦系保全之意。盖在此交战状态中，鲍以敌军，通过后方，于势于理，均为不合。即令放彼东行，在途中与他军一有冲突，则全军终必无幸，如今虽解除武装，生命身体固极安全也”。<sup>⑨</sup>韩复榘作为冯玉祥部下，缴械行为本身是在履行上级意志。对此，外界已有明确认知。时人郭曾炘就在日记中记述了鲍旅被缴械一事，认为“此中作梗之人，不言而喻也”，即指向冯玉祥。<sup>⑩</sup>冯氏在明知鲍旅留京属治安维持会、奉系、国民政府与驻华公使团各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扣押缴械，实际上还是为自身在此次接收京津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进行激烈抗议。直到6月19日，冯玉祥才在各方压力下下令释放所扣鲍旅士兵，并发还枪械。<sup>⑪</sup>

①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第497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1928年6月7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70页。

③ 《晋军孙楚部今午入城接防》，《顺天时报》1928年6月8日第2版。

④ 《使团昨公布为鲍旅事件与国府往来电文》，《顺天时报》1928年6月11日第3版。

⑤ 《第三集团军入京记》，《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0日第2版。

⑥ 《阎派朱潘来京 昨分访使团》，《顺天时报》1928年6月9日第2版。

⑦ 《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1928年6月17日。

⑧ 《北京治安维持会结束》，《时报》1928年6月19日第1版。

⑨ 《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1928年6月17日。

⑩ 窦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记》，1928年6月11日，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87页。

⑪ 《鲍旅案》，《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20日第2版。

6月11日，阎锡山以京津卫戍总司令身份与白崇禧一同进入北京，当即发布安民告示：“革命本不得已之举，实为民除害，此来为保护民商，务须各安其业，毋为惊扰。”<sup>①</sup> 阎还对记者表示，将全力以赴维护一般居民之安宁，并“与各友军协力肃清京津之残余军阀及有害治安之一切恶势力，以谋巩固治安之基础”。<sup>②</sup> 当日下午，阎锡山在朱绶光的陪同下到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龄等宅，对诸老维持北京治安之功致谢。14日，阎锡山又到东交民巷访问各国驻京公使，表示负维持京津治安之责，外侨生命财产，绝无可虑。<sup>③</sup>

“二次北伐”启动之初，京津百姓因接近战区，“颇流露一种恐怖之色”。<sup>④</sup>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北京一直被认定为数百年来清王朝腐化败坏的“渊藪”，那些前清遗老与北洋官僚也被贴上土豪劣绅、买办、政客军阀的标签，且国民党在前期北伐过程中流出了“滥杀”“腰斩”的传闻，“大家都提心掉胆地为他们捏一把汗，生怕革命党掏出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去革他们的命”。<sup>⑤</sup> 至国民革命军兵临北京城下，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一切都属未知，恐慌亦在所难免。时在北平的黄尊三在日记中记载：“奉军昨晚总退却，京津交通断绝，人心惴惴不安。”<sup>⑥</sup> 不过，阎锡山入京后第一时间的系列安抚行为释放了明确信号，“皆足以博市民之信赖”。<sup>⑦</sup> 此次负责和平接收的阎系晋军性情朴实，也给外界留下了较好印象：

北京自局面变化之后，逐日均有晋军到来，晋军向系征兵，出身农家，性情和平而畏事，故市面极能兵民相安，与曩时商民畏兵如虎之情形不同。两日前，兵队初入城时，凡驻扎地点，概由巡警导引，尤以奉军曾经驻扎为条件，甚至兵士向民众索取茶水，亦非请警察介绍，不敢径往讨要。北京人力车夫向来惯受丘八太爷压迫，至此大有解放之感。市上群称“老西是老实的”，几已成为舆论矣。<sup>⑧</sup>

北京城在经历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类似“济南惨案”的事件并未上演。大部分民众的疑惧心理很快被打消，“市面安静，一如常时……一场大事，匕鬯不惊”。<sup>⑨</sup> “攘往熙来，恢复原状。除掉街上多几件中山装，拜客变成早衙门之外，又几乎一切如常，了无异状。这样的革命，真是中外罕见，许多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人，到此都觉从前之畏惧与反对为多事”。<sup>⑩</sup> 《申报》也转引《字林西报》评论：“北京电话、电报、汽车、火车等交通，渐能恢复常状……目下北京城郊，因有二四集团军所部维持，秩序极佳。”<sup>⑪</sup> 《大公报》记者赴南苑访韩复榘，“车出永定门，已见韩部兵士，三三五五，游行道途，市廛中熙熙攘攘，决无军事时代光景，夹道绿柳成阴，稻田阡陌相连，仿佛江南风物，农夫刈草插秧，似不知有干戈之事，除有兵士押大车，拉草料以外，地面上充满和平气象”。<sup>⑫</sup> 在京的周作人虽然一直对南来的军队以及“革命”持调侃态度，但也承认此次变动甚至比1924年底的冯玉祥国民军进城以及后来张作霖的奉军进城更有秩序。<sup>⑬</sup>

北京之所以能实现平稳过渡，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张作霖离京前的安排以及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统一筹划，“奉军决定退兵之后，城内除鲍旅一部，说明系留下保安，其余军队，概行撤走，城外军队，亦

①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第994页。

② 《阎锡山对记者谈话》（1928年6月11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9年，第1632页（总第4034页）。

③ 《北平政闻·阎锡山拜访使团》，《申报》1928年6月24日第2张第8版。

④ 《恐怖与希望》，《大公报》（天津）1928年4月27日第1版。

⑤ 欲樵：《从“北京”到“北平”》，《语丝》第4卷第39期，1928年9月24日。

⑥ 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下），1928年6月6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723页。

⑦ 《增市民安堵之念》，《顺天时报》1928年6月13日第2版。

⑧ 《旧都新闻见》，《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7日第2版。

⑨ 《希望天津避免战祸》，《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6日第1版。

⑩ 《从北京到天津的印象》，《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7日第1版。

⑪ 《西报对于北京地位之两说》，《申报》1928年6月17日第3张第9版。

⑫ 《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1928年6月17日。

⑬ 岂明：《通信》，《语丝》第4卷第29期，1928年7月16日，第35-36页。



概禁入城，所以秩序井然，易于维持”。<sup>①</sup>《申报》从国民政府接收方面进行总结：“当北伐军戡定京津时，凡百事物，均呈紊乱之象。北京军事方面，有阎锡山结束，庶政方面有蒋作宾（战委会）接收。故秩序之回复，比较迅速。”<sup>②</sup>另一方面，王士珍、熊希龄等一众京内耆老在北京青黄不接之时挺身而出，组建临时治安维持会，积极奔走，联络政界、军界、警界、商界等，疏通各方关系。虽仅存短短5日，但凭借其中立的政治立场以及声望，在极易出现动荡的交接关头，维持了社会层面的基本稳定，《大公报》高度评价：“中外晏然，平安交替。诸老之功，不可没也……奉系信之也，故授以权；国府信之也，故重其意；一般市民与外交团共信之也，故该会能行使职权，毫无滞碍。夫以无拳无勇之三数老者，当此政治剧变之冲，而能措置裕如，此信用为物之所以可宝也。”<sup>③</sup>北京实现平稳接收对于国民党新政权营造“崭新气象”具有重要意义。

## 二、旧都人群众生相

6月20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决议：直隶省改名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sup>④</sup>当北京丧失国都身份，政治地位为之一变，各类人群的不同反应绘就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旧都社会风貌图。新旧政权转换之际，各方利益需要调整、重塑。

国民党在北京建政，带动各方势力涌入，北京城内一时人声鼎沸，众多组织与社会团体纷纷活跃起来，据黄尊三的记述：“有国民党市党部、国立九校之代表团、国民党京汉铁路特别部、顺直特别政务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直隶第一路司令部、京师总商会之治安维持会、文物临时维护会，此外如京兆各团体，旅京公会，各大学之学生会，五光十色，极人类自谋生存谋活动之能事。”<sup>⑤</sup>

新政权建立之初的一个重要动作就是改旗易帜。为迎接阎锡山入京，王士珍一方面在国务院为其预备住所，另一方面要求赶制青天白日旗。<sup>⑥</sup>北京警察也通知各商号，要求悬挂青天白日旗。8日上午晋军之商震部入城之后，“青天白日旗已遍布京市，即小街僻巷亦见党旗与新国旗之飞扬，投机者且沿街叫卖，每旗一面，索值四五角不等焉”。<sup>⑦</sup>《申报》报道：“沿途欢迎新入城军之人，拥如山积，市内遍悬青天白日旗，表示欢迎。”<sup>⑧</sup>

商户与学校是悬挂新旗帜的重点场所，成衣局迎来了一波好生意，原本四五角的一面小旗，竟涨至一元余，大旗则八九元不等，一时门前皆书“本局出售大小青天白日旗”字样。据说长安街有某成衣局定货约有2000余份，“想可发一次小财矣”。<sup>⑨</sup>不过，由于时间仓促，一些旗帜或尺寸不对，或图案有错，“‘白日’的四周有超过十二（或者不足）的白角还不算，有的竟成了花瓣的样子，挖了心，成了一朵平面的菊花图案”。<sup>⑩</sup>面对“革命”的突然到来，北京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有些猝不及防。

与青天白日旗帜相伴随的是“中山”符号到处飘飞，广泛渗透进旧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近几日来，其他像洋服店亦大做中山服，扇铺亦大印中山扇，书局亦大制中山章，钟表行亦大卖中山钟，眼镜公司亦大售中山镜”。<sup>⑪</sup>翻看当时的报纸广告、墙壁招贴或是商店门口的大标牌，“中山布、中山呢、中山眼镜、中山餐，几于一切的货物都是中山……等到店伙拿出来布来，仍是不改旧观的芝麻布”。<sup>⑫</sup>此

① 《从北京到天津的印象》，《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7日第1版。

② 尧日：《北方军事政治渐上轨道》，《申报》1928年7月3日第3张第11版。

③ 《北京治安维持会之成功》，《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1日第1版。

④ 《中央政治会议对京兆直隶区名称问题之决议》，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4页（总第4046页）。

⑤ 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下），1928年6月7日，第723页。

⑥ 许宝衡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3册，1928年6月7日，第1250页。

⑦ 《北都易帜记》，《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0日第2版。

⑧ 《京人欢迎晋军入城》，《申报》1928年6月10日第3张第9版。

⑨ 月伴：《国军入京前琐纪》，《国闻周报》第5卷第26期，1928年7月8日。

⑩ 青见：《革命过了以后》，《语丝》第4卷第30期，1928年7月23日。

⑪ 《关于中山》，《大公报》（天津）1928年7月2日第5版。

⑫ 霞：《再到的北京》，《大公报》（天津）1928年10月9日第11版。

外还有“中山头”“中山靴”“中山装”“中山丛书”“中山公园”等，以此为了表明北京是“革命的”。<sup>①</sup>

大学也不甘落于人后。张作霖安国军政府时期，曾对北京教育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将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在内的国立九校合组为京师大学校，引发各校反对，尤以北大态度最为激烈。国民革命军进城之后，“时局转机，京学界顿呈活泼气象，尤推国立各大学校行动露骨，积极将学生会次第恢复，并努力从事复校运动”。<sup>②</sup>6月6日清晨，北京大学东斋门前已见有党旗飘摇，学生组建复校运动委员会，将文理法三科京师大学招牌尽行拆毁，恢复“北京大学”校名，发表复校宣言，声称北京大学“跟着北伐的成功而复活了”。<sup>③</sup>对于北京师范大学而言，6日早即悬党旗，校内遍贴有“欢迎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派”等醒目标语。北京法政大学也从“京大法科”招牌中得以恢复。此外，朝阳大学、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也有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庆祝活动。清华大学虽处西郊，反应同样迅速。8日晨起已有国民党背景的学生在大礼堂前悬挂红底之青天白日旗，校园内到处贴满各种颜色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之类”。9日，北京城内已经恢复原状，各处城门在短暂关闭之后照常开放，“惟到处悬青天白日旗，晋军往来市街”。<sup>④</sup>

对于北京商家来说，在商言商，也最看重社会环境的稳定，于是迅速拥抱新政权。京师总商会作为临时治安维持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不遗余力。国民革命军甫一入城，总商会派副会长冷家骥、会董姚秀岩等携物资前往慰劳军队。<sup>⑤</sup>冯玉祥部进驻南苑之后，因无可靠之财源，发行军票或钞票亦皆不可能，数万大军之军需支出最终只能依靠北京实业界暂时筹措。<sup>⑥</sup>6月22日端午节前，北京商银两界紧急筹垫40万元，用于支持国民革命四路集团军，但也劝诫当局“从速收束军队，裁减名额”。<sup>⑦</sup>

相比于冯部，阎系晋军的给养更有保障，但在入城后面临货币兑换的难题。晋军军饷原是山西省银元票，也称晋票，通常情况下需兑换银元，才能在北京市面流通。但因时间紧迫，兑现不及时，士兵只持晋票，令商家无所适从。商震进城后即与总商会会长孙学仕协商，要求通知各商号暂行通用晋钞，待交通便利后即照数兑现。总商会积极活动，居间协调，婉劝各商家暂时使用晋钞。阎锡山入京后也专门召集总商会孙学仕、冷家骥及董事多名商谈晋票流通问题，并担保“绝不使商民稍受损失”。<sup>⑧</sup>不过，此举并未完全打消京师商人的疑虑，钱业公会、米粮公会、纸烟公会纷纷致函总商会，询问兑现办法。阎氏为打消商人顾虑，决定先拨10万元现洋兑换晋钞，又决定在北京成立山西省银行，以便兑换。京师总商会也设立兑换处开展兑换业务。<sup>⑨</sup>

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对于不同政治身份与立场的群体而言，实际意味大不相同。此时居住在北京的郭曾忻忧心忡忡，他与友人谈及：“前此辛亥名为种族革命，亦为政治经济之革命，然老生宿儒，偷息其间，遗秉滞穗，尚不至尽绝生路。若此次革命，则文学之大革命，且一革将无复兴之望矣，可哀已！”<sup>⑩</sup>几年之后，与郭身份相当、经历类似的瞿宣颖也将此次变动视为北京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节点，“北平的风俗……大约在戊辰（1928年）那一年，改变的最多”，“整个的多年蕴藏之重器国宝，逐渐移转，而丧失其固有意义，其多年沿袭依赖的社会秩序、人民生计，也受绝大之波动……北平之历史意义，从此殆摧毁无余矣”。<sup>⑪</sup>二者的表述一个发生在事件初起之时，一个是时过境迁之后，但传递出来的态度则

① 青见：《在革命的气氛中》，《语丝》第4卷第37期，1928年9月10日。

② 《北京各校之新气象》，《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9日第3版。

③ 《北大宣言 复校运动成功》，《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5日第2版。

④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1928年6月8、9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2、73页。

⑤ 《总商会昨开紧急会》，《北京益世报》1928年6月7日第3版。

⑥ 《北平政闻·晋钞问题与冯军给养》，《申报》1928年6月24日第2张第8版。

⑦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4期，1928年6月24日。

⑧ 《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1928年6月17日。

⑨ 《晋钞明天兑现》，《世界日报》1928年6月27日第7版。

⑩ 窦瑞敏整理：《郭曾忻日记》，1928年8月26日，第207页。

⑪ 铢庵：《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0月1日，第108页。此时，一位江南地方知事符璋也

是共通的。他们都属北洋旧人，从各自际遇考察，确实受此次“革命”冲击不小。

郭、瞿二人此时感慨的是文化巨变、国体消亡，而对于许多原北洋政府的中下层官吏而言，则不啻经历人生之一大转折，生计问题已经摆在面前，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北京自元代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国都所在，政治职能是推动城市运转的重要动力，由此衍生出大量“以官为生”的职业官僚，他们及其眷属的存在是支撑城市消费的重要力量。瞿宣颖曾记述说，北京在1921年以前都是官僚的鼎盛时代，“一个人兼上几处差事，竟有拿到千元以上之薪俸的。既食厚禄，又享清福，承平未远，雅道犹存。于是上衙门之暇，买买古书，玩玩古董，听听名脚（角），逛逛西山，优哉游哉，聊以卒岁”。<sup>①</sup>

由于北京丧失国都身份，中央机构多数南迁，导致相应职业需求急剧减少，大量工作岗位消失，“数千衙门小吏，顿起恐慌。而全城商会，向恃官僚为主顾者，今亦深为惶恐”。<sup>②</sup>郭曾炘记述说“当民国三四五年间，朝野欢娱，一般号为政客者，樗蒲倡优，挥金如土，气焰咄咄逼人”，“今则若辈落拓者十有八九，其奔走而横死亦略可缕数”。他有数百家同乡闲散京官滞留北京，无以度日。期间也有同乡计划发起救济之举，商量资送停职人员眷属“回南求援”，但郭氏本人对此也没有信心，“时异境迁，南中诸贵人不知肯垂悯否也”。<sup>③</sup>

其实，进入1920年代之后，北京一般官僚（包括高校教师）的日常俸禄就很难完全保障，欠薪、讨薪、裁员已属常态，但许多家庭尚能勉强维持。此次政权变动所引发的职业冲击则前所未有，甚至导致“官不聊生”现象。郭曾炘曾对此分析说，由于科举之风过盛，导致“士趋于贡举之一途，以官为家，不复知有治生之计”。一旦做官之路不通，薪水不继，则“住无可住，归又无可归”，惟有坐以待毙。<sup>④</sup>这些官吏往往承担家庭的全部收入，一旦失业，拖累的不仅是自己，更是全部眷属。当时流行一个词就是“灾官”，梁启超在致女儿的家信中描述说“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sup>⑤</sup>《申报》报道：“自国都奠定后，北平之倚官为活者，失所凭藉，欠薪累年，日食早不继，更有欲归不得之苦。平沪各慈善机关，遂实行遣送大批之灾官。”<sup>⑥</sup>从1928年秋开始，北平灾官及失业人员分九批被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送至上海，人数约2300人。<sup>⑦</sup>不过，此举仍属杯水车薪。

进入冬季之后，一些灾官的生活更遭重创，“灾官均系上等社会人，顾惜脸面，不肯领粥。子女环泣，终日不得一饱，至今犹穿单衣。典质已尽，告贷无门……最可惨者，某胡同内张某，在某部当差多年，历年欠薪，已难支持。今又失业，贫病交迫，全家大小四口，已两日不食。尚有四书一部，饭碗四只，茶壶一把，售洋九角。买面回家，和毒做饼，全家毒死，身上均着破单衣，观者无不泣下”。<sup>⑧</sup>据报道，前北洋政府财政部赋税司科长刘邦俊“在家赋闲、一贫如洗，断炊两日，又不肯出门乞讨”，与妻子在家自缢，独留两子。<sup>⑨</sup>

不仅原北洋中央机构受到冲击，北京众多高校也被波及。1928年6月底，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开始接收北平国立高校，只拨给维持费1万，分摊到各校就只有几百。<sup>⑩</sup>据报载，“大学院远在南都，蔡子

---

有与郭曾炘、瞿宣颖相似的表述：“清亡于辛亥，孔亡于戊辰。”参见温州市图书馆编，陈光照点校：《符璋日记》下册，1928年8月15日，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49页。

① 铢庵：《北游录话（二）》，《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第428页。

② 《西报对于北京地位之两说》，《申报》1928年6月17日第3张第9版。

③ 窦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记》，1928年7月22日，第197页。

④ 窦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记》，1928年12月31日，第140页。

⑤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2-763页。

⑥ 太玄：《灾官访问记》，《申报》1928年10月20日第6张第21版。

⑦ 《北平失业官僚九批到沪》，《申报》1928年11月8日第4张第15版。

⑧ 《两处灾民待赈孔亟》，《申报》1928年12月14日第4张第14版。

⑨ 《北平灾官之惨状》，《申报》1929年1月18日第3张第9版。

⑩ 《北平九校维持费一万元》，《申报》1928年7月27日第12版。



民兼差四五，对于北方教育实嫌过于冷淡。如高师问题，迄无解决，接收九校，但讲裁员，转瞬暑假将竣，招生尚无布置，师生皇皇，人心不安”。<sup>①</sup>北京国立各校的教师不断上书国民政府、大学院及地方当局，争取经费，这种乱象正是先前局面的延续。自五四运动之后，北京教育界教潮、学潮、索薪潮等相互交织，学生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教育系统内部蔡元培与李石曾的派系斗争一直比较激烈，这种态势直接影响到本次接收工作。<sup>②</sup>由于正值暑期，因招生、经费等问题高校迟迟无法开学，直接影响到很多教师的抉择。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钱玄同听闻北方将推行大学区制，为增加收入，于是决定转投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sup>③</sup>

不仅许多国立高校陷入动荡，即使如清华这类经费相对充裕者也面临命运未知的考验。当时有清华将要解散的传闻，在校教师吴宓为此寝食难安。此事虽被迅速辟谣，虚惊一场，但他已经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旧日北京大学一派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事”。由于自认与这些新派人物不属同一阵营，吴宓曾设想单纯做一教授，“自行潜修，以进于学”。陈寅恪作为吴的好友与同事，也从学业进步角度劝其留守。吴表示，“非不得已，不离北京”，即使北京教育界真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还可以在辅仁大学等校谋职。“然去留之分，出处之际，今亦难遽定。惟近颇自安义命，不为深忧过计，静待其变化展露可耳”。吴宓对未来出路很迷茫，“近感于国难迭乘，危机四伏……生死不能预期，祸福亦非尽由己”。<sup>④</sup>

类似吴宓这一群体属于比较典型的观望派，反映了当时许多类似人物的共同心态。他们与新当政的国民党政权没有渊源，政治态度相对中立，对于未来也没有长远安排，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见机行事。原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的李景铭就观察到：“自三民主义侵入北平后，除奔赴青天白日旗帜下，甘为投机分子外，余皆观望怀疑。”他虽然暂无生计之忧，可以略事休息，闭门读书，“但亲朋失业者多不知如何方能挽回劫运也”。<sup>⑤</sup>当友朋问及黄尊三的日后安排时，他有清醒认识，“吾人对于革命，毫无工作，此时只有冷静以待革命之成功”。<sup>⑥</sup>再以当时正担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的许宝衡为例，虽然暂时还不会为生计发愁，但作为国民党曾经的“对立面”，处境不佳。当他得到张作霖将要出关的消息后，感叹“政局又将变矣，随波逐流，不知此身何归矣”。左右他作出决定的因素有很多，家庭眷累尤其需要重点考虑。<sup>⑦</sup>不过，许氏仍读书、游览、会友，工作节奏也一直如常。在国民革命军进城之后，他密切关注时局，基本能够做到沉着应对，积极配合新政府的交接工作。当战事纷乱、各种消息纷飞、时局讯息万变之际，以静制动应该是一个更加妥帖、现实的选择。

### 三、北京的“革命化”，还是革命的“北京化”？

1946年，沈从文曾回忆1928年夏天的北京：“凡革命军所到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即无不热烈欢迎帮助，使军阀的私兵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革命军既得顺利推进，不多久，于是北京城的市民，就有机会见到着布军服的白崇禧将军，在公园茶座上站起演说，向群众解释北伐目的和意义了。”<sup>⑧</sup>当时正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冯友兰后来也有类似表述：“北方久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凡是南边来

① 《今后之北平》，《大公报》（天津）1928年7月30日第2版。

② 刘晓：《李石曾与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期，第149-152页；许小青：《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1925—1929）》，《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7-88页。

③ 余连祥：《钱玄同年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46页。

④ 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1928年5月18日、6月13日、6月14日、7月4日，第62、76、77、85页。吴宓的预感确实非常准确，随后国民政府宣布曾担任蒋介石秘书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出身于北大，为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是典型的“北大派”。

⑤ 李景铭：《六二回忆》（三），《近代史资料》总13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37、140页。

⑥ 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下），1928年6月10日，第724页。

⑦ 许宝衡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3册，1928年5月31日、6月2日，第1247、1248页。

⑧ 沈从文：《忆北平》，《大公报》（上海）1946年8月4日第1张第1版。实际上，京津易帜之际，沈从文已经迁往了上海，但他描述的这些细节基本属实。

的人，都非常受欢迎。”<sup>①</sup>二人都因国民党先前展示出的革命朝气而对其有所寄望，国民党也必须适应作为执政党的这种身份转变，正如媒体评论所言：“一到革命军底定幽燕之日，当然便是革命党钞票兑现之时，是以北伐成功，革命政府责任乃益加严重。”<sup>②</sup>国民革命军进城确实也带来了新的政治空气：

曩时军阀时代，所谓军政要人，机关领袖，罔不狂嫖滥赌，夜以当日……今则革命诸军政要人，大致均能了解，颇愿接见。彼卫戍部帅府园前第三集团军之朴实，南苑与北小街二四集团军之和蔼，较之北京原有各衙门之差役，实有礼貌万万，与胡化之奉军比，更无待论。所惜现今办公地址，多为旧时衙所，旧日恶役，闻多未有更动者。如卫戍部，则多旧军事部之差役，战地政委会，则多旧交部之差役，此辈虽不敢再摆架子，而劣性生成，一副讨厌脸面，终觉不受看，盍彻底改易，以新耳目？<sup>③</sup>

这一观察反映的是政权过渡时期北京城内的新旧交织，而借此还可发掘更深层次的内容。国民党在北京建政的过程中，无法斩断与原北洋政府的联系，仍需借助原有基础，正如那些旧时衙所的差役，仍多有留用。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北京军事方面由阎锡山负责接收，政治方面则由战地政务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负责。“战委会”为1928年3月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而设，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指挥，“处理战地民政、财政、外交、司法、交通各政务”，相当于占领区的临时政府。<sup>④</sup>此时，国民政府再次强调，“战委会”作为总负责机关，承担京津地区的官吏任免与行政体系重建等职能。

在具体交接过程中，阎锡山与“战委会”之关系如何协调成为关键。阎作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职责被明确限于治安。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后，首先接管的就是城防。阎也多次表态，将专责任于卫戍，政治事项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但因其进驻在先，阎锡山一方面训令原北洋政府各部院机关，“慎密保管档案文件，静候中央各部派员来北京接收”；另一方面又以财政税收机关（崇文门关）、京奉、京绥铁路管理、天津海关等关系重大、不能中止办事为由，先行委派人员前往代理。<sup>⑤</sup>另据《顺天时报》报道，阎锡山一面电请南京政府速定官制，一面就其职权内委派人员，包括京津卫戍司令部参谋处朱绶光、秘书长贾敬德、察哈尔交涉员潘连茹、天津交涉员苏体仁等都占据要职。<sup>⑥</sup>对于一些机要部门，阎锡山提前抢占先机，为日后控制北平铺路布局。

6月13日，蒋作宾率“战委会”进入北京，随即宣布对原北洋政府的司法、外交、交通、农商、实业、财政、教育等部门实行接收。同时，“战委会”又以人力有限，电请国府各部、院速派专员北上办理接收。<sup>⑦</sup>蒋再次申明，“战委会”设立之目的就在于“使军队专力作战，不必旁鹜”，解决军事、政治混合不分之流弊。<sup>⑧</sup>阎锡山此时也致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示先前因“事机紧迫，不得不权予处理”。既然“战委会”已到，“一切政务，均交由该会主持办理，以明权限而昭统一”。<sup>⑨</sup>此后不久，国民政府再派专员周震麟偕秘书杨熙绩等约20人前往北京，接收前总统府、国务院以及各机关等相关事务。<sup>⑩</sup>

新旧政权转换之际，人事安排最为各方瞩目，尤其是一些重要岗位，往往成为争夺焦点。接收初期，“战委会”以铲除附逆分子、澄清吏治为由，采“革命手段”，命令旧有各机关人员一律停职。但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② 《京津善后之亟务》，《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21日第1版。

③ 《旧都新闻见》，《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7日第2版。

④ 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第2册，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162页；《战地政务委员会条例》，《国民政府公报》第39期，1928年3月，第4页。

⑤ 《京直政务悉交战委会》，《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5日第3版；《北京晋军安辑人心》，《申报》1928年6月14日第4版。

⑥ 《新局面中 一批新贵》，《顺天时报》1928年6月13日第2版。

⑦ 《过渡中之北京政务》，《申报》1928年6月17日第4版。

⑧ 《北京政闻·蒋作宾之重要谈话》，《申报》1928年6月24日第2张第8版。

⑨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第999页。

⑩ 《北京接收人员出发》，《申报》1928年6月18日第4版。

随着接收区域日广，人员不敷应用，于是蒋作宾又致电国民政府，“惟各机关停职人员，不无聪明才智学识专长之辈，务恳早日厘定办法，量才录用”。<sup>①</sup>随着接收工作的展开，“战委会”在京津任命或加委的官吏愈来愈多，其自身成员亦可直接担任职务。蒋作宾就曾联合阎锡山向国民政府保荐战委会民政处主任仇鳌担任北京市长。据报道，一周之中随战委会北上之300余人，连日已任知事、税局、公安局局长等百余席。“旧官僚请谒战委会多至数千人，仇鳌、蒋作宾大苦，仇已病，其同乡欢迎会，大都谋饭碗”。<sup>②</sup>蒋也因拜访者络绎不绝而特别发出公告，以限制会客时间。<sup>③</sup>

此时，“战委会”可谓大权在握，烜赫一时，“一般目光，以该会在兹军事未终、北京政治分会尚未成立之时，为处理过渡期间一切政务之唯一机关，故皆予以非常之重视”。<sup>④</sup>此种情形引发外界批评。当时社会流传，“战委会”到京后委任众多官吏，其中有不少腐化分子。在北平举办的祝捷欢迎大会上，也有人因战委会委任投机分子过多而“讥中央革命不澈底”。<sup>⑤</sup>南京市党部要求中央撤销该会，“该会自成立迄今，不特成绩毫无，而措置尤多荒谬，民众啧有烦言……该会份子复杂，腐败已达极点，职员共有一千余人，尽属旧时之贪官污吏，种种设施，非特不能力图改革，且有更甚于军阀时代之官僚……又查最近京沪各报称，北京官僚三千余人，纷纷进谒战地政委会主席蒋作宾，大肆活动”。<sup>⑥</sup>其中内容含有明显夸张成分，并非全部属实，但也不是完全捕风捉影。6月30日，国民政府以“平津收复已久，军事告终，河北省政府及北平、天津特别市政府委员、市长亦已次第任命”，正式结束“战委会”使命。<sup>⑦</sup>

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之初，各种情况瞬息万变，很多问题都暂时没有标准答案，需要依靠各路领袖协商，一些偶然的、随机的因素往往能够左右事件的最终走向。各个部门如何有序衔接，确保各项已经达成的协议不走样，不变形，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国民革命军这样一种暂时的军事联盟框架下，各方首先需要确保的仍是各自集团的利益，在实际接收过程中，“抢夺胜利果实”的现象时有发生，“革命”阵营内部的冲突并不鲜见。以北平特别市市长一职为例，最先有“战委会”推荐仇鳌出任，被南京国民政府否决后又出现“双簧”局面。在国民政府已经明确委任何其巩的情况下，阎锡山与蒋作宾仍推举何成濬宣誓就职，足见当时各方争夺之激烈，情形之复杂。<sup>⑧</sup>在京奉铁路局长的人选问题上，也出现了“阎锡山前已派员，而政委会现又派员”的冲突现象。<sup>⑨</sup>

梁启超在当时给子女的家信中也谈到这一现象：“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间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嘴里却个个都说要裁兵）。 ”<sup>⑩</sup>梁氏的观察确实敏锐，统一告成，国民革命军各方对外纷纷主张“息兵”，裁减兵员，但暗地里都在积极扩张，表面和平之下，实则暗涛汹涌。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黄尊三就与友人感叹：“谓裁兵事各方皆无诚意，仍属权利地盘之争。”<sup>⑪</sup>《大公报》记者也在永定门外看到，“大车载给养甚多，而城内城外复见晋国两军悉有招募新兵之旗帜，又殊令人感叹无已也”。<sup>⑫</sup>

① 《战委会系临时性质》，《申报》1928年6月27日第4版。

② 《战委会工作甚忙》，《申报》1928年6月18日第4版。

③ 《战地政委会移入交部后昨已开始办公》，《顺天时报》1928年6月15日第2版。

④ 《战地政委会入京后之措施》，《申报》1928年6月23日第2张第8版。不过，对于一些更重要职位，战地政务委员会至多只有建议之权，没有决定之权，主要取决于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博弈。

⑤ 《战委会系临时性质》，《申报》1928年6月27日第4版。

⑥ 《京市党部请撤战地政委会》，《申报》1928年6月23日第2张第8版。

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1928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71期，1928年6月，第4页。

⑧ 参见《何其巩之表示 对国府委为北平市长事 未发表意见》《世界日报》1928年6月27日第2版；《何成濬就职后》，《世界日报》1928年6月28日第3版；《北平市长之两何》，《大公报》1928年6月27日第2版。

⑨ 《战地政委会在北京接收案卷》，《中央日报》1928年6月17日第1张第3版。

⑩ 《与思顺书》（1928年6月23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5页。

⑪ 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下），1928年6月27日，第728页。

⑫ 《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1928年6月17日，第4页。



新旧政权更迭，许多机构需要重组，引发人事大洗牌，旧都各色人物为差缺竞逐奔走。《申报》报道：“北方甫经易帜，庶政停顿，失职之政客文人不下三两万人，均欲乘此革命方终、训政开始时，谋一位置，鱼龙漫衍，极尽钻营之能事。”一批投机分子受“党权高于一切”吸引，“竞争加入，所谓腐化分子，在所难勉”，“冒牌党籍者，大有人在”，以致一些老党员“反望望然去之”。<sup>①</sup>瞿宣颖看到的情形是，“长腿的赶忙跑到南京，依然是参事、秘书、顾问、咨议，家眷住在北平，一年回来几次。老实些的，改行谋个教馆，也还可以对付。至于那些不济的，就只好老死牖下”。<sup>②</sup>《大公报》也有类似观察：

北京为数百年建都之所，官僚习气，蒂固根深，而社会一般生活，亦胥赖“官僚”而维持，年来做官已成末路，而依官为生者，官味犹浓郁如故，每有政变，辄有无数巧官滑吏，蠕蠕而动，今则一声霹雳，普遍参官。新式之投机分子，固然很多，旧式之奔走钻营，依然不少。各重要机关，从早至晚，踵门投刺者，多半为求差觅事之人，或称为阎商旧属，或谓为供职多年，或临时恭上条陈，或高呼有权生活。阎商久历官场，尚能相当敷衍，惟白崇禧为崭新人物，殊以接见此辈客人为苦。其副官某君曾云：“最讨厌是穿马褂的人，总指挥见过一次，决不愿再见第二次。”<sup>③</sup>

国民党新政权延纳北洋旧官僚，引发党内人士忧虑，“自京津克复以后，今天说这个敌人投降了，明天也说那个敌人收编了，顽强险诈的敌人，到了此时，果都有觉悟吗？我想未必都是信仰我们的主义，大多是屈服我们的威力”。<sup>④</sup>尤其是一批年轻激进群体对此现象大力抨击：“现在的国民党里，难免还有一班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党的混账，他见到国民党的威猛，便投机加入附从，当然他的头脑是不纯洁的，一旦给他的建设政权，他便要横行起来，充足他的兽欲，因此恐怕社会要受这班人莫大的影响。”<sup>⑤</sup>要求将这批旧官僚与政客势力彻底铲除，进而创造一种新纪元。<sup>⑥</sup>

国民党《中央日报》此时也刊发文章，要求“严防北方官僚政客混入本党”，因为北京是一个“销人窟”，“假如你没有孙行者进入八卦炉的本领，他立刻便可以使你的人格化为灰烬”。<sup>⑦</sup>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则提醒：“每到登峰造极之时，亦即一败涂地之日。”<sup>⑧</sup>胜利背后隐藏危机，有国民党人发出警告，“本党自前年出师北伐以来，党务，政治，军事，成了一个畸形的进展；政治跟不上军事，党务跟不上政治”，“旧污满布的一个环境里面，新治的末由进行，不言而喻。若不将这些旧污，完全洗涤，那么，五色国旗，何必换做什么青天白日？总理总长，何必改做什么委员主席？大家要晓得我们此次这大的牺牲所克复的北京还留得半点旧污么？还能再蹈辛亥的覆辙么？”<sup>⑨</sup>这种呼声既是一部分国民党人基于以往失败的教训而发出的预警，同时也有借题发挥的成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是国民党内部分失意群体对新当权者发动的进攻。

国民党虽然在北京确立了统治，但其革命精神不仅没有相应推进，反而呈现萎缩态势，“从广东到武汉的高潮，流到北平时只是一股每天在流的小川”。<sup>⑩</sup>此时，作为国民党党外人士的黄尊三记录了一位朋友的言论并表示认可：“谓今日革命，均是假的，人面兽性，何尝为公，如此革命，乃革贫民及好人之命，恶人仍居高位，窃大权，不改常态，挥金如土，何能致太平？”<sup>⑪</sup>《现代评论》也评论说：“文人”不脱科举思想，武人抱着地盘思想。”“在党政府之下，投机，幸进，朋比，缘引，把持，割据之风何等

①《北伐成功后之北方情况》，《申报》1928年6月28日第3张第9版。

② 铢庵：《北游录话》（二），《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

③《旧都新闻见》，《大公报》（天津）1928年6月17日第2版。

④ 何浩：《北伐成功与辛亥革命之比较观》，《党军半月刊》第3期，1928年7月1日。

⑤ 谭誉洪：《克复北京和我们应有的注意》，《血路旬刊》第1卷第5期，1928年6月20日。

⑥ 钟天心：《克复北京以后目前最紧急的两个问题》，《再造》第10期，1928年，第9页。

⑦ 雪崖：《严防北方官僚政客混入本党》，《中央日报》1928年6月11日第1张第3版。

⑧ 何浩：《北伐成功与辛亥革命之比较观》，《党军半月刊》第3期，1928年7月1日。

⑨ 任：《克复北京以后》，《策进周刊》第2卷第40期，1928年6月19日。

⑩ 许虚：《纸花撩乱的北平文化》，《新时代月刊》第3卷第5-6期（新年号），1933年1月1日。

⑪ 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下），1928年7月1日，第729页。

的盛！许多人徒有权位之念头，不以事业为重。长此下去，党藉等于科举的变形，革命便是造地盘的机会。”<sup>①</sup>这些观感并非个案，北伐虽已告成功，而政治能否走上正轨，国家能否向上发展，尚有很大疑问；国民党的建设之路，仍要花很长时间来走。

当北京变成北平，张作霖时代“阎锡山的假面具”“洪水猛兽的共产党”“孟子讲道图”一类的宣传图书，已刷洗一净，变成了各色纸张、石印黑字的标语，如“拥护革命领袖”“民众武力”“不平等条约”等。“就是中央公园，从前何等风雅，现在也变成了宣传品大观园”。<sup>②</sup>不过，大部分民众并不理解这些“格格不入”的新鲜口号与名词，他们期望的只是“取消一切苛税杂税”的标语可以兑现。望眼欲穿，却等来了新的税吏，只能自我安慰，“其先整理而后再取消吧”。正如《语丝》的一位作者所感受到的，“革命到来所给予我的刺激，也只是那一下，那仅仅一些神经的震动；过后，冷了，消了”。<sup>③</sup>对周作人而言，虽然五色旗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但“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本来北京与北平就只差了一个屁（P）字”而已。<sup>④</sup>周作人因此认为这不是“北京的革命化”，而是“革命的北京化”。<sup>⑤</sup>

#### 四、余论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和平”接收北京，北洋政府统治终结，但这只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暂时性平衡”。政权交接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函电频繁往还，协调各方利益，确保京津实现和平过渡。各方虽能够达成表面协议，但暗地之间则嫌隙渐张，各怀心事，相互关系远未理顺，慷慨陈词之下仍是一副争权夺利景象，无法掩盖地盘与军队扩张的现实考量。

新旧政权过渡之际，原有秩序被打破，各类人群需要重新寻找并确立在新社会中的位置，有人观望风色，积极寻找新出路，伺机而动；有人寝食难安，焦虑自身生计，但亦无可奈何；有人随遇而安，淡然处之；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以不变应万变。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不确定性”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因此生出普遍的“宿命感”，对未来的规划也大多是方向性的轮廓。

国民党新政权建政之后，北京延续数百年的国都地位遽然丧失，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连带影响，市井萧条，社会民生更显紧迫，各种痼疾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国民党新政权承诺的支票绝大多数不能兑现，“宣传上似乎百废俱兴，事实上直是一事无成”，<sup>⑥</sup>与北方民众的期望值相距甚远。

1928年国民党政权只是在名义上确立了对北平的统治，实际上并未能够真正扎根。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平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仍是若即若离，国民党在北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国民党势力并未深入渗透北平社会，从而造成了彼此的割裂，对于很多北平民众而言，他们始终视国民党为外来政权，始终保持着“观看”的视角，始终缺乏接纳与认同。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 松子：《北京下了以后》，《现代评论》第8卷第185期，1928年6月23日。

② 《这就是新北平？》，《大公报》（天津）1928年12月4日第3版。

③ 青见：《革命过了以后》，《语丝》第4卷第30期，1928年7月23日。

④ 北斗（周作人）：《北京与北平》，《语丝》第4卷第31期，1928年7月30日。

⑤ 岂明：《通信》，《语丝》第4卷第28期，1928年7月9日。

⑥ 《南北气象不同》，《大公报》（天津）1928年12月11日第1版。

## 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sup>\*</sup>

林浩彬

**[摘要]** 丞参设置起源于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促进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出现关于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讨论。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决议在各部普遍设置丞参。相比于日本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清季仿照日本实行新内阁官制,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被认为缺乏效率,被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取代。清朝试图裁撤各部丞参,只是因丞参的出路问题以及部分部院的抵制而未能彻底实现。丞参兴废对于清末部院官制与内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丞参 部院官制 内官制 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140-12

以尚书、侍郎(合称堂官)与郎中、员外郎、主事(合称司官)为主的六部官制,是隋唐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重要官制,并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一并构筑起整体的内官制。上述官制由于清末丞参兴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丞参为左、右丞与左、右参议的合称,二者是清末新政以后各部普遍新设的职官。丞参兴废贯穿了清末新政的各个关键阶段,展现了不同阶段官制改革的新特点。该问题不仅决定了清末新政以后各部官制改革的成效,同时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其他内官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密切相关。丞参兴废作为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改变了既往各部官制的立意、体系、架构,更成为改变整个内官制立意、体系、架构的关键,对于近代中国的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清末丞参兴废的问题,此前学界主要在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部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侧重于介绍特定部院丞参的设立时间、人员组成、职能等基本内容。<sup>①</sup>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清末设置丞参对部院职官专门化的影响。其中,李文杰注意到清末外务部设置丞参与总理衙门的渊源关系,并重点考察了外务部丞参人员的来源与去向。<sup>②</sup>刘文华则从部院内部官职调整的角度,介绍了清末丞参设置、职掌与存废之争的大体过程,提出其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认为设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保举制度与近代中国的铨选转型研究”(CZS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浩彬,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苏 南京,210023)。

<sup>①</sup>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8-209页;王奎:《清末商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77页;杨帆:《清末度支部机构及职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s1期;苏全有:《论清末邮传部的人事管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鞠方安:《中国近代中央官制改革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3-104、232页。

<sup>②</sup> 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73-428、435-445页。



置丞参“符合了行政近代化的潮流”，而丞参存废争议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选任中的“腐败行为”。<sup>①</sup>总体而言，学界对于丞参兴废中起源、讨论、定制、裁撤过程的梳理仍有不足。本文拟重点关照丞参兴废与清朝原来的部院官制、内官制以及日本中央官制的立意、体系、架构的关系，考察丞参兴废与裁撤书吏、裁撤九卿<sup>②</sup>等相关问题的关联，展现清末官制改革寻求专门化的曲折过程，探讨其对于近代中国官制转型的长远影响。

### 一、改设外务部与设置丞参的起源

在庚子议和期间，由于北京公使会议要求清政府设立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其开始筹划将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由行在政务处、在京政务处与吏部商订外务部官制。<sup>③</sup>其中，按照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鹿传霖的设计，外务部的官制方案先由行在政务处拟稿，再交在京政务处商定。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初，行在总理衙门提出外务部官制草案，强调其升转等方面“均照六部旧章”的原则。不过，行在总理衙门章京刘宇泰等人对此并不认同，指出外务部相比六部存在“事繁责重，额缺应多”的特殊情况。因此，相比于旧的六部，外务部官制更应注重拓宽司官的升途，“以资鼓励”。假设外务部变通六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保送四、五品京堂的旧制，不仅无法拓展外务部司官的升途，甚至不如六部司官的升转待遇。在其看来，外务部既然无法额外设置京卿以提供出路，就应在六部与总理衙门升转旧制基础上拓宽升途，“在京出路，自以郎中升转京卿及同员外保送御史为定”。<sup>④</sup>

与之不同，五月初七日，京师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瑞良、顾肇新等拟订外务部官制九条方案，强调外务部“有总核之事，有分任之事”，讲求熟悉部务，这与六部的运作模式不同。因此，瑞良、顾肇新等强调，外务部的职官设置必须特殊对待，在仿照六部定例的基础上，“仍应参酌总署成规”，<sup>⑤</sup>使其同时兼具总核与分任的功能。由此奠定了外务部官制杂糅总理衙门与六部官制的设计基调。

其中，瑞良、顾肇新等提出“请酌设卿缺”的方案。在他们看来，改设为外务部后总理衙门章京由差遣改为实官，依照六部的升转体制已不合适。为此，瑞良、顾肇新等建议在该部添设职官，“拟请照内务府三卿之例，添设同文馆四品卿、五品少卿，满、汉各一缺，提调馆务，即充总办”。该项职官从原来的总办章京等人中“请旨简用”，使得熟悉部务的郎中、员外郎“迁转不出一途”，<sup>⑥</sup>符合各国外务部用人专门化的取向。按清朝旧制，寺卿等京堂是六部郎中、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等后续升转的重要对象，因此新设“卿”与“少卿”等职官，实际有将原先作为升途的寺卿移植、嫁接到外务部体制之内的意味。

不难看出，上述方案的实质是将总理衙门的提调、总办章京合二为一，变通总理衙门提调、总办章京的机制并移植到外务部之内。新设的四品卿、五品少卿负责原来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处理的事务，并从后者之中选择。编制与原来总办章京的人数相同，品级则分别与郎中、员外郎或总理衙门章京的升途对应。可见，上述设计实际便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等直接改为外务部职官，实现本职与差遣合一，促使其成为事实上新增的职官层级。

六月，行在政务处已经议定，外务部“在侍郎以下、章京以上又设三、四品参议二员，体制如京堂。遇本署侍郎缺出，固可充补，即六部侍郎缺出，亦可升补”。<sup>⑦</sup>新设职官的品级与实质与前述方案截然

① 刘文华：《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② 清代的九卿有大小九卿之分。此处主要是指小九卿，一般指宗人府府丞、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学士、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鸿胪寺卿、通政司通政使及顺天府尹。

③ [日]川岛真著，薛轶群译：《晚清外务的形成：外务部的成立过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④ 《本署拟改官制额缺应多并宽予出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8。

⑤ 《据总办等酌拟改外务部章程九条钞录咨会一并核议具奏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7。

⑥ 《据总办等酌拟改外务部章程九条钞录咨会一并核议具奏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7。

⑦ 《外部新章续志》，《新闻报》1901年7月21日第1版。

不同。新的“参议”与侍郎的品级更加接近，更便于司员在本部直接、迅速升转，并且“体制如京堂”，愈加贴合此前京师总理衙门提出的仿效内务府三卿的方案。同时，外务部的“参议”可以升补各部侍郎。可见，该项设置更多是为了拓展该部职官的升途，而非出于简单的职官专门化的考虑。

由于外务部事属初创，各方对于该部新设职官的名称、级别、编制、升途等存在分歧。行在与在京的政务处大臣围绕此事反复讨论。此后，有消息称，外务部官制已由行在政务处将方案送京，规定“侍郎以下又设三品左、右丞各一员，四品左、右参议各一员，以本署总办升补斯缺”。<sup>①</sup>和此前的各种方案有别，新方案开始明确设置“丞”与“参议”的名称、品级与编制。

分设“丞”与“参议”进一步体现了不同品级职官的区别。对应清朝九卿职官的品级来看，设置三品“丞”比三品“参议”更加名正言顺，并能与堂官、司官的品级上下衔接，构筑起上下贯通的部院职官体系。此外，政务处确定“丞参四员以总办充补”，实际上等于正式承认将总办章京由差遣改为实官。随着外务部官制日渐清晰，政务处进一步规范丞参承上启下的地位与升途，“体制在堂官之下、司员之上，可升本部侍郎”，<sup>②</sup>使其与六部堂司直接、大小相制的职官体系截然不同。

按罗惇齋的《宾退随笔》所载，外务部设置“丞参”的方案由京师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提出。在设计外务部官制的过程中，顾肇新因其郎中的身份，“自揣必不能得侍郎”。设置丞参可在品级差别悬殊的郎中与侍郎之间架设升转的桥梁。顾肇新为个人的前途考虑，“乃建增设丞参之议”。可见，该方案实际是顾肇新为个人的前途所设的。不过，该提议虽被外务部“长官纳之”，却遭到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会办外务部大臣王文韶的抵制，按照该说法，王文韶认为外务部设置丞参弊大于利。各部堂官与司官品级相差悬殊是基于职官“大小相制”的设计。二者虽然区分尊卑，但可以堂司直接，“本无隔阂”。设置丞参作为总核职官，只会在二者之间增加职官层级，对政务运转“徒生障碍”。为此，王文韶主张采取倚重司官的举措，维持旧有的部院官制以代替设置丞参。据该笔记称，外务部设置丞参的进程一度受阻，直至王文韶去世之后才得以实施。<sup>③</sup>

实际上，上述说法存在不符史实之处。一方面，盛宣怀早在七月初二日就向在京的政务处大臣李鸿章通报清廷在外务部设置丞参的决议，“丞参照办。本日具奏，奉旨依议”。<sup>④</sup>为此，李鸿章还就外务部丞参的选任对象提出意见，“外务部丞参应在总办、帮办各员内，择其尤为勤能者”，符合丞参“以资熟手”的功能要求与设计初衷。<sup>⑤</sup>另一方面，王文韶在商定外务部官制过程中实际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其日记所载，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他“午后到外务部，随同庆邸核定丞参并章京二十四缺”。<sup>⑥</sup>可见，王文韶至少未对外务部设置丞参展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甚至还亲身参与制订丞参的具体编制。

十一月，政务处大臣奏定的外务部章程决议“拟设左右丞各一员，正三品；左右参议各一员，正四品”。明确外务部职官在本部升转，“左右丞缺，以左右参议开列奏请简放。左右参议缺，先尽郎中，次用员外郎。由该部堂官保送引见，请旨录用。遇有该部侍郎缺出，先尽左右丞开列”，体现对外务部职官“以专责成”与“优予升阶”并举的宗旨。此举改变了六部郎中与总理衙门章京升转到其他机构的惯例，“所有郎中例应保送四、五品京堂员缺，即无庸开列”，<sup>⑦</sup>开始打破原来的内升外转的体制。如果说外务部的司官设置是仿效六部、体现“分任”的宗旨的话，丞参设置则是在原先总理衙门的运作机制下改头换面，体现“总核”的要求。

①《外部缺述闻》，《申报》1901年7月26日第1版。

②《外部事宜汇闻》，《新闻报》1901年8月23日第1版。

③《记各部丞参》，[清]罗惇齋著，孙安邦、王开学点校：《罗瘦公笔记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④《盛宗丞转西安来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97页。

⑤《寄西安行在军机处》，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399页。

⑥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52页。

⑦《具奏遵旨会议总署改设外务部酌拟章程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8。

综上可见,外务部设置丞参是结合总理衙门、六部与九卿体制的产物,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并非仅仅只是职官专门化的考量,这也为后续该问题产生的一系列困扰埋下伏笔。在外务部率先设置丞参之后,新设的商部亦仿效其设立丞参。随后,户部等开始“请设参丞”。<sup>①</sup>在清朝旧的六部中,户部与刑部是特别讲求熟悉部务的机构。二部的重要事务分别汇总于北档房与秋审处,并选择熟悉部务的司员充当总办、领办等差遣,新旧部院体制有别。户部提议设立丞参,无疑提出了六部是否设置丞参的命题。

## 二、整顿部务与关于六部设置丞参的讨论

清代六部原先以依据例案办事为基础,在说堂、画稿等方面大体形成堂官、司官、书吏之间区分尊卑又大小相制的运作体系。各部堂官、司官由于频繁迁调等原因通常无法熟悉部务。书吏则往往凭借对各部例案的熟悉而掌握其解释权,进而出现舞弊。清末新政开始之后,裁撤书吏、删订例案等成为时人主张整顿部务的主要方针,而裁撤书吏等无疑会改变旧有的部院体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受吏部裁撤书吏事件影响,御史王诚羲奏称六部书吏舞弊的根源,在于司官无法久任而不熟例案。因此,在六部裁撤书吏之后,部务需要责成司官,如何保证六部“官皆久任”是下一步整顿部务的关键。为了实现六部官员久任的目标,王诚羲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完善旧制。此前六部通常从郎中、员外郎中选择资深人员,充当各司掌印、主稿或各部领办、总办等差遣,由其处理主要事务。在其升转时则由堂官通过奏留以保证熟手。因此,需要保证该部有重要兼差的司官久任,“期以数年不调”。二是新设职官。仿照外务部、商部的事例,在郎中以上“添设参议、左右丞各缺”。以此为司官提供升途,“使各部自堂至司在署办事常有始终行走之员”,<sup>②</sup>解决其在本部久任的问题,实现以专责成的目标。可见,其将设置丞参视为裁撤书吏后整顿部务的一大抓手或进一步举措。

不难看出,王诚羲提出的两套方案存在逻辑关联,与此前外务部设置丞参的方案大同小异,主要目的还是为处理重要部务的职官寻求新的出路。正因如此,有说法称,王诚羲的上奏背后有人事的影响,“此事发端由于吏部”,“所谓吏部建议开办,明指张玉叔(指张检,张之洞之侄,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而言。有人谓此事为张玉叔所运动者,颇近是”。<sup>③</sup>与之前外务部设置丞参的事例相似,提议六部设置丞参似因吏部官员考虑自身升途而推动。

吏部在清朝六部体制中地位显要,该部是否设置丞参对六部官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加之同期朝野裁撤六部书吏的呼声高涨,裁撤书吏以后的六部官制如何调整成为现实问题。政务处认为六部设置丞参与“官制攸关”,奏请清廷通咨各衙门“各抒所见,开具说帖,以凭汇核”。<sup>④</sup>最终该请求“奉旨依议”。<sup>⑤</sup>

需要指出,上述问题虽因裁撤书吏而起,但实际牵扯的问题已经超出六部官制,涉及到内官制的整体。在清朝的内官制中,九卿是六部司员后续升转的重要对象。裁撤九卿则意味着部员原有的重要升途被打断,以及内升外转体系被打破。另一方面,被裁的九卿将面临着安置的需求,而新设职官的六部无疑将是去处之一。因此,是否裁撤九卿成为制约六部普遍设置丞参的关键问题。

正因上述问题关系重要,在各方上呈说帖之前,政务处已先行商议如何处理裁撤九卿与六部设置丞参的关系问题。有消息称,政务处曾规划解决两个问题的先后次序,分清轻重缓急,提议六部先行“添设丞参”,再讨论裁撤九卿问题。<sup>⑥</sup>此后,政务处又筹划通过将六部丞参与九卿的人事对接,“九卿衙门

①《会议》,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4页。

②王诚羲:《奏为吏部裁革书吏统筹无弊之法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440-006。

③[清]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498页。

④奕劻:《奏为请旨会议添设各部丞参官制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442-057。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⑥《裁撤九卿再志》,《大公报》1905年5月28日第2版。



之堂官由各部出身者仍回本衙门，授以丞参”，<sup>①</sup>实现新设职官与裁撤旧署并举。尽管如此，政务处仍未就该问题作出决议，而需根据各方说帖的总体情况再做决定。

随后，各机构的人员陆续就六部设置丞参一事展开讨论并上呈说帖。六部设置丞参无疑会改变原来堂司直接的体制，引发堂官与司官权力关系、架构的重组。由于新设丞参对自身权力、利益的影响不同，六部堂官、司官对于设置丞参的意见有别，“闻各司员以为然者多，各堂官不以为然者较多”。<sup>②</sup>其中，户部主事徐士瀛认为六部设置丞参有两大益处：一是丞参能完善旧的堂司直接体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使各部职官的权责更加明确，乃整顿部务的关键所在。二是便于各部司员在本部升迁，有利于各部职官专门化。不过，六部设置丞参需要两个配套举措：一是仿照外务部、商部酌减堂官数额，减少相互牵制。二是专以本部司员升补，保证丞参来源的专门化。<sup>③</sup>

前面提到，设置丞参的本意是方便本部司员久任与升转。实际上，清朝旧的官制体系遵循内升外转的设计，六部、翰林院、卿寺、都察院等机构的职官因此存在升转的关联，“皆不能不出衙门”。<sup>④</sup>清朝通过职官在各个机构之间升转，既能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职官之间的流动，又使得职官不断历练以积累行政经验，还可防止其在固定职位上结党营私。设置丞参则体现了各部上下贯通的用人专门化趋向，无疑会对清朝原来内升外转的官制产生强烈冲击。为此，翰林院编修陈伯陶在回复户部侍郎戴鸿慈的书信中，就对戴鸿慈赞同六部设置丞参的说帖提出异议。陈伯陶分析了内升外转与上下有序官制之间的矛盾，认为清朝内升外转的官制讲究总揽与综合，而基于专门化考虑而设置的丞参不适合讲究综合的官制，“今议以丞参升尚待，盖冀其有益部务耳。然但知一部之益，此非惟不足任秉钧之重，即于所管部亦恐有覆餗之虞”。<sup>⑤</sup>

另一方面，清末新政开始之后，翰林院、卿寺、都察院等机构面临裁改的危机。在此情境下，各部官制的变革更加引起上述机构职官的担忧。在设置丞参之前，翰林院官员是各部堂官的主要来源。对此，时人总结称：“未设丞参以前，各司而上则侍郎矣，尚书、侍郎皆为翰林坐致之地，部曹无与焉”。在各部设置丞参之后，各部堂官的选任来源随之发生剧变，各部司员与翰林院官员的升途乾坤颠倒，“设丞参，取部曹之资深或外官之道府擢之，于是部堂始易人”。<sup>⑥</sup>翰林院官员的升转空间被各部司员挤压，导致“清望顿减，极盛而衰，亦其变也”。<sup>⑦</sup>由于设置丞参对仕途升转的利害关系各异，翰林院与各部官员之间的意见截然对立，“闻翰林院开坊诸人均极力运动不设，以既设丞参，则翰林院升途更窄也”。<sup>⑧</sup>

其中，大学士孙家鼐就声称政务处会议“不以设丞参为然”。他认为，六部改造升转旧制就可实现所谓的官员久任与专门的目标，“郎中独不可径升侍郎邪”，不必有所更张。换言之，六部官员的专门、久任、升转与新设职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受其影响，翰林院官员对六部设置丞参之事也是集体反对。在领会孙家鼐的意见之后，翰林院官员就如何写作说帖展开商议，其中“鞠农（指李傅元）欲作一总说帖，嘱恽薇生（指恽毓鼎）以此意叙入”。<sup>⑨</sup>而据翰林院侍讲恽毓鼎所述，此后翰林院的说帖是孙家鼐指令其撰写。恽毓鼎所写的说帖主要对设置丞参“设四说以驳之”，并且据说该说帖“寿州（指

① 《议设六部丞参详述》，《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7月5日第4版。

② 《各部添设丞参问题》，《时报》1905年7月7日第6版。

③ 徐士瀛：《上户部书》，《绶紫集》，出版者不详，1926年，第123-125页。

④ 张亨嘉：《添设丞参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83页。

⑤ [清]陈伯陶：《复戴少怀前辈书》，卢晓丽校注：《陈伯陶诗文集校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29-330页。

⑥ 《记部曹》，[清]罗惇齋著，孙安邦、王开学点校：《罗瘦公笔记选》，第254-255页。

⑦ 《京官变局》，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3-34页。

⑧ 《翰林院阻设六部丞参》，《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8月4日第4版。

⑨ [清]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499页。

孙家鼐)颇赏其骏快”。<sup>①</sup>

光禄寺卿、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则列举了设置丞参的三大问题:一是设置丞参以革除书吏旧弊并非对症下药。二是丞参的品级与部分京堂相同,体制则介于各部的堂官与司官之间,地位尴尬。在改变堂司直接体制后,丞参难以与堂官、司官划清权限,无法各司其职,只会给各部的运作制造障碍。三是设置丞参会改变内升外转的体制,阻碍内阁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官升任六部堂官。如若实行兼顾各方的补缺利益的措施,则有违六部设置丞参的初衷。所以,张亨嘉提出参考刑部秋审处人员内升外转的旧制,实现六部用人专门化的目标,舍弃另外设置丞参的举措。<sup>②</sup>

不同于上述观点,都察院兵科则认为,六部添设丞参是基于整顿部务考虑,并且外务部、商部已设丞参,必须要求各部官制整齐划一。不过,全由部员升任丞参有损京官之间升转的平衡。为此,都察院兵科提出了结合上下贯通与内升外转旧制的变通方案,六部设置的丞参“其叙补半取之本部郎中,半取之九卿”,<sup>③</sup>将丞参补缺的机会向九卿等其他职官开放,从而提升六部设置丞参的可行性。

事实上,此前御史与六部郎中同时可以保送四、五品京堂。各部设立丞参无疑会打破旧有京官升转体系的平衡,对于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续的升转难免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有说法称:“且各部设立丞参,皆自郎员以渐跻卿贰,惟御史终身沉滞,皓首台郎,才智之士视为畏途矣。”<sup>④</sup>因此,都察院兵科新旧杂糅的方案,实质是协调用人专门与疏通仕途的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谋求自身的补缺利益。如此考虑周全,据称政务处王大臣“金以为然”。<sup>⑤</sup>

综上可见,由于设置丞参的利害关系各异,围绕六部是否设置丞参,不仅翰林院、寺卿、都察院与六部之间存在分歧,各部之内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总的来说,各方的意见可分为三类:一是赞成六部设置丞参,认为其有利于各部职官专门化。同时主张应该裁撤九卿,保证丞参只由部员而非九卿等升任。此外,需要裁减各部堂、司官员数量,取消满汉复职,以及厘清丞参与堂、司官员的权限,以此真正实现各部官员久任与专门的目标。二是反对六部设置丞参,认为设置丞参只是为部员提供升阶。其与堂司权责不明,反而增加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效率。并且会破坏原来的部院职官升迁以及内升外转的制度。为此,主张沿用或改良六部设置各司掌印、主稿或领办、提调的旧制,代替设置丞参以实现专门化的目标。三是提出折衷意见,认为六部在设置丞参之余,需要平衡九卿等与各部司员的补缺利益作为配套措施,平衡专门与升阶、内升外转与上下贯通之间的关系。

对于说帖中支持与反对六部设置丞参的总体情况,媒体的报道则有所不同。有媒体称,支持六部设置丞参的说帖占据多数,“统计说帖分为三类:(甲)主添设者;(乙)主不添设者;(丙)主添设丞参,请裁尚、侍各一缺,不分满汉者。甲类约占十之六,乙类约占十之四,丙类不及十之一”。<sup>⑥</sup>不过,由于各机构针对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说帖数量众多,媒体也难以探知其中准确的比例。与上述报道相反,有媒体则声称,反对六部设置丞参的人员占据多数,“大约主不添设者约十之七,主添设者十之四,丙类则不及十之一”。<sup>⑦</sup>可见,各机构针对该问题的态度存在着明显分歧。结合现有材料以及后续政务处的行为来看,官员中反对六部设置丞参的比例应该占据多数,导致政务处无法根据说帖的总体意见立即作出决策。

总体而言,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六部职官是否需要专门化以及如何保证专门化。是设置丞参

① [清]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② 张亨嘉:《添设丞参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5册,第583页。

③ 《兵科会议添设丞参呈都察院说帖》,《申报》1905年7月12日第3版。

④ [清] 赵炳麟:《请改给事中为殿中侍御史疏》,黄南津等点校:《赵柏岩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3-434页。

⑤ 《兵科会议设丞参事》,《大公报》1905年7月23日第2版。

⑥ 《添设丞参议分三类》,《新闻报》1905年7月19日第2版。

⑦ 《记政务处添设丞参之说帖》,《时报》1905年8月2日第6版。

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设置丞参需要哪些配套举措,尤其是如何确保丞参来源的专门化,其背后很大程度是各机构职官的升迁利益问题。这也成为此后丙午官制改革亟待回应的问题。

### 三、丙午官制改革与各部设置丞参

清末预备立宪,清朝确立了仿照日本进行官制改革的方针,首当其冲的是内官制改革的问题。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初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会銜上奏,二人认为清朝六部与日本的中央官制相比缺乏“辅佐官”的角色,“至新设各部特置丞参,尚有辅佐之意,他部则惟有郎、员。郎、员分掌各司,实如日本诸省之各局局员、各课课长,不可谓为辅佐官也”,由此导致各部书吏弄权。为此,改变满汉复职、大小相制的职官体制而设置辅佐官,是彻底解决书吏弊端的最佳方式。二人提出改革各部官制的两套方案:一是完全仿效日本的中央官制,将各部尚书、侍郎改为大臣、次官。二是仿效新设各部的事例,设立一尚书、两侍郎,并改变堂官相互牵制的权限、职能,“以尚书为主任官,而侍郎为之辅佐,受其指挥”。在此设计理念的基础上,“更设丞参各官”,将丞参等与日本中央官制的职官逐一对应,并据此划定职权,“丞如日本之参事,专主审议、立案;参议如日本之局长;郎、员如各课”。<sup>①</sup>

事实上,日本中央官制各省由上到下一般分为省、局、课三个层级。参事官则是设置于内阁官房、大臣官房或各局的政务官,起到辅助长官的作用,与各局局长等事务官并无明确统属关系。如此一来,该方案“丞”的定位与此前新设各部左右丞的作用不同,其与参议、司官的权限关系也存在差别。该方案通过中外、新旧制度的杂糅,在清朝没有彻底仿效日本官制的情况下,向日本等立宪各国的中央官制靠拢,促使各级职官上下有序、权责分明。“内而丞、参、郎、员”,“凡就任者必先策其悠久之功,始不致有置棋之消”,进而实现用人专门化的目标。在附上的“中央政府官制”办事权限大略中,二人强调,新旧各部“按部务繁简,各设丞参、司员等,分理庶务”。<sup>②</sup>其对各部丞参的编制未做划一要求,而是提议根据各部的实际情况处理。

随着七月官制改革的展开,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模式下,无法妥当安置的九卿等机构面临裁撤的问题。在太常寺、光禄寺、鸿臚寺被正式并入礼部的情况下,裁撤寺卿的目标部分得以落实,从而为各部设置丞参扫除了重要的外围障碍。另一方面,该时期的官制改革方案确定保留翰林院、都察院等机构。已设丞参的各部,也向卿寺、翰林院等机构的官员提供选任丞参的机会,<sup>③</sup>平衡专门与升阶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落实了上阶段讨论六部设置丞参的折衷方案。各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述机构官员反对各部设置丞参的压力。

清朝随后的内官制改革方案,主要是在戴鸿慈、端方奏议的基础上讨论修订的。据媒体披露,厘定官制大臣在此期间反复讨论“汰尚书、侍郎之缺额,裁冗员,设丞参”等官制改革之事。<sup>④</sup>其中,编纂官制大臣载泽更是力主在各部设置丞参,对此起到重要作用。据称,各部设置尚书一人以及左右侍郎、左右丞参,不分满汉,该方案由载泽“领班奏明两宫先行办理”。<sup>⑤</sup>有消息则称,在讨论各部官制的过程中,载泽积极主张仿效新设各部官制,“拟编各部两侍郎,外设丞参”。<sup>⑥</sup>

期间,各方围绕设置丞参问题主要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各部仿效外务部等新设部院的官制,改为一尚书、二侍郎,并且设置左右丞与左右参议,取消满汉复职的职官设置。<sup>⑦</sup>二是部分仿效日本的内

<sup>①</sup> 戴鸿慈、端方:《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第3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2页。

<sup>②</sup> 戴鸿慈、端方:《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第3册,第382页。

<sup>③</sup> 参见拙文《丞参选任与清末部院用人专门化问题》,《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sup>④</sup> 《会议厘定官制要闻》,《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第2版。

<sup>⑤</sup> 《部缺议定纪闻》,《大公报》1906年9月18日第3版。

<sup>⑥</sup> 《本馆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9月22日第4版。

<sup>⑦</sup> 《电报一》,《时报》1906年9月27日第3版。



阁官制，将各部尚书、侍郎分别改为大臣、副大臣，同时保留丞参设置，新旧、中外制度杂糅。<sup>①</sup>三是全盘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各部职官除了改设为大臣、副大臣以及各局局长之外，取消丞参设置，转而仿照日本各省大臣官房的规制。<sup>②</sup>

不难看出，上述方案与戴鸿慈、端方奏议的方案大同小异，而清朝是否直接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改革各部官制，成为制约丞参是否设置以及如何设置的关键。由于清朝最终并未决议仿效日本实行新的内阁官制，只是借鉴了日本中央官制的设计理念，清廷高层多数还是倾向于上述第一种内官制改革方案，即全部仿照此前新设各部的官制。对此，友人在与盛宣怀的书信中也透露该时期官制改革进展的传闻，声称“各部设丞参、尚书一、侍郎二”。<sup>③</sup>同期，已见过编制局制定的各部通则的徐兆玮也声称，各部“仍设两丞、两参加参事数员，毫无更动”。<sup>④</sup>

九月，清廷正式颁布《各部官制通则》，在“分职以专任”的原则下，规定各部设置的职官包括左右丞、左右参议以及参事等。同时指出，外务部等设立的丞与参议“阶级虽分，事权无别”，应进一步为二者设置专门的办事机构，“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确划分各部丞与参议的权限、职能，改变新设各部中二者“事权不明，尚多窒碍”的局面，作为对上阶段丞参与堂官、司官权责关系争议的回应。上述举措可使丞与参议的功能更加实际、专门，而非主要为升迁所设，符合各部官制改革权责明确与专门化的取向，“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sup>⑤</sup>

对比《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可以看出，左右参议的权责由原来制定各部规章制度的“立法之事”改为“谋议之事”，<sup>⑥</sup>与戴鸿慈、端方奏议对应日本中央官制确定丞与参议的功能不同。可见，厘定官制大臣对于丞参的权责划定仍存分歧，并且期间曾作出调整。为此，各部甚至试图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划定内部职官的权限，“本部大臣司法，丞参行法，郎中以下立法”。<sup>⑦</sup>实际上，各部丞与参议原先的职能区分，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部院职官内部“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分别。后续的修改方案则更多体现了二者在“行政”下的配合。此举应与官制改革将各部定位为三权分立体系中的行政机构相关。正因如此，有说法称，各部承政厅兼有“行政、司法之性质”，而参议厅则兼有“立法、行政之性质”。<sup>⑧</sup>上述现象体现了丞参设置并未直接对应日本的中央官制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设计，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清朝此前官制偏重行政的设计理念。相比于日本基于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同时承担了更多行政的功能。

《各部官制通则清单》则明确了丞参的编制与具体职责。规定左右丞各一人，“承尚书、侍郎之命，总核承政厅兼考核各司重要事务”。具体负责的事务包含各部原先由各司掌印、主稿以及堂主事、司务厅、档房等负责的人事、文书、财务等庶务。实际是将原来分散到部内各机构的重要事务，以及清末新政后各部新的人事、财务自主权集中管理，收归于上。另一方面，左右参议各一人，“承尚书、侍郎之命，总核参议厅事务兼审议各司重要事务”。<sup>⑨</sup>主要负责处理各部的章程条文。实际上由丞参代替各司主稿、书吏等担负制定章程等权责。

上述条例实际是根据此前新设各部的相关章程、实践，同时结合日本中央官制中“参事官”“秘书官”的权责而定，在各部新增兼有总汇、辅佐功能的职官与机构。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举措是调整各部的

①《各部尚书侍郎改为大臣下设丞参》，《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9月27日第2版。

②《京师近信》，《时报》1906年9月28日第2版。

③陈旭麓、顾廷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辛亥革命前后》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④[清]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711页。

⑤《庆亲王奕劻等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进呈折》，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第3册，第515页。

⑥奕劻：《呈拟厘定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84-044。

⑦《各部官制权限纪闻》，《大公报》1906年10月17日第2版。

⑧《会议改定官制详细情形》，《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10月25日第4版。

⑨奕劻：《呈各部官制通则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84-043。

内部架构与相互关系，将原来各部之内与各司平行的机构、职官或差遣，整合为承上启下的机构与职官，使各部职官体系由大小相制转为上下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各部官制通则清单》还借鉴此前学部的做法，在丞参之外设置了参事一职，规定参事“承尚书、侍郎之命，佐左右参议审议拟稿”，而且参事“可视各该部情形，由尚书派令助理承政厅及各司事务”，<sup>①</sup>主要起到辅助丞参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丞参与参事皆“承尚书、侍郎之命”，可见参事与丞参三者虽然品级存在差别，相互之间却无统属关系，甚至职能还存在交叉与重合。其相互关系更多是品级的上下有序，而非职能上的明确统属。“参事”在清代以前主要是一些特殊官职，此处是借鉴日本中央各省所设的参事官一职。前述的戴鸿慈、端方奏议是以各部的左右丞对应日本的参事官。与之不同，此时各部则是在丞参之外另设参事，而且其与丞参并无统属关系，显示清朝有意进一步仿效日本分类设置的官制内容与设计理念，与自身现有分层设置的制度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外、新旧官制杂糅的特点。

在清廷颁布《各部官制通则清单》后，各部基本以此为基础设置丞参，作为清朝无法彻底仿效日本内阁官制的折衷举措。只是，各部对于丞参权责的规划不一，实际的职能有别，因而丞参机构的设置亦不同。<sup>②</sup>其中，陆军部、礼部等甚至起初在其官制草案中并未规划设置丞参。该过程中清朝为了划一官制而忽略各部的实际情况，成为影响此后各部丞参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设置丞参新旧、中外制度杂糅的特点，也为清季试行新内阁官制而出现裁撤丞参呼声埋下伏笔。

#### 四、新内阁官制与裁撤丞参的纠葛

在光绪三十二年各部普遍设置丞参后，因认为设置丞参无用，御史黄瑞麒、赵熙等人曾先后奏请裁撤丞参。此后，陆军部拟订的新官制使丞参存废问题成为焦点。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宪政编查馆等厘订的陆军部暂行官制，强调该部相比于其他各部讲求运作效率的特殊性，“务使阶级较少、事类相从，一洗从前牵制、推委之习”。陆军部由于职官“责任宜专”，必须改变此前的官制，原设之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均拟一并裁撤”。<sup>③</sup>该部转而全盘仿效日本陆军省的官制，改设为陆军大臣、副大臣各一员。言下之意，设置丞参只会使该部职官层级过多，出现上传下达不顺畅以及运转效率低下的问题。增加职官层次与讲究专门、高效的官制要求并不相符，需将职官由分层的垂直化设置改为分类的扁平化设置，进一步追求专门与高效。

陆军部的新官制随后被海军部效仿，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以及各部的恐慌。随着清朝修订新内阁官制被提上日程，在丙午官制改革的基础上，清朝试图进一步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由此开启了内官制新一轮的改制。其中，各部是否仿效陆军部官制而裁撤丞参，职官由分层设置改为分类设置，进一步追求专门化与效率，成为改制的重要议题。

受制于新内阁官制的不同设计方案，关于各部是否裁撤丞参以及如何裁撤丞参，清朝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除了部分官员主张丞参等职官仍旧之外，总体来说，各方裁撤丞参的方案主要有二：一是将各部丞参全部裁撤，但为其安排出路。其中，地位显要的左丞借鉴日本官制“即改为本部秘书官”，而右丞与左右两参议则听候考试，再根据考试结果予以不同安排，合格者降级“以郎中补用”，不合格者“概作为裁缺之员，不再任用”。<sup>④</sup>该方案无意中调整了丞参原先的权责关系与内部架构，使其在贴近日本官制设计的同时，又保留了某些清朝原来部院职官的设置特点。二是全盘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李家驹提出的方案，各部的丞参与尚书、侍郎等“一律在裁撤之列”。裁撤上述职官之后，

① 奕劻：《呈各部官制通则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84-043。

② 参见刘文华：《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③ 《为厘订陆军部暂行官制大纲列表呈进一折尚书侍郎左右丞参各缺着即裁撤改设陆军大臣副大臣等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全宗》，档号：05-13-002-001002-0078。

④ 《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12月9日第6版。

各部的尚书、侍郎“改为大臣、副大臣”，郎中、员外郎等则改为“一、二、三等科员”。<sup>①</sup> 各部的其他职官可在新内阁官制中改换名目，重新定位。而由于无法与日本官制的职官对应，丞参被裁撤之后如何安排则无明确方案。

不难看出，上述各方案的核心区别在于，在新内阁官制中是否为丞参保留位置以及如何安置，其背后则是各部官制的体系与功能的定位区别，即职官是垂直化的分层设置或扁平化的分类设置。

不过，裁撤丞参在清朝高层内部阻力重重。据媒体报道，宣统二年十一月，政务处在会议各部新官制时，对于裁撤丞参问题，“泽公（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沈云沛（时任邮传部右侍郎）、那桐（指那桐，时任军机大臣）均不认可”。<sup>②</sup> 有媒体则披露了具体的消息，针对裁撤丞参的问题，载泽主导的度支部“反对最力”。作为丙午官制改革力主各部设置丞参的主要人物，度支部尚书载泽反对裁撤丞参，与度支部丞参的职能特殊以及丞参上行走人员众多密切相关。与普通部院的丞参不同，度支部丞参还兼充清理财政处、币制局的提调、帮提调，并与外务部丞参同时兼充税务处提调、帮提调等。<sup>③</sup> 清理财政处作为清朝清理各省财政的关键机构，币制局则是负责币制改革事宜的机构，可见该部的丞参权责重要。受其影响，其他一些部院也纷纷反对裁撤丞参，“而外、邮、农三部因亦随同附和”。<sup>④</sup> 尤其是此前被御史胡思敬弹劾与舆论指摘的邮传部，“其于丞参一缺保全之甚力”。在上述部院的抵制之下，各部尚书“亦因此见好，决不加以裁抑”。<sup>⑤</sup>

日本的内阁官制讲究职官的分类与精简。不过，对于上述各部而言，在新内阁官制可能诱发新一轮人事变动的背景下，尽可能避免所在部院的人员被裁撤，减少因人事变动导致内部出现混乱，从而维系行政事务的正常运转，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由此可见，如何在新内阁官制中平衡整体改制与特殊需求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分损害各部的具体利益，尤其是丞参人员众多的部院的利益，成为新内阁官制裁撤丞参能否凝聚共识、顺利推行的重要因素。

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朝成立暂行内阁，并由其主持修订新的内官制。经过一番讨论，新内阁官制规定将各部尚书改设为大臣，而各部大臣与总、协理大臣均为国务大臣，成为内阁成员。各部长官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发生转变，并且由于中央集权的需要更加注重行政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内阁官制中各省只设副大臣一人作为行政次官，而清朝原先各部则设有侍郎二人。丞参则作为丙午官制改革时期清朝无法直接仿效日本内阁官制的折衷举措，无法在日本的内阁官制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职官。因此，该时期影响丞参等是否裁撤以及如何裁撤的关键，在于采用何种内阁官制方案。具体而言，即是否将丞参与尚书、侍郎等作为旧制视为一体，从而与后者的改制一并进行。同时，改变上述职官的职能，重新理顺各部职官之间的权限关系。另外，此前各部设置丞参更多是为了安置官员以及为官员提供升途，而非出于简单的专门化职官考虑。因此，在新的内阁官制实施后，如何平衡各部职官精简与功能充实的关系，妥善安置各部丞参，也是影响丞参是否裁撤以及如何裁撤的重要因素。

不过，对于新内官制中各部裁撤丞参一事，度支部、外务部等“已决计不认裁汰丞参办法”。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外务部尚书邹嘉来讨论，认为两部事务繁难，必须受到特殊对待，<sup>⑥</sup> 以此作为共同反对裁撤丞参的理由。在此期间，相关各部相互联络，集体行动，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正因度支部、外务部与邮传部极力反对裁撤丞参，导致此事成为新内阁官制中“实为极难解决之问题”。为了平衡部分部院的特殊诉求与新内阁官制整体改革的需要，清廷高层被迫提出“变通办理”的折衷方案，对应日本内阁

① 《京内外新官制内容纪要》，《申报》1911年1月3日第5版。

② 《政务处会议纪闻》，《申报》1910年12月22日第4版。

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19，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54、3450页。

④ 《京师近事》，《申报》1911年1月7日第6版。

⑤ 《新官制竟有如此阻力》，《申报》1911年2月24日第5版。

⑥ 《外务、度支两部均拟添设顾问》，《大公报》1911年4月19日第5版。



官制的职官名称，将丞参一律改为“参事”，改换门面，并准许其照常办事。在新内阁官制中暂时保留该项职官的权力与地位，仅在形式上作出改变，以此向相关各部作出让步。作为临时举措，“此制即附订于暂行章程之内”。<sup>①</sup>

实际上，对于新内阁官制是否裁撤丞参、右侍郎等事，清廷高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据称，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副大臣寿勋对裁撤丞参“主张尤力”，而陆军大臣荫昌则“极力折驳，以为非宜”。针对各方争执不下的局面，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只能“从中调停”，该问题因此“卒未决议”。<sup>②</sup>此后，裁撤丞参等问题虽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核定为“必行之件”，但是各国务大臣对此“仍多不置可否”。其中，邮传大臣盛宣怀继续奏调丞参，“以表示其不裁汰之意”，借此展现出抵制裁撤丞参的态度。不仅如此，盛宣怀还准备联合此前一直反对裁撤丞参的度支大臣载泽，共同“与内阁抗议”。<sup>③</sup>正因如此，尽管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皆主张裁汰丞参，但由于邮传大臣盛宣怀、度支大臣载泽“仍主张保存”，该问题“故极为纠葛”。在此情形下，奕劻等人被迫将该问题提交摄政王载沣决断。对于该问题，载沣认为各部应在精简机构与充实职官之间寻求平衡。针对部分部院极力反对裁撤丞参等事，载沣提出“所有政务较难之各部似可通融办理”。实际上默认新内阁官制对于特定部院可以特殊对待，根据各部具体需要而定，不必强求各部一律裁撤丞参。由于摄政王载沣态度暧昧，“惟一时尚不知有何调停之法”。<sup>④</sup>是否裁撤丞参以及如何裁撤丞参的问题仍悬而未决。

在此期间，针对裁撤丞参问题仍争执不下的情况，各方又主要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改易丞参的名目。其中，由于陆军部设有参事，而海军部参照日本官制设有参事官、秘书官。因此，有人提出，将各部丞参对应日本官制改为“参事”“秘书官”等名目。使其仅是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于权利毫无损失”。<sup>⑤</sup>与上述方案相似，有人则提出，将各部丞参分别改设为“一、二等参事”，与各部副大臣等新职官“同理部务”。以上作为暂行章程，“候各部务清理就绪，再行裁撤”丞参。<sup>⑥</sup>实际上，日本内阁官制中的“参事官”“秘书官”等职官建立在政务官、事务官的区分基础之上。二者与各局局长皆属于“荐任”官，相互并无上下统属关系。其区别更多是职能的分类而非级别的高低，其级别、权限、职能与清朝各部的丞参并不相同。因此，上述方案强行将丞参与日本内阁官制的参事官等职官对应，并不讲求二者在整体官制中地位、作用与性质的差别，实际上是寻求其在新内阁官制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将各部的丞参与右侍郎一并裁撤，但妥善安置上述裁撤的职官。其中，有人提出，保留各部裁缺的右侍郎、丞参原先的品级等待遇，“拟暂赏原俸，以对品行行政官简放”。<sup>⑦</sup>有人则提出，裁去左右丞而保留两参议，在新内阁官制中寻求其合适的位置。借鉴原来各部承政厅、参议厅的设置，在各部新设总务厅，“即以各该部参议充参议，各该部丞之一充厅丞”。<sup>⑧</sup>从而避免全部裁撤丞参引起反弹，减轻改制的压力，使得新内阁官制得以顺利实施。

可以看出，由于丞参等官员品级较高，影响较大，能否事先设计妥善的安置方案成为制约裁撤丞参问题的关键。随着吏部、礼部等被裁撤机构的丞参得到安置，该问题一度出现进展。此后甚至有消息称，清廷要求各部官制原则上不设丞参，“均暂按海、陆军部成例办理”。不过，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现实情况下，丞参等“亦暂行参赞”。<sup>⑨</sup>清朝的新内阁官制并未彻底完成改制，裁撤各部丞参的问题被迫搁置，直到民国肇建之后才真正完成。

①《略更名称之新内官制》，《大公报》1911年5月19日第2版。

②《要电》，《时报》1911年5月26日第3版。

③《邮部不认新制之裁汰》，《大公报》1911年6月7日第3版。

④《监国对于新官制之调停》，《大公报》1911年6月10日第2版。

⑤《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年6月14日第5版。

⑥《各侍郎有仍得保存之耗》，《大公报》1911年6月25日第5版。

⑦《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年6月23日第5版。

⑧《改订官制之大意》，《申报》1911年8月14日第4版。

⑨《谕交各部暂照章办事》，《大公报》1911年11月22日第5版。

在南京临时政府新的《各部官制通则》中,规定各部分别设立总长、次长、参事、司长、秘书等职官。其中,各部设参事二至四人,“承总长之命,掌拟订及审议法律命令案事务”。此外,各部设秘书四人,“承总长之命,分掌总务所事务”。<sup>①</sup>原先各部丞参的职能被新的参事、秘书等职官代替,在某种程度上落实了此前清朝新内阁官制裁撤丞参的方案。虽然此后受政治体制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一度在政事堂中恢复了丞参的设置,并且不时有声音传出,北洋政府还有意在各部取消参事、秘书等职官,转而恢复原先丞参的设置。即职官从分类的扁平化设置,改回分层的垂直化设置,但上述想法一直未能实现。丞参作为清末官制改革寻求专门化的过渡,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 五、结语

清末丞参设置兼具升阶与专门的功能。在清末官员众多而不少机构的官员面临裁撤的情况下,丞参提供升阶、安置的功能愈加突显。如此一来,机构精简与充实职官如何平衡始终困扰着清政府。该问题也是此后丞参兴废的过程中,清朝始终无法直接仿照日本中央官制的重要原因。

清朝六部各司的“掌印”“主稿”与其他司官存在实际地位差别,户部、刑部的北档房、秋审处等机构的总办、领办等更是如此。上述差遣与各司官员之间并无统属关系,形成了各部官制的差遣与实职、权重与品级分离的格局。各部通过上述差遣,在保障“熟手”之外可以体现官员的资历差别与某种升转,是“阶官化的过程”。<sup>②</sup>丞参兴废无疑是各部职官体系“阶官化”变为实职化的重要过程。同时,也是将原先各部内部的机构、职官、差遣以及各部之外的临时机构、差遣,整合为新的机构、职官的行为。以此使其从原来的权限模糊变为职能明确,从叠床架屋变为结构清晰,从大小相制变为上下有序,从堂司直接变为承上启下。

上述过程的背后,是从传统的六部体制到近代仿效日本等实行新的各部官制的过渡。只是,在丞参兴废的过程中,清朝未能完全处理好中外、新旧制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改变原来堂司直接的体制之后,是仿照清朝原来设置各种领办、总办的旧制,还是借鉴日本的参事官、秘书官的设计理念;丞参设置与裁撤是建立在职官分层的垂直化体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体制基础上,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由于丞参提供升阶以及更多承担行政功能,丞参设置无法完全对照日本参事官、秘书官等政务官。丞参的层级、架构与职能、效率难以协调。同时,在丞参兴废的过程中,清朝未能处理好丞参整体改制与各部不同情况的关系,尤其是平衡新设、改设与旧有各部之间对于专门化的不同需求。在清末对改制的迫切需求之下,清朝为了从整体寻求改制的声势或象征性意义采用一刀切的举措,而未能在其中找到适合不同部院的精准差别化方案,导致官制改革专门化的进程充满曲折。

在内官制的整体改革下,各部丞参的兴废还涉及部院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机构职官的关系、地位问题。清朝旧的内升外转体制是建立在防弊、历练以及现实中官员众多迁转需时的基础上,同时其升转次序也体现了不同机构、职官之间的地位差别。在讲求实用、专门的上下贯通体制中,各部丞参迅速、直接升转则对该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原来翰詹、科道与部员内升京卿、外放道府体制亦被打破。其本质是内官制的架构、职官地位、升转体系的重新划分。在丞参兴废的过程中,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偏务虚的机构地位衰落不同,具备实用功能的部院在内官制的地位则不断提升。传统的建立在皇朝体制下的六部官制与内官制,随着近代的政体变迁,其立意、体系、架构随之发生不可逆转的转型。

责任编辑:杨向艳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sup>②</sup> 郑小悠:《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

# 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物性和无物性

——从意义发生看中西艺术范式差异<sup>\*</sup>

王才勇

**[摘要]** 艺术离不开物和物之形。呈现于艺术中的物之形分为有物性和无物性两种，由此可以从意义传达层面披露中西艺术意义发生的两种不同方式。西方艺术形式不仅即物，也带有物性，因而呈现出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其意义传达以外发生的方式实现：对象先在，意义随后出现。中华艺术形式虽然也即物，但不带有物性，形式不具有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其意义传达以内发生的方式实现：对象不确定，并且不先于意义而在，而是与之共同生长，意义在对象确定呈现之际诞生。不同的意义发生方式表征了艺术诉诸个殊性的不同方式。西方艺术形式所要求的个殊性以外在方式存在，存在于作品的外显形式中，意义传达却转向了共通性；中华艺术所要求的个殊性以内在方式存在，并不呈现于作品外显形式中，意义传达却转向个殊。数字影像艺术与中西传统艺术意义发生不同，它以超度物性的形式提供了一种不再来自主体间性的异度审美。

**[关键词]** 有物性 无物性 意义发生 内与外 共通与个殊

〔中图分类号〕J0-02；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152-10

从艺术与现实关系切入，中西艺术范式差异呈现为不同待物方式；<sup>①</sup>从造型角度看，见诸不同形象特质。<sup>②</sup>余下的便是意义发生上的不同。由于作品意义以感性方式存在，感性即形式，因此意义发生问题必须回到形式特质上。形式一方面离不开物，另一方面又不是物本身所固有，而是由人的感官建构而起，或曰物之呈现。西语将 representation 用于艺术，指的是广义的物之感性再现，而非与表现对应的再现。物之感性再现的施予者是人，接受者也是人，因此作为再现的艺术形式对人便呈现出意义，具有意义表征。诚然，作品的意义由形式特质而来，而形式特质又具体由形式呈现的物之形及其带有的物之性所致。物之形为艺术形式所不可或缺，否则，形式便不复存在，感性意义也无从发生。而形之性，也就是状物之形带有怎样的物性，则在表征人对物的态度，其间会显出间差。恰是这个间差或态度，开启了艺术形式意义传达的空间，中西艺术也由此呈现出鲜明的范式差异。

## 一、物之于艺术

艺术叙说人的情感，有关艺术的所有论述几乎都聚焦于这一点。而问题的另一面——艺术离不开物，则直接谈论的不多，深入论述的更少。当然，间接触及的比比皆是，如强调艺术的感性特点，其实谈论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华审美文化对近现代西方的影响研究”（17ZDA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才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sup>①</sup> 参见王才勇：《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极和无极——中西艺术范式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见王才勇：《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体和无体——中西艺术范式差异再辨析》，《学术研究》2022年第5期。



的就是艺术的即物性。物的存在都是感性的，只是少有就物与艺术表意的关系进行深入挖掘和披露。艺术固然离不开情感，艺术必须有传达；可是，离开了物，艺术同样无以存在。

首先，情感都是因物而生，由物而来。情感是对某物的情感，离开了物，情感就不会也无从出现。日常语境中，物一般指身外的一切事和物，情感就是对特定事或物的情感。由于情感本身离不开物，古今中外，凡是论及艺术本源的几乎都围绕这一点展开。中国早期乐论的“物感说”，即“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阐明的就是物之于艺术的本源意义。西方早期论艺的“模仿说”，虽然话语指向与中国的“物感说”有异，但是将物和现实视为艺术的关联对象，则与中国早期的论说一脉相承。艺术来自物，关联具体实事，是古今中外不争的事实。就情感传达而言，艺术也是寄情于物、借物传情的。这不单纯指艺术赖以存在的物质媒介，如色彩、线条、音响等，更是指这些物质媒介在作品创制中形成的彼此关系，比如在戏剧中就是事件。无疑，物是艺术进行情感传达的介质，是艺术的存在方式所在。

其次，古今中外就艺术所不断强调的感性特点，谈论的其实还是物之于艺术的本源意义。情感、思想、精神等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唯有借助物才能获得表达或进入人的感知，表情、神态就是鲜明体现。这里不仅指实物媒介，也包括文字。毋庸置疑，物的存在都是个体的、感性的，或曰具有感性确定性。物之感也都是个体化的、个性化的。反过来说，感性、个体亦非物莫属，唯有物才是感性的、具体的。所以，“艺术感物而生”除了表明艺术来自物之外，同时还表明了艺术的感性和个体性特点。感性和个体性是由艺术存在方式决定的。就传达而言，感性和个体性（个殊性）也是艺术命中注定的。诚然，艺术传达以情感或意义为中心，但是艺术传达是用感性方式进行的。感性也就意味着所传达的情感、意义都是依附于物，栖居于具体实事中，黑格尔就艺术美强调的“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帖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sup>①</sup>就是看到了艺术传达的这种感性特质。感性与个体性是同一层面的概念，艺术传达由于以感性方式发生，这种传达也就必然是个体性的，是单个个体面对具体作品时发生的，就像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是一对一的单称判断一样。单一不仅指空间意义上的单个存在，也包括时间意义上的单个存在。所以，如果时空改变，即便同一个体面对同一作品也会出现意义传达上的差异。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作品的意义都是“此时此地”的。<sup>②</sup>

进一步看，物进入艺术并不是径直不变、直接进入的。艺术并非物本身，而是在用形式、用艺术媒介再造出的物进行传达，即西语所谓 representation。这个传达如何，已经不完全由本源意义上的物，而是由再造出的物，即形式决定，艺术家便是这个形式的创造者。由此就出现了形式在艺术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更为重要的问题也就不在艺术来自物，不在艺术是感性的，而在于物如何进入艺术，如何成为艺术形式，也就是说，现实之物如何成为艺术中的物，如何成为进行传达的物。本来，物无所谓形式与否，形式本是人感物的产物。换句话说，形式是一种概括，像点、线、面等都是概括的产物，它不代表物的全部，却是人感知到的物之所有。就根本而言，形式非客观自在，而是主观的，形式是人创造的产物。恰是这个创造，使得物，也就是进入艺术中的物对人具有了意义，行使着传达功能。一件作品传达如何，具体就由这个进入艺术中的物而来，就由呈现为艺术形式的物决定。

呈现为艺术形式的物也就是对人进行传达的物。单纯来看，这样的物具体栖居在两方面要素中：媒介和形相。长期以来，艺术都在以直接物，即实物为媒介进行表达，如文字、颜料、线条、乐音等，掌握电子手段后，又以电子影像和电子乐音等间接物为媒介手段。媒介在艺术中无疑参与了作品传达，无论是直接的物质媒介，还是间接的物质媒介。媒介不同，表达就不同。形相见诸视觉即造型，诉诸听觉则是音色。与媒介不同，形相本身虽然不是独立自在之物，而是以物为载体而存在，但它无疑是物呈现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2页。

②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社会学三论》，王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自身的方式所在，而且是向人而呈现。因此，在艺术语境里，形相同样指向特定之物。实际上，进入艺术形式之后，媒介和形相都处于传达之中，都在向人传达着什么。就传达来看，媒介和形相存在即物程度的问题。虽然两者作为形式的承载者都指向物，但是，即物程度不同，传达就不同，也就是说，不同即物程度的形式传达出了人对物的不同态度。正如所述，但凡形式必然即物，这是形式之感性特点决定的。但是，如何即物，以及即物程度如何，则关乎形式的意义传达，体现着人对物的主观态度。因此，就切入艺术实际而言，即物程度问题更值得关注，这个问题直接关乎作品传达出怎样的意义。而且具体的作品形式中媒介与形相的即物程度还会出现不对应，典型的就数字艺术。在数字艺术中，媒介已不再是直接的物质存在，而是电子影像，但形相却高程度即物，这就使得数字艺术具有了与手绘艺术完全不同的传达。电子音乐同样如此。当然这已经达到了超常即物的程度，超常即物的意义传达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即物与通常所说的再现问题密切相关，即物程度问题可以具体化到再现性问题上。对再现的讨论一般是从艺术的现实渊源角度切入，深入到再现程度问题上的迄今不多。艺术形式由于是再造出的存在，其与实际指向的物或曰现实之间不可能完全等一，必然有间差。所以，西语 *representation* 这个词除了可以译为再现外，也可以译为表征。艺术事件中，恰是再现或曰间差使形式的情感传达具有了可能，也给情感传达带来了空间，而且间差如何，情感传达也就如何。总体而言，作品情感传达的差异最大框架上见诸形式是否与现实一致。凡是与现实一致的艺术形式传达的都是直接指向物、指向现实的情感，而不一一致则相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致和不一致在具体艺术形式中是丰富多样的，不仅多维，而且还有程度差异。艺术形式作为对物的再造，其间必然有选择发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再现程度问题皆由此而来。艺术形式就渊源而言，多多少少是一种再现；就传达而言，又多多少少是一种表现。一种艺术形式中，即物和传达同时存在，进一步看，即物程度问题就是艺术形式何种程度上带有物性以及具有怎样的物性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物有现实（已知物）和未来（未知物）之分，两者都会进入艺术形式中。无论是现实物还是未知物，共有之处都是物，都具有物性特点。但是，艺术形式中现实物和未知物的物性特点是不同的，因此传达也不同。要深入区分艺术形式就应该关注形式之物性特质。说形式即物，表明的是形式指向了怎样的物，形式之物性叙说的则是以怎样的方式即物，涉及的是形式的意义传达问题，更为切入艺术方式的细微之中。再者，凡是形式都是即物的，都与物有关。所谓与现实不一致，指的只是与现实物不一致，并不包括现代艺术热衷呈现的未知物。因此，一致与否的论断只具有相对性，不具有外延的广袤性。而物性概念就能广泛区分艺术形式的各自特质及其不同传达，不仅能一般区分艺术形式中现实物与超现实物的不同指向，而且还能在现实物或超现实物内部区分出各种物性差异。实际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艺术的差异，主要来自艺术形式带有之物性的不同，而不是出现了不同的物。艺术形式带有不同的物性指的是呈现了不同的待物态度，不同民族所待何物的差异远远小于该物展现方式上的差异，恰是这一方式标识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表明了民族性所在。就中西艺术而言，情形更是如此。主导差异的已经不在艺术展现的物不同，而是展现物的方式之不同。可以说，一个带有物性，一个不带有物性。进而，从形式之有物性和无物性角度切入，在披露中西艺术差异方面，又彰显出了意义发生的不同路径和方式。

## 二、艺术形式之有物性

就中西艺术比照而言，物性程度如何，或曰艺术形式是否拥有物性，是进行区分的有效手段。总体来说，艺术形式带有鲜明物性是西方艺术的特质所在。无论是古希腊以降，还是 19 世纪启动、20 世纪全方位展开的变革，甚至新崛起的影视，包括今天的数字艺术，西方艺术呈现的形式不仅即物，而且带有明确的物性。即物使形式拥有了物本身的形态，物性使其拥有了物的形质，媒介和形相上都如此。即物是造型感知，物性是质地感知。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如何，虽然同时受制于两者，即物之形和形之

性虽然都在从不同角度规约着整个艺术形式的特质及其表达，但更具决定性且占主导地位、引发具体意义的则是形之性，是物性与否以及如何。比如，艺术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形同性不同，效果便迥然有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许多作品都如此。相反，性同形不同的情形则一般不会出现，因为性只是形的属性，离开了形便不具有独立意义。但恰是这个属性特质主导着形式意义的发生，西方艺术形式之有物性便将其与中华艺术的分水岭昭示了出来。

西方自古希腊至19世纪中叶的传统艺术，总体上是以日常观物为基点进行创造的，所创制的形式不仅拥有物之形，形质上也带有鲜明的物性。所谓模仿、再现等叙说，都在表述这一特点。它是按照物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给人的样子去呈现和创制的，物之为物，物性之为物性所依循的就是日常观物。这一点在视觉艺术中较为直观和明显，如造型、用色、线性、布局等都呈现出日常观物捕捉到的物性特点。这就使得西洋绘画、雕塑乃至建筑艺术展现出中华艺术所没有的实感，这是应合日常视点的产物。即便莱辛在与文学比较中不是将“真”而是将“美”看成是欧洲造型艺术的最高原则，这个“美”也是包含着模仿、物性在内的。莱辛所谓的美仅是对物的布局、重组，比如整一、比例、对称等，绝非真的反面，其形之性未变，依然呈现出物性特质。这也符合自古希腊开始的一贯理念。欧洲造型艺术自古希腊始经由罗马时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巴洛克乃至浪漫派和现实主义，出现的风格变迁其实都是物象要素组合秩序方面的变化，物象之形质，尤其是带有的物性特点并没有出现变化。换句话说，写实性这一点总体未变，感性确定性依然，这是一种日常观照捕捉到的对象确定性，来自日常应事观物中将对象确定下来加以感知的行为。西方艺术形式拥有的这种感知确定性不仅见诸媒介，而且见诸形相，如水彩画，虽然媒介不再具有对象的确定性（用水稀释过），但是勾勒出的形象还是有着细部上的确定性，不像中华水墨那样由于媒介用水稀释过而在形象上放弃了细部真实。伦勃朗1654年用毛笔画过一幅题为“熟睡中的年轻女子”（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素描，淡淡的笔线和一气呵成的画像不禁令人想起中华水墨，但是对细部真实的恪守还是令画面呈现出鲜明的物性，这是中华水墨所没有的。形式之物性是西方艺术的标识所在，听觉艺术同样如此。西洋音乐较之于华夏音乐的特点就是乐音确定，没有穿行流转，织体呈网状结构的单线延伸。这是写实性和媒介物性的体现。西洋音乐史上出现的众多风格演进同样也是乐音要素的重组，乐音本身的确定性并没有变化。这种确定性与日常听觉感知是同构的，因此仍是基于模仿。西方传统艺术这种呈现物性的形式特质在文学中也是如此。完整的叙事构架，确定且直接的语义表述等，都秉承着感性确定性审美理念，都是基于日常文字叙事的物性机制而来。概而言之，形式不仅即物，也带有物性。即物是因为没有变异，造型与物象一致，带有物性是因为具有对象形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开始彻底抛弃希腊—文艺复兴传统，转向现代主义。形式不再即物，而是开始与现实剥离，出现了变异、肢解，甚至逆反、否定。即便如此，物性依然。形式不再即物指的是不再即现实之物，抛弃了从日常视角出发进行叙事，但是不再即现实之物并不意味着走向无物。实际上，现代主义绝没有走向无物，而是走向了另一种物，一种他异于现实的物。无论是变形、肢解，还是全然否定、抛弃，都是在用另一种物——他异于现实之物取而代之。哪怕抽象，也绝非无物，而是用非现实之物取代。这里，把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理解为依然有物的关键是，造型和所用媒介如颜料、色彩等都带有充分的物性。很多情况下，艺术家本人退隐到背后，任凭形式媒介这个物自行表达。由此，媒介之物性特质反而得到了放大，如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28—1962）的画便是如此，即便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也在让笔直的线条和单纯的色彩这些物性十足的媒介本身去行使表达。在现代主义那里，形式的物性特质依然存在，只是已经不是现实之物带有的物性，而是新物、他异于现实之物的物性罢了。到了波普艺术，情形又发生变化，形式创制似乎又回到现实之物，出现了传统艺术的即物和物性，其实不然。波普艺术呈现的即物表面上看取之现实，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发生变化，物之语境、氛围等已经与现实中的情形大不一样，而且微妙的细部也有变异，这就导致了全新表达的出现。新意的出现清楚表明，这已不再是原本熟悉的现实之物，而是有所变异之物。因此，波普艺



术的即物也同样不再是现实之物，形式之物性也是新物之物性，确定的感知形式指向的已经是新物所具有的那种物性。可以说，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依然带有物性，与传统艺术的区别只在于是现实之物的物性还是他异之物的物性。当然，物性不同，表达也迥然有异。

在即物的艺术形式中，新兴数字影像艺术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不再运用直接物质媒介，而是聚焦于电子媒介，数字影像艺术创制的形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双重性：一方面，影像的高清晰度展现出精准的物象，即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精细度上超越了日常感官；另一方面，指向的虽还是现实之物，但已经不同于日常视域捕捉到的现实物象。这个不同不仅体现于数字影像更加精准，更加清晰，而且还见诸即物的构架上，器械捕捉到的物象在构架上与人感官直接捕捉到的有区别。精准和清晰只是将人知觉世界的特定维度进行提升和放大，而不是肉眼观物的全部，这就进一步使得数字影像艺术带有单一的高强度即物性。虽然带来高强度即物性，图像拥有高程度的物性，但这种物性是器械提炼出来的，不是人感官直接捕捉到的。殊不知，器械只是提炼出了物象的特定部分，其高强度即物不是完整的即物，只是提炼出那些直接关涉对象辨认的部分，而人的感官感知除了含有对象辨认因素外，更多地还指向对象所处的氛围，尤其是审美感知。德国当代学者格诺特·波默（Gernot Böhme）提出的氛围美学用意即在此。对象美与不美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对象是什么，而是由对象怎样所决定。辨认上的高精度导致氛围的改变就使得影像数字艺术呈现出一种新的物性。新是就人直面现实之天然视域而言，具体有二。其一，对象感知的个体性差异消失。本来，人对世界的感知是很大程度上受个体时空状态影响的，数字技术的高清晰度将对象呈现为任何时空状态下都是等值的，这就使得感知上的个体差异消失。其二，数字影像由于机器创制，作品不再留有艺术家手工创制的痕迹。审美中观者与艺术家出现会通的主体间性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单向的认知和辨认。所以，本雅明写下了这样的话语：“眼睛对于一幅画永远不会觉得看够，相反，对于摄影照片，就更像饥饿面对食物或焦渴面对饮料一样。”<sup>①</sup>器械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艺术家的，不再带有记忆，不再是可以与之交流的活生生的艺术家，传统艺术中的主体间性不复存在。总之，数字影像艺术仍是即物的，虽然单一，但带有物性，甚至是超强度、超常规的物性。

### 三、艺术形式之无物性

相比而言，艺术形式之有物性较易理解，也较普遍，无物性则较特殊，而且一般只见诸中华艺术，可以说是切入语汇去标识中华艺术特质的点位所在。迄今有关中华艺术固有特色的表述已出现不少，如主情、含蓄、写意等，但大多从效果层面说，少有具体切入作品形式语汇中讨论的。从艺术与物这个基本问题出发，切入形式语汇不难发现，中华艺术有着鲜明的物象，音乐和文学中都有明确叙事，即物不在话下。细究之又会发现，这不是西方那种完全意义上的即物，而进入作品形式的物象又有着显然的约减，叙事已从日常氛围中剥离。概而言之，即物但缺乏清晰的物性，形式不再具有惯常的感性确定性。中华艺术创造了一种见物不见物性的形式，不仅与西方艺术截然相反，而且近乎绝无仅有。

就视觉艺术而言，形式的感性确定性来自确定的时空造型，大多体现为细部特征明显，这在中华艺术中显然缺位。在中华艺术中，物虽明确在场，物象可以清楚看见，但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之物，而是经由约减成了无时空定位之物，或曰处于穿越形态中之物，如绘画中没有光影成像，没有第三维（无纵深感），放弃体感（无重感），平涂用色且没有色差等等，都在造就一种只见物象不见物性的形式。雕塑中写实细节的缺失也是例证。此外，以泥塑木雕为主也从某种角度表明中华雕塑崇尚的是弱写实性，不固化对象，西方的石雕更能确定和强化物象的对象性。不固化对象，在物象的有与无之间取其中间值加以展现，这就使得物象虽然可辨，但物性不在场。中间值是中华视觉造型的一个鲜明特点，无论是笔线、造型，还是用色，都由于中间性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再现出对象的形；另一方面又有所去除、约减，令其不再具有完整的对象性。这是中华兼性思维在艺术创造上造就出的兼性形式——有物象，但又不完

---

<sup>①</sup> [德]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全受制于物。于是，没有完整对象性的物象就成了不带有物性的形象。所谓“离形得似”，剥离的就是物固有之形，也就是去除带有物性之形，不为物所役，但又不是全然去除，物形消失，物象还在。中国山水画“俯仰往返，远近取与”的造象法则表面上看是在造就一种流转、穿行的观赏效果，其实是在倡导不为物役的观物方式，这实际上在应合着中华艺术的兼性要求。流转穿行就是面向物但不驻留于具体之物，映照了中国文人的林泉之志，中华艺术造就的兼性形式就是这种文化诉求的写照。进一步看，只见物之形，不见物之性，便出现空灵的效果。空呼唤出了寓于对象中的灵气，所以西方学者论中国画大多聚焦在空灵（empty）上，这种空灵是西洋艺术所没有的。

兼性和空灵，意味着不确定和开放包容。不将对象可感属性确定下来，使得物象表征不指向个体意义上的特定物，而是指向贯通于众个体的物，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物，这就包容了一切个性存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确定不仅指物，也指向人。众所周知，作品形式、笔画之间会留下艺术家的心性踪迹，西语谓之投射（projection）。中华艺术不将对象可感属性确定下来，同时也就意味着不留下个人心性印迹，不作心性投射，不展现具体个人情性。比如书法，一般情况下强调要写得慢，不能快，哪怕是草书。快容易留下单纯运笔的痕迹，过于直接折射书写者个人的情性。个体性印迹也是一种感知确定性，一种可以径直还原到某具体情性的确定性。笔墨不能过于飞舞，要有内敛，目的就是不去展现确定的个人，而是展现没有个体确定性，即穿行于众个体间的人，包容因此而来。就绘画而言，这一特质很大程度上源于媒介，比如水墨，但绝非仅仅归因于此。即使用水墨，也可以画出呈现物性的造型，如写实性勾勒以及主体情性的直接折射。西人画水墨，一般一眼就能看出是出自西人之手，原因就在于呈现出物性，画面留有具体物感或个人感受的痕迹。

由是观之，中华艺术的只见物象不见物性，归根结底就是废除个性感知，不让感知指向任何具体的个体，既不指向具体之物，也不指向具体之人，不指向个体化情性。基于这一双向超越，个性感受也就同时消失。面对一件作品，虽然物象在，视看依然发生，但所见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性存在，而是贯通于众个殊的共享存在。中华艺术形式的即物使得观照必然指向现实，与现实进行比照，而无物性又使这个比照没有落处。意义便发生于如此往复穿行中。形式的中间性或曰兼性特质引发了这种在有与无、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穿行，由于穿行，形式上的空便显出灵性。这一形象特点在中华艺术诸门类中普遍存在。就音乐而言，中西方虽然都具有调性、旋律、节奏、织体等听觉再现要素，也就是说都即物，但是，西洋音乐调性、旋律、节奏是确定的，织体结构也明确，呈网状展开，彼此之间不穿行，只是处于和谐共鸣关系中，这就使得即物的听觉要素呈现出实实在在的物性，具有清楚的感知确定性；而中华音乐则不同，其听觉要素即物但不带有物性特点，原因在于彼此重叠复合，没有明确的网状织体，只有彼此之间的穿行、叠加，与现实听觉感知殊异，如此，就单个要素而言就会失落感知的确定性，无法独自生成意义。所以，西洋音乐不仅即物，也呈现出清晰的物性，而中华音乐只是即物却不见物性。作为文字艺术的文学同样如此。不过，因文学艺术形式创制比较复杂，需另做论述。

总之，物和物性是两个直接关涉艺术形式特质的概念。艺术形式必须见物，否则不再感性，但见物可以不见物性，就像中华艺术一样。这不仅表述了中西艺术形式特质的差异，更切入各自意义发生的不同路径及样式中。形质的不同直接关涉传达或意义发生的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见诸作品意义的内发生和外发生，或者说作品意义发生的内与外。

#### 四、作品意义发生的内与外

意义及其传达离不开物，但意义的发生是物或事之于人而言的。对物进行再造的艺术形式不是为实用目的，而是为引发意义服务的。形式怎样，引发的意义也就怎样。中西艺术形式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待物方式，由此引发的会意，即对意义的感知和理喻也就出现很大程度的差异。这方面少有提及但又格外值得关注的是意义的外发生与内发生之差异。

西方艺术形式不仅即物，也带有物性，这就使得意义以外在方式发生。外即外于物，由特定主观视

点出发通过观照与把握去建构物对人的意义，这与日常观物会意一致。西方艺术由于形式具有感性确定性，再现的物或对象也就可以直接与处于确定时空中的人建立关联，会意得以发生。如此而言，意义是外于物发生的。本来，物自身无所谓意义与否，是人待物之后建构了意义，见出了物对人或对他物的意义。面对这样的艺术形式，意义发生与否直接取决于观者与之是否能建构起某种关联。西方传统艺术中，由于形式的确定性，这个关联较大程度由作品形式，也就是艺术家所规约，会意较大程度由对形式的把握和领会决定。西方现代艺术中，形式变得不再确定，关联的建构有着较高的开放性，也就是说较高程度由观者所规约。尽管如此，现代艺术形式还是即物的（往往即未知物），并拥有物性，感性确定性也依然存在，会意还是外在感物的产物，即外在发生。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式只要带有物性，就会引发日常观物会意行为，日常观物会意也就意味着凭借感官与物的直接交接去捕捉对象与主体的关联。就物而言，意义便是外在发生，这是人就物进行会意的通常方式。西方现代艺术所不同的只是引发的意义与现实出现了差异而已，而会意方式未变，还是以外在观物方式与对象建构起特定关联，将意义注入新形式中。至于数字影像艺术，由于高程度的感性确定性，情形更是如此。高程度的形式确定性也就意味着高程度的物性，同时也就高程度地引发感官会意行为的出现，有高度的官能感知尾随、跟进，这也将外在观物和会意高程度聚焦在物的感性层面或曰外显层面。

西方艺术形式是日常感官能够直接捕捉和把握到的，哪怕是现实，日常感官确定性也没有改变，因此，会意总是以外在方式发生。这个外指的是意义外于物而在，不与物同体，是形式创制者注入形式中的，换句话说，是一种单纯的感知投射（projection）。亚里士多德论艺指称的必然律、或然律已蕴含着意义由人建构的思想。后来，西方艺术理论关注的联想和想象其实就是外在建构意义关联的体现，18世纪欧洲美学讨论中就审美和艺术区分的绝对美、相对美（哈奇生、狄德罗、康德等），说到底描述外在建构审美关联的两种基本形态：在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建构关联，也就是意义。这是西方艺术会意发生的不变方式。进一步看，这种外发生也可以说是意义的无机发生。由外注入、嫁接，就表明意义不是由物内部有机生发，而是无机生成。会意者与对象并没有合二为一，而是各处一方，会意只是意味着两者进入了会通、应合而已。意义的内发生或曰有机生成是中华艺术呈现的情形。

中华艺术展现的形式虽然即物，但不带有物性。即物意味着具象，有物象在，不带有物性又表明看到的物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物，往往细部不完整，体性不确定。于是，虽能看到物，视线却无法驻留细部，会不经意移向他处。由于细部不确定，这就使得见到物象后自发出现的与现实比照，也就是与前经验的勾连无法落实，外在视看无法完成，日常感官无法建构意义。但是，物象在场又不会使会意像西方现代艺术那样走向现实的反面，走向非现实、反现实或抽象。既然会意在实与虚、有与无两方面均无着落，无处可以驻留，留下的就只有穿行：从一处向他处穿行。随着穿行的展开，观赏就从单纯感官把握中走出，不再专注细部，转而通观总体。这时，视看就会发生逆转，由外视转向内视。外视指向物之外显，细部尽览无遗；内视转向物之内里，转向日常感官不经意之处（日常观物只专注于确定对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内视还是一种视，还在视看作品中的物象，只是视点从细部转向了总体，而且这个总体并非由形式之所有局部相加而成，而是由观赏穿行所及之全体促成。这样一来，内视靠的就不单纯是外在感官，而是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心领。心领不是抛开感性转向概念把握，而是驻守在感性方式中的意义领受。中华文论中的“心游万仞”（陆机《文赋》），指的就是这种心观。这就将形式感知上的外在把握（官能把握）逆转成内在生成，这是观赏过程中的双向生成：形式由物生成为美感对象，人由日常观物者生成为审美者。人与物相生相长，中国学者普遍看重的生生美学，指向的就是这种不是外在固化而是内心生成的美的对象，这是形式之无物性引发的感知发生逆转的产物。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区分形与象。关于形，庄子有言“物成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史记》云“形者，生之具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很清楚，形直接来自物，是感官即物的产物。关于象，《韩非子》云“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非子·解老》），刘勰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想”（《文心雕龙·养气》），《礼记》也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礼记·乐记》）的说法。显然，象与想有关，是主观活动的产物。形是给定的，象是生成的。中华美学一开始就将象而不是形看成是美的对象，后来变成意象，就充分表明，艺术形式中的美不是给定，而是生成的。所谓“观物取象”（《周易·系辞》）强调的就是审美对象的主观生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主观绝非主观任意，而是观物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视看对象，是视看发生逆转的产物，是从日常定点视看转向“仰观俯察”“远取近求”（《周易·系辞》）式的全景视看。由此生发的意义便不是就某一确切对象而言，不是由外注入某一固定对象中，而是随着象这个美感对象一起诞生，一起生成，此即内发生。中华艺术强调的感兴或起兴，指的就是美感经验不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经验，而是一种美感对象与美感共时生成的过程。所有这些都由意义生成过程中发生的逆转所致，中华艺术话语中出现的一系列独有范畴，如“气韵”“意象”“意境”等都是这个逆转的产物，它们不是在作品形式要素中直接指认出的，而是观赏过程中感受到的，即感知发生逆转后内心生成的。

无物性使得中华艺术形式呈现出中间性——即物但不具有物性，而中间性又使得意义感知向内转，由外在把握转向内在生成，物也就随之由外在变成内在，不是由感官捕捉，而是在内心生成。形式一旦带有物性，会意过程中的逆转就不会发生。所以，中华艺术强调“淡”，不仅媒介要淡，造型的即物程度也不能高，即物程度高了之后，就会呈现物性。因此，在中华艺术的意义传达中，作品形式并不是意义生成的唯一要素，意义的完成还有待会意过程中逆转的发生。这样，形式要素的意义就不在细部，不在单个要素，而在总体，在总体上是否引发会意的逆转。当年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在中国看到园林建筑时非常入迷，准备将之引入西方建筑界，但是，他碰到的难题是无法按照欧洲建筑界的惯例对中国园林建筑进行丈量，无法确定一些具体的建筑数据，如放几根柱子、柱子间的距离多少等等。<sup>①</sup>他可能对中国园林有一定的会意，但不知这样的效果来自总体，来自各细部促成的总体关联，而非单个细部本身，也不是各细部单纯之总和。就形式语汇本身而言，中西艺术意义发生的路径也同样对峙。中华艺术中由于会意出现逆转，意义便不再来自形式语汇本身，而是发生于语汇之外。西方艺术形式呈现物性，会意就只是发生在对确定形式要素的感知把握上，作品的传达就在语汇之内。当然，有物性的艺术形式在传达意义过程中也会触发联想、想象活动，也会出现延展和生发，现代艺术中甚至出现了无边际的意义衍生。但是，这些都由作品形式要素规约着，意义仍然发生在语汇之内。中华艺术则不再受形式要素规约，其会意发生在语汇之外、文字之外，所谓“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等，表达的就是会意的最终发生已经不再系于作品语汇，不再由形式语汇直接推导出来，而是逆转后心观过程中有机衍生的结果。

从根本上看，作品意义的内发生和外发生，体现的是不同的物感或曰不同的待物态度。基于不为物役的文化传统，中华艺术在展现物象的同时必须将物性去除；西方奉行以物为先，艺术模仿就成了对现实的全盘展现，不仅有物象，也有物性。基于此，中西艺术中对象的意义就有了内生成和外生成之分，会意也就出现依感官外发生和逆感官内发生之别。内和外，直接和逆转，表面上看是意义发生的不同路径，其实背后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文化依托。

### 五、形式会意之共通与个殊

意义的内生成和外生成表征着不同的文化行为和价值认同。艺术表征文化的基本点不外乎人与世界、个殊与共通关系中的意义建构。艺术由于媒介的感性特点，注定是一种个殊性语言，意义建构必然呈现为以个殊方式展现共通性。任何艺术都不可避免具有个殊性和共通性两方面要素，就中西艺术而言，则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西方艺术在感知层面依托的是个殊性，会意或意义把握层面出现共通性，用主体建构的意义统辖审美感性活动；中华艺术则相反，在感知层面剔除了感性形式本来具有的个殊性，创制出没有个殊性的共通形式，使感知出现逆转，而于会意层面出现了个殊性。中西艺术中个殊

---

<sup>①</sup> 参见[英]威廉·钱伯斯：《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性的落点如此不同，一方面体现了中西艺术的不同叙事方式，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不同的文化行为。

西方艺术由于形式带有物性，个殊性存在于形式中，因而物是个殊的。个殊不仅来自形式媒介本身，同时也指向投射在物性形式中的创造者，即某时某刻创造者的状态也映现在带有物性的形式中。而由于所见是个殊存在，观赏行为也就以个殊方式发生。西方传统艺术中，所见形式与日常观照一致，感知行为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得的，所以本雅明用“独一无二的此在”及“原作的此时此地性”来表征作品的“原真性”；<sup>①</sup>西方现代艺术中，所见形式与现实的一致虽然被突破，甚至颠覆，但是形式本身的物性特点未变，个殊性依然存在，只是具有个殊性的形式与日常观照不再一致罢了，观照行为的个殊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见所感还是此时此地的、个殊的、不可替代的。

艺术形式带有物性就使观照行为以确定方式发生，而且指向物之确定的外显。确定意味着对对象的界定。对象都是感性的、个殊的，界定就意味着用主观手段，比如视角、概念等将对象确定为可由主体把握的。因此，确定性是对本然个殊性的覆盖，是在特定公约工具介入下发生的。撇开如此这般的本然个殊性不论，大多情况下，个殊性话语指向的是确定下来的个体，但即便面对这样的个体，由于确定性的缘故，把握也必然以提取概括的方式发生。因此，会意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可公约性，不再像对象一样独一无二、不可复得。柏拉图区分物与物本身，表达的就是人对物的把握（理念）与对象不可能完全一致。对象是个殊的，把握则会出现择取，择取必然转向共通性和可公约性。另一方面，面对个殊性对象，由于对象独一无二，把握就会从前经验中寻找依循，理喻和领会多多少少是在前经验参与下发生的。这样，把握或会意就与既往经验出现一定程度的共通。本雅明在论述有灵韵艺术之美，即传统艺术美时也指出了前经验的主导性，他说：“那种使人对美的兴致永远不会止息的东西是前世界（Vorwelt）的意象，即那个波德莱尔称为被思乡的泪水遮住了的前世界。”<sup>②</sup>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对于个殊性对象，理喻不会再同个殊，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可共享性，至少与既往经验共享。所以会意上，西方艺术呈现出鲜明的共通性。固然会有限度差，有程度分介，但特定层面可公约则是确凿无疑的。艺术感知的可公约，其共通性虽不至于达到概念层面，不会呈现为诉诸概念的共通，但严格来说已经不再个殊，不再不可复得。换个角度说，意义本非对象固有，而是人注入其中。形式确定，注入才得以实现。会意来自人，来自人对对象的把握，把握必然有取舍提炼。于是，面对确定的形式，走出个殊进入一定层面的共通便不可避免。西方艺术，无论传统与现代，形式感知的个殊与内涵把握的会通是相辅相成的，较之于中华艺术，都给解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确定性。西方艺术外显个殊、内蕴共通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化中以一般制衡个别的理念一致，艺术形式恰好表征出这一文化范型。

中华艺术呈现出相反的情形：感知层面共通，会意层面个殊。中华艺术形式由于即物而不带有物性，确定性缺失，物象失去了个殊性的实感，形式不再个殊，成了没有个殊性的感性存在。这当然也就是不完整的感性存在。无论是绘画、雕塑、音乐，还是建筑、戏曲等，形象都没有以完整的再现性出现，个体不带有西方艺术那种不可复得的独一无二性。同时，媒介形式不再个殊，也就无以映现艺术家的个殊存在，也就是说，投射到作品形式中的艺术家印迹不带个体性，艺术家的个体视角消失。凡是折射出艺术家个体性的要素，不管是用色、线性，还是造型，均被视为有损于美的东西而加以去除。形式的中间性特质使得中华艺术不仅就对象存在而言，而且就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而言，都不会出现个殊性要素。中间性使得作品形式成为一个没有个殊性的个体，一个可以落在诸多个体中的个体，也就是说，一个与其他个体共通的个体。中华艺术形式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共通的个体。

面对这样的形式，观赏直接感知到的就不再是个殊的现实形式，而是共通于诸个体的形式。称其为共通的个体，绝非指成了共性层面的存在，其存在形态还是个体，只是没有了独一无二性，成了一个可以复得，可以落在诸多个体上的个体。这样，感知把握和会意就无法进行日常那种取舍和提炼，对象不

① [德]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社会学三论》，王涌译，第48页。

② [德]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201页。

再具体确定，取舍和提炼无从切入，也无法启动前经验相助，因为日常并未提供如此这般的感知经验。于是，把握或会意只能整个沉入对象中，不是专注于细部，而是直面对象本身。这更像是一种体性直观，又谓本质直观（Wesensschau），德语 Wesen 就具有“类特性”“共同体性”之意。这是将对象总体作为单个存在，将总体作为个体去感知，结果出现的会意则是完全个殊、不可复得的。这样说是因为将形式作为总体去感知，是当下观者个人努力的结果。作品本身还是由诸多个体和不同要素组成，看出其间的贯通和总体性有待观者铸就，也就是说，美感对象，比如意象，是某时某地观者作为个体铸成的结果，这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得的。观者由于进入全新的全景式观照，前经验已经不再渗入会意中，观照成了完全一对一的事件，原创间出的总体性或曰象与全部的此在直接相接，出现的结果必然是不可公约的。所以，中华艺术在形式上的共通和不具有个殊性，反而在观赏上触发了逆转，激活了不带任何先入因素的全身心感知。共通的外显形式引发了个殊的意义建构，这是与西方艺术完全相反的。中华艺术表面共通，会意却个殊，不具有可公约性；西方艺术表面个殊，会意却共通，呈现可公约性。换个角度说，中华艺术外显的共通形式却在会意的内世界开启了个殊赖以驰骋的天地，那是内心对世界的体味，并非感官把握到的个殊；西方艺术外显的个殊形式反而在会意上引发了先入因素的渗入，如概念和前经验，会意不再完整拥有对象的个殊性，而是进行了筛选、取舍，这就从对象的独一无二性中走出，成为一定层面的共通存在。可以说，中西之间由于文化差异在艺术形式上发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殊方式。

在这方面，数字影像艺术展现的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感知和会意上都只见共通，不见个殊。这种高程度的全面共通来自形式上的超度清晰和确定。众所周知，数字影像艺术的特点在高清晰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来自机器，而不是艺术家手工创制，这就出现高程度的共通性。“超度清晰”是相对于日常视看而言，数字影像艺术能将肉眼捕捉不到的细节加以展现，这个从未见过的形式在感知上也就无法与现有经验建起勾连和对接。于是，只能用全身心的此在投入其中，感知到的似乎是个殊的，为自己的此在独有，但是，这是一种伪个殊。这种感知者自以为独一无二的东西，其实为众多其他感知者共有，因为高程度清晰的、确定的形式将感知中出现差异的可能性近乎全部去除，以致诸个体间感知出现差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字影像艺术中，个殊性感知勾连的虽是个人的此在，但指向的却是无任何差异可能的相同对象。可以说，相对于手工创制，数字影像艺术提供了一种异度形式，引发了一种异度审美：不再来自主体间性，不再出自人际交互，只是关注当下自我情感的发生。形式由机器创制，由程序操控，不留下任何个人的印迹，会意也就不再指向他人，只是指向自己，指向自我的当下发生。这种异度形式造就了一种元宇宙审美，这是用没有个殊性的共同体形式造就着单纯当下的个殊感受，也就是说，当下感受是个殊的，但是越过当下时空，却是与他人的个殊感受一致的、共体的。当然，可以称之为伪个殊性，也可以称之为异度个殊或新个殊性。这是前所未有的的一种新个殊性感受，是人类进行个殊性印证的新方式。从个殊性在中西艺术展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看，数字影像艺术固然称不上是艺术，但是，就审美享受而言，其艺术性是不能否定的，它同样给予观赏者实实在在的个殊性享受。至于这种个殊性是否来自主体间性，是否与他人一致，已经不再受享受者关注或者说已经是次生的了。这是形式超度物性后引发的新问题。

责任编辑：王法敏



# 两个桃源的对话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关系的再探讨

李光摩

[摘要]《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异，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桃花源。《桃花源记》对应的是仙境桃源，它是陶渊明根据当时社会传说故事润色而成，体现的是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即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的思想；而《桃花源诗》则对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提出了批评，它展现的世间桃源是一种带有复古倾向的羲皇之想。这才是陶渊明所欲表达的。《桃花源诗》与《桃花源记》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桃花源记并诗》。这既是一次文体的创新，也是一次思想的对话。

[关键词]《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 《桃花源诗》 文体创新 思想对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1-0162-08

《桃花源记》(以下简称《记》)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也可以说是陶渊明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作品，而《桃花源诗》(以下简称《诗》)则相对逊色不少。但在《陶渊明集》里，《诗》和《记》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以《桃花源记并诗》的名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诗》的重要性未必就在《记》之下。那么，《诗》与《记》到底是什么关系，《诗》与《记》是否可以独立单行，它们的思想是否一致？如果《诗》与《记》作为一个整体，算是文体的创新吗？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一一进行审视。

## 一、关于《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关系的种种说法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在陶集、陶诗注本及古诗文选本里的存在形态迥然不同。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以李公焕本为底本，并用曾集等本对校，桃源诗文题作《桃花源记并诗》。其他如杨勇、龚斌和袁行霈等笺注本也都参校多种古本，题作《桃花源记并诗》，入卷六“记传赞述”类。这样看来，陶集里的桃源诗文基本上是以记为主，以诗为辅。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却一改成规，将桃源诗文移置编年诗内，以诗为主，改题《桃花源诗并记》。当然还有更特别的，如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陶渊明集》，桃源诗文被一分为二，记是记，诗是诗，各不相干。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是现存最早的陶诗注本，其中《诗》却以《记》的附庸形式出现，题作《桃花源记并诗》，附在卷四之末。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四卷，突出了《诗》的地位，题名《桃花源有记》，列在卷四之末。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参照黄文焕做法，列《诗》于卷末，题作《桃花源诗并记》。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亦是如此处理，题作《桃花源诗并记》。古诗选本如明人冯惟讷《古诗纪》、陆时雍《古诗镜》和清人沈德潜《古诗源》由于编选内容的限制，皆题作《桃花源诗并记》，《记》只是附带性质的存在。而在古文选本中，一般是把诗删去，只保留一篇记，《古文观止》即是如此。这也影

作者简介 李光摩，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响到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并通过教材影响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记》是独立成篇的。那么,《诗》与《记》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第一,视诗文各自独立。其一,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1918年,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一文,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用心结构的短篇小说。<sup>①</sup>1929年,梁启超说:“这篇记可以说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算是极有价值的创作。……至于这篇文的内容,我想起他一个名叫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sup>②</sup>把《记》视作一篇小说,这个说法自然有其根据。因为在《搜神后记》里可以找到《记》的雏形,而《搜神后记》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当中属于子部小说类。其二,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古文。如明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就将《桃花源记》与柳宗元“永州八记”等编为一卷,明显是将其视为古文。传统的古文选本如吴楚材、吴调侯编纂《古文观止》,限于选文体例,单选记,不录诗,完全将《记》视作古文。

第二,视诗文互为一体。其一,认为《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四库全书总目》“搜神后记”提要云:“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sup>③</sup>四库馆臣把《搜神后记》当作伪托之作,且把《记》当作《诗》的序言看待。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将《桃花源记》降为与“诗序”同列,是《诗》之附庸。<sup>④</sup>施蛰存也认为《记》是《诗》的序,后人裁篇单行,题作《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游记文的嚆矢。<sup>⑤</sup>诗序这个说法太不确切,首先要破掉。什么是诗序呢?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sup>⑥</sup>一般诗序,大都“自述写作缘起、主旨和阐释创作背景,是对诗题的补充,是读者了解作品的重要依据”。<sup>⑦</sup>陶渊明的作品,如《停云》《时运》《游斜川》《饮酒》等作均有序,也都是交待写作缘起、背景,而《记》却没有这些类似的交待,与诗序迥不相类。其二,认为二者属于对话关系。蔡瑜曾论及陶集不同文体之间的对话,认为《诗》与《记》也是如此。“《桃花源记》……再加上与诗组合,并列《记》的客观叙事,《诗》的主观抒情两种声音,形成文体结构本身虚实主客的对话张力与多重声音。”<sup>⑧</sup>

其三,认为《诗》与《记》是一个整体,属于文体的创新。张伯伟认为陶渊明是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大师,兼采不同文类,熔铸新体。《桃花源记》由一文一诗构成,以两种不同的体裁处理同一主题,亦文亦诗,互相映衬,正是陶渊明在文体上的一种新尝试。<sup>⑨</sup>顾农认为《桃花源记并诗》在思想上是复古的,在艺术上是创新的,其一文一诗的成组配合,同时又各具相对独立性。<sup>⑩</sup>如果《记》与《诗》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那么可以把《诗》视作《记》的隐括。如果思想倾向不一致,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记》是陶渊明独创,抑或记录润色?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回溯作品的诞生过程。

## 二、《桃花源记》的诞生与思想倾向

《桃花源记》的故事显然不是作者杜撰,而是有所借鉴。陈寅恪认为桃源故事系据传闻而写成,《搜神后记》中桃源故事乃《桃花源记》之初本。“《搜神后记》卷一之第五条即《桃花源记》,而太守之名

①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② 梁启超:《陶渊明》,《饮冰室合集》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③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8页。

④ 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92页。

⑤ 施蛰存:《漫谈古典散文》,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0页。

⑥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2页。

⑦ 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⑧ 蔡瑜:《陶诗与对话》,《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辑。

⑨ 张伯伟:《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新论》,莫砺锋主编:《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89-291页。

⑩ 顾农:《〈桃花源记并诗〉新论》,《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

为刘歆，及无‘刘子骥欣然规往’等语。”其第六条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事。“据此推测，陶公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骥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sup>①</sup>唐长孺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sup>②</sup>逯钦立也认为《桃花源记》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sup>③</sup>

除《桃花源记》外，魏晋六朝在南方存在着不少类似的遇仙传说。如刘敬叔《异苑》卷一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遂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sup>④</sup>唐长孺评论说：“刘敬叔与渊明同时而略晚。他当然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作品。然而这一段却不像是《桃花源记》的复写或改写，倒像更原始的传说。我们认为陶、刘二人各据所闻的故事而写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传闻异辞，也可以有出入。敬叔似乎没有添上什么，而渊明却以之寄托自己的理想，并加以艺术上的加工，其作品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sup>⑤</sup>任昉《述异记》卷下“武陵源”条载：“武陵源在吴中，山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于此避难，食桃李实者，皆得仙。”<sup>⑥</sup>这个故事基本上是桃源故事的简写版。类似的还有刘义庆《幽明录》所载“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故事。<sup>⑦</sup>这些传说的出现在时间上与《桃花源记》相距很近，也间接说明桃源故事在当时广泛流传，陈寅恪、唐长孺等人的说法是可信的。

我们发现，这些传说大致有着共同的要素，即沿水而入的路径，经过山洞进入平旷的地方，有桃树等。这里涉及三个道教之象，即山洞、桃树与溪水，它们构成了遇仙故事的基本要素。仙界往往需沿水路而入，这个特点如果往前追溯，还有几个有名的故事。如周密《癸辛杂识》引《荆楚岁时记》载，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于天河，得织女支机石。<sup>⑧</sup>其他如张华《博物志》卷三、《太平御览》卷八引南朝宋刘义庆《集林》所载应为同一故事，传闻异辞而略有差异。其共同点是凡人皆经水路而达仙界，这与桃源渔翁沿溪而行颇为相近。而桃树作为仙界的代表植物，在《桃花源记》及同类故事中多有出现。其出现可以追溯更早。《风俗通义》《搜神记》俱引《黄帝书》云，黄帝做桃人以立门户，画神荼、郁垒以象之，借之驱鬼。《初学记》卷二十八引《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服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sup>⑨</sup>由此看来，桃树作为仙木有着悠久的历史。桃源的山洞，也和道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陶弘景在《真诰·稽神枢》中有关于洞府的详细描述，至唐代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道教洞府基本定型。道教认为，在天地之间，除了仙岛之外，名山之中还有诸多的洞天福地。那里虽是仙人世界，世俗凡人亦可出入。

张松辉认为桃花源的原型就是道教茅山洞天，且拿桃花源与《真诰》描写的洞天做了比较，得出几个共同特点。其一，二者都是经过山洞进入洞天。《真诰》卷十一云：“中茅山东有小穴，穴口才如狗窦，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阔……便朗然如昼日。”其二，洞天里的山水田园与人间无异，虽是神仙福地，世俗凡人也能偶尔进入。《真诰》卷十一云：“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觉是洞天之中。”陶弘景注曰：“世人采药，往往误入诸洞中，皆如此。”其三，《真诰》提示，山洞即是洞天的便门，专门为世人准备的，因为神仙根本用不着。但不是谁都可以进入洞府的，只有纯真之人才可以。《真诰》卷十一云：“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秽浊，精诚不恳，无能上达。”陶弘景注曰：“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当缘秽气多

①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5页。

② 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6页。

③ 逯钦立：《关于陶渊明》，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6页。

④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页。

⑤ 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87页。

⑥ [梁]任昉：《述异记》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9页。

⑦ [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⑧ [宋]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页。

⑨ [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74页。



故也。”<sup>①</sup>陶渊明笔下的渔翁，第二次想要带人进入桃源，由于落了机心，遂不能如愿了。

《桃花源记》作为遇仙的故事，在类书中也可得到佐证。如《太平御览》卷六六三“道部五·地仙”引“陶潜《桃源记》曰”云云，可以说是一个简化版的《桃花源记》。由此可见，《桃花源记》原本就是遇仙的故事。唐代诗人大多视《桃花源记》为一神话故事，如王维、韩愈、刘禹锡诸人的相关诗作，皆是如此。宋代以后，风气转变，则视《桃花源记》为一世俗故事，其中居民即为隐居避难之人。苏轼、洪迈、方回等人皆作如是观。<sup>②</sup>即便在宋代以后，在部分词曲作品中，桃源故事依然保留着神话性质。如韩元吉【六州歌头】：“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元杂剧《误入桃源》第四折【殿前欢】：“这时节武陵溪怎暗约，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饭绝音耗。”《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赚煞】：“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我们发现，在这些作品里，桃源往往指代刘阮天台遇仙故事，天台和桃源合而为一了。这一点甚至在词牌上亦有表现，如【阮郎归】，宋以后又名【醉桃源】【碧桃春】等，隐约透露了其中消息。其实，桃源与天台合而为一，至迟在唐代即已出现，如曹唐的游仙诗《刘晨阮肇游天台》云：“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sup>③</sup>天台与桃源为什么会合流？首先，二者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遇仙故事。其次，牵涉到诗歌的用典问题。陈永正解释说：“同姓之典，如‘刘郎’之典，‘桃源’与‘天台’之典，亦经常合用。”自杜甫以来，宋代诗人作诗也喜欢合用典故，并视之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sup>④</sup>这一用典方法后来又逐渐渗透到词曲创作之中了。

也许有人说，桃源的世界实在太像人间了，说是仙境有点牵强。袁行霈对此解释说：“此仙境乃渔人偶然发现，且不可再觅，所谓‘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此亦无甚奇者，一般神仙故事多如此。桃花源与一般仙界故事不同之处乃在于：其中之人并非不死之神仙，亦无特异之处，而是普通人，因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遂与世人隔绝者。此中人之衣著、习俗、耕作，亦与桃花源外无异，而其淳厚古朴又远胜于世俗矣。”<sup>⑤</sup>这个解释不尽如人意，其中蕴含着一个矛盾，既然是仙界，却长期住着一群凡人。也许潘雨廷的解释更为合理，他说：“道教的仙境与其他宗教的彼岸世界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粹空虚死寂的世界，而是和充满了活力的人间相似。”<sup>⑥</sup>综上所述，《桃花源记》叙述的是一个遇仙故事，其所表现的思想，是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即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的思想。问题是，陶渊明是否认可这一思想倾向？

### 三、《桃花源记》符合作者的思想吗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归属，历来众说纷纭，儒释道三家标签都曾被不同的学者分别标在陶渊明身上。其一，认为陶渊明属于儒家思想。如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sup>⑦</sup>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云：“渊明之学，自经术来。《荣木》之忧，逝水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东周可为，充虞路问之意，岂庄老玄虚之士可望耶？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饥寒，而后存节义也。”<sup>⑧</sup>钟泰说：“渊明慨想大同，于诗文屡发之，不独《桃花源记》云尔也。”又说：“盖自孔子作《礼运》以来，儒者言治，惟及三代。其跨三代而思跻于黄虞者，渊明一人而已。”“渊

① 参见张松辉：《十世纪前的湖南宗教》，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120页。

② 关于宋代以来对《桃花源记》现实维度的解读，可参见李光摩：《〈桃花源记旁证〉发覆》，《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③ 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72页。

④ 陈永正：《诗注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⑤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83页。

⑥ 潘雨廷：《道教史丛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⑦ [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页。

⑧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01页。

明之学，迹近老庄，而实本之孔氏。”<sup>①</sup>朱光潜也认为陶公一再引“先师遗训”，处世近于人情，富于热情，故得力所在，“儒多于道”。<sup>②</sup>其二，认为陶渊明属于佛教思想。如葛立方认为《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远，盖第一达摩也。<sup>③</sup>熊十力《存斋随笔》云：“渊明学杂道佛，而佛之成分尤多。”又说：“陶渊明诗，有旷远冲淡之趣，而杂染佛徒西来意。览其诗集，《归园田居》有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又曰，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王船山嫌其颓废，卓哉睿识。千载来论陶诗者，未见及此。”<sup>④</sup>其三，认为陶渊明属于道家思想。如朱熹说：“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陶渊明，古之逸民。”<sup>⑤</sup>朱自清从古直笺注引注情况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次，《论语》第二，37次，《列子》第三，21次，说明陶诗里的主要思想还是道家。<sup>⑥</sup>

中国在宋代以来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几乎每个士大夫都会受到三教的沾溉。在陶渊明时代，三教合一还没有最终完成，但许多人已经程度不一地受到三教的影响。所以，我们探讨陶渊明的思想，主要是指他在三教之中更倾向哪一家，而不是说，除了此一家，他的思想中再没有受到其他两家的任何影响了。那么，陶渊明在儒释道中到底更倾向哪一家呢？首先可以排除佛教。慧远在庐山精舍与同道立誓共期西方，周围名流云集，如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诸人，皆一时之选。而当时与慧远比邻而居的陶渊明却未参与，说明诗人对其思想的不认同。汤用彤曾说：“靖节诗有赠刘遗民、周续之篇什，而毫不及远公，即匡山诸寺及僧人亦不齿及，则其与远公过从，送出虎溪之故事，殊难信也。”<sup>⑦</sup>前揭熊十力举“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之语来证陶渊明沾染佛教颇深，似不贴切。“幻化”在道教亦为常谈，“空无”虽有佛教色彩，但单词孤语，很难坐实。

陶渊明更倾向儒家吗？他曾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sup>⑧</sup>“跨三代而思跻于黄虞”，钟泰以此为陶渊明为儒家之一证。然而，黄虞是儒道两家共同想象的黄金时代，单指儒家，显然不合理。朱光潜也以陶渊明屡引“先师遗训”，谓其为儒家信徒。这个证据也不够有力。陶渊明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对此说法，诗人显然不认同。“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说，孔子的理想太高远了，不切实际，还不如下地劳作。而孔子对劳作的态度，以及对樊须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陶渊明还曾借古隐士来表达对孔子的态度。“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遥谢荷蓑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这两首诗涉及长沮、桀溺和荷蓑等三位古隐士，而他们对孔子是颇不认同的。在《论语·微子》里，长沮、桀溺耦而耕，他们对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荷蓑丈人对孔子之徒的评价也很低，即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渊明欣赏的古隐士对孔子颇不以为然，从中我们自然可以窥见其倾向。《饮酒》之二十，也是一首能够表现其对儒家看法的作品，其中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陶渊明追求羲皇时代的真与淳，显然对当下颇为失望，孔子即使有复真还淳的愿望，但时移世易，也很难有所作为。况且，从“弥缝”二字，诗人看出孔子迁就时势勉强推行儒道的窘态，其结果自然不会乐观。观此，陶渊明非孔子之徒可知矣。

① 钟泰：《中国哲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57-159页。

② 朱光潜：《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

③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5页。

④ 熊十力：《存斋随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77、75页。

⑤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3页。

⑥ 朱自清：《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88-289页。

⑦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4页。

⑧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第65页。本文所引陶诗皆出此书，不另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渊明更倾向于道家思想。陈寅恪认为《形影神三首并序》最能代表陶渊明的思想。“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陈寅恪按语云：“谓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也。”“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陈寅恪按语云：“此非主旧自然说者长生求仙之论”。“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陈寅恪按语云：“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概括言之，“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他对所谓名教也是有所批评的，“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sup>①</sup>陈寅恪标举“新自然说”，借此使陶渊明与嵇康等人区别开来。但陶渊明既不养生，又不求仙，只是委运任化，恐怕与天师道这种宗教信仰相距甚远。

其实，陶渊明的道家，似老庄，又不同于老庄。清人方宗诚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sup>②</sup>不离人事人情，又有行动的能力，说明陶渊明信崇的道家不是魏晋之际清谈的玄学，也不是修仙的道家，而更像是战国至汉初的黄老道。黄老之学在先秦汉初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范蠡、张良是其重要代表人物。司马谈对黄老道家评价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于道家曾著录《老子》《黄帝四经》等书，也说黄老道学是“君人南面之术”。这说明黄老道学是有大行动力的，远非魏晋玄学可比。黄老所谓的“无为”，不是完全不为，而是顺自然而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是落实黄老之学的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并未消歇，而是潜入民间，时隐时现。到唐代，《黄帝阴符经》被发明，和《道德经》相配，依然是黄老之学。在陶渊明诗文中比较明显表现黄老思想的作品是《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此诗表彰汉代疏广叔侄，功成身退，散尽千金，颇有范蠡、张良之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表现了陶公对仕隐的看法，亦可注意，诗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骖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清人温汝能评曰：“孔明初出茅庐，便有归耕南阳之想；渊明始作参军，便有终返故庐之志，其胸怀一而已。至于一返一不返，时势不同，所遭各异也。”<sup>③</sup>黄老强调适时顺势，时来则仕，时去则隐。即便成功，也要功成身退。陶渊明此诗差可表现此意。陶渊明侧重黄老思想的另一表现是珍惜现实生活，而非避世出尘。“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饮酒》之六更是完美呈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南山飞鸟，一派澄明，世界在诗人面前打开，万象在旁，目击道存，何必言语？有此境界，又怎会追求什么仙境？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使诗人远离了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

陈沆认为，读陶应力避二蔽，一为闲适，一为忠君。“早岁肥遁，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有怀抱。”<sup>④</sup>可谓知言。陶渊明既不是闲适的田园诗人，也谈不上激愤的忠君诗人。正如鲁迅所言，“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反而内心有一种平静。他对刘裕不抱什么希望，对东晋也未必有太多的向往。总之，他对这个时代彻底失望了。然而，尽管失望，诗人并未自暴自弃，而是坚定地站在大地上，用劳作

①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9页。

② [清]方宗诚：《陶诗真诠》，《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54页。

③ [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第117页。

④ [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二，《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37页。



证明生命的价值，用劳作呼唤人性的本真。沈德潜引陶诗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并进而指出：“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sup>①</sup>《劝农》就是这样一首作品，举舜、禹、稷、周作榜样，以劝君相之重农；举冀缺、沮、溺作榜样，以劝仕隐之重农。陶渊明为什么如此重农？黄文焕道出个中原因：“《劝农》，情理深远。绎其首末，光怪万状。开口曰‘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巧最伤朴者也。欲广用奢，财之不足，岂必智巧，愚者同有之。而必归罪智巧者，智巧生而百姓之心坏；心不坏，则欲不广。智者不作，则愚者不效也。坏风俗莫若智巧，贍民生又必须哲人。下欲愚，上欲智，上与下不同道，小智与大智不同用也。杜民智巧，惟在劝农。民农则必朴，移风易俗，返朴在是。历代作用本领，由虞至夏、周，莫不同意。此《劝农》大渊源，非独为疗饥计。”<sup>②</sup>不但《劝农》如此，陶渊明的多首农耕诗也是如此，皆有用世之意。面对浇薄的人世，他渴望有一个大回归，“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于是有羲皇之想。

通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考索，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和清静无为的玄学无关，和修仙养性的道教也无关，而是以积极入世的黄老道学为主。而《桃花源记》所表达的长生久视思想与诗人是有冲突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具体考察诗人的创作意图何在，《诗》与《记》的关系如何。

#### 四、《诗》与《记》的对话

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诗》与《记》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现象很多学者也看到了。如雒江生认为，《诗》与《记》存在着三个矛盾：五百年与六百年的矛盾；《诗》与《记》所描写的历史环境与时代特点不同，有些情景是相反的；《诗》与《记》的写作旨趣不完全相同。这之中除了第一个矛盾可以忽略之外，其他两个矛盾是确实存在的。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雒江生认为《诗》与《记》不是一篇作品，而是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写作旨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诗文。<sup>③</sup>但这并没有解决矛盾。因为这毕竟是同一作者就相同题材所作的诗与文，不会因为把二者分开各自成篇，矛盾就自然消解了。还有部分读者认为《诗》与《记》是一体的，其思想倾向也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对于其中的矛盾之处，极尽弥缝之能事。然而，这些努力也不尽如人意。这就提醒我们，不妨转变思路，正视矛盾的存在，且视之为诗人的有为之。因为像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不可能对如此显豁的矛盾认识不到，处理不了。

前揭陈寅恪引述《形神影》论证了陶渊明对修仙养性道教的排斥，在陶渊明其他诗文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闻”（《连雨独饮》），“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这些诗句体现了诗人对神仙的不信或不屑。《读山海经十三首》，诗人以现实起，以考史终，立意所在也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此外，众多的田园诗也表达了诗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以陶渊明这样的思想，他对追求长生久视的道教思想应该是排斥的。而《桃花源记》如前所述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诗人把这一故事勾勒出来，再以一首诗来回应，其意图很明确，就是对话与批评。既然不认同，既然是批评，两首作品呈现出来的内容和旨趣当然会有差异。《诗》既然是对《记》的批评，脱离了《记》就成了无的放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记》与《诗》看作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下面就《诗》与《记》逐条疏解，以呈现二者的对话关系。对其矛盾之处，读者尤需留意，这正是诗人命意所在。（1）“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记》的开头先讲渔翁发现桃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是遇仙故事的一个套路，而《诗》却略而不言，直陈世人入山避秦，桃源之人亦是如此。此与仙境拉开距离。（2）“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记》云：“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诗》说路径荒废了。二者说法相似，都是说桃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3）“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记》中只是闲闲带过，所谓有“良

① [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70页。

② [明]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9页。

③ 雒江生：《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田桑竹之属”、有人“往来种作”，显得过于恬静。而《诗》中所述，桃源人肆力农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自足自乐。无王税之可交，无王官之可瞻，三代不过如此。《诗》强调了力耕的快乐。(4)“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记》云：“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不同之处在于“暧”字，此字有昏暗不明之义，亦有掩蔽之义。“阡陌交通”是指交通便利。而“荒路暧交通”却是指交通不便利，即便有路，不常走，也荒废了，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诗》强调了“不相往来”的一面，因为大家生活富足，不需要往来相互帮衬。(5)“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记》中无俎豆之事。两个对句，说明《诗》中桃源礼制、衣裳皆旧时之制。《记》对衣裳的表述：“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外人”为何，历来聚讼纷纭。按照常理，一个与世隔绝了几百年的地方，其服饰不可能与外界完全一样。不管“外人”是指桃源之外的人，或是世外之人，都说明《记》中所写应是仙境，否则解不通。而《诗》写的是带有复古气息的理想人间。(6)“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记》云：“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诗》则更生动具体，是鲜活的人间。(7)“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记》勉强对应的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强调的是没有历史感，对世事的茫然。而《诗》强调的是，桃源无历志，叶落而知秋。无历志，即无王权，此殆所谓羲皇时代。(8)“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记》无相关表述。《诗》渴望返璞归真，是对尔虞我诈的现世的批判。陶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瞻之，实赖哲人。哲人伊何？时维后稷。瞻之伊何？实曰播植。”(《劝农》)(9)“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记》文所述，自秦至晋太元间，五百多年。一朝被渔翁撞破，显露于世。自此以下，是对《记》所写桃源故事的评论。(10)“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记》中渔翁再寻，不复得路。即便有这样的仙境，也不可能向浇薄的世俗世界敞开。《诗》强调桃源关闭的原因，淳薄不同世。(11)“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记》之末尾，刘子骥欲寻而未果。《诗》显示了对方士的不屑。(12)“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最后卒章显志。自己不会像刘子骥那样想去找一个世外桃源，也许在这个尘嚣的世界里，在自己的脚下，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诗》与《记》有重合，有差异，差异多于重合。重合是认同，这是二者相似的地方，都是避难入山，都生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里，其中的生活非常美满。差异是商榷，是对话，重要性远在重合之上。差异之中包含着忽略与增补，忽略是否定，增补是强调。一损一益之间，诗的主旨凸显了。其中最重要的忽略是桃源发现的过程，诗人有意避开，其目的是否认其神话性质，显示了桃源的人间属性。增补的是桃源人肆力农耕，以及桃源世界无王税、无历志的无政府状态。其对劳动的赞美，是诗人站在大地上面对浇薄人世的批评，希望能借此移风易俗，返璞归真。既然是对话，当然蕴含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桃源。一个是《记》中呈现的无历史感的仙境桃源，一个是《诗》中所写带有复古气息的人间桃源。仙境桃源所表述的是那个时代一般社会大众的思想，而人间桃源则表达了作者的愿望。仙境桃源是静谧的、被动的，其所表现的是世俗的仙界想象。而人间桃源，则是主动的、有为的，其对仙境桃源有所修正，有所批评，其所表现的是淳朴人世的劳作与快乐。通过对话，诗人否定了仙境桃源，表明其所向往的桃源是一个虚君主义的、无为而治的世界。那里不需要智慧，不需要王权，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最后归宗于“羲皇上人”，所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种以不同文体对话构成的新体裁，可视为陶渊明的一次文体实验。陶渊明把世俗的遇仙故事加工润色，成就了《桃花源记》这一千古名篇。但它代表着世俗的意见，作者并不认同。陶渊明最终以诗的形式对这种世俗意见作出了回应，把一个清幽恬静的桃源仙境，成功地改造为脚踏实地的人间乐土。这种文体创新也为后学开启无限方便法门，为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提供了可能。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效法王瑶的做法，将《桃花源记并诗》改题《桃花源诗并记》，并在陶集中将其置入适当位置呢？

责任编辑：刘青

# 景图在文学传播中的生成机制与意义

——以刘禹锡《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及其“涵碧”意象为例\*

戴一菲

[摘要] 于兴宗建涵碧亭景观，请人绘制成图，刘禹锡据图作《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涵碧”经过了由景到图和由图到景的两次传播。其后，“涵碧”多以景观为物质载体在文人群体中被广泛使用。传播过程中，“涵碧”以其审美视觉特性完成了景—图—诗的准确复制，因刘禹锡的名人效应，生成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建立了为政清明与“涵碧”景观之间的正向联系，并使文人雅趣在历史积淀中不断深入和强化。

[关键词] 涵碧 传播 刘禹锡 《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

[中图分类号] I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11-0170-07

刘禹锡《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以下简称《涵碧图诗》)较少有人关注，其诗是对于兴宗所赠《涵碧图》的应答之作，虽源于《涵碧图》而并非题画诗，画源于“涵碧亭”景观而先于诗歌存在。在景图诗三者彼此相承的线性关系中，能看到景观、绘画在文学意象传播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而景观的加入也突破了以往诗画关系研究中的对象限定，呈现文化生态链条中更多艺术形式的融合样态，有助于还原文学圈层的真实景象。

《涵碧图诗》云：“东阳本是佳山水，何况曾经沈隐侯。化得邦人解吟咏，如今县令亦风流。新开潭洞疑仙境，远写丹青到雍州。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sup>①</sup>从诗歌中可见刘禹锡对东阳山水之仙境多有赞赏，虽为“寻常画师”所作，却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涵碧”包孕的凛冽秋意。这种以景述情的表达在传统山水题诗中并不少见，但刘诗前还有一序，交待了于兴宗其人及其建涵碧亭之旨，特别是提示了“涵碧”原初的艺术形式，为我们考察“涵碧”意义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材料。刘禹锡并非眼见实景，却能凭图构想；于兴宗只是一位县官，却能凭借“涵碧”留名；刘禹锡、于兴宗之后，“涵碧”被后世广泛地用于景观命名。“涵碧”作为文学意象，在其生成与传播过程中，于景观和诗歌二者间勾连，其对后世影响到底更多缘于文学作品的加持，还是景观本身样式的特殊性？其中，复现景观的涵碧图又起着什么作用？这些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 一、第一次传播：从景到画的图像生成——“涵碧”审美的视觉呈现

过去，人们关注文学意象，多将其放入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相关文字文本中，考察其始源，训诂其流变，探究其影响。很多文学意象往往通过诗歌等文学作品，实现意义增殖，成为经典意象，历久而不衰。其中不少意象突破了文学的界限，在其他艺术门类中被赋予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这一类意象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诗图像与唐诗经典生成研究”(23BZW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戴一菲，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877页。



论在历史生成还是自身意蕴上,都殊于他类,“涵碧”即是其中之一。“涵碧”在唐以前较少出现在诗词作品中,《说文》曰:“涵,水泽多也。”<sup>①</sup>“碧,石之青美者。”<sup>②</sup>可见,“涵碧”一词形象而具体,具有较强的审美特性。除此之外,它还具备区别于其他文学意象的特点,并为传播带来特殊性。

首先,“涵碧”审美意象的视觉因子为由景到画提供了可能,更便于传播。《涵碧图诗》序中说东阳县令于兴宗“因构亭其端,题曰涵碧”,所谓涵碧,即水色碧绿深沉的意思。同样形容水之倒映,古人还用“涵虚”“涵空”等,意谓水映天空所呈现的空茫之感,如孟浩然《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sup>③</sup>温庭筠《春江花月夜》“千里涵空照水魂,万枝破鼻团香雪”。<sup>④</sup>古人还有“涵碧落”,碧落指天空,“涵碧落”常形容天映在水中。唐陆龟蒙“古岸涵碧落”,<sup>⑤</sup>元丁存“百顷澄波涵碧落,一行归雁渡青冥”,<sup>⑥</sup>明冯惟敏“浸青峰兮影倒,涵碧落兮光浮”<sup>⑦</sup>等即是。由此可见,“涵碧”与“涵虚”“涵空”“涵碧落”相比,着重强调了包涵之“碧”。这个“碧”字,表现了一种由色彩包裹有如碧玉般的质感,从而使“涵碧”独具魅力。刘禹锡《涵碧图诗》序中将“涵碧”描写为“碧流贯于庭中,如青龙蜿蜒,冰澈射人”,虽是简单几笔,但“碧流”“青龙”二字明确了“涵碧”的核心审美内容。

除去“涵”字,上述“涵碧”“涵虚”“涵空”“涵碧落”的区别,就在于所涵之物的特点。“虚”“空”表示的是虚无空渺之感,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触摸的;天空虽为实物,但与“碧”相比,缺少具体的形象表征。换言之,只有“碧”因其色彩上的绿,可以用具体的画面表达,给人以视觉上的感知。这种视觉因子为画家描摹“涵碧”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对景的这种图像转换才能使刘禹锡尽管未见景却如在目前。柳宗元《永州八记》创作心境与于兴宗相类,本无其景,开拓成景,其中多以诗心画意写成,可谓绝佳风景画,但未见有“图之”之说,多少有些遗憾。于兴宗“图之”虽粗,出于“寻常画师手”,但从传播的角度看,以图存景的绘画作品便于携带,为“涵碧”的传播带来了便捷,使人不用亲临,便能欣赏绝佳风景。

其次,景与图的视觉审美特性使“涵碧”在审美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使传播内容不产生偏差。古人以山水为审美对象,将其形诸文字是诗歌史上一重要内容,从而完成了从“景”到“诗”的审美过程。其中一部分山水诗为画家所摹写,作为诗意图留存于世,又形成了由“诗”到“图”的审美转换。但以诗为中介,很多时候囿于古人意在言外的审美追求,无法直接呈现形象,读者和画家只能借助文字进行想象,“图”与“景”基本无法做到复刻。即便是有明确指向的一些图文转换,都很难达到图景一致,比如绘画史上的传统母题“辋川图”,王维本人作《辋川别业诗》二十首,又自作《辋川图》。从宋代到清代,无数画家对此进行复现,包括文征明和王原祁这样的大家。但展开他们的画卷,很难看出他们绘画对象的一致性。如文征明《辋川别业图》是一种江南水乡般的辋川意象,王原祁自己说“未见粉本不敢妄拟,……以我意自成,不落画工形似”。<sup>⑧</sup>可见,古人作画再现诗意,更多的是融入自我体悟,追求神似。那自然地,“景”与“图”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同为融合景图诗三者的刘禹锡《涵碧图诗》中涉及的图、景却和上述图、景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绘画主体的追求,二是创作序列的先后。前者表现在涵碧图创作主体身份上,据刘禹锡诗云:“落在寻常画师手”,那就意味着“涵碧”风景的描摹者是寻常画师,相较于后代文人画对神似的极致要求,唐代画师还处在对形似的审美追求中。彼时流行的山水画在青绿两色上的高超技法,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66页。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0页。

③[唐]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33页。

④[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8页。

⑤[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九三,第8930页。

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36页。

⑦[明]冯惟敏:《冯惟敏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31页。

⑧[清]王原祁:《王原祁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270页。

与“涵碧”的色彩特征相呼应。虽图已失佚，但不难想象画师对“碧”的客观状写。而刘禹锡发出“犹能三伏凛生秋”的感叹，仿佛该画师有远超形似的技艺，拥有让人身临其境的能力，当然，此句亦可能缘于刘禹锡对于兴宗之褒奖。同时，《涵碧图诗》是对东阳县令于兴宗所献“图”之描绘，该“图”是对“景”的直接临摹，从而构成了从“景”到“图”再到“诗”的审美序列，区别于惯常所见“景—诗—图”的艺术创作先后环节。尽管《涵碧图》以“图”的形式对“景”进行了二次创作，但因图直承于景，略去了诗这一中间环节，且与景同为视觉呈现，具备直观性特征，使得“景”“图”之间的转换能基本保持一致，从而使得“涵碧”在传播内容上具有限定性，不易产生偏差。

由此，“涵碧”意象以其“碧”之特殊性，即色彩的呈现而区别于其他相似意象，使得审美对象在景与图之间实现了较为准确的复制，而由于景图二者的直观性特征，亦使得“涵碧”意象的呈现具有特指性，即必有含绿之水。这种图像生成和视觉呈现对“涵碧”意象在后世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为其文化意义的输出限定了范围。

## 二、第二次传播：从图到诗的文化意义——“涵碧”意象生成的双重主体

通常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对于文学史或艺术史上的经典性意象，审美创作主体对其意涵的建构是第一位的，在“涵碧”内蕴的生成过程中，刘禹锡的书写确实不可忽视，但同时，通过刘禹锡的阐释，作为原初以景观形式出现的涵碧亭，其建造者于兴宗本人的影响在对后世“涵碧”意义的传播中有所体现。

首先，由普通景观到名胜古迹来源于审美创作主体的传播能力。刘禹锡在《涵碧图诗》序中交待了写作的缘由：“惜其居地不得有闻于时，故图之来乞词，既无负尤物。”涵碧亭所在之地并不出名，所以于兴宗令人图景，并请刘禹锡赋诗。刘禹锡也不吝溢美之词，不仅在序中说“不负尤物”，更写自己“予亦久翳萝茑者，睹之慨然”，表达目睹涵碧图时的感慨，其在诗中说：“新开潭洞疑仙境，远写丹青到雍州。”东汉时光武帝定都洛阳，设立过雍州。于兴宗为东阳令在宝历二年（826），时刘禹锡由和州刺史奉调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刘禹锡作此诗时正是从和州调至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的时期，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心境，都和“居地不得有闻于时”的于兴宗截然不同。以刘禹锡的身份地位，虽可帮助于兴宗扬名，但后人在提到“涵碧”时似乎都忘记了于兴宗，只言刘禹锡诗。如宋王铎《游东阳涵碧亭刘梦得所赋诗也明日过中兴寺游览终日记所见》：“我游东阳城，隐侯昔所制。山川无古今，城邑有存废。梦寐涵碧亭，草间得遗记。飞流落天明，喷洒寒玉碎。停车风雪中，岂特生秋意。李杜到韩刘，峥嵘相品次。景因真赏见，遗句细吟咏。”<sup>①</sup>宋强至《寄题殊公禅老黄云阁》云：“还如梦得闻涵碧，谁写丹青复寄予。”<sup>②</sup>元陈樵《涵碧亭（刘禹锡题涵碧亭：犹能三伏凛生秋）》：“涵碧池头夏气清，我从三昧起经行。移樽近树传杯绿，向日看山入户青。人似亭前花不语，诗如江上草无名。山中水调知何限，不入熙宁水乐声。”<sup>③</sup>可见，名人效应在涵碧亭从一处普通景观转变为名胜古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景变为图固然在传播中更加便捷，但名声更大的刘禹锡以诗写图的举动更为“涵碧”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这一点从其与方干的对比中更见端倪。同时代人对“涵碧”的吟咏极少，方干有《涵碧亭（洋州于中丞宰东阳日置）》一诗，由题目可知正是于兴宗所建之涵碧亭，方干此诗注云“洋州于中丞”，于兴宗为洋州刺史应在大中后期（847—860），晚于刘诗。诗云：“高低竹杂松，积翠复留风。路极阴溪里，寒生暑气中。闲云低覆草，片水静涵空。方见洋源牧，心侔造化功。”<sup>④</sup>与刘禹锡面对的是画作不同，方干之诗虽无序，但大致可以看出是游观的创作。从写作姿态上看，方干与刘禹锡的差别也很大。刘禹锡一言“远写丹青到雍州”，再言“落在寻常画师手”，高居其上，俯视对象；而方干“方见洋源牧，心

① [宋]王铎：《雪溪诗集》卷四，清冰蘧阁钞本，第9-10页。

②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五九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988页。

③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8册，第358页。

④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八，第7444-7445页。

侔造化功”，仰瞻对象。方干一生活动在社会下层，未有一官半职，对时任洋州刺史的于兴宗钦慕实属自然。尽管两首诗因涵碧亭而发生了关联，但在后世文献中言及涵碧亭者，很少提及方干诗。在“涵碧”意象的传播过程中，审美创作主体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诗人作为“涵碧”意象的阐发者，亦是“涵碧”意象生成的主体之一。

其次，涵碧内在意蕴的固化与其建造者于兴宗有密切关系。刘禹锡《涵碧图诗》尽管面对的是画中之景，但和一般的山水诗一样，对景物的描述很细致，而其于一般写景诗不同之处就在于序开头叙于兴宗事迹，并在诗歌中对于兴宗做了“如今县令亦风流”的评价。

一方面，于兴宗其人，正史载录不多，而刘禹锡这首诗序成为了解于兴宗不可多得的材料。另一方面，于兴宗建造涵碧亭这一事件，通过刘禹锡诗使“涵碧”得到文化意义上的确认，风流县令与地方景观浑然一体，成为政治清明的一种表征，为文人士大夫所向往和称许。序开头云：“东阳令于兴宗，丞相燕国公之犹子。生绮襦纨袴间，所见皆贵盛，而挈然有心如山东书生。前年白有司，愿为亲民官以自效，遂补东阳。及莅官，以简易为治，故多暇日。一旦于县五里偶得奇境，埋没于翳荟中。于生自以有特操而生于公侯家，由覆荫入仕，常忽忽叹息。因移是心，开抉泉石，芟去萝茑，斧凡材，畚息壤，而清溪翠岩森立垒来。因构亭其端，题曰涵碧。”序叙作诗缘起，述诗之本事，刘禹锡诗序不吝笔墨，详细描述于兴宗为东阳令之缘由及其建涵碧亭的过程，字里行间勾勒出一个生于公侯之家却为政简易的清明县令形象。同时，于兴宗在刘禹锡的笔下也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之人，“惜其居地不得有闻于时”，含有不为世用之意，但他能于荒野中开辟胜景，并构筑涵碧亭，懂得寄情山水排遣内心苦闷。经刘禹锡建构，于兴宗的为官遭际通过涵碧亭的建造而具象化，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即为官一方，开拓风景为养其性之助，有利于政治清明。

宋《宝祐重修琴川志》载：“于东阳啸咏于涵碧亭，李虞城游憩于蠡丘馆，世率谓其游亭馆而废事，然观柳子厚论作邑者，以为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常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虚，则夫啸咏游憩之地，所以养其清明，而为政之助也。若夫杨炯为盈川令，多治亭台，书榜美名，则非为政之所急矣。”<sup>①</sup>这段文字以于兴宗建涵碧亭为例，纠正了人们对文人建亭馆废于政事的认知偏差。后《咸淳临安志》记载了关于“涵碧”的另一则故事：“涵碧桥，孤山路中。桥非名不足以润色，以雅易郑署曰涵碧，盖出于揽景而生乎？自然也。且将图以归。好事者或思见之，当出以示，或曰启塞之说，实由古之训山水之乐，未达予之志，曰：今朝廷有道，区宇无事，能敏其政，又适其性，则斯人也。庶几不为妄矣。别作五言律诗一章，章四韵，刻于他石，率大雅者和之，以永涵碧之说。”<sup>②</sup>涵碧桥并非涵碧亭，桥在西湖孤山路上，与亭同取“涵碧”之名，是为“润色”之举，原因在于古人“山水之乐”与“敏其政”的正向关联，并认为题咏“涵碧”之诗是雅正之言。可见，亭桥建造者对亭、桥之名的传播作用亦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建造主体的为政清明通过亭桥之助得以确立和显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以“涵碧”意象得以勾连，并为后人所继承。因为“涵碧”之“碧”的限定性，这种对“涵碧”意蕴的承接并非源于“涵碧”自身的审美意义的阐发，而是对建造主体——风流县令与风景客体——涵碧亭间的联系做了引申，从而引出士人为政之“山水之助”，赋予“涵碧”文化意义。

由此，刘禹锡与于兴宗作为“涵碧”的双重创造主体，对“涵碧”的流传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如果没有刘禹锡，建造者于兴宗与亭之间无法发生联系，也不能因涵碧亭留名，两个主体在传播效用上有区别。

### 三、广泛传播：从一处景观到广泛采用——“涵碧”图像背后的文人雅趣

现今留存的不少古迹，皆因文人题咏闻名。从唐人漫游所到之处的肆意题写，到宋人赏玩山水的墨

<sup>①</sup> [宋]孙应时编纂，[宋]鲍康增补：《宝祐重修琴川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9-290页。

<sup>②</sup> [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490册，第254页。



迹留痕,及至元明清,山水皆因文人赋诗而雅趣横生。其间,诗歌成为山水声名的传播者,但反过来,景观亦是诗歌传播的媒介,甚至成为文人情趣的物质遗存,帮助固着其文化意义,增强其传播效能。以“涵碧”为例,唐人诗作中较少有对“涵碧”及其景观的描写,唐之后,特别是有宋一代,不少的诗词作品中都出现对“涵碧”的歌咏,这些作品大概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唐人所建“涵碧亭”及其周边景观的描摹及追忆,二是对其他以“涵碧”命名景观的描绘。由此可见,“涵碧”意象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以文本的形式再现,更存在于景观这种可视化的图像中,且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广泛传播的物质载体以景观为主。涵碧亭为唐于兴宗所建,经由刘禹锡的题咏,得以扬名。东阳涵碧亭后世犹存,“来者未知秀老,观荆公所赠六诗,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择刻六诗于扬州禅智寺真觉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东阳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书。”<sup>①</sup>而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涵碧亭不存,杜绾《云林石谱》载:“涵碧石,婺州东阳县之南五里有涵碧池,唐令于兴宗得其胜概,……刘禹锡有诗在集中。”<sup>②</sup>涵碧原址已无涵碧亭,但有涵碧石,且宋人将此与于兴宗和刘禹锡关联。东阳人曹冠有《兰陵王·涵碧》《蓦山溪》(乾道戊子秋日游涵碧)《满江红》(淳熙丁酉六月十三日浙宪芮国瑞巡历东阳招饮涵碧)《喜迁莺》(上巳游涵碧)《夏初临》(并序)(淳熙戊戌四月既望,游涵碧)等诗词作品,其中提到“刘郎何在玩石刻”<sup>③</sup>“游涵碧,登生秋、冲霄二亭”,<sup>④</sup>可见,南宋时唐于兴宗所构筑涵碧亭已不存在,景区统名“涵碧”,而另有生秋亭、冲霄亭,“涵碧”命名亦来自于兴宗、刘禹锡二人。王铨《游东阳涵碧亭刘梦得所赋诗也明日过中兴寺游览终日记所见》:“梦寐涵碧亭,草间得遗记。”<sup>⑤</sup>金华人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中载《婺州碑记》有“涵碧亭碑”,<sup>⑥</sup>东阳涵碧亭虽至南宋已为古迹,但后人人为其立碑,可见其影响。除此之外,宋代亦出现了不少以“涵碧”命名的景观。如《(景定)严州续志》:“故地之侧为亭曰:南昌胜境,亭之南,植木为表,榜曰:屏山第一峰。又南放舟为亭曰:涵碧。庶几续旧观云。”<sup>⑦</sup>《宝庆四明志》所载:“普济寺县东北一里……寺之前德润湖之心有亭,旧名清音。天圣九年,余姚县令孙籍记。大观二年,令唐昌期改名涵碧。”<sup>⑧</sup>《咸淳临安志》载杭州孤山路中有涵碧桥。<sup>⑨</sup>《舆地纪胜》载连州有涵碧轩。<sup>⑩</sup>除方志外,诗歌中也多出现涵碧亭、涵碧轩和涵碧寺,如宋冯山《阆中蒲氏园亭十咏涵碧亭》,<sup>⑪</sup>文同《蒲氏别墅十咏·涵碧亭》,<sup>⑫</sup>刘安上《甘露亭二首其一》中所云:“涵碧轩前甘露亭”,<sup>⑬</sup>喻良能《再游东阳》有“寻幽已访涵碧寺”<sup>⑭</sup>句。无论是公共景观,还是私人营造,“涵碧”在宋代以实地景观形式得以存留,成为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宋之后,以“涵碧”为名的景观层出不穷,如元成廷圭《宁境寺涵碧轩》,<sup>⑮</sup>陈颢《涵碧池》,<sup>⑯</sup>明陈燿《文用更新涵碧亭病起游览不遇》,<sup>⑰</sup>祝允明《沧洲姚家涵碧阁》。<sup>⑱</sup>多地亦有涵碧亭,如无锡涵碧

① 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一二,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3144页。

② [宋]杜绾:《云林石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

③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36-1537页。

④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32页。

⑤ [宋]王铨:《雪溪诗集》卷四,清冰藟阁钞本,第9-10页。

⑥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附录:舆地碑记目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⑦ 《(景定)严州续志》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5页。

⑧ [宋]胡槲修、[宋]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7册,第284页。

⑨ [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0册,第254页。

⑩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九十二,第2270页。

⑪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七四一,第8646页。

⑫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四三三,第5315页。

⑬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一三一六,第14950页。

⑭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二三五二,第27012页。

⑮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3页。

⑯ [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四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2页。

⑰ [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六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91册,第983页。

⑱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亭，“池右有‘涵碧’‘湿云’及‘漱香’诸亭，皆可坐以观泉”。<sup>①</sup>扬州有涵碧楼，“水次设小马头。逶迤入涵碧楼。楼后宣石房。旁建层屋。赐名致佳楼”，<sup>②</sup>“堂后开竹径，水次设小马头，逶迤入涵碧楼”。<sup>③</sup>西湖有涵碧楼等名胜。潮州有涵碧楼，亦有涵碧堂，如“寺僧导余上，入涵碧堂小坐，启右扉而北度石桥，过绿云楼。”<sup>④</sup>涵碧轩，“江道士《涵碧轩》：‘飞阁环流水，层轩面面开。虚澄涵倒影，净碧绝浮埃。镜里闲云度，潭心爽气来。道人能有此，还似小蓬莱。’”<sup>⑤</sup>庐山有涵碧池，“有十老堂、濯缨亭、涵碧池、芙蓉径、古木陂诸胜。二百年来殆亦消归何有”。<sup>⑥</sup>涵碧由一处景观的命名开始，经由刘禹锡诗歌的推广，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文人胜迹，在历代延续中，不仅有涵碧亭，还广泛推及到楼、堂、轩、池等其他景观。

其次，传播中不断强化文人雅趣与山水景观的历史积淀。古人历来有寄情山水之作，题咏“涵碧”也不例外，如宋冯山《閤中蒲氏园亭十咏·涵碧亭》云：“日影摇吟笔，烟光落酒杯。犹嫌池外俗，移入镜中来。”<sup>⑦</sup>文同《蒲氏别墅十咏·涵碧亭》曰：“轩窗晓吹清，枕簟晴光冷。亭上逍遥人，满身摇水影。”<sup>⑧</sup>“涵碧”之景集日影、晴光、水影为一身，有清冷脱俗之感，充满文人赏玩之雅趣。但从刘禹锡《涵碧图诗》以来，“涵碧”不仅拥有现时的抒怀意味，更带有历史感，从而使“涵碧”更具人文意味，表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如东阳人曹冠《兰陵王·涵碧》云：“晚云碧。松巘飞泉翠滴。双鱼畔、疑是永和，曲水流觞旧风物。波光映山色。时见轻鸥出没。壶天邃，修竹翠阴，虚籁吟风更幽寂。登临兴何极。上烟际危亭，彩笔题石。山中猿鹤应相识。对远景舒啸，壮怀豪逸。刘郎何在玩石刻。感往事陈迹。还忆。少年日。帅旗鼓文场，轩冕京国。如今老大机心息。有陶令秫酒，谢公山屐。闲来潭洞，醉皓月，弄横笛。”<sup>⑨</sup>曹冠词是对涵碧景观的整体描绘，不仅有对碧水山色修竹亭石的细致描摹，更追忆刘禹锡当年题诗涵碧的情景，用陶潜、谢灵运的典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其另一首《夏初临（并序）》中说：“淳熙戊戌四月既望，游涵碧，登生秋、冲霄二亭，觞咏竟日。……佳山句在，我思古人，对景兴怀，视今犹昔，何异乎兰亭之感慨也。”<sup>⑩</sup>亦承袭于古人登临咏景之情怀。刘宰《东阳道旁涵碧亭》云：“斯亭作者谁，俯仰四百年。栋宇有兴废，篇章足流传。”<sup>⑪</sup>在时空差异中写尽文章千古不废的历史事实。强至《涵碧阁，东阳山水佳处。予闻且久，独未能往。近得进士与邑官唱和诗，读之景物依然，如暂经目，因次元韵附诸篇之末云》中说“吟恐昔人精魄笑，到疑盛夏骨毛寒。流觞已往双鱼在，怀古探奇两事干”，<sup>⑫</sup>亦是今昔对比。元胡助《和方韶卿游涵碧韵》中写“拂袖高吟梦得诗，缓探陈迹扣林扉。古亭禅刹自兴废，野水闲云无是非。一沼净沉秋树影，数峰长带夕阳晖。风流县令今何在，唯有苍苔满钓矶”，<sup>⑬</sup>不仅表达对刘禹锡题诗之向往，更点明风流县令之典。

古代文人士大夫眼中，山水景观可供赏玩，源于其绝佳的外在形态。可能是位置经营的巧妙，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可能是景色的奇绝壮丽，如“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亦可能是色彩的绚烂多姿，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等等。但另一方面，正如“涵碧”这样的景观，不仅有其自然美的一面，亦因历史沉淀而有了人文韵味。通过代代诗人的

① 王继宗校注：《〈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常州府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2页。

②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7页。

③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164页。

④ [明]王临亨：《粤剑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7页。

⑤ [明]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六，《薛瑄全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⑥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康熙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60页。

⑦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七四一，第8646页。

⑧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四三三，第5315页。

⑨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36-1537页。

⑩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32页。

⑪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二八〇八，第33391-33392页。

⑫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五九二，第6978页。

⑬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第79页。

再阐释,“涵碧”意蕴脱离了单纯的写景,其所附带的名人印迹不再仅限于兴宗和刘禹锡,更多富于文人情怀的典故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叠加,其内蕴不再局限于寄情山水的自得其乐,而被赋予了文人修身立言的终极意义。因“涵碧”以物态的景观形式存在,使得其间的文人情趣得以固化,更增强了其在文人群体中的显性传播。

#### 四、结语与余论

古代诗歌传播的载体多为文本化的文人诗歌全集、选集,再加上历代诗文评注本、选本等等,建构了线性的诗歌传播路径。实际上,诗歌传播属于文化生态圈层的一个方面,必然受多类型、多样式的传播形式和模式的影响。当传播对象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意蕴在审美性上产生交集时,传播主体的类型就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意象的传播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多角度叠加的晕圈模式,多角度即包含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景观等。以“涵碧”为例,景观和绘画先于诗而成,后又不断重建与命名,加强了诗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意义。唐东阳令于兴宗于县五里处发现一山水佳处,结亭其端,因其碧水澄澈,命名为“涵碧”。于兴宗请画师将此景绘成,使“涵碧”完成从景观到图画转变,也是“涵碧”得以传播的优势条件。涵碧图呈于大诗人刘禹锡手中,刘禹锡作《涵碧图诗》融情感和议论入景。同时,刘禹锡在序中点明涵碧亭的由来,褒扬了于兴宗身为县令之亲民和为政的简易,从而建构了“涵碧”的深层意蕴,即从审美角度往文化角度转变,从可观性的“碧”之风景到文人为政清明的象征,体现了传统文人寄情山水之乐的内在理趣,并以从图到诗的方式完成了“涵碧”的第二次传播。“涵碧”本身的可视化特征以及其“景—图—诗”的传播路径为传播带来了确定性和广泛性,后世对“涵碧”的容受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以景观为中介广泛运用于文人群体,并以其深厚历史感所带来的文人化雅趣得到进一步传播与再塑。

值得注意的是,“涵碧”以其在文人圈的广泛传播而闻名,但在明清两代,却出现了从文人雅玩到俗文学和宫廷景观的些微变化,如俗文学中出现涵碧庄,“听秋馆里足勾留,涵碧庄前恣步游,自怡轩小适名楼(原注:俱园中楼馆名)。几多秋,一半儿梧桐一半儿柳”。<sup>①</sup>宫廷也出现以“涵碧”命名的景观,如“内苑涵碧亭苑入黄金坞,桥回碧树湾。龙池观九岛,鳌禁觅三山。溜转云车急,花深月殿闲。从来人罕至,御榻在中间”。<sup>②</sup>“乐成殿,从椒园南,循水过西苑门半里,有闸泻池水,转北别为小池,中设九岛三亭。一亭名涵碧,藻井斗角,十二面丹槛碧牖,尽其侈丽。中设御榻,外四面皆梁槛”。<sup>③</sup>出现此变化的原因一是可能与“涵碧”的色彩之美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其时文化艺术的时代背景。对“涵碧”这一经典范例的梳理,是对古代诗图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涵碧”的由来以及传播,可见古代文化生态的存在形式。其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也不是单一的文学艺术样式所能包含的,文学、绘画和景观三者之间彼此影响,接受容纳,共同塑造出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

责任编辑:刘青

① 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659页。

② [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740页。

③ [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 Main Abstracts

### **The Classical Form of the Oneness of Body and Mind: A Study on the Body View of Epicurus School**

*Tuo Jianqing* 2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Greek philosophy. Plato not only overturns Homer's theory of the same body and mind, but also criticifies Gorgias' rhetorical thought and constructs the paradigm of body and mind dualism based on his creationism system. This paradigm of mind-body dualism influenced the mind-body thoughts of Stoicism and Neoplatonism. Based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atomism-ethics, Epicurean school emphasized that body, soul and even God are composed of atoms, and demonstrated the original unity of body and mind and the mortality of soul, thus breaking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Plato's dualism of body and mind, and transforming philosophy from the technique of soul persuasion to the ethics of body and mind unity. It reinterprets the good life in late Greek society.

### **On Stalnakerian Context**

*Hu Yang* 32

Stalnaker's theory of context defines context as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interlocutors, namely what is commonly presumed at a particular time by the interlocutors. This theory can be examined in terms of both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undational issues". Additionally, we shall argue that Stalnaker's common-ground theory of context is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about context.

### **Copyright Analysis on Larg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Proposition of a Misappropriation Remedy**

*writ. by Michael D. Pendleton, trans. by Xie Lin* 52

Whether larg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generates copyright-protected works or infringes others' copyrights, should not be bound by the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ncepts such as "originality" "substantial similarity". The adoption of these concepts aims to avoid overprotection of copyright, but it aggravate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opyright law. Therefore, it should be directly analyzed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misappropriation", and extend the defence to limit copyright protection, that is, has the defendant added sufficiently to the plaintiff's work to be said to appear no infringement and enjoy its own protection. The key problem is how to define sufficient additional investment, in which transformative use can be the consideration ground. In this misappropriation remedy approach, the originality dispute on non-human creation should not be an obstacle to acquir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I works, transformative use can be the AI training defence ground.

### **Promoting Data Elements Flow and Transaction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Basic System Construction**

*Li Junlin, Lu Shutan and Lu Jiaming* 81

Data cir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unleash the value of data.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privacy breache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hinder the flow of data in transactions. The emergence of privacy computing, enab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as effectively addressed privacy concerns in data transactions by enabling "usability without visibility" in the exchange of data elements. This shift emphasizes trading data usage rights rather than data ownership.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data elements rights, starting from reducing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data transac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rough market segmentation based on data elements,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ransaction methods of data transactions. This approach can establish a grid-like data trading market structure that spans regions and industries. By promoting effectiv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data market,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gradually implementing a market-based pricing mechanism, both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can achieve Pareto improvement and facilitate data trading. However, the current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elements is still incomplet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data circulation channels,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market-driven circulation of data elements, fully leverage their value, and suppor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Siphoning or Spillover Effects of Central Cities**

### **——An Analysis of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in Guangdong**

*Hong Weijie and Luo Biliang* 98

Revitalizing county economy is a crucial approach to achie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narrowing regional income gaps. There has been much debate on how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cities affects the growth of county economies. This article utiliz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national county and major city data from 2000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firstly, the growth of center cities' econom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county economies, demonstrating an overall spillover effect of center cities' economies on county economies. Secondly,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enter cities' economies on county economies weakens as the spatial distance increases. When the spatial distance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center cities' economies exhibit a suction effect on county economies. Thirdly,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enter c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ounty economies continuously weakens as the initial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m widens. Additionall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center cities development, a suction effect of center cities is more likely to be exerted on surrounding counties. However, as cities' economies development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it transforms into a spillover effect on neighboring counties while still exerting a suction effect on more remote counties. Above findings provide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phenomenon of delayed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s county econom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cities is not inherently contradictory to the growth of county economies; the key l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enter cities.

## **From the Protagonist to the Bystander: The Social Sketch Rule of Beiping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in 1928**

*Wang Jianwei* 127

In June 1928,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marched to Beijing. With the Joint effort of Chiang Kai shek, Yan Xishan, Feng Yuxiang, Zhang Zuolin, and local gentry in Beijing, the new and old regimes achieved a stable transition, and the Kuomintang establish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However, this process had already hidden several conflicting clues. Beijing lost its status as a national capital that has las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caused a chain reaction in area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public psychology. Faced with this change, various groups in the old capital had been watched and speculated. The new Kuomintang regime originally planned to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 but soon it was assimilated, highlighting the limits of the "unification" and the strong historical inertia of Beijing.

## **On the Materiality and Immateriality in the Creation of Art Form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Paradig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ning Emergence**

*Wang Caiyong* 152

Ar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material and the forms of the material. Within the forms of material presented in art,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materiality and immateriality, which reveals two distinct ways of meaning emerg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Western art forms not only represent the material, but also possess materiality, thus exhibiting determinacy. This determines the realization of meaning transmission occurring externally: the object exists first, and the meaning subsequently emerges. Although Chinese art forms also represent the material, they lack materiality, leading to forms without determinacy. This determines the realization of meaning transmission occurring internally: the object is indeterminate and does not precede the meaning; instead, they grow together, and meaning arises when the object takes a definitive form. The differing ways of meaning emergence characterize the distinct approaches of art's appeal to individuality. The individuality demanded by Western art forms exists in an external manner, present in the overt forms of the artwork, while the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turns towards universality. Conversely, the individuality demanded by Chinese art exists in an internal manner, not manifested in the overt forms of the artwork, while the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shifts towards individuality. Digital image art differs in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presenting a form that transcends materiality, offering a novel aesthetic beyond intersubjectivity.